极端十年
——中国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分析

作者：柯云路

目录

序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对它的剖析是我蓄之已久的一个愿望。现在，在完成了《极端十年》这部书后，这个愿望总算实现了。

在这部书中，作者的第一个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发展及结束做出尽可能言简意赅又全面无漏的概括。

对文化大革命的概括，如同对任何一段历史一样，要容纳足够全面丰富的历史素材，又要有足够的简洁。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全面印象的概括，是一切研究历史的著作首先应该做到的。

对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作者收集了相当多的资料。本书所附的参考文献目录，只是其中的一

部分。资料的丰富一方面为历史描述的真实可靠与全面完整提供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梳理资料的工作量。当最终完成了这项概括历史的工作之后，作者心中无疑是高兴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所有比较重大的历史素材，本书都尽可能依据多方资料予以确切的叙述。倘若众多资料之间有矛盾，那么，就要做出比较和取舍。一般性的资料服从权威的资料，个别的资料服从多数的资料，非原始的资料服从原始的资料，以确立历史描述本身的可靠性。

在对历史做出概括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历史素材之间逻辑的表达与把握。可以说，当一段历史以文字的方式描述出来时，它就不仅是历史事实的堆积，同时还是这些事实的逻辑关系的表现。即使那些似乎完全是大事记式的纯事实的叙述著作，里面同样有着重要的逻辑存在。一个又一个历史素材之间，一个又一个历史行为之间，语言的表达往往就包含了叙述者对历史事实的判断。

本书在对文化大革命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特别慎重地运用了叙述者的逻辑权力。对于那些重大的或不重大的、人所共知的或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作者的叙述都力求尽可能准确地表现历史。希望这些叙述中存在的逻辑体系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本书在概括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所做的又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这种剖析既伴随着对历史的叙述不断进行着，也经常“暂停”历史，做出一次又一次比较集中的分析。

剖析的总的题目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本书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了近、现代史的一部分，也当做了几千年文明史的一部分，从而在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文化大革命的生灭。

一切重大的社会行为都是由传统模式与现实经济共铸的。所谓传统模式，就是一个民族在童年刻下的记忆，它通常体现为一个民族潜意识中深藏的传统观念。而所谓现实的经济，则是指现实经济以及由此发生出的政治、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

就像一个人的行为一方面决定于他在现实中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决定于他深刻的心理特征，而这心理特征大多是由童年的经历印记而成的。一个民族自然也是这样。

本书在对文化大革命剖析的过程中，论证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保守主义力量的一次全面大反动。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在革商品经济的命。而这样一个“大革命”，又是通过极为复杂的经济、政治斗争格局表现出来的，同时还凭借和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巨大的能量。

作者希望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本质的剖析不是简单化的。

在剖析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性质及历史地位这个大母题下，本书还对一系列有着比较重大意义的子题目做出了尽可能深入一些的分析，其中包括：

对红卫兵运动的分析；

对个人崇拜的分析；

对“血统论”的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中各种社会利益与潮流的分析；

对这个当代社会中“出身等级制”的形成、发展与灭亡的分析。

对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阶级分析；

对文革中对刘少奇极端批斗的动力的分析；

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的分析；

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及“上山下乡”这些社会政策的分析；

对1975年中国全面整顿的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中“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的分析；

对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为何具有罕见的极端性的分析；

这些分析都是全面、深入剖析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同时完成的任务。读者看了，自会做出评价。

文化大革命这一页虽然已经翻过去三十年，然而，我们对它的认识未必已经足够深刻。如果这部书能够引发朋友们更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兴趣与要求，则是作者十分高兴的。

对待历史的深刻理性，是一个民族更好地走向明天的凭借。

第一章 近代的缘起（1900年－1956年）

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及社会利益所汇成的社会潮流，都有着无限推进的本能。这种无限推进的本能之所以常常又表现为有限的限度，是因为这种潮流有它的外部环境，有它与其他力量的力量对比。判断这个力量的对比和界限，常常是这个社会潮流的思想家及战略家自觉或不自觉的事情。

一、适当的历史距离

为了将中国1966－1976十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一个适当的距离考察,我们特别有必要

先在百年来的历史范围中考察一下中国的演变。

我们不妨引用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著作《极端的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概述。西方人的观察与叙述，想必便于西方人理解。又因为这段概述对中国不无善意和中肯，所以也便于中国人理解。这段文字多少能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考察放在一个不远不近的适度距离上。

霍布斯鲍姆在该书的第十六章第一节中这样论述道：

70 年代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忧心其在经济上相当不如人的落后状态。不论别的原因，单看紧邻它的日本，竟然是一个最为辉煌灿斓的资本主义成功范例，就令它着急不已。中国的共产主义，事实上绝不只能看作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分支，而它作为苏联卫星集团一员的色彩更浅。即以一点来论，中国的人口便远比苏联为多，事实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多。中国的实际人数也许不能肯定，但是一般估计，地球上每五个人里，便有一人是住在中国（東亚及東南亚一带，也有大量的华裔人口移居）。更有甚者，中国民族的同一性不但远超过其他许多国家——94%的人口为汉族——并且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虽然其间或有分裂中断），至少可能已有两千年历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两千年中华帝国岁月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在绝大多数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与典范。反之，在所有其他由共产党政权获胜执政的国家中，除了极其少的例外，由苏联开始，都是自认为文化边区，相比于先进文明中心显然落后的不毛之地。斯大林年代的苏联为什么极声尖叫，一再强调自己不必依赖西方的知识科技，大力坚持自力研制从电话到飞机所有先进的创新发明，就是它自认不如的心态的明显流露。

但是中国可不这样想。它认为——相当正确的看法——自己的古典文明、艺术和文字，以及社会价值系统，是其他国家公认的精神鼓舞及模仿对象，对日本尤其恩深泽重。像这样一个文化大国，不论由集体角度看，或从个人地位与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自然毫无半点知识文化不如人的自卑感觉。而中国周围的邻近国家，也没有一国能对它造成丝毫的威胁；再加上中国发明了火药，更可高枕无忧，轻而易举将犯境的野蛮人拒之边外。于是中国人的优越感，更获得进一步的肯定，虽然这种心态，曾使得它在面对西方帝国的扩张时，一时措手不及。19 世纪时，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变得再也明显不过——因为科技不如人，直接便表现为军事上的不如人。但是这种落后现象，事实上并非由于中国人在技术或教育方面无能，寻根究底，正出在传统中国文明的自足感与自信心。因此中国人迟疑不愿动手，不肯像当年日本在1868 年进行明治维新一样，一下子跳入全面欧化的“现代化”大海之中。因为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打倒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

中国共产党，因此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希望这个字眼不致有反答为问的嫌疑。点燃共产主义火把的爆炸物，是中国人民极端的贫困受压。首先是中南部沿海大城市帝国主义租界（有时并有不失现代的工业）里的劳工群（上海、广州、香港），其后则有占中国 90%人口的小农加入。中国农民的状况，甚至比都市人口更惨，后者的平均消费是前者的两倍半还有余。中国之贫穷，西方读者难以想像。在共产党取得政权时（根据 1952 年的数据），中国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半公斤的粮食得以糊口，每年也仅有不到一公斤的茶叶可享用。至于他或她的足下，则每约五年才有一双新鞋上脚（China Statistics，1989，Tables3l，15.2，15.5）

中国共产主义的国家性格，是通过上层与中层知识分子的血脉流送，他们为 20 世纪的中国政治运动，提供了大多数的领导人才。而它的国家性格，同样也透过中国民众普遍感受的心情传播。中国人民认为，那一批批野蛮的洋鬼子，不论对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中国人个人而言，或对中国作为国家整体来说，都没有半点好处。自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每一个力所能及的外国势力，中国都受过它们攻击，曾被它们击败，惨遭它们爪分，受到它们剥削利用；因此中国人这种深恶痛绝的感受，自然绝不是无的放矢。早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前，中国便已经掀起过数次带有传统意识色彩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如 1900 年的义和团。而共产党的抗日，无疑是共产党翻身的关键时刻，使它由一个被看作是业已溃败的社会乱源（即这个党 30 年代所处的地位），摇身一变，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和代表。共产党同时呼吁对中国的贫苦百姓进行社会解放，自然使得它对国家民族进行解放复兴的政治目标，在以农村为主的大众眼里更为可信。

因此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比它的对手占有优势。1911 年帝国覆灭后的中国，到处是军阀割据。（早期的）国民党打算在这满地残破上重建一个强大单一的共和新中国，一时之间，两党的短期目标似无不同之处。双方的政治基础，都在南方中国较先进的几处大城市；双方的领导阶层，也都由颇为类似的知识精英组成

不过一方较亲企业，另一方则贴近农工大——比方说，两边都拥有同样比例的传统地主与士绅阶级出身的男子，即帝国中华的精英分子，不过共产党内，西式教育程度较高者似乎较多（North Pool，1966，p378－382）。双方发起运动之始，也都出于本世纪初年的反帝国主义思潮，并经过“五四运动”（1919 年北京学生教师发起的一场民族思想浪潮）愈发强化。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是一位爱国者、民主人士，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苏维埃俄罗斯的教导及支持——当时惟一的革命及反帝国主义力量——同时发现布尔什维克式的一党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适合他完成任务。事实上，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主要大党，多半是通过这个与苏联联手的路线之故。中共不但由此加入正式的国家运动，到孙中山于 1925 年逝世后，更加入共和国，将其势力延展至北方中国的北伐大军。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1887－1975）始终不曾在全中国完成全面控制，虽然他在 1927 年与俄国闹翻，并且进行清党，镇压共产党人。而后者当时拥有的群众基础，主要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阶级而已。

于是共产党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乡间，在那里，掀起了一场对抗国民党的游击战，但是整体而言，成效甚微——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混乱，以及莫斯科对中国现状的不了解，自然有损害作用。1934 年，在那场英雄式的“万里长征”之后，中共军队被迫退居西北部边区的遥远角落。种种形势，使得长久以来即赞成采取农村战术的毛泽东，在中共困守延安年间，跃居而成它无可置疑的当然领袖。但是就共产党本身的跃进而言，新形势却没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 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止，国民党却逐步确立了它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但是国民党毕竟缺乏吸引中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目标，再加上它放弃了当时同时也具有现代化及复兴民族意义的革命路线，因此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始终不会成为另一个凯末尔——凯末尔同样也带领了一场现代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一方面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共产党为己用，然后再一脚踢开；只是凯末尔的手段没有蒋那么咄咄逼人罢了——蒋介石跟凯末尔一般，同样拥有一支军队，可是这却不是一支向国家效忠的部队，更无共产党部队具有的革命气节。这支部队的成员，是那些知道大可凭一杆枪、一身制服，在动乱中打出天下的一帮人。而带队的军官，则是一群深谙“枪杆子可以出政权”

——正如毛泽东本人也深谙此道——同时也可以“出财富”的家伙。蒋在都市中产阶级中，拥有相当的拥护基础，海外华侨对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却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国土地亦有九成属于乡间。这些广大的地面——如果有半点控制的话——都在当地有势力的人手中，从拥军自重的军阀，到前朝遗留的士绅，不一而足，而国民党则与他们达成妥协。

日本人大规模发动侵略，国民党部队无法抵御日军对其精华力量所在沿海各城的猛烈攻击。而在中国其余各地，国民党则终于成为它一向有可能变成的又一个地方加军阀的腐化政权，就算它从事抗日，效果也极其有限。在此同时，共产党却动员了群众，在敌后进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场几乎毫不留情大败国民党的短暂内战之后，共产党于 1949 年全面接收中国，帝制王朝结束之后 40 年的统一中断的局面，总算告一段落。对于所有中国人民来说——除了逃到他处的国民党残余是例外——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国政权正统的真正继承人。在众人眼里，它也被如此看待。因为凭着多年实践马列党纲的经验，共产党的统治足以通令全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严格体系，从中央开始，一直到庞大国土最偏远的乡野——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一个像样的帝国就该如此。组织纪律，而非教条学说，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最大赠礼。

然而，共产党中国绝非只是旧有帝国的复兴。当然，中国历史的千年不坠，共产党受惠良多。因为在这绵延不断的悠久时光当中，中国老百姓学会了如何面对应“天命”而生的政权统治；而那些当政主事之人，也娴熟了治理之道。请看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共产党国家，竟会在其政治辩论中，引用 16 世纪某官员对嘉靖皇帝的忠耿进言。50 年代有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当时即语出惊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作此预言：到 21 世纪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即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

刚开始的头几年里，这似乎也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的赏赐。农民的粮食生产，在 1949－1956 年间，增产了七成之多（China Statistics，1989，p.165），大概是因为他们尚未受到太多干扰之故吧。到中国开始介入 1950－1953 年的朝鲜战争，虽然难免引起一阵相当恐慌，但是面对强大的美军，中共军队竟然能先挫其势，后又能拒其于雷池之外，这份力量实在不容小觑。而工业与教育的发展计划，从 50 年代中期也已开始。从 1956 年起，中共与苏联的交情迅速恶化，1960 年两大共产党政权终告分裂，于是莫斯科尽撤其重要的科技与各项援助，但是中国人民的磨难并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罢了。他们受难的十字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 1955－1957 年间农村的高速集体化；二是 1958 年的工业“大跃进”运动，接着有 1959－1961 年的三年大饥荒，恐怕也是 20 世纪史上人类最大的一场饥荒；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随着毛在 1976 年去世才告结束。

几场浩劫性的冒进，一般以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毛本人。他的政策，在中共党中央内部往往只得到勉强的接受，有时甚至面对公开坦白的反对——大跃进中便可见最显著的例子。他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才能对这些事做进一步的认识；而毛自己，就是其中最佳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与俄共不同，它们与马克思及马克思的思想，等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它是一场“后十月革命”的运动，是通过列宁才接触了马克思，或者更精确一点地说，它是经过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才知道了马克思。毛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看来几乎全部袭自斯大林所著的《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1939 年）（History of the CPSU（b）：ShortCourse of 1939）。直到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始终未曾出过国门，其理念知识的形成，全是中国本土制造。但是即使是这种理念，也有与马克思思想接近之处，因为所有的社会革命梦想，都有其共通之处，而毛呢——毫无疑问具有十分诚意——正好抓住了马列思想中几点符合他见解的地方，用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然而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一个众人异口同声，意见完全一致的社会，“个人全面自我牺牲，全面投入社会集体，最终将止于至善……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秘思想”，事实上正好与古典马克思思想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论及终极目标上，后者的主张，乃是个人全面的解放与自我的完成（Schwartz，1966）。中共以为，一个人可以经由改造，产生精神的变革力量。这种强调心灵变化能力的看法，虽然是先后得自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意识知觉与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发挥得过火了，尽管列宁对政治行动□心的角色深信不疑，可是他却从不曾忘却现实——他怎么能？——他知道行动的效力，受到现实状况的局限；甚至连斯大林，也清楚其权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观意志”的力量无限，若不是以为只要愿意，人定可以移山胜天，“大跃进”这种过火行为，根本难以想像，又怎么可能发生？专家可以告诉你，千么事办得到，什么事办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热，却可以克服一切物质障碍，意志力能够转变外物。因此“红”的意义，并不在其比“专”重要，而是它指出了另一条路。1958 年间，中国各地同声掀起一阵热情高潮，这股热情，将使中国“立即”工业化，一跳跃过好几个年代，进入未来。而在未来，共产主义必将“立即”全面实行。于是无数劣等的自家后院高炉，纷纷投入了生产洪流；靠着土法炼钢，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一年之内加倍——到 1960 年时，甚至还真的增加 3 倍以上。可是 1962 年，却又跌回必大跃进之前还要低的程度。这些土高炉，只是转型中的一面。□有 24000 个“人民公社”，于 1958 年中短短不到两个月内成立；公社内的农民，代表着另一面的转型。这些公社，是道道地地十足的“共产”，不但将农民生活所有的内容都全部集体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内——如公社一手包办的幼儿园和食堂，解脱了妇女家务和育儿的操劳，反之，却将她们编成队伍送下田去——并以六项基本供应，全面取代农家的劳动所得与金钱收入。显然，这一套并不灵。不出数月，在众人的消极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极端的例子终于被放弃，不过一直要到 1960－1961 年间，天灾人祸一起造成了大饥荒（正如斯大林推动的集体化行动一般）方才结束。

就一面来说，这种对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实主要来自毛对“人民”的信仰：人民随时愿意接受转变，因此也愿意——带着他们的创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与发明能力——参与这项伟大的大跃进工程。基本上，这是艺术家浪漫的观点，就是这股浪漫心态，引导他不顾党内其他领导人士提出的疑虑与务实忠告，径自于 1956－1957 年间，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呼吁旧精英分子出来响应，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毛发起这个运动，是基于一项假定，他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或许已经在革命中（甚或由于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结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较欠佳”的同志所担心的一般，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证明众人对新秩序毫无一致认同的热情。毛心中对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于是获得证实；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与不信任，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最高表现程度。十年之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停摆，原有的知识分子纷纷被送到乡间劳动。然而毛对农民群众的信任却始终不变，大跃进期间，在同样的“百家争鸣”（即发挥各地的本土经验）原则之下，他力促后者找出种种办法解决生产问题。毛泽东在根本上深信，斗争冲突、紧张压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惟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国重蹈旧社会的覆辙。因为旧社会坚持的和谐不移，正是中国的弱点所在——这一点，其实是毛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出论点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必须靠不断的一再斗争，方能保持血脉畅通而不阻塞。革命，永远不能停止。

毛泽东路线的奇特之处，即在其“既是极端的西化，却同时又局部地回归传统”。传统模式，事实上正是毛政权甚为倚重的基础。至于以苏联为模式，具有高度重工业倾向的工业化发展，更是绝对的第一优先。大跃进的荒谬，主要来自一种盲目的看法——这一点中苏相同——认为不但要以农业养工业，在此同时，农业还得想法子自力更生，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必须投入到工业中。这种重工轻农的做法，意味着以“精神”回馈，取代“物质”诱因。转为现实，在中国就变成以无止境的“人力”替代不可得的“科技”。中国乡间，始终作为毛式体系的基石，正如同当年游击年代以来，一直未曾改变。大跃进运动排山倒海而来，中国乡间又成为工业化的最佳场所，这一点则与苏联不同。在毛的统治之下，中国不曾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又与苏联不同——一直要到 80 年代，农村人口才降到 80%以下。

毛泽东统治的 20 年间，搀杂着超现实的幻想。对这种混乱，世人自然感到震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若以饱受贫穷折磨的第三世界标准而言，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其实不算坏。毛时期结束时，中国人平均粮食消耗额（以卡路里计）刚好居世界各国的中等以上，并高与美洲 14 国、非洲 38 国，在亚洲也属居中——远超过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以外的南亚及东南亚全部地区（Taylor / Jodice，Table 4.4）。中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由 1949 年的 35 岁，增加为 1982 年的 68 岁——死亡率则持续下降（Liu，1986，p.323－324）。而即使将大饥荒考虑在内，从 1949 年到毛泽东去世，中国人口还是由 5 亿左右增长为 9。5 亿多，可见得中国经济毕竟有法子喂饱大家——比起 50 年代的水平略见增长——衣类的供应也比以前稍有进步（China Statistics，Table T 15.1）。至于中国教育，却同时遭到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波及，甚至连初级教育也不例外。天灾人祸之下，分别使入学人数锐减 2500 万左右。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毛死去的那一年里，全中国进入初小的学童人数，比起当年他取得政权时多出 6 倍——即高达 96%的注册率，比起即使在 1952 年还不及 50%的比例，当然更见成就。诚然，纵使到了 1987 年，20 岁以上的全部人口当中，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目不识丁或属半文盲——女性中不识字的比例，更高达 38%——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读书识字，在中国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1949 年以前出生的 34%的人口当中，有幸完全就学者可谓少之又少（China Statistics，p.69，70－72，695）。简单地说，在持怀疑心理的西方观察家眼里—其实有很多人根本缺乏怀疑的精神——毛泽东时期的成就也许不堪一提；可是换作印度人或印尼人来看，他的成就却相当不几。对于 80%属于农民阶级、与外界隔绝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自然也比较满意了。他们的期望，最多也就同其祖先一般。

不过在国际舞台之上，中国自革命以来显然大为落后，尤其与非共产党的邻国相比，表现更见不如。它的国民平均经济增长率，虽然在毛泽东统治期间颇为出色（1960－1975 年），可是比起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这几个中共当局必然密切注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显然相形失色。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固然庞大，却只与加拿大的总值相当，比意大利要少，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Taylor / Jordice，Table 3.5，3.6）。总之，50 年代中期以来，在伟大舵手带领下的这趟迂回之旅，险象环生，之所以尚能持续进行，是因为毛于 1966 年在军队撑腰之下，发动了一场刚一开始是由学生领头的无政府“红卫兵”运动，藉以对抗已经在默默跟他唱反调的党中央领导人士，并用以对付所有知识分子。这就是陷中国于多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最后，毛必须征召军队入场，方能收拾残局，重新恢复秩序。同时发现他自己也不得不稍做屈服，将党的控制力做某种程度的恢复。毛本人显然已到了生命的晚期，没有了毛的毛泽东主义，便缺乏实质支持。于是 1976 年即伟大的领袖去世之后，由其遗孀江青领头的“四人帮”便几乎即刻被捕。紧接着邓小平率领的实用主义路线，便马上上场了。

二、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间差零度化

上面引述的文字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生出一大片联想，而在这片联想中产生的重要结论，便有如花岗岩石碑一样赫赫然立在我们面前：

（注：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间差零度化：按马克思（而非列宁的）经典理论，共产主义应该发生在成熟过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说来，这种国家不可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因此，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革命之后的。中间是有时间差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这时间差似乎零度化了。）

一，中国这个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其高度发展的封建主义文化使得封建主义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难以改变的存在，它在世界封建主义国家中独具的完善性，使它自身保持了长久的寿命；而封建主义寿命的长久更造成了资本主义登台的姗姗来迟。

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中国没有与西方大多数国家同步进入资本主义，甚至也没有与日本同步进入明治维新那样的社会变革，这一切就造成了中国在近代惨不忍睹的民族生存危困境况。正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生存的危困境况，才以坚实有力的方式打破了中国封建大帝国的闭关自守与停步不前。

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在此基础上，有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这个“天下为公”的近代伟大革命家，在象征的意义上敲响了中国封建帝国的丧钟，将皇帝赶下了金銮殿。

二，与孙中山几乎同时，诞生了更激进、更尖锐与更先锋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它在其初期与孙中山携手并进，随后便作为一个刚刚发端的政治力量踏着仅仅是皇帝被推翻的变革成果继续前进了。

它的革命行动一方面发生于中国封建主义社会末期，发生于一个资本主义远未充分发展的贫穷国度，另一方面，就国际背景而言，它却发生在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都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已经在西方哺育了几代相继的工人阶级运动，而且造成了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这个国内、国际的巨大历史发展的时间差，以极为奇特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治力量上零度化。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既是共产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它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组织方式表现出来的是共产主义，而它在当下历史阶段要完成的经济和政治使命，却首先是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

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革命，综合了当时国内及国际背景的诸多因素，是中国当时诸多社会力量的合力的产物：

第一，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思潮及其国际势力的影响。

第二，我们看到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潮流，这里本质上是民族资本在中国发展的要求。

第三，与此相关，我们特别看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与封建势力的矛盾。

第四，我们看到了民族资本及其知识分子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之间的矛盾。

第五，我们看到了整个民族与帝国主义侵略的矛盾，这特别集中体现在中日战争上。

第六，作为这些矛盾的一个特别表现，就是国共两党的斗争，这是当时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四，这里，一个特别重大的矛盾，是整个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间的斗争，这是近代史特别是共产党的革命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共产党在中日战争中，以其坚决性和彻底性赢得了它后来赢得的一切。

正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所讲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正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在全民族的范围内以充分的合法性成长起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一个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虽然它似乎更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力量推上了历史舞台。

当一个民族面临异族侵略压迫时，除了投降，就是作战。而只要作战，就一定会使得坚决的主战派占据主导地位。没有那场抗日战争，便没有共产党的天下。民族危难之时，民族便把权力交给了民族英雄。共产党以其无产者的一无所有的气概挺身而出，它赢得了一切。

在那场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中，它无疑是勇敢和无畏的。它失无可失、奋不顾身的奋斗最终注释了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独立的中国。

五，共产党领导了民族、民主革命，它的领导集团实质上是一群接受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具有民族、民主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或许他们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充分领会国际范围内共产主义思潮与国内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进程的时间差的实质，然而，从整体上讲，他们却在实践中无比自然地合成了这两个潮流。这是实践的合成，是在一系列战略、策略的调整过程中的合成，是在整个形势迫使下的合成，是通过其领袖人物的天才选择而完成的合成。

他们领导了工人阶级，却并非从工人阶级中产生。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重大矛盾：这里有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有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之间的矛盾，有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矛盾，有整个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们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层次的统一战线。

就民族独立而言，他们有反帝的最大的统一战线。他们首先成了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利益的代言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族资本及其知识分子利益的代言人。还在反帝斗争的过程中，在有限的程度上与官僚资本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线。他们力量的源泉是因为其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这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战争。而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胜利后，

他们领导的又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人民战争。

六，当我们将观察的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力量的领导集团时，我们不仅看到他们是由那些具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倾向又接受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组成，同时我们还可以大致地（并不十分显然地）看到这里有三种不同的倾向，或者说三个有区别的层次：

第一个倾向，是最激进地照搬布尔什维克的王明路线的倾向。

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曾经占据过主流地位。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类似城市暴动这样的左倾激进策略。在对内的思想组织原则上，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大规模清洗的路线。这个倾向或者说这个派别理所当然地被淘汰了。

然而，我们在随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中，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的康生、张春桥之类人物的活动，可以说颇具某种色彩。这或许是为文化大革命这极端的十年埋下的伏笔。

第二个倾向，或者说第二个潮流，则是毛泽东所代表的稳健派。

他表现为知识分子与中国广大农民的高度统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国情的高度统一，是共产主义与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实践需要的高度统一。他们是领导人民战争的天才人物。

第三个倾向，或者说第三个潮流，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隐蔽的，朦胧的，那就是，不仅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整个西方文明有过较多的接触，有过一定的理解，因此，他们有可能在共产党未来的历史中率先表现出对商品经济及价值规律的理解与接受。

他们一方面同毛泽东一样，是领导农民战争的好手，另一方面，他们的思维与农民的思维更有先天的距离。这种潜在的素质为未来的历史，特别是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历史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内这一潜在倾向的典型人物。

七，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彻底、最坚决、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力量，它胜利了。而就其自身而言，则是一个打磨掉了偏激左倾倾向的毛刺、坚持稳健务实的农民战争路线的胜利。

八，中国共产党终于掌握了国家机器，他们成为一个组织严密并广有威望的政治力量。从经济上讲，他们以革命胜利的名义直接剥夺了官僚资本，并将此归为国有。他们现有的是由剥夺而来的极其微弱的一点工业。

他们兑现诺言，将土地分给农民，同时也便面对了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这在眼下只是可以获取税收的一个社会底盘。他们还将面对的是私有的民族资本和私有的个体手工业者以及知识分子。他们还领导着工人阶级，而工人在有限的国有化工业及民族资本的工业中为数不多地存在着。

共产党人面对这样一个经济现状，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工业化必然成为他们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

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工业化无疑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历史潮流。在中国，自然是共产党承担起了工业化的任务。

因为这是一个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纲领的政治力量，它必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在实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它所处的国际、国内背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工业化过程必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

一，由于世界已经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形成了两极世界，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开始的。这是一个对其有着重大影响和制约的大背景。

二，正是在两极世界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业化进程自然而然地依靠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这对于既缺乏资金又缺乏技术且急于工业化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从历史的角度讲，苏联在当时做出的援助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无疑是响亮的一笔。

三，也正因为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工业化过程始终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广大的国土上都洋溢着高涨的反帝气氛。

“抗美援朝”这样的历史事件虽然就现在看来与很多偶然因素相联系，与当时的金日成及斯大林的秘密策划相联系，但究其实，是东西方世界对峙的产物。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实行了“抗美援朝”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无疑使中国处在了对外战争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当时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实行的是战时的经济政策，这对于随后的工业化过程中强化在经济领域的国家行为无疑给予了足够的诱导和鼓励。想一想当时全国上下节衣缩食、奋发劳动、无保留地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广泛社会激情，就能够想像共产党人在这里汲取了多大的“以政治号召经济”的自信心。

四，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它的工业化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由此，我们就会非常清醒地看到它当时在国内面临的现状。

因为它取得了政权，掌握了国家，土地、矿藏、河流及森林为共产党所掌握的国家所有，这是经济上的最大资源。而对官僚买办资本的直接剥夺，使它有了最初的一点国有化工业。这都是共产党当时可以直接掌握的经济力量。

当它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面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时，面前还有着三大部分经济版块。一个，就是已经得到或者将在土改中继续得到土地的数以亿计的个体农民。一个，是有一定数量又为数不多的手工业个体劳动者。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民族、民主革命中被共产党人视为同盟军的民族资本。

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进程主角人物是共产党，它此刻所做的事，是将战争状态转化为建设状态，将夺取国家变为建设国家，将政治上、军事上的征服转化为经济上的征服。而经济上的征服，在如此的经济现状中展开，自然而然就表现为“一化三改”的总路线。

正像毛泽东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重要批示中指出的那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第 89 页）

这条总路线就近代社会一般民族主义潮流而言，可以注释为工业化纲领。而就中国社会主义而言，其实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领域或者说在所有制领域的一个征服。

毛泽东曾在 1953 年 10 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第 119 页）

紧接着，在同年 11 月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又一次谈话中，他又继续指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第 123 页）

看清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业化过程的社会主义性质，看清楚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扩大国营企业，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社会主义改造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使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的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国有化。

这样说或许太绝对，那么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将这三个方面在越来越深的程度上纳入国有化经济的领导、支配、干预和计划之中。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是在苏联的援助下扩大已有国有经济的规模，另一方面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实行改造。

这一经济上的征服，当时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历史上这个无与伦比的巨大政治力量的不可遏制的行为。

五，当我们站在今天回顾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改革时期已有的经济格局中回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明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完成那个并非容易的经济领域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不无风险的社会变革，共产党人当时凭藉了它在方方面面的巨大优势：

第一，凭藉了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与信用资

本。

第二，凭藉了与共产党在全民族中建立威望的同时形成的毛泽东个人的领袖威望，这种威望从某种程度上讲，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崇拜深刻联系，有着广大的潜能。

第三，凭藉着它领导并发动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民族英雄主义行为的号召力。

第四，凭藉着土改过程中将土地分给农民所形成的信用和感召力。

第五，凭藉着使中国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走出失业的困境、提高了就业率、提高了社会地位所形成的阶级感召力。

第六，凭藉着对大量知识分子的团结、安置、发挥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所形成的对知识分子的感召力。

第七，凭藉着争取来的苏联经济援助，这在当时无疑也是团结、号令全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资本。

第八，凭藉着将在明天的中国实现的共产主义蓝图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共产主义的前景不仅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直接吸取了逻辑的力量，给予中国的知识界以思想上的影响，它在实际中无疑借助了苏联在当时已取得并显示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影响。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种辉煌的憧憬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在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度里，形成了一种天堂就在眼前的光明前景。

从城市到农村，广大民众无不通过共产党层层组织的宣传，受到这个蓝图的吸引。百里聚会围看一辆拖拉机的农民，无不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

第九，凭藉着共产党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力量。这个组织力量是令人惊叹的。特别是它携带着当时特有的种种锐气，表现出史无前例的进取精神与组织效率。这在涣散了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一个结构，它的有效的系统与神经网络触及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

正是凭藉着上述优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总路线中改变所有制这样一个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它支出的是曾经具有的巨大政治资本，当这个进程发展到随后的公社化乃至更极端的阶段时，我们难免会说，共产党在这样的经济变革中，还“透支”了它的政治资本。

六，客观地说，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化三改”过程，特别是它所领导的农业的合作化过程，并没有表现出过分勉强和生硬的政治强制性，而这种过分勉强和生硬的政治强制性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曾经比较惨烈地出现过。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民战争中起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政治家们无疑比斯大林更了解农民，他们对广大农村的政治领导也远比苏联当时的共产党更有效得多。在整个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地方的农民以比较热烈甚至十分热烈的方式加入了合作

社。

然而，如果深究农民行动的全部心理背景就会发现，这里一方面确实存在着生产合作的实际需要，无论从耕作、从水利、从使用机械，到后来的推广农药、化肥等等，另一方面，也深刻表现出了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急于一天富起来的盲目冲动。

在中国这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中，全民上下（包括广大农民在内）都缺乏经济上的现实主义。这一点我们将在随后对公社化等历史阶段的分析中着重剖析。

七，“一化三改”的基本路线，就其“三改”而言，也就是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在 1956 年就基本完成了。但是，这种经济领域的社会变革以及社会主义的征服其实还有继续推进之意。

正像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第 374 页）

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造是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内、所有制领域内进行的一场革命，是一种征服，是一种占领，它本身是一种趋势，是一种潮流。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及社会利益所汇成的社会潮流，都有着无限推进的本能。这种无限推进的本能之所以常常又表现为有限的限度，是因为这种潮流有它的外部环境，有它与其他力量的力量对比。判断这个力量的对比和界限，常常是这个社会潮流的思想家及战略家自觉或不自觉的事情。

如果广大农民一天之内就纷纷拍手，都要求加入合作社，那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可能远比当时更快地完成。如果广大农民表现出比当时更多的消极、动摇与怀疑，那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可能要大大地放慢步骤。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与广大农民之间经过反复商讨签定的一项契约。双方的利益、意志和力量都体现在这个契约之中，也体现在这个契约的形成过程中。

八，在随后中国农村所推行的公社化运动中，上面所说的那个含有推进之意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时，界限偏离合理性的距离更加明显了，广大农民最终表现出的生产劳动的消极性表明了他们潜在的不满。

而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农村的政策更进一步向极端发展。

当“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剥夺了“自留地”等一切带有农民个体形式的经济成分，还几乎剥夺了农民在个体生存上的一切自由空间时，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口号既注释了当时政治上的极端纲领，也注释了当时在经济上的极端纲领。

今天，回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历史，使得我们在瞻前顾后的全过程考察之中，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的性质及其规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当农民放下锄头，袖手蹲在大寨田旁，聆听各种政治口号训导时，那一片麻木不仁的劳苦面孔，注释了一个经济及政治纲领中所含有的不合理性。不合理的社会契约常常有一方不愿遵守。而只要有一方不愿遵守，这个契约必将流产。

九，社会主义改造对于中国大概是必要的，然而其进程在不同阶段有其自身合理性的度。将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变成一个极端的纲领时，先是公社化，后是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最终导致的是破解。

极端化的破解孕育出的就是今天的改革。

无论是工商业中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还是农业中的分田到户，这一切改革中推出的新经济纲领作为几十年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让我们对比着回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起始。历史深刻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变革中集中与反集中的力量对比及其合理的界限。

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关系、一切格局都通过有形的或无形的七月结构在一起。一个适宜的经济纲领或政治纲领表现为与社会上各行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合理的契约。永远没有一厢情愿的事情。

十，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最简单化的一些反思。

有人说，如果中国当时不搞公社化，大概会好得多。更有人说，如果当时合作化只停留在初级社的阶段，而不盲目求大、求高，搞高级社，是否我们的农业发展会好得多？

这是纸上谈兵的反思。依然是一派善良的意愿而已。

历史并不这样思维。历史的所有格局是由不同的社会力量相互界定与平衡出来的。

倘若共产党当时没有那样高的信用与号召力；倘若当时没有“抗美援朝”形成的国家战时经济的行政权威及其后效益；倘若没有当时苏联给予的经济援助；倘若中国共产党没有其共产主义远景的蓝图；倘若共产党没有那样巨大的政治组织力量；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大概不可能那么搞，也不可能那样样顺利，更不可能给了共产党继续搞人民公社的自信。

正因为那一切“倘若没有”的因素都有、都存在，当时“总路线”的出现与贯彻就是必然的，作为历史来讲是无可非议的。对任何力量、任何利益所汇成的任何社会趋势，我们都只有在与其他力量的相互界定中确定它的边界。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在这几十年中，就生产关系而言，我们看到了不同经济成分的相互矛盾与斗争，看到了不同所有制成分的相互矛盾与斗争，也看到了计划经济绝对扩张的趋势与市场经济绝对扩张的趋势的相互矛盾与斗争。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矛盾斗争有其自然的、合理的界限，有其合理的相互关系。

十一，在共产党内，特别是领导集团内，对于这种矛盾斗争一直有着感应。

合作化时期，就有激进与保守的差异与分歧。后来公社化时期，又有冒进和求稳的差异与分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又有主张“三自一包”和反对“三自一包”的差异与分歧。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坚决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宽容“资本主义尾巴”的差异与分歧。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主张责任到户、包产到户与反对这些改革的差异与分歧，还有主张外资进入和反对外资进入的差异与分歧，有允许民营企业出现和反对民营企业出现的差异与分歧。

这实际上是党内的根本分歧，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说得概括一点，就是接受商品经济与反对商品经济的斗争。

就本质上而言，是整个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本质矛盾与斗争。

十二，总之，文化大革命是反对商品经济的政治纲领的极端表现，而改革是接受商品经济的最完备的纲领表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对中国工业化充满热诚的政治力量，透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完成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又进行了公社化，再随后，于文化大革命中将其推向极端。正是在这个极端的表现中，原来经济纲领中所隐藏的某种程度的不合理性充分暴露了。

这个不合理性就是对商品经济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排斥，就是用政治的手段来抑制商品经济的顽强力量。超强的政治力量在强制经济的进程中，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及范围内奏效，表现出种种干预与调整；然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在根本的性质上，经济将以其自身的力量摆脱任何过分的政治强制，走出自己的道路。

第二章 新阶级斗争纲领（1956 年－1959 年）

当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从而使整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发言权被剥夺之后，真正能够对社会发表经济上、政治上现实主义声音的派别，就只能出现在党内了。

1957 年还未被人预料到的这个“阶级斗争”重点向党内的必然转移，两年后在庐山的政治硝烟中露出了最初的清晰轮廓。

一、商品经济规律的顽强显现

熟悉思想史的读者大概已经看到，我们在上一章的某些叙述中借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现在，我们将更为广阔地拓开眼界，磨锐目光，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更透彻的剖析，揭示出是什么样的历史过程孕育出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怪胎。

正像了解近代史的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的政党，其革命纲领显然同时就是阶级斗争纲领。在民族与民主革命时期，这一纲领就是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领导和团结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自然表现为发展已有的国有经济，改造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化三改”的阶级性质依然是十分显然的。改造三种经济，也就是改造农民、手工业者及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人。

按照共产主义者通常的思路，是有一天而且是尽快地有一天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全地变为国有，从根本上消灭商品经济，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毛泽东本人曾经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共存，还存在着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不过，在他的视野中，这一定是个比较短暂的过渡时期。即使在这个过渡时期，对商品经济也将做出极大的限制。

将商品经济限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这大概是当时幼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可以理解的思路。而急于超越商品生产在历史上的必然阶段，迅速达到共产主义，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通有的基本症结。

他们面对的是商品经济自身的历史发展趋势，他们始终要和商品生产的各种规律（譬如价值规律）作顽强的斗争。他们过高估计了国家行为的强制性力量，而忽略了商品经济不可忽略的伟大潜力。

在一个领导了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从而掌握了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力量的视野中，商品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东西。比起战争，比起国家，比起政权，比起群众运动，它似乎渺小得多，微弱得多。显然，他们并不了解它那包罗万象、无孔不入并顽强不息的伟大力量。

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得知，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不过是指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物化于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价值规律的实现是有着普遍性法则的。通过供求矛盾的调节，资本总是流向利润高的生产领域，因此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这造成的最终结果是，一切商品的价格总在其价值的上下浮动。

当社会主义将主要的生产国有化，将经过改造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也纳入国家计划之下时，价值规律似乎被掩埋了，似乎可以忽略，可以从轻发落了，但其实只是以更为曲折的方式显示它的力量。

计划价格下的统购统销，可以保证国家对所需农产品的掌握，并且可以保证国家以适当的比例取利于农业，累积自己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然而，农民却可能不种赔钱的或挣钱少的粮食，而去种挣钱多的经济作物。无论是个体农民，还是集体化了的农民，都可能采取这样

的对策。这是价值规律最初露出的力量。

于是国家就会下达计划种植面积指标，规定各地区必须保证的种粮亩数。而个体的农民或者集体化的农民（后来就全然是集体化的农民）又可能与数字作斗争。他们可以对种粮亩数少种多报，阳奉阴违。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各种带有国家行为性质的管理与监督，看到了下乡的领导干部拔掉农民种植的西瓜苗，看到了就地召开的田头批判会。在那里，有正气凛然的干部讲演，有讷讷无言蹲在田头的农民群体。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种粮面积在亩数上有了这样或那样的保证。

然而，农民仍有可能做出其他方式的消极抵制。在粮食田中较少投入，而将更多的投入转向各种合算的经营缝隙，还有种种数不清的对策。于是，就出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的帽子，就有了更多的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甚至将这种斗争极端残酷化。

当斗争的残酷仍不能奏效时，国家就不得不调整价格，使之合理（使农作物价格接近其价值），或者采用一系列变通政策，更或者，就有了今日这样的全方位改革。

通过长久的、有声有色甚至有血有泪的历史阶段，价值规律终于以顽强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急于超越商品生产特定阶段的共产党人，始终自觉不自觉地与看来微不足道的价值规律做着不懈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看到，党内总有一些务实的人士构成了务实的派别，他们就是我们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至今几十年中看到的各种所谓党内的右倾倾向、右倾派别。无论是农业合作化时的右倾，还是三年困难时期提倡“三自一包”的右倾，或者其他形式的右倾，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在党内内的感应。

今天，当我们的目光直指几十年前的历史时，我们看到这一规律还未被当时的人们所充分认识。那时候也不可能完成这个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在庆祝它的“一化三改”的伟大胜利。

二“匈牙利事件”与反右斗争

1956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在相当正式的意义上宣告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个政治报告当然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审阅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作的重心也发生了重大的转移。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已被基本消灭，私有制也基本上不存在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以及建设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课题被提上主要日程，这对于走向共产主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事情开始发生变化。1956 年 10 月 23 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二十万人大游行，最后造成了纳吉上台、苏联出兵等一系列政治变动。这一政治变动又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次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共高潮。“匈牙利事件”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是有触动的。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时期不无清醒地着重思考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问题。他在 1957 年 2 月的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演讲。这个演讲当时成为一个颇获热烈反响的政治文本。

那时的毛泽东显得从容、镇静和有条不紊。他充分估计到了

“匈牙利事件”的严重性质，同时更充分估计到了中国共产党与匈牙利共产党相比之下更大的优越处。无论从哪方面讲，中国共产党都处在远比匈牙利共产党更有力的地位上：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幅员的广阔，政治、军事的强大，“一化三改”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个人的威望。这一切都使毛泽东自信而从容地走出顺理成章的新步骤。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后来由《人民日报》于同年 5 月 1 日公开发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便正式开始了。

毛泽东以极为自觉的意识发动的这次整风运动，既体现了他对“匈牙利事件”教训的汲取，也体现了他“天下在握”的自信，还体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后，他所领导的这架巨大的政治机器寻找新的运动与进取的必然趋势。一个政治力量只有在政治行动中，才能表现和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然而，“整风运动”随后的发展和变化却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他在 1957 年 5 月 15 日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已表明共产党正面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意料之外的情况。那些主要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抨击，似乎已经开始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特别是在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教育界、工商界和某些民主党派中，这种情况甚为严重。

然而，全局在胸的毛泽东显然看透了这里悬殊的力量对比。在“敌寡我众”的优势下，他不仅没有显出任何慌急，而且有意放慢反击的步伐。因为他看到了这里潜伏的一篇好文章。看到了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声有色地做一下的题目。

把潜在的反对派诱发出来，这不仅能够“引蛇出洞”从而消灭毒蛇，而且让毒草生长出来。在与毒草斗争的过程中，震慑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在消除隐患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的领导权。这在毛泽东眼里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因此，他从容地做出部署，给了右派分子们一个“大鸣大放”、充分表演的时间，而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反击。

他在 1957 年 6 月 8 日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做了分外妥当的安排。这是一个“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的斗争部署。这是一个发动全党全民对右派分子群起而攻之的斗争部署。

正是在这一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第 432 页－433 页）

同年 7 月 1 日，毛泽东还专门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表明反右斗争将更大规模地展开。

反右斗争并不很吃力地取得了胜利。作为这个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政治纲领有了新的变化，这是与"八大"政治报告中的纲领有明显差异的变化。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做出了结论性论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他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第 456 页－465 页）

这里提出的是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大不同的结论。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阶级斗争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结论。

随后，在 1957 年 9 月－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段论述更加经典地道出了新的阶级斗争纲领。相对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既顺理成章（因为有了"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斗争）又显得突兀的结论（因为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完全不同）。

毛泽东对此做了极为明确的解释。他说："八大"文件中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服服帖帖，问题没有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上层建筑中的问题，当时都看得很不清楚。经过这次大鸣大放，资产阶级要造反，问题就看清了。因此应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这样，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整风运动"，反右斗争，一个新的政治纲领诞生了。

三、新阶级斗争纲领

1957 年“整风运动”引发出的反右斗争，虽然时间不长，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影响却是重大的。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一个新的政治纲领，或者说一个新的阶级斗争纲领，在这场斗争中诞生了。这是中国当代生活中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也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之源。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意识形态的，它的阶级斗争纲领又必然在理论上自洽。就一般的意义上讲，阶级的划分本是经济范畴的事情，是所有制关系的一种体现。现在，经济上对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既然已经基本结束，要维持阶级斗争的纲领，就必然要提出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理论依据。

这时，在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的理论学说似乎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过各种形态的说法被越来越明确地提了出来，并终于在一定时候成了不容置疑的理论。

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剥夺了，在政治思想上却不但存在而且还可能在比较长久的时间内存在，因此，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将是长久而重大的事情。这个理论一旦形成，就成了“武装”全党、同时也“武装”全国人民的理论武器；也成了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政治存在、政治势能。

如果说孔孟学说曾经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个巨大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政治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纲领便成为 1957 年之后的二十年中贯穿全党、全国的一个“传统文化”。

这个“传统文化”发动和支持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二，这个新阶级斗争纲领还在某种程度上特别具体地规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

1958 年 5 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曾经明确指出：与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对立的两大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则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这一阶级定义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它在相当明确的意义上将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划入了阶级斗争对象的范畴之中。

三，与此理论相应的阶级斗争事实是，反右斗争以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而告结束。

五十五万右派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的结果是，99%以上的右派被改正、平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右派集团的划定，实际上是把任何有不同政见可能性的知识分子都打入地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政治权力。

这成为中国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历史事实。“地、富、反、坏、右”成为阶级斗争固定的靶子。它对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十分重大。

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实际上剥夺了知识分子整体在政治思想上发表言论的权利。这是新阶级斗争纲领得以诞生的祭奠与牺牲。

四，正是整风与反右运动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在相当意义上有独立影响的政治力量。

中国农业人口众多，但整体文化水平低下而且涣散。工人阶级在落后的旧中国人数原本就很少，新中国工业的发展也还没有给他们更成熟的发展时间。当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划入右派、归为“阶级异己分子”之后，其在政治上的力量已经微乎其微。

五，接下来能够代表所谓资本主义倾向发言的，就只有党内的领导干部了。反右斗争似乎解决了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其结果必然导致将未来斗争的重点移向党内。

这一点在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预见到。那些曾经高扬阶级斗争旗帜进行反右斗争的领导干部也绝未想到，他们中的某些人最终将会沦为更重要的阶级斗争对象。这是社会政治发展的辩证法。

在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并彻底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哺育和发展了像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些专事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杀手。新阶级斗争纲领弥漫的二十年间，在党内造就了这样一批人，包括文化大革命中风光一时的戚本禹之流，都属此类。

江青是其中的精英。

总之，在政权内部，在共产党内部，已经潜伏着一批充满厮杀冲动的、野心勃勃的、随时准备进行政治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狼犬。

六，旧的知识分子已被划入政治另册。而新一代知识分子从小在新阶级斗争纲领的哺育下正在成长起来。

整整一代中小学生接受的是反右斗争的教育，“大跃进”的教育，公社化的教育。十年后，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冲锋陷阵者。

七，反右斗争震慑了全国，党的权力更为强化和集中了；震慑了全党，毛泽东作为领袖的个人权力和威望更加集中了。伴随着新阶级斗争纲领的推行，这一切成了新一轮革命的必要条件。

八，“反右”的胜利造成了中国政治生活大幅度向“左”的方向倾斜：“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干部下放”，“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秋后算账派”和“观潮派”。

林林总总的“左”倾意味十分明显的政治行为，是反右斗争在政治上的必然延续，是新阶级斗争纲领的必然产物。从而导致 1958 年席卷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业共产主义

新的阶级斗争纲领是在整风和反右斗争之后真正形成的。

今天我们回头去看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从那个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还显得朦胧的理论状态。

一方面，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第 373 页）

这表明他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一种温和估计。这种估计是在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经济建设的喜洋洋情绪浮上共产党人心头的一幅图画。

当然，毛泽东从来对阶级斗争是敏感的，因此，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第 375 页）

在这里，他仍然把阶级斗争保留在自己的视野之中，但是对它的注释无疑又是十分温和的。

有着超越一般共产党人政治敏感的毛泽东，在这个和风细雨、谆谆教导般的讲话中同时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第 389 页）

可以看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看来充满和风细雨的经济建设气氛的讲话中，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新阶级斗争纲领的萌芽。而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新阶级斗争纲领终于成形了。

它的直接后果，就是 1958 年、1959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广泛开展。这是借着 1957 年反右斗争势如破竹的政治优势，经过一系列逐节推动的政治发动得以形成的。

1957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农村展开了大鸣大放，进行了两条道路的群众性大辩论，将反右斗争的政治成果在农村普及化，将阶级斗争新纲领的威慑力普照到六亿农民头上。

同年 10 月 26 日，《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开发表。《纲要》指出"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并明确指出今后每年要"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正是这个《纲要》，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跃进的指标。

同年冬天，全国广大农村涌现了大兴水利、大抓积肥的群众运动。这时的农业行为无疑还在经济合理性的范围之内，但是已经为 1958 年震惊世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心理铺垫。

195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全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潮头。

到 1957 年底，整个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张满了“大跃进”之强弓。

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判了 1957 年党内右倾分子搞的“反冒进”，指出这是“方针性的错误”。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可以视为对“大跃进”的进一步推动。

1958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进一步推动“大跃进”运动：“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的‘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还特别明确指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该永远使用下去。”

1958 年 5 月 5 日－23 日，在中共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做了推动“大跃进”的重要讲话：“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到，”“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是全面号召开展“大跃进”的纲领性口号。

“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城乡，农村空前热烈。在这个“大跃进”浪潮中，农村自发诞生了最初的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同年 8 月 4 日－13 日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时，不失时机地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个讲话很快便作为一个号召传达全国，广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同年 8 月 17 日－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将近一年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化为了一系列明确的决定，最主要的有：一，号召全党全民为在 1958 年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三，今冬明春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北戴河会议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极为壮阔的规模开展了。全国农村都在 1958 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农村田野和城市的机关大院里，矗立起一座座熊熊燃烧的炼钢、炼铁的土高炉。

中小学生则挥舞着系在竹竿上的红领巾，敲锣打鼓地与城市居民及乡村农民一起展开了轰麻雀运动，用这种全民动员的方法使麻雀在空中惊恐飞行不已，直至疲劳坠地而死。这种群众性的灭“四害”运动在当时不过注释了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同时兴起的，还有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小学校的土高炉同样炉火熊熊。

当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最终以经济上的惨重代价结束。它对经济上合理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生产资源的破坏，对并不富足的物质储备的破坏都是空前的。

横刮过来的“共产风”造成的经济损失，加上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还造成了中国农村人口相当幅度的减少，饥饿所造成的恐怖与死亡，至今以极为惨烈的教训深深留在几亿农民的记忆中。

当我们今天以历史的审视来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出现的根源时，可以清晰地得到如下结论：

一，这首先是反右斗争及在这个斗争中形成的新阶级斗争纲领的产物。

正是这个斗争与这个纲领造成了政治上空前的威慑力，造成了政治上向左倾、向左移的巨大势力。这种巨大的政治势能最终施加到经济领域，便以左倾的经济纲领与运动表现了出来。

二，这是以政治方式动员经济，以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的典型思路。

正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政治动员经济，群众运动搞经济的习惯模式在新阶级斗争纲领的照耀下进行了一次极致的表演。

一切模式都渴望再版。

一切模式都会因势利导地寻找机会再版。

一切长期的或短期的传统与习惯都会显示它的作用。

当机缘凑巧时，就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夸张表现。

三，之所以产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无疑还受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急于在经济上超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冒进趋势的影响。

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都有着企图运用政治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以及计划的力量来使本国经济有一个超常发展速度的冲动。

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有这个冲动。而且，它在政治上的高度自信和优势，它在思想上和群众动员上所具有的高度效率、能力和自信，使得它在这方面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

四，党内并非没有务实的思想倾向，那些对经济发展规律有更多一点感应的领导成员，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有所保留。然而，又有哪个人能够阻挡这个大势所趋的潮流呢？

在那个潮流中，有反右斗争之后的新阶级斗争纲领的威严，有全党上下的政治热情，有号令了全国又在全国得到反应并形成的“超英赶美”的高涨情绪，有共产主义的蓝图高悬蓝天，没有多少人可以在那个潮头上发出更明确的反对声音。

考察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此前后都表现出某种务实精神的领导成员，在“大跃进”方兴未艾的时期同样发表过许多助长冒进、浮夸的讲话。

五，还不懂得尊重商品经济规律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在这时表现出了典型的指标经济：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粮食产量，层层追求指标。

向上汇报指标，向下要求指标，层层加码，层层增加指标。

高指标意味着政治上的坚定，高指标也意味着政治上的成绩。高指标还意味着一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升迁。

在追逐高指标的运作中，我们看到当时广大城乡特别是乡村，有相当一些基层干部“革命”得可爱，积极得可爱，冒进得可爱，夸张得可爱。

六，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普及到广大农民时，我们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

“农业共产主义”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亩产万斤粮，田野筑高炉，吃饭食堂化，这确实是毛泽东与整个民众合作讲述的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民众特别是农民欢呼般地大炼钢铁的狂热，家家户户熄火灭灶、吃食堂、开大锅饭的狂热，可以说是对农民几千年勤俭自耕的小私有观念和个体劳动的一次大反动。

那是一种彻底的解放。

类似许多民族中放弃一切禁忌的狂欢节。在狂欢中，不仅可以践踏一切秩序，还可以恣肆消费日常勤俭累积起来的物资。

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这种方式能把生产搞上去，当人们放弃一切生产的、劳动的、财产的及家庭的禁忌，撒欢地在田野中、土高炉旁、公共食堂中“大跃进”时，这不过是另一种狂欢。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整个民众的思维模式造成的故事。

其中还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企图一天就富裕起来的激进。

就毛泽东本身而言，他内心深处同样深藏着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模式。这是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以及在农民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很容易产生的乌托邦。

五、庐山会议揭开了阶级斗争新阶段的序幕

1959 年 7 月 2 日－8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庐山连续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初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十九个问题进行座谈讨论，试图继续纠正当时已有所觉察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冒进、浮夸等“左”的倾向。

正是在这个会议期间，7 月 14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下长达万言的意见书。在这个意见书中，彭德怀明确指出：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也指出了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且对党内缺乏充分民主的情况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当然地把这一行为看成争夺领导权的进攻。在他的领导下，7 月 23 日开始展开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并于 7 月 26 日做出重要的书面解释，指出“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而且明确指出这种进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庐山会议期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苏联代总顾问对彭德怀表现了明显的赞誉，这大概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

在随后一些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看到，苏联的政治影响，中国与苏联的矛盾与斗争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外部原因。

8 月 2 日，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正式召开。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便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

8 月 10 日，毛泽东又在书面指示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党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证明之一。”在此期间，八届八中全会不仅对彭德怀，还对与其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进行了批判。

8 月 16 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由来及其他》一文中做了纲领性的论断：“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

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正是这样的结论，完全化入了 8 月 16 日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之中。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作为庐山会议的总结，发出了在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号召与部署。

虽然这次会议也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所刮起的共产浮夸风做了某些具体的调整，然而，由于面对彭德怀这样的党内反对派而开始的反击，却主要地把一个反右倾的政治运动推向了全国。

正像前面讲到的，当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从而使整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发言权被剥夺之后，真正能够在社会上发表经济和政治的现实主义声音的派别，只能出现在党内了。

在两年前还未被人预料到的这个“阶级斗争”重点向党内的必然转移，两年后在庐山的政治硝烟中露出了最初的清晰轮廓。

第三章 两条路线斗争的真正含义（1953 年－1962 年）

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才可生存。一切伟大的社会进程，说到底要站在经济的基础之上。一切变革的实质，都是经济范畴的事情。当共产赏担负起一个民族的工业化任务时，这个政党所具有的适合经济发展的纲领和路线，也该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一、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

权力斗争是世界的普遍现象。

不同国家之间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及经济上争夺某一种权力，形成国际间的权力之争。一个国家内不同阶级、不同政党相互之间的斗争也常常会集中表现为对政治、经济与军事权力的争夺，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现代社会，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任何一个政党内都难以杜绝这样或那样的权力斗争。如果正视社会的辩证法，便不必讳言，共产党内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权力斗争。

一般说来，党内的权力斗争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从通俗的角度讲，就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争夺权力。

二，不同的思潮背景、不同的主义引起的权力之争。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进行的权力之争。

不同思潮、不同主义引起的权力之争，常常也和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权力之争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三，不同认识引起的权力斗争。说得通俗一点，是因看问题方法不同而表现出的权力斗争。这种情况有时与上述两种情况有联系，有时没有联系。

四，由于方针、政策的分歧引起的权力斗争。

这种斗争一般可能与上述三种情况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为代表不同的利益，必然表现为不同的方针、政策取向；不同的思潮、背景也常常反映在方针、政策上面；不同的认识也常常在方针政策上反映出来。

五，历史的宗派主义形成的集团派别利益，也可能导致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可能与上述四种情况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也可能没有多少联系。

六、个人的权力野心也会导致党内的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和上述五种情况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也可能没有多少联系，甚至完全没有联系“

透彻地承认权力斗争，不避讳权力斗争的说法，不过希望说明，无论是利益代表上的差异，思潮背景的差异，认识分歧的差异，方针、政策取向上的差异，最终都涉及到一个发言权的问题，都可能形成某种带有权力性质的斗争。

至于宗派主义及个人权力野心所导致的权力斗争，倒是所有人都不讳言的。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不仅把这看成反击个人野心性质的权力斗争，而且上纲为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这在共产党内该是最严重的定性了。

当历史翻过这一页后，今天的某些善良人士会做出善良的评价，认为毛泽东缺乏民主精神，听不进反对意见，对同志无情打击、无限上纲，给共产党造成了莫大损失。这些善良人士还会善良地评议道：如果毛泽东当时能够虚心接受来自党内诸如彭德怀这样的批评意见，他只会有更高的威信。

现在看来，那时的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矛盾其实是难以调和的。

接受彭德怀的批评意见，就意味着路线上根本性质的改变。毛泽东将反对彭德怀的斗争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时，大概是有某种牵强的。然而，把这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则是完全不错的。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不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确实是两条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路线斗争。

二、两条路线斗争最初的表现

在阶级斗争“纲举目张”的年代里，两条路线的斗争常常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联系在一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解释其实特别有助于我们透视其实质。

两条路线的斗争表面看来是党内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究其实，是一个如何发展经济的问

题；是一个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是对待生产关系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政策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不允许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是可不可以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因素纳入社会主义范围的问题；是承不承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及价值规律的问题。

这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是党内斗争的根本问题。

一条路线，自然是毛泽东代表的路线。

正像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 4 日－13 日视察山东等地时所讲的那样："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句话不仅表明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称道，也表现出了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路线的本质。

共产党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将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尽快地国有化、社会主义化，并高度控制在国家手中，以尽可能集中的"便于领导"的结构方式，从政治出发动员经济，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商品经济的困扰，一步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这是一条看来很彻底的社会主义路线，是一条本能地就要无限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发展经济的路线；是一条要不断借助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的路线；是一条在本质上就会产生各种冒进、浮夸的路线；这也是一切想超越商品经济本身发展历史阶段的社会行为必将受到教训的路线。

还有一条路线，就是与此相对立的路线。

它表现为对商品经济及价值规律的更多的感应和自觉与不自觉的接受，表现为对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盲目自信的某种保留，表现为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工人、民族资本及各种阶级力量的利益的更多一点的承认，表现为对主观能动性的无限作用的某种质疑，表现为对用经济的方法搞经济的思路的探究。

这条路线从本质上讲，是对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合理性的客观估价。它表现为一种求实的思想方法。而在共产党内，它被具体演化为时起时伏、连绵不断的"右倾"倾向。

稍稍回顾一下近五十年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早在 1953 年 3 月－4 月中共中央举行的财经会议上，就批判了薄一波在税收工作中保护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特别是在此之后，类似的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在不同时期曾落到不同人的头上：刘少奇、邓子恢、王稼祥、薄一波、陈云等等，以及后来庐山会议的彭德怀。

在这些人中，刘少奇无疑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在这些人中最高的党内地位，也在于他在这方面有最完备的理论和纲领。

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斗争中，将刘少奇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刘邓（邓小平）定为黑司令部，应该说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党内一直存在着一条正视商品经济规律的务实路线。刘少奇用他的含冤而死祭奠了这条路线。邓小平用他东山再起的改革证明了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

1955年4月底－5月前后，也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时候，主持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就对刘少奇做过紧急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刘少奇讲道："斯大林有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你看过吗？""好好写篇文章反一下冒进！"

正是在刘少奇的这个精神下，邓子恢提出了"三超"的论断。认为当时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经验水平"，提出需要"赶快下马"否则"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无疑是针对合作化过程中的很多偏激做法而言的。

5 月初，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刘少奇曾主持召开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他与邓小平共同制定了"停"、"缩"、"整"的方针，对于全国范围内在条件不成熟时急于一下子合作化的情况做出了收缩的方针。

然而，同年7月，毛泽东一回北京就召开了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严厉批判了刘少奇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高潮"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用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还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他批判那些反冒进、实行坚决收缩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在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举行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批判了刘少奇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纲领性的错误。"

他再一次着重指出实现对所有制的三大改造以及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灭资兴无的斗争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一切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

正是在毛泽东路线对刘少奇路线的反击中，社会主义合作化以更快的速度形成高潮并完成。在这一回合中，刘少奇作为另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已经在历史的舞台上平和地出现。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他在城市经济领域又有什么表现。

1956 年 12 月，刘少奇在人大常委第五十二次会议上，颇有些思想解放地谈到资本家可否开

私人工厂的问题："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准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一个补充嘛！"

这样一个对待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是何等现实，何等合理，何等有政策上的先见之明。然而，历史的悲剧恰恰在于这是一个先见之明，而不是一个迟到的理性。

又是同一个刘少奇，在 1957 年 5 月整风运动期间，还做了更令人注意的讲话，这是 5 月 7 日他在听取杨献珍等人关于党校整风的汇报后的一段讲话："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我们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地下工厂，要允许他们钻空子，当他们一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立即跟上去，你钻空子搞这一样，我们跟上去抢一部分，也搞这一样。他钻几十万样，我们也搞几十万样。"

这段讲话如果移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何其恰当！今天的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几十年前刘少奇经济纲领的再版。

我们不禁为历史而悲哀。

所有关注这个东方大国文明发展的有识之士，都不免要思索一下历史发展的这个蒙太奇。中国有一句古话："天机不可泄漏"，是刘少奇过早地泄漏了天机，还是与他同时代的人更晚地意识到了历史的某些现实性呢？

在对共和国近四十年发展历史的回顾中，刘少奇这样的人物以及他的路线和纲领以非常清晰的面貌浮现在我们眼前。稍加浏览便会发现，正像毛泽东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方面面有一个完整的路线和纲领一样，刘少奇也有一个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文化方方面面完整的纲领。

刘少奇在 1956 年 3 月 8 日给文化部党组的指示中指出，关于改革旧文艺的方针，"不能勉强"，"不要硬生孩子"，"京戏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能乱改"。"戏改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这无疑是与江青后来所做的京剧改革完全相异的。

特别重要的是刘少奇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文明的宽容态度，他指出："世界各国的电影，只要无害的，能介绍情况，帮助了解情况的都可进口；有些改良主义的，也可进口"。并赞扬《天鹅湖》以及《巴黎圣母院》这样的艺术作品。他甚至还非常具体地讲道："好演员工资要高些，吃得要好些"。还讲，可以大搞民间的私人剧团。

刘少奇在文化领域的现实主义精神颇让我们思前想后。它在几十年前听来有可能是个不和谐音，在几十年后却显得实际而生动。

当我们将刘少奇的路线和纲领做出大概的勾勒之后，不难看到党内这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的存在，不难看到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含义。

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才可生存。一切伟大的社会进程，说到底要站在经济的基础之上。一切

变革的实质，都是经济范畴的事情。当共产党担负起一个民族的工业化任务时，这个政党所具有的适合经济发展的纲领和路线，也该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历史原本可以给刘少奇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士以更宽大的政治空间。然而，1957 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像一部强有力的推土机，将党内这种有异于新阶级斗争纲领的思想一时间都推平了。阶级斗争纲举目张的声音笼罩了全党、全国，并响亮地发动了“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直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数以百万计的小高炉熄烟灭火之后，烟雾缭绕的庐山会议才又展示了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清晰面貌。

三、毛泽东路线在一定时期内的必然胜利

在 1957 年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刘少奇这样的党内领导人物虽然也有自己大致完整的经济、政治路线与纲领，但是明显地处在弱小的地位，处在一个不可能旗帜张扬的地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毛泽东代表的党内主流相抗拒，势必面临失败的结局。

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着巨大的政治资本，有着巨大的政治、军事、组织的力量，有着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巨大思想力量。它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国家的全部资源。

剥夺官僚资本使它有了最初的工业，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使它争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这已经是一个控制了全国政治、军事、外交、全部资源、主要工业又具有最庞大组织系统的巨型“托拉斯”。它本能的趋势就是要进一步将所有的经济都逐步掌握在自己日益集中的领导之下。

在所有制领域内进行新一轮革命与占有的运动，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符合全党意愿的。这既与他们头脑中或深或浅的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也与他们整体的切身利益相一致。谁反对这个锐不可挡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必将粉身碎骨。谁在这个潮流面前迟疑、保守或怠慢，也将被冲垮，失去立足之地。谁反对这个潮流，必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

而不断地将已经打倒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派、地富反坏）当做靶子再攻击一番，就足以威慑党内一切动摇分子。将党内各种与主潮流对抗的反对派与已经打倒的阶级敌人联系在一起，始终是一个威力无比的斗争手段。

刘少奇在那个时期的被批判与被压制，是必然的。他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的理性必然有所收敛，当然，他又会因势利导、把握时机做出某些克制不住的顽强言行。

在整风运动、反右斗争时期，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乃至庐山会议时期，他与毛泽东路线的矛盾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公开化。他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那些年中，才得到了表现自己的机会，接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总清算。

在庐山会议这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关口，是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虽然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几个志同道合者，实际上却更有些独自行为的色彩。他在庐山会议上拿出的万言意

见书无疑在整个会议中显得十分突兀，在“万言书”中，他对毛泽东所领导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措辞尖锐的批判。

因为他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跳出来的，因为他是在反右斗争中解决了知识分子这个反对派之后跳出来的，所以他不仅被打倒了，而且成为阶级斗争重点移向党内的第一个对象。

因为几乎全党都卷入了“大跃进”、公社化，所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彭德怀理所当然地被全党当成了敌人。这个斗争结果，既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必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老练、敏锐和坚定。

如果他稍微犹豫一些，迟钝一些，软弱一些，故作宽容谦虚，听取彭德怀的意见，并欢迎类似的批评广泛展开，推波助澜，很可能会发生迥然不同的结果。然而，毛泽东坚定不移地、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反击，反而轻而易举地将彭德怀打了下去。

政治斗争的分寸感常常就是这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代表了全党。即使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经济上的挫折，也没有能够伤害他个人在全党的权威，甚至似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权威。

在随后的一些年中，虽然又有自然灾害、苏联停止援助等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中国经济陷入了极为困难的时期，不但仍然没有伤害毛泽东的权威，他的权威甚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那一时期的潮流所致。

这一切，大概都为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部分基础。

四、经济现实赋予经济现实主义路线以表现的空间

历史毕竟给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资本主义”路线以新的机会与空间。

庐山会议在反右倾的政治高压下，掩盖了对共产党内左倾倾向的检查。虽然在此之后对农村的共产浮夸风等“左”的倾向做了这样和那样的调整，反右倾的政治声音却是弥漫全国的。然而，在各种类似共产浮夸的“左”的倾向造成了对经济的巨大人为性破坏之后，一个巨大的“历史偶然性”发生了。

1959 年、1960 年、1961 年，中国连续三年发生了特大自然灾害。这对于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重要比例的经济落后国家，无疑是极为严峻的事实。也正是在此期间，由于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又扩大表现为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单方面通知中国，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止和废除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各种重要设备和物资。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然在表面上保持着“大跃进”的高旋律，将 1958 年、1959 年、1960 年看成是持续三年的“大跃进”。从表面数字上展示的是，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 40%以上。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依然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

然而，这一勉为其难的政治行为并没有能够支撑住残酷的经济困难造成的压力。三年自然灾害与苏联停止援助，将“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经济秩序与经济实力遭受到的巨大破坏进一步放大了。

人祸天灾，将一个饥馑遍布大江南北的严酷现实摆在了人民面前，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人数也在各地增加。这时，一切强硬的政治高调都有所萎缩，注重经济的务实声音却此起彼伏地升起来。

自 1949 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历经十几年时间之后，经济问题以最裸露的、强有力的现实性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经济规律对党内的感应也便以越来越显著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时，刘少奇为代表的经济、政治路线有了一次远比“大跃进”人民公社前更为完备的表现。

1961 年春，邓小平便在广州会议上冷静地评价人民公社化运动：“合作化从互助组到高级社都是有规律、有步骤的”，“但是搞公社，步子就迈得太快了，与前不同了，没有把高级社的优点发挥起来。”

同年 4 月，彭真在北京怀柔县的一次讲话中说：“北京这几年农业减产的原因，天灾是次要的，搞得几年挨饿，必须追究责任。”“过去晋察冀，三年就上了轨道，现在十几年也没有上轨道，政策来回变，怎么行？”他在怀柔还直接讲到农民单干性质的劳动：“现在农民种自留地、小片开荒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民懂得等价交换。我们总是一平二调，迟早要推翻政府。”

应该说，这些讲话已经相当尖锐地表明了对党内左倾路线的批判。

同年 4 月 2 日－5 月 16 日，刘少奇在湖南视察时做了更为尖锐的讲话：“毛主席所提倡的开调查会的调查研究方法已不够、已不适用了。”“刮‘五风’中央不知道，”“中央只知道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

同年 5 月 23 日，刘少奇在湖南湘阴县的一次讲话中对于“大跃进”更加警醒地发出这样的声音：“水利有成绩，公路也修了不少，不过比起损失来说，还是损失比较大些。”“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

刘少奇在同年 10 月 22 日更进一步讲到有关农村的经济政策：“社会上有点资产阶级也很好，这些人积极得很，很会钻空子。他们可以补我们的缺陷，甚至有的开地下工厂也好。”“这些人有商业技术，你们要向他们学习。”“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农村自由市场会产生一些资本主义，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即使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也不可怕。”“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

刘少奇等人就农业经济问题所讲的这些话，明显地已经在提倡一条与毛泽东不同的路线。

在工业领域，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于同年 9 月颁发试行。这后来被批判为与毛泽东《鞍钢宪法》相对抗的修正主义纲领性文件，是那个时期刘少奇路线在工业经济领域的反映。

与此同时，这条路线在科技领域也发出了声音。

同年 7 月 6 日，刘少奇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科研十四条》时，批评“大跃进”以来的某些思想文化革命做法是“戴帽子，乱斗争”，是“乱指挥”“不懂装懂”。“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正是在同一个会上，邓小平做了精神相似的讲话：“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要老老实实当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

与这样的声音相一致，在文艺界有周扬、林默涵等人主持制定的《文艺十条》颁发，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率先攻击为大毒草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开始在《前线》杂志出台。

经济上的现实性，无疑给了现实主义路线以表现的空间。

然而，路线斗争是双方相对立的运动。在此期间，作为新阶级斗争纲领的继续贯彻者，依然透过中国人要吃饭的世俗气氛发出了神圣的声音。

林彪作为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野心家，于 1959 年 9 月 30 日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文章，他以高昂的调子说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党的总路线很快为群众掌握，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正是这篇文章，对右倾机会主义发出了彻底的批判，论证了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是通过教育和斗争一步步地占领与扩大的，每一个革命者必须在思想领域里进行不断革命。”

林彪在 1960 年 9 月 30 日又发表了一篇极大影响中国当时政治思想格局的文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篇文章针对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明确指出，“用毛泽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我们当前重要的战斗任务。”这无疑显示出了与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经济务实路线的针锋相对的性质。

同年 10 月 21 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林彪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再一次发出了强硬的声音，指出在一部分人员中存在“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怀疑和抵触态度”，提出“必须坚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

林彪的政治行动不仅表明一个与刘少奇、邓小平经济政治路线相对立的路线的存在，他还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路线坚定捍卫者的面貌出现。他既为毛泽东支撑了来自刘少奇所代表的经济务实路线的压力，平衡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而且，作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掌握着军权的人物，林彪开始在中国的大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依傍毛泽东又相对独立的力量。

没有庐山会议，便没有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一事。没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严峻的经济现实与经济现实主义路线的压力，便没有林彪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崛起。作为新阶级斗争纲领的坚决附庸者，林彪恰恰是在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经济现实主义路线的斗争中逐步取得了巨大的权力。

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在后来得以开始的政治准备之一。如果没有林彪的政治崛起以及他在中国政治格局中逐渐取得的位置，那样的十年动乱也还是不可思议的。

在同一时期，我们还看到一些政治人物的确切表现。

1959 年 11 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他在文章中论述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抗。"他们"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与林彪一样，陈伯达这样的人物同样在为进入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政治格局中固定的位置而表演着。

在往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严峻的经济现实及其教训一方面给了刘少奇这样的"资产阶级"路线以更充分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对立而相互依存的是，林彪式的人物和力量也得到了政治的上升，他们以捍卫毛泽东路线为旗帜，集结了自己的力量。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在一步步逼近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革命"前夕。

五、1962 年的两条路线斗争

1958－1960 三年持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 1959－1961 三年连续的特大自然灾害，把一个日益严峻的经济困难的现实摆在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面前。当历史揭开 1962 年这一页时，严寒笼罩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顿、食物匮乏、生产萧条的低谷。

毛泽东不愧为毛泽东。在这样一个看来举步维艰的困难局面下，他以足够的胆略与气魄领导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重要的厂矿企业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共七千余人，故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个于 1962 年 1 月 11 日－2 月 7 日举行的长达二十七天的大型会议，可以称之为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解决当时面临的全国范围内的局势之大行为。

这个会议就其内容而言，是为了总结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 1958 年以来的这四年，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大会体现了毛泽东与共产党纯熟的政治领导艺术。

作为大会的第一阶段，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书面报告，并组织全体与会者讨论这个书面报告。

这是一份着重总结四年来经验教训的报告。这是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总结目前困难局面的报告。这是指出“大跃进”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现象”，结果使人民“饿了两年饭”的报告。这是一份将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归为“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报告。

在大会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

他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以令人有些惊喜的姿态做了自我批评，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代表们无疑是极为热烈地讨论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并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认识，提高思想，加强团结。

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政治家的毛泽东的重大行为。在这个行为中，毛泽东针对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针对党的领袖与党的集体的关系问题，针对几年来他所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社会行为的问题，使自己的理论、方针、政策及态度都做出了适度的位移。

这是一个有著相当好的政治感觉的位移。毛泽东不愧为炉火纯青的政治家。

当他领导的全党进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上遭到了如此大的挫折之后，他依然当之无愧地以全党领袖的身份承担起领导全党在方针、政策、路线上适度位移的任务。他将个人的位移与全党的位移合为一体。

在任何时刻毛泽东都要使中国共产党处在全社会潮流的重心，同时也使自己处在全党的重心。

作为政治家，他十分敏感社会的合力，总能够找到代表社会主流方向合力的潮流位置。在民主革命时期，他领导的共产党所制定的国内阶级斗争路线以及在中日战争开始之后举起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都充分表明了他把握社会主流的政治智慧。

只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将智慧用在了他所领导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之后的困难局面中。

四年来的“天灾人祸”，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带入了崩溃的边缘，这时，任何顽强不屈的政治高调，都无法消除全党全民的疑惑。再简单化地重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正确性，无论如何是无法掌握全党全国局势的。这里已经潜伏着领导权的危机。也是一定程度的信用危机。既是共产党的信用危机，也是毛泽东作为领袖个人的信用危机。

然而，毛泽东并不困难地就解决了这个危机。他以从容不迫的大度带头做了检讨。以他一贯形成的英明领袖的权威而做出这样的检讨，无疑极大地感动和感召了全党上下，把绝大多数潜伏的对他个人领导决策的不满予以平息。

同时，他又理所当然地以领袖的身份要求全党都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这无疑更在一个适当的立场、方向和潮流上加强了他作为领袖的权威地位，也加强了中共中央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当这个行动在党的各级领导中贯彻之后，又势必巩固和加强了共产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通过这个行动，毛泽东使自己处在更加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的领袖位置，同时也就必然加强了全党的团结，加强了全党的纪律，不但没有削弱而且进一步加强了集中的领导。这个大会把四年来政策错误造成的经济困难中所潜伏的各种危机都大致消化了，把一切可能动摇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实施集中领导的危机消化了。当对四年来的方针政策做出自上而下的检查、总结之后，全党上下有了统一的认识，统一的说法，统一的舆论。一切都在党的正常生活中合法化。一切有可能演化为权力斗争的反对意见，都失去了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当毛泽东用自己带头的方法带动全党做出检查与总结之后，领袖及领导集团当然地处在了全党的主流位置，而全党当然地处在了整个社会的主流位置。这可以看成毛泽东解决四年来政策失误造成危机的重大战略部署。

正是在毛泽东带头进行自我批评的民主宽松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不失时机地再次鸣响了阶级斗争这个警钟。他在 1 月 30 日的会议上再一次论述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强调指出：“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在这个时刻的这个讲话，无疑使毛泽东的形象更加完整了。他在对四年的总结中做出自我批评，对方针政策做了适度位移之后，又不忘记拧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确实显示出政治家的坚定性、全面性和远见性。从维护集中领导的权力而言，有了这个重鸣阶即斗争警钟的举动，毛泽东作为领袖的行为大概才是天衣无缝的。

1962 年初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使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格局又发生了比较重大和微妙的变化。

大会召开之后，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经济务实主义路线的推行者，一方面给予了他们某种理论上、方针上、政策上的合法性，在一定范围内他们的行为符合全党的统一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恰恰又加给他们某种限制。他们似乎更难超越毛泽东在大会上所做的政策位移的界限，去各行其事地做更多的自由发挥。

然而，全国几亿人要吃饭，这个巨大的经济现实本身在造成各种行为。

就在 1962 年 2 月，广西、福建、湖南等省的很多地方就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这是农民和基层领导干部为解决生产、生活困难而自发采取的行为。

同时，安徽省很多地区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责任田”，这依然是农民与基层干部为自己找饭吃的经济行为。这些农村生产关系领域出现的变化，随着 1962 年特有的政治气氛，开始了各种形式的传播。

到了这一年夏天，河南省出现了所谓“借地”的农业生产形式，这实际上带有分田到户的性质，这一生产关系性质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河南省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的支持下开展的。

几乎同时，谭启龙担任省委书记的山东省也出现了各种类似的农村生产关系的新形式。谭启龙本人也在一些讲话中说：“包产到户”“有利于党，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甚至还这样说：“包产到户”可以“一包十年、二十年不变。”

这颇像二三十年后中国实行农村改革的语言。

而在林铁担任省委书记的河北省，则出现了所谓“十项小自由”，这是从“自留地”发展出来的更多种多样的自由，无非是给农民以更多个人经营的权利。

在这些全国不同地区出现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农业生产变革中，最经典的纲领性总结，便是“三自一包”，所谓“三自”，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所谓“一包”，就是“包产到户”。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刘少奇本人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在当年 6 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

作为党内务实主义路线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邓小平，也在当年 7 月份的一次讲话中，发表了他在其他场合不止一次重复发表过的有名的“白猫黑猫论”。

他在讲到“三自一包”等农业生产关系领域的变化时说：“看来生产关系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那种形式在那个地方容易比较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那种形式，就应采取那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在这个时期，对于农业经营政策有类似突出表演的，还有邓子恢等人。

在经济政策上的纲领性表现，也同步发生在政治领域。

邓小平在 1962 年 3 月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到甄别工作：“这几年，批判、处分的人很多，拔白旗、反右倾、整风、补课等，百分之八九十是错了，甄别工作进展很慢，不能调动积极性。”“县以上的要赶快平反，可能发生错了的（指平反——作者注），但这是少数，将来在工作上看，不要怕出偏差。”

这一讲话充分显示出他的雷厉风行、明确干练和敢于承担责任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二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东山再起时所领导推动的各项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得到了再版。

正是在 1962 年，刘少奇的代表性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了修订版，并广泛发行。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显然不无关系。同一年，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进入低谷。

与这一年政治空气相吻合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广州举行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这是一个在周扬领导、陶铸支持下的文艺领域的活动。陶铸在这个会上讲道，反右倾斗争使作家受了“精神的虐待”，讲到要给作家以“创作自由”。这都可以看作刘少奇为代表的务实主义路线在上层建筑诸领域的反映。

三年自然灾害后的 1962 年，给了刘少奇路线以一个更深化表现自己纲领和作用的时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因此进一步深化。

早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就曾不失时机地做出了重要表演。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在毛泽东做出自我批评之后，林彪的讲话无疑是对毛泽东自我批评的另样的注释。这是林彪这个政治人物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分外乖巧的表现。正像在庐山会议上一样，在这里，他又一次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自己的政治机会。

同一时期，陈伯达这些所谓“思想理论家”也都做出了相关的行动，形成了与刘少奇路线针锋相对的格局。

这一年，天遂人愿，随着各级领导在经济政策上的现实主义调整，老天爷也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给了一个风调雨顺的和善面孔。当这年夏天的农业生产形势表明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开始过去时，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拧紧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弦。

他在 8 月 9 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而且特别批判了单干能增产的理论，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他还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他特别含蓄而又严峻地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这样一批党内领导干部发出批评，指出他们“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大概刘少奇、邓小平并没有足够重视这个严峻的警告，他们或许还心存侥幸，认为毛泽东是在指其他一些并不像他们这样举足轻重的领导干部。但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声音中，我们已看到了他四年之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内心的全部愤怒。

就在这一年秋天，9 月 24 日－27 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再一次论证了他的新阶级斗争纲领：“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他严厉批驳了党内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向全党乃至全国发出了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号召，鲜明地强调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声色俱厉地指

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句话可以看做毛泽东对 1962 年党内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概括，也可以看成他四年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声明。他同样要为他的政治革命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第四章 刘邓路线正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路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汇成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经济务实主义者率先探索到潮流底层掩盖着的商品经济的历史趋势，并扎根于其中，开出了几朵带刺的玫瑰。

一、价值规律通过党内斗争显现出来

在本书第二章中，讲到商品经济规律的顽强显现，主要讲的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内的显现过程。现在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阐述这一命题。这涉及到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当代的生活，包括深入认识文化大革命。

价值规律的一般含义，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其中凝固的社会必要劳动。说得详细一点，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物化于其中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而所谓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指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下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价值规律也有其实现过程。因为供求的矛盾经常会造成某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时高于其价值，而另一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时低于其价值。然而，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资本总是向着利润高的部门流动。在这种流动中，既会消灭那些高利润率，也会消灭那些低利润率，从而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

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都做挣钱多的买卖，那个买卖就挣钱少了；都不做挣钱少的买卖，那个买卖就挣钱多了。在资本的流东中，挣钱都差不多，利润率也都差不多。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其价值上下浮动。用通俗的话说，一个商品的贵贱，最终取决于生产时花费劳动的多少。

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会有各种形式的垄断价格出现。垄断价格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的手段并凭藉一定的条件，使某种物品的销售价格在较长时间内、在比较稳定的意义上偏离（高于或低于）其价值。

这种情况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当然，都要付出代价，都要以其他方面的支出作为维持条件，都要有各种各样的凭藉，都不可能维持永远。最终，价值规律会以其顽强的方式透过垄断的屏蔽曲折地表现出它的力量。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无疑是一个更为绝对的垄断价格体系，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工商业，并在相当程度上间接掌握着农业及手工业，国家还掌握着全部外贸，掌握着国民经济以外的政治等诸种结构与力量。对国有企业的绝对的计划领导以及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相对的计划领导，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计划经济不仅表现在遍布一切的计划价格上，还表现在计划生产指标上，当然，还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

仅从计划价格而言，在国有企业内，就涉及到资金的调配，涉及到轻重工业之间以及工业各部门之间的资金调配，涉及到积累与消费之间的调配。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国家通过计划价格也就是对农民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销售工业产品的方式积累资金。这就是所谓的“剪刀差”，这就是计划价格偏离价值。说得通俗了，就是在国家与农民的交换中，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产品价格偏高。

作为一个迫切需要完成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国家凭藉着巨大的垄断优势以计划的形式（也就是以某种强制的形式）对商品交换的价格做出规定，虽然这种规定确实要付出方方面面的代价，包括政治方面的代价。

然而，这时价值规律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呢？价格是否就可以在国家的强大力量、政治的强大力量以及计划经济体系的强大力量下长时间地、较大幅度地偏离价值呢？

历史表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同样起著作用，而且以极为顽强的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仅就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言，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表现形式：

第一，它表现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或缓和或尖锐的矛盾斗争中。

单就国家对粮食作物的计划领导而言，就有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看到的那个矛盾斗争过程：因为粮价低（低于其价值），农民就将自己的投入转向其他种植和经营领域；因为国家实施了对粮食统购统销的高度管理，粮食作为商品并无第二个买家，而国家又以下达计划种植亩数的方式规定种粮面积，农民就有了在种植面积上作文章的对策。

而国家又有种种方式来保证计划价格下的计划种植亩数，包括在农村种粮问题上开展各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粮食的种植。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同偏离“以粮为纲”的种植经营方向的斗争。这种斗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来，说到底是国家的政治力量、行政力量、计划力量、组织力量、意识形态力量与价值规律之间的斗争。

当国家保证了农村的粮食种植面积，维持了对粮食的计划价格下的统购统销，国家付出的是与农民矛盾斗争中消耗的各种政治资本。

第二，价值规律的力量还表现在党和国家在决策中的种种考虑。

虽然有强大的国家垄断，有史无前例的庞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然而，当共产党及国家的领导人在考虑与农民进行产品交换的价格时，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公正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对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价格也是经常考虑其价值的，所定之计划价格也绝非悖离产品价值十万八千里的。决策者经常在价格上费思索，在剥夺农民与与休养生息农民这两方面关系的尺度上是经常犹豫和迟疑的。

毛泽东本人也经常讲到这一点：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又不可过大。他不止一次讲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轻、重”这个顺序来兼顾，表明他也看到了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问题。只不过最终的决策结果还是更多地考虑了国家的积累与经济上的集中。

看到这个统帅全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在涉及到计划价格的时候表现出的种种前瞻后顾，本身就表明价值规律的影响何其伟大。计划价格似乎可以偏离价值，但是计划价格在偏离时却胆战心惊。

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始终驱之不走的一个危险幽灵。

第三，更要补充说明的是，价值规律的力量还通过党内的斗争表现出来。

如果说“农业学大寨”运动那种强化的阶级斗争以及无穷无尽的大批判所贯彻的不计成本的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是党内在农业问题上的一条路线的具体表现，那么，自然就有与此相对立的另一条路线的表现，那是一条几十年中一直遭受批判的路线。

当我们看清楚政治路线的经济实质时，就可以说，商品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党内表现为一个倾向、一个派别、一条路线、一条道路，那是一条与“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路线相对立的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在政策上对农民利益的尊重，究其实质，是对价值规律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尊重。

价值规律决定着农民的利益，驱动着农民的趋向，而且最终感染到党内，在党内政治路线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

第四，价值规律的力量最终表现为迫使僵化的计划价格体系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系破解。

仅就价格体系而言，它最初表现为对计划价格的调整，譬如国家对粮、棉等农作物的收购价格做出调整，使之更接近其价值。接着又表现为国家对很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予以放开，这在实质上缩小了计划价格的范围，扩大了市场价格的范围。

再往下，就表现为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广泛承认与接受。先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继而理直气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下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目前的改革中不断扩大范围，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主流。

我们看到，价值规律透过计划经济体系的巨大强制性力量，以顽强而曲折的方式，经过一个不算很长的历史时期，终于显示出其全部合理性。

今天的中国已形成的一定规模的市场经济，是价值规律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有其特殊的曲折历程，它经历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反复斗争，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改革过程中的斗争。

纵观中国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特别能够看清楚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相互关系，看清楚那些基本的经济规律如何在看来壮阔且纷繁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来，并透过壮阔纷繁的政治政治斗争最终表现出虽然简单却不可抗拒的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价值规律及其驱动的社会利益和感染的政治人物遭受打击的一段历史，是价值规律在政治高压下暂时被扭曲的一段历史。在一片“全面专政”的政治强音中，价值规律及其决定的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有可无的。

然而，历史才是真正的长远派和秋后算帐派。在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解析中，我们会在一个非常深刻和广阔的意义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失败，本质上是由于其在经济上的失败。

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崩溃，最终崩溃了文化大革命自身。一个政治纲领是被其经济纲领的底盘托起来的。当经济纲领的底盘瓦解了，高耸入云的政治纲领宝塔必然顷刻坍塌。

在往下的论述中我们还会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同时就是商品经济的胜利，是价值规律的胜利。那已被近三十年的改革注释得明明白白。

二、价值规律力量的更充分展示

我们在前面仅就价值规律顽强表现的有限范围做了描述。所谓有限，第一，它仅就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做了描述；第二，在讲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时，主要限于计划价格、计划种植这样的范围进行描述。现在，让我们把这种描述进一步展开。

首先，就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而言，要揭示这里更全面的生产关系内容。

应该说，就生产、交换、分配而言，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对农民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指导与干预，它们通过计划的价格以及计划的生产指标（例如种植面积的规定）来保证。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商品经济关系。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在这方面有过阐述。他们知道，所谓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是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关系，他们之间的产品交换，从理论上讲无疑属于商品交换。

只不过他们这种承认是非常有限的，是非常不响亮的。而这种有限的、理论上的承认，在经济实践范围内又常常更多地予以忽略。最终体现出来的，是计划至上。

这使我们更深刻地想到所有制的原因。

如果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所有制，那么，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应该是充分展开的。然而我们看到，不仅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家的完全管辖下，集体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国家的管辖下。这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的一个本质特征。不存在国家控制之外的一个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国有化的性质。

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农民的经济集体没有绝对的经营权，只不过是反映了它没有绝对的所有权而已。而国家对这种集体所有制有着经营上的指令权，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拥有所有权。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这种集体所有制的诞生本身是在国家行为的参与下、以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方式实现的。

而当前中国农村进行的改革，不仅在计划价格、计划种植上表现出一定的放开，从而体现出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表现为对农村所有制关系的改革。

当农村由最初的"责任田"性质的改革到"分田到户、三十年不变"的改革，我们看到，不仅国家与集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劳动关系的变化，而且是很深刻的所有制性质的变化。当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十年不变地长期使用，这种使用权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带有所有权的性质。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权和使用权或者说所有权和经营权似乎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其实又是两个相互渗透的概念。因为对立的事物并非是绝缘的，常常又是相互转化的。所有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根本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而使用权和经营权则常常是某种程度的所有权。

一辆国有企业的汽车，它的司机自然对它只有使用权，然而，当他独自一天天驾驶着汽车行驶在公路上时，他在某种程度上随意支配着这辆汽车，就表现出了所有权的性质。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讲，车到了司机手里，就是司机的了。

不要小看这个生动的事例，只要我们具有辩证法的逻辑，在生活中就经常可以看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转化有时显得很细微、很隐蔽，似乎可以忽略，却常常含着深刻的意义和重要的动向。

关于这一点，共产党人也有所觉察。斯大林就觉察到过。毛泽东也曾觉察到过斯大林的这种觉察。

他在一份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斯大林在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要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关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

在这里，斯大林无疑看出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实际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永久的使用权已经很大程度上带有所有权的性质。

同样，"分田到户，三十年不变"的使用权也已经带有很大的所有权的性质。中国农村目前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所有制领域的变革，保证了农业生产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这一切看来是政策的改变造成的，实际上却是价值规律本身显示了力量。

价值规律的伟大力量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还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历经几十年，表现出其不可抗拒的力量。

两种所有制之间存在着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起作用，似乎今日还便于理解一些。那么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化经济中，情况又怎么样呢？

从理论上讲，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所有国有化的经济内，任何产品的交换都不改变所有权，所以它们都不是商品。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价值规律，有的只是计划经济。

然而，实际的经济管理又使他们感到，不能完全忽略商品的价值规律，否则一切计划都失去参考的依据。于是乎，他们就有了“价值规律是计划的工具”的说法。

这种说法是非常模糊的，实用的，权宜的，不透彻的。这种说法包含着理论上深刻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实际上反映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

他们试图抹杀价值规律；他们又不能够完全抹杀价值规律。当他们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经济的工具时，又常常感到这个工具十分扎手。价值规律始终是共产党人敬畏而又厌恶的东西。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曾经这样讲道：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的经济计划。教科书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他们现在做法的一个真正的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毛泽东还在同一份笔记中继续这样写道：“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亏了，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

在毛泽东的这两段论述中，我们深刻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与价值规律的矛盾，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想消化价值规律、又常常难以消化它的尴尬两难的境况。应该说，这个矛盾始终是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上遇到的最根本的矛盾。

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表明它的社会主义体制没有能够消化这个矛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顺利进行，表明它在逐渐有效地消化这个矛盾。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更为强大，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有着民族以及传统文化上的更强有力的统一性。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展开，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计划经济

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地盘让给市场经济。市场作为调节生产与流通的杠杆，正在撬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僵硬环节，打通各种滞涩堵塞的渠道。

一系列相关经济政策的出台，起码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对“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生产与流通也都赋予了更多的商品经济认识，也都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价值规律的崇高权威。目前，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不仅表现在国家和农民之间，而且在整个“全民所有制”经济范围内扩展开来，颇有些波澜壮阔之相。

与此同时，价值规律的力量又在所有制的改革中表现出来。

我们不仅看到各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及合资企业出现，而且大批赫赫然标榜着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也纷纷出现了承包、租让及股份制等改革形式。即使完全保持国有化性质的企业，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其独立的经营权。

市场经济要求所有的国有化企业有充分的独立经营权，而充分的独立经营权又造成了市场经济的扩展。正像我们前面分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绝对绝缘的。相当规模的独立经营权自然隐含着某种所有权性质。

中国的改革在目前是一个一切都在流动状态中的运动。合法性总是被合理性突破，合理性又常常为自己取得合法性。形式为内容所突破，内容常常又为自己取得必要的形式。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规定、又要不断改变规定的时代；是一个特别需要规定、又不可太生硬规定的时代。

正是各种经济活动、各种架构与政策都在相互拱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在继续推进这一变化。

这是整个生产关系领域内也包括所有制关系领域内发生的变化。它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

生产关系总是体现为一定的方针、政策及法规，因此，这也是一个方针、政策及法规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意识形态要为方针、政策及法规的变化提供社会舆论与思想基础，因此，这也是意识形态在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是整个上层建筑在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

当然，今天中国的改革所造成的这个变化，并不是突兀出现的。

三、刘邓路线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改革路线

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推行的改革政策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刘少奇、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推行的政策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显而易见地发现，今天的改革其实就是当年刘邓路线的再版。

当然，这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的、发挥了的、充分展开的再版。今天所推行的改革政策，在那个时代就有了这样或那样的萌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改革的胜利表现出结果，不过说明这整个过程都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力量的显示，都是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适应自己、继而要求上层建筑适应自己的历史过程。这是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实质。

现在，当我们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的刘邓路线翻案时，该是更为彻底的翻案了。应该做出的结论是，党内确实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推行了一条与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路线、社会主义路线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路线”；而实际上，那才是一条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路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路线，是可以接收和消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部合理性的路线，是代表中国社会进步的路线，是真正代表历史潮流的路线。

当今天的改革证明了这条路线在历史上的合理性之后，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是一条代表历史进步的改革路线，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已经萌芽、在庐山会议之后逐步成型的刘少奇的路线，以及由此展开的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已是今日改革的先驱，或者说已是今日改革的开始。

刘邓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表明了一场改革最初的并不自觉的开始。这个改革的锋芒，正是指向那一味趋向权力集中、大搞阶级斗争乃至最后大搞全面专政、逆生产力发展而动的保守力量。

那个保守力量保守的是苏联模式的影响，保守的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一味夺取所有制、占领并扩大它的社会主义旧框架，保守的是面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闭关自守。刘少奇、邓小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推行的某些政策，表明他们是改革的先驱。

如果说我们今天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革命的，那么，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为生产力在当代中国开辟前进道路的革命先驱。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他们代表了生产力的方向，代表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的要求以及最终对上层建筑提出的要求。这带有真正的革命性质。

我们甚至可以生出一些幼稚的联想，倘若当时没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倘若那时就逐渐推广现在已经在改革中推广的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以及整个改革政策，中国现在会何等强大？

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对这一点做出推想。但是，我们也立刻会做出更深思熟虑的结论。

历史不可能那样发展。就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国际背景，社会主义在中国还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熟理性。

国际范围内两大阵营的对峙，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乃至军事、经济的对抗，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效仿以及对其援助的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形成的巨大政治资本以及高度熟练领导农民战争、群众运动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惯性，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那样的“一化三改”乃至那样的新阶级斗争纲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成为支配那个不长不短的历史时期的主流。

刘少奇路线从其一开始就处在非主流地位，他所敏感到的在今天看来具有完全改革性质的政策，在那时只能作为一个不断与主流现状作斗争的改革运动的先驱表现。它的伟大意义表现为将来时。

历史并没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超越苏联模式影响下的最初阶断，那是毛泽东阶段。历史使刘少奇、邓小平扮演了对毛泽东阶断实行改革并取而代之的新阶段的导演。

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至少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党内就存在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为生产关系上包括所有制形式上要求继续“进步”，要求集中化，要求共产主义化，要求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而实际上这恰恰是一条违背生产力发展的保守路线；另一条，似乎在要求退步，它反对在所有制问题上集中化的倾向，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用政治号令经济，这条看来保守的路线恰恰是代表着生产力前进方向的先进路线。

两条路线前后重叠又相互交替，写出了历史的两个阶段。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为第一阶段，刘少奇、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为第二阶段。

四、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断地重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个主要矛盾。现在看来，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就客观实际而言，这个矛盾确实以其最主要的力量支配了当时以及随后相当一些年的中国社会生活。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在统领中国社会的运动。只不过对这个矛盾两方面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我们要做出如前所说的新的注释。

为了进一步深刻揭示文化大革命这极端十年的全部历史原因，我们特别有必要对两条斗争了几十年的路线做出更全面的、寻根探源的剖析。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领导并推行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中国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主流路线，它的统治地位随著文化大革命的崩溃才告结束。它何以能在中国当代史上统治二十多年，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这绝非毛泽东个人的力量，而是一个历史潮流的力量。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毛泽东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革命的、不断“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社会主义路线来源于哪些历史条件：

一，正像我们前面论述到的，毛泽东的这条社会主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力量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隔着巨大的时间差，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面对急需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及规范下，必然出现的一条路线。

对于最初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几乎没有第二种选择。特别是当社会主义最初时期

接受了苏联的大量经济援助后，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是有着巨大的必然性。对于这一点，任何纸上谈兵的非议都与历史无关。

二，当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国家全部重要资源和仅有的一些工业的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必然表现为在所有制领域内的不断革命、不断进取和不断占领。

这种将整个社会经济成分越来越集中地掌握在自己领导下的趋势，对于一个生气勃勃的政治力量，无疑成为本能的冲动。而它巨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动员群众的能力，使它尤其趋向于运用政治号令经济的手法，运用国家行为、集中领导的手段来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它并不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自己的最高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无疑更加强化了它在生产关系中的革命。

三，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因为处在和西方资本主义始终不息的尖锐对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不会有从西方资本主义吸取资金的奢望，而且永远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威胁相对抗的紧张军事、政治状态。这种准战时状态和半战时状态尤其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显示出政治上的紧张度，权力上的高强集中性。

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的特别巨大的外部情势。这个情势始终证明着毛泽东路线的必要性，也加强着毛泽东路线的政治优势。

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苏联率先感染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都发生了巨大的位移。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矛盾。

主要是由于苏联方面的原因，这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发展为国家之间关系的矛盾状态。这时，苏联对中国形成的压力及威胁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尤其高扬起反帝、反修、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的一些年中，与苏联的对抗，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所依据的外部条件之一。

在我们随后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发动和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根源之一。

五，涉及到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更深刻的思想根源的剖析。首先让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有独钟。他的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人民公社化，确实是他与中国农民联手创造的一个理想国。

这里，我们不妨引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 年 5 月 7 日）发出的重要的《五·七指示》。这个指示实际上是对林彪给他送去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一封回信。

这封回信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性体现，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蓝图。信的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 5 月 6 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 年 5 月 7 日

这个文本不仅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而且于同年 8 月 1 日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中摘要公布。这篇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还进一步发挥了《五・七指示》的思想。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

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在这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纲领轮廓非常鲜明：

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进行政治思想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第二，限制和取消商品生产。

第三，缩小工农、城乡、体脑差别，乃至消灭各种差别。

第四，在分配上实行大体上的平均主义。

第五，一个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小而全的桃花源式的社会。

这是一个毛泽东特色的社会主义蓝图。从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这种企图超越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而达到的桃花源式的理想国，与中国著名的文化人陶渊明的理想一脉相承。

这是一种农民的社会主义，是古来自然经济中农民的理想国，也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这种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的空想共产主义，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众文化中产生，反过来又极容易感召民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对这一点做出了有力的注释。

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就其本质上讲，是一条限制、抵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必然发展阶段的路线。这个貌似革命的乌托邦，其实在经济上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纲领。

六，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依据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大量能量。

关于这一点，在《五·七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这种平均主义观念既是自然经济下农民的观念，也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输入给统治者的统治策略观念。毛泽东将马克思学说中的共产主义远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患不均”的观念超越巨大的时间差来了个合二为一。

毛泽东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地将全社会的经济、政治归于国家，而将国家归於越来越集中的领导，造成最为集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上倡导平等，恐惧任何贫富差别造成的社会不安。他对两极分化的高度敏感与警觉，以极为典型的方式注释了“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法则。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中，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口号，以天才的方式嫁接在一起，形成了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奇观。

商品经济是制造差别的，竞争以及竞争所争得的差别是商品经济的生命力。毛泽东对任何贫富差别的恐惧，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之一。仅就这一传统文化而言，毛泽东的

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对商品经济的倾向。

我们在随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还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所昭示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既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说到底，是执行商品经济对现状的批判。

七，这样，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毛泽东的路线其实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反经济的，反生产力发展的。毛泽东这一路线的来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布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对于中国这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度，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众中存在着与《五·七指示》广泛共鸣的思潮。这也正是毛泽东路线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总能够在党内、在全国占上风的社会原因。

当他把城乡出现的任何一点贫富差别都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提出来并予以进攻时，绝大多数民众一呼而应，顿时形成对少数稍稍露富者进行斗争的狂潮。毛泽东利用当下社会的任何贫富差别造成的阶级斗争形势，总是无往而不胜，威慑全党，威慑全国。这也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凭藉之一。

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形成了像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批专事政治思想斗争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新阶级斗争纲领的政治基础、阶级基础。

他们是运用民众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平均主义思潮在党内维护和扩大自己特有官僚权力的意识形态斗争集团。这个集团在理论上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鼓噪者，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幌子，企图在一个经济贫困、民众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国家里建造自己别样专制的官僚统治。

如果说毛泽东本人还有很多农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及艺术家的浪漫，那么，这个专事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政治集团，却以他们残忍的行为方式及心理本能，注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路线，其实是一条专制的路线。

五、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路线

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改革，走出了属于中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是真正将商品经济的必然发展阶段容纳在自己体系之内的社会主义。这是尊重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

当邓小平揭开这个改革阶段时，不仅使人们看清了中国的现在，也使人们看清了中国的过去。应该说，这条改革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后，是被刘少奇、邓小平越来越清楚地表述出来的。

剖析这条路线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基础，显得单纯得多。

作为共产党人，刘少奇、邓小平原本和毛泽东一样，都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处于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受着苏联模式的指导和影响，对于最初的“一化三改”的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大概在态度上和毛泽东是基本上一致的。

然而，出发时似乎一致，行进过程中却出现了分歧。分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感受到了商品经济本身发展的规律。之所以他们能率先感受到这一点，原因是很简单的：

第一，由于个人思想渊源、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造成的对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敏感性及务实性。

刘少奇在民族、民主革命中长期从事党的工作，特别是曾主管过城市的地下党工作，本人的家庭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社会阶层有较多的直接联系。邓小平年轻时曾赴欧留学。他们这些个人性的历史及文化知识结构，是有别于毛泽东这样从农村土生土长又从农民战争、武装斗争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领导人的。

第二，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更单纯的原因，就在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这批经济务实主义者大多是在第一线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他们更多地直接面对国计民生，面对生产各部门的管理者和劳动者，包括更多地面对知识分子群体，也包括更多地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民主党派。他们更直接感受到价值规律潜在的力量。

在理论上，他们或许并没有自觉到认清商品经济有其不可超

越的历史阶段，价值规律总会透过各种垄断乃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表现出顽强的力量，然而，他们却在具体的政策中、操作中感受着一切，又接收着一切。

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共产党，而在于要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共产党。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社会主义，而在于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还是现实的？

他们同样以极高的职业政治家的忠诚力图设计和维护共产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利益，然而，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商品经济本身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他们就像商品经济一样，顽强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大胆表现不过注释了商品经济的必然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汇成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他们率先探索到潮流底层掩盖着的商品经济的历史趋势，并扎根于其中，开出了几朵带刺的玫瑰。

这几朵带刺的玫瑰花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巨大潮流中，曾被冲刷得七零八落，但仍不时探出潮流，露出警醒的一笑。那时也许他们未必知道，旧的潮流落尽，新的潮流属于他们。

第五章 完整的政治斗争格局（1962 年－1965 年）

一场社会政治斗争中的诸多力量、诸多矛盾以及诸多因素，是在互动中合成的，是一个生动

的运动过程。一切静态的分析只能提供述中的相对方便。而任何对这种相对方便的过分迷恋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掌握。

一、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成因的分析逐渐逼近文化大革命的大幕时，特别有必要使我们政治斗争的眼光越来越开阔与深刻。

社会政治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便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斗争。当历史学家描绘他们视野中的任何重大社会政治斗争时，无论怎样穷尽有关历史素材，都可能在概括中将历史本身简单化。特别是当他们抓住了所描述历史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思路时，常常有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那就是，将丰富的千方百面的历史事实都归为已经抓住的思路，各种现象不过成为他们论证自己思路的事实而已。

任何深刻的思想都有可能简化生活。任何有力的逻辑都有可能使丰富的历史变得干燥。结果，我们读到的历史描绘，可能在某一条思路上是深刻的，然而，相对于丰富的历史却是简单化的。

就好像我们原本要阅读一条滔滔千里的长河，然而，读到的只是河流主航道上的一条航标连线。当这条航标连线位居航道中流时，还能为我们标出一个正确的逻辑。倘若它偏离主航道，逶迤在长河岸边或者无关紧要的支流湖泊中，我们得到的或许只是一个有关长河的错误印象。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得以形成的历史分析，或许已经使我们抓住了位于长河主航道上的航标线，然而，对于历史的概括还应该更丰富、更全面。

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分析，已经使我们抓住了这段历史的根本线索，那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过反映着经济本身发展的规律，反映着商品经济的力量，反映着价值规律的力量，反映着生产关系必然适应生产力并同时要求上层建筑适应自己的趋势。在这一点上，我们越来越清楚了。

在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剖析中，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怎样实现这个基本的逻辑。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究其实是商品经济的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过典型地表明了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适应其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基本的逻辑是我们标出的历史发展长河的主航线。

然而，作为对一场重大社会政治斗争的描述，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这个基本逻辑的描述中，更确切地说，当我们描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历史进程时，本身就表现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的方方面面。

首先，我们将看到，作为一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有着国际和国内多方面的背景。

就国际而言，涉及到非常具体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就国内而言，这场政治斗争是各种力量的汇集，各种矛盾的交叉。

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又各自依据于它们深厚的利益基础；它们与国际上的不同力量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也与广泛的社会思潮与传统文化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各自表现出相应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方方面面的力量、矛盾和因素，我们都应该一览无余。

当把与历史进程相关的任何重大因素排斥在视野之外时，我们的判断必然是偏颇的。

就好像身历其境的各派政治力量，其代表人物的行为是各种因素汇集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消失或增加，都可能改变他们当时的行动，也会由此改写当时的历史。因此，武断地略去历史中的某些重大因素，必然离开真实的历史。

其次，我们还应该明确，一场社会政治斗争的诸多力量、诸多矛盾以及诸多因素，是在互动中合成的，是一个生动的运动过程，一切静态的分析只能提供叙述中的相对方便。任何对这种相对方便的过分迷恋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把握。

不同的政治力量与不同的矛盾在斗争的演化中此起彼伏，有着无比生动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有着瞬息万变的格局的变化，我们的概括必须紧随这种变化。深刻的结论应该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地形成着、修正着、深化着，绝不要轻易停留在一时一刻的发现上。

如果我们把握的历史素材还未达到绝对丰富时,尤其要透过素材看到它们所依据的丰富历史。要把已经被烘干燥了的素材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还原水分，使其在今天的研究中再现鲜活的意义。因为一切历史的素材对于今天，几乎都只是文字的记录。文字似乎代表了一切，又远不能代表一切。这是要特别清醒的。只有重新面对那段曾经鲜活的历史，才能对之做出生动而深刻的描述。

这样，再其次，我们就势必又会提到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

一个严肃的思想文本，总在对历史的描述中艰辛地寻找必然性，把一条条铁链似的逻辑发现出来，条理清楚地挂在世人面前。而那些文学性的历史记载，总在捕捉各种生动的偶然性，他们不关心那些令人敬畏的必然性，只希望在生动的偶然性中找到别致的趣味。

然而今天，我们严肃的思想却试图把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统一地掌握在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确实看到了由大及小的层层必然性，包括生产力将冲破各种各样的束缚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根本必然性。同时，我们也将不放过历史进程中任何重大的偶然性因素。

例如，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江青。可以说，这一类人物的产生是必然的，但这一类人物的代表以毛泽东夫人的面貌出现，或许有某种偶然性。江青这一类人有必然性，江青这一个人却有偶然性。

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带有偶然性质的江青的存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所谓时机经常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很多时机都带有偶然性的色彩。从历史哲学而言，

一切现象都是偶然性的。历史规律这个必然性存在于历史现象这个偶然性之中。

每一个政治家都绝不错过对他们有利的偶然性。至于这里包含着什么必然性，那是三思而后得的东西。我们描绘这场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要尽可能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再其次，还要指出的是，在研究这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时，作为对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矛盾和斗争的描述与剖析，一定不要忘记透视他们各自的代表人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的政治较量是惊心动魄、残酷激烈的。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在历史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处心积虑地行为着。当我们将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行为及其依据的背景、环境掌握之后，对他们的行为、意识形态特征及策略、动机，也都能入木三分地掌握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对这段历史有比较深刻、中肯的把握。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对任何历史描述做出我们的结论；当我们准确道出了一段历史中各种代表人物的行为逻辑及其背景基础时，我们就近乎把握了这段历史的最大真实。

这样做绝非容易。

在这个世界上了解他人从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要了解一段重大历史中的诸多重要历史人物，更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对一段历史中那些特别重要的人物，如果缺乏正确的把握，哪怕对其中一两个人物把握有偏差，对那段历史的概括就将是片面的，有缺陷的。

用一个我们刚才用过的方式就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人物倘若有一两个偏离了原有的背景环境与思想行为逻辑，历史就不会是原来的样子。所以，偏离了人物，就是篡改了历史。

在这方面，我们不可有任何主观主义的偏见，不可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无论我们有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多么独到的思想，都要放下执着，做一个面对历史万分虚心的人。

我们在描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绝不是在陈述已有的发现，而是要做出新的发现。叙述的过程就应该是再发现的过程。永远使我们的思维和语言追随历史本身的事实，按照历史的逻辑去探究历史的逻辑。

我们进入历史的思维，而不是让历史来注释我们的思维。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斗争。

这场斗争在一个完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背景中产生和进行。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这是一个巨大的过程。这是一个多方面的格局。这是一个始终在变化中的格局。

千万不可纸上谈兵，将其简单化。

二、焦点聚向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这个给中国生产力发展造成巨大损失的社会大动乱，毛泽东自然有他的责任。然而，将此说成是由于他晚年昏聩所致，又绝对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非常清醒的政治大行为。从他的角度和思想出发，可以看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理由。只不过这个理由就历史而言，还要重新审定。

在这里，有必要把我们的描述在历史的时间表上停顿一下，对 1962 年发生的事情再做一点回顾。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到 1962 年 9 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是两个性质上有较大差别的会议。可以说，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的变化中，包含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重要线索。

七千人大会总体上是一个宽松的大会，民主集中制的大会，这次会议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了比较主要的位置；而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会。那么，在两个大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在第三章所做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一方面，在 1962 年的上半年，中国的农业形势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明显好转，显示出了从经济困难中摆脱出来的趋势。这无疑为毛泽东开展新一轮政治思想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当人民要吃饭的问题不那么紧迫了，政治上的考虑才能从经济困顿中脱颖而出。这是 1962 年夏季来临时，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确实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也并非是人民一有饭吃了，就想搞阶级斗争运动，他的全部政治部署都有其必要的情势。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 1962 年整个上半年中，一直有着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种种舆论与动向。这足以引起全党和毛泽东的警觉。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被打倒了的地主、富农以及其他敌对势力这时确实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蠢蠢欲动”。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政策失误以及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为共产党旧有的敌人提供了一线希望。而他们的全部活动，势必成为毛泽东在全党拧紧阶级斗争之弦的依据之一。

八届十中全会前夕，1962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开门见山讲出这样的话：“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廿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

在这里，国内的阶级斗争无疑带有了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性质。只要蒋介石有反攻大陆的嚣张，毛泽东拧紧阶级斗争之弦，就有了全党都必然认可的合理性。

毛泽东历来看重中国大陆以外的事情，但又不是最看重中国大陆以外的事情，他最看重的还是中国大陆上正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大陆，他对已经被打倒的地主、富农虽然在其阶级斗争理论中常常率先提到，然而，他常常又并不把他们放在主要的位置。

毛泽东在这时看到的最主要的威胁，恰恰是七千人大会前后在中国围绕着经济务实主义路线

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动向。他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特别考察一下上面提到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于 1962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会议，是同年 9 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政治思想准备。正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路线的全部依据。

他讲道："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 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 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

这段讲话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对于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向的头等警觉。对任何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的产生，都会触动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都是毛泽东视野中带有最严重性质的阶级斗争动向。根据对客观情况的梳理，他已经把这种动向和党内的斗争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联系在了一起。

他在会议上这样讲，"党员的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好的坏人，实际不是共产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注意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做分析。"

在这段讲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置疑和警觉。

当毛泽东将社会上贫富差别、两极分化以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向作为阶级斗争的重大事实与党内矛盾联系起来时，他日益警惕和抓住的是，这一切在党内上层的反映。

他在会上严厉指出："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的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毛泽东还用更加提纲挈领的严重口气讲道，"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所勾勒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的"阶级斗争"、特别与上层的"阶级斗争"连成一体的图画。这实际上已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

再联系我们曾经引用并分析过的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联系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展露的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就更能看清楚毛泽东在这里所论述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什么样的性质。这确实是他要批判和反对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

正是在这些讲话中我们看到，1962 年在中国社会以及党内发生的许多经济政策的变动，从根本上是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相对立的。这确实是毛泽东从其思想基础上要加以反对的。

毛泽东总是将那些经济务实主义的政策与社会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联系在一起，并把它定义为“资本主义”；他也总是扮演一个考虑大多数贫苦民众利益并维持社会平均主义状态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还显露出他与整个经济管理部门之间别样性质的矛盾。他讲道：“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影响，商业部应当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利于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他要批评的恰恰是某些部门只考虑国家利益而不考虑农民利益的倾向。当然，这依然和他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反映出毛泽东对立统一的两方面倾向。

一方面，他的革命路线本身是追求集中领导的，是要把全社会的经济都纳入政治统治之中的；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记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这里反映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社会框架。对于任何经济职能部门的集中性权力，他都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而对这些职能部门的权力偏离以他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中心的任何分散倾向，他又予以极力的反对。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他理想的社会政治结构模式是：每个民众成员都是又能做工、又能务农、又能做文化、又能批判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一种平均的生活水平状态中，超越各种压迫他们的集中领导，直接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指挥。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体现了这种社会政治蓝图：一方面，相对于现代经济生活所需要的秩序与权力，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方面，表现在政治、思想及领导上又绝对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

我们看到，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实与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这里不仅有农民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陶渊明式的理想国倾向，还有封建主义专制政治文化的表现。

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讲道：“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对中央各部门特别是主管经济的部门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信任与抨击。这种不信任与抨击表明，毛泽东正在一步步形成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感受到的一切。

而这一切又与国际上重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这里不仅是帝国主义问题，更重要的是修正主义问题。中国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之间的矛盾，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两国关系方面，日益尖锐。

1959 年 9 月，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赫鲁晓夫支持了印度的尼赫鲁，对中国进行了攻击，塔斯社发表了相关的声明。后来，在中国的国庆十周年宴会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又对中国有所批评。随后，在 1960 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领导了一场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以后，中苏两党的会议，八十一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还有华沙会议，都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中的尖锐冲突。

这种国际上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必然与毛泽东反对党内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毛泽东在随后的历史中逐渐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和锋芒也指向了党内。这是我们在随后的历史剖析中理解文化大革命逐步酝酿和诞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过程。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这无疑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口号越来越接近了。

三、国际反修的大情势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反对赫鲁晓夫为首的所谓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逐渐成为中国面对的最重要的国际形势。两党之间由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渐延伸为两国之间关系的矛盾。到 1960 年前后，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在此过程中，两党在一系列苏联主持的国际性共产党会议中发生了日益明显的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在两党的双边会谈中同样愈演愈烈，越来越失去调和的余地。1960 年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对中国的援助合同，以及在中印边界矛盾冲突中对印度的偏袒，只不过是两党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国家关系的典型表现。

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有着越来越根本的分歧，两人所代表的两种潮流也越来越没有调和的可能。他们都不可能改变自己，迎合对方。赫鲁晓夫以极端地批判斯大林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奠基，毛泽东对此尤其警觉。

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同是自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自然会使毛泽东产生更多的政治联想。他在这方面的警觉与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更有不同。

在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感到这个对立面的危险性，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危险性与中国共产党内斗争的联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 1962 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中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定名为党内的修正主义。这样，他就把国际、国内的斗争完全联系在了一起。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表面而言，毛泽东还将此保持在一个不露锋芒的自然而然的讲话中，并在其他问题上谈到与刘少奇的共识，似乎这一切与刘少奇无关，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向，

只是一般性的、理论上的警示，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提法在当时已经多少隐含着具体指向了。

当历史揭开 1963 年这一页时，与国际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入了更大规模的阶段。

1963 年 3 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大意是：国际形势和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变化，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若干原则性问题。

1963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对此做出了纲领性的回答。这就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长篇回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一个试图以理服人同时又针锋相对的纲领性文件。

同年 7 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苏联就两党关系进行会谈。在会议期间的 7 月 14 日，苏联在报刊电台上公开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言辞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共产党，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公开化。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方面，它发生于赫鲁晓夫参加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谈前夕，想必是他带给美英的一份见面礼，是他与美英进行高级谈判的“诚意”之表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赫鲁晓夫认为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到了向全苏党员和人民说明的时候，它是两党斗争升级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对此立即做出强有力的反应。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方面对两党会谈缺乏诚意，建议会议暂停，随后便取道回国。接着，面对苏联方面公开信的广泛影响，中国共产党做出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特别是在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之后，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反击，也是规模浩大的。先后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篇文章，展开了大规模的国际反修斗争，这九评是：

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 年 9 月 6 日）

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 年 9 月 13 日）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 年 9 月 26 日）

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 年 10 月 22 日）

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 年 11 月 19 日）

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 年 12 月 12 日）

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 年 2 月 4 日）

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 年 3 月 31 日）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 年 7 月 14 日）

九评延续了近一年时间。

到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紧接着，11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对一至九评的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做了总结性论述。

在这篇文章中，把赫鲁晓夫的下台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实际上，赫鲁晓夫的下台与苏联国内诸种具体的政治矛盾相关，和苏共内部的具体政治斗争相关。也多少意味着苏共中央在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当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后新的政治领导集团抱着些微希望时，他们以政治家应该有的灵活姿态，走出了尝试调整两党！关系的外交步骤。

1964 年 11 月 7 日，正值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这一高规格代表团的派出，是明显的友好姿态。这一友好姿态有可能开始友好的接触，从而打开两党、两国之间封冻的冰河。

然而，在中苏两党会谈还未正式开始之前，发生了一个看似偶然的重要事件。

在 11 月 7 日晚苏联政府招待各国来宾的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居然对中国代表团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贺龙当场就对这种说法予以了驳斥，并立刻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据此立刻向苏共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出质问。勃列日涅夫以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作为一种解释和掩饰。

然而，周恩来认定这个事情性质严重，这种认定无疑与他深谙政治相关。他必须对此表现出更充分、更完备、更坚定、更无任何隐患的态度。

在随后进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周恩来再一次就此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以至勃列日涅夫本人不得不亲自道歉。周恩来在这件事上无疑做了完整而妥当的表现。

正是这件事情，使得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勃列日涅夫刚上台时曾有过的些微幻想都归于消失。这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样，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冰河不但没有打破，似乎更加严酷起来。

毛泽东本人对马林诺夫斯基事件肯定更加警觉。作为一个超常敏锐的人，对于政治斗争中的任何危险因素，他从不掉以轻心。他不仅熟谙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政权内部斗争的复杂性，而

且通晓当代国际上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对于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就有的控制兄弟党国家政治权力，甚至用颠覆手段来搞掉不听话的领导人，从而培植自己仆从的传统，毛泽东大概分外留意。

两国关系越发交恶。勃列日涅夫政权将上百万部队、越来越多的先进军事装备陈列在中苏边境，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这时，毛泽东反对苏修的斗争便不仅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而且还带有直接的政治、军事性质。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神经自然是越绷越紧的。他知道，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内部的任何反对派都可能被感应。里通外国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外通国内的企图更会不断地运作。对此，最安全和最可靠的方针是：

第一，坚定不移地与苏联修正主义对抗，绝不表现丝毫的软弱性。

第二，针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必须对党内实行更加强化的整肃，在外部的高压下保持内部的高度纯洁。绝不能让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势力漫延，绝不能造成党内修正主义集团化。

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及军事压力，是毛泽东考虑国内政治思想斗争的巨大外部情势。在敌我双方的斗争中，任何不安全感都可能促成先发制人的进攻。

当毛泽东感到，苏联的巨大外部压力有可能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联结在一起时，他显然不能再保持百分之百的从容。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他主动发动的，然而，更深刻地说，有可能是他“被迫”发动的。

四、农村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

在国际反修斗争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自然同时抓紧国内的阶级斗争。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部署。

正像他一贯的思路那样，他从来特别重视农村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及路线斗争。

七千人大会前后，伴随着经济现实主义路线的影响，农村在生产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各种被毛泽东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与部分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等交织在一起，在毛泽东眼里当然是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因为这种斗争还反映到党内，包括反映到党内上层，所以毛泽东把这当做一件大事来抓。

毛泽东认为，不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不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问题，他在政治思想上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会失去最基本的阵地。

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中，发出了警醒的声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5 月 9 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不进行三大革命运动，如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是毛泽东从农村阶级斗争出发做出的有关党的基本路线的纲领性讲话。这段讲话表现出毛泽东对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已经有了高度的警觉。中国改变颜色的危险，仿佛就矗立在面前。

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同样做了重要指示，指出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他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吃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之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对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一个相当裁面的概括。如果将这一概括同《五·七指示》联系在一起阅读，就能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在什么程度上有其政治可行性，在什么程度上又根源于他深厚的空想社会主义。

在中国这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在这个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民的共产党内，这样的指示无疑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5 月 20 日，他又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十条”)，向全党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

在“十条”中，他指出了中国当时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情况，提出了在斗争中依靠贫下中农组织革命阶级队伍的问题，提出了四清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为“十条”的开头，就是毛泽东本人加写的著名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

“十条”的制定，使得全国城乡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种斗争和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自然相互联系。

随后不久，即 1963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30 日来信的覆信《关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中共中央在这封《建议》中尖锐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紧接着，在 6 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流血的阶级斗争，有不流血的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

应该说，毛泽东对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并开始泛滥资本主义倾向的中国农村，有效地领导了一场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名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对于这场阶级斗争，全党自然不会有什么异议。而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重要插曲，倒是我们不该忽略的，因为这个插曲与刘少奇相关。

1963 年 11 月－1964 年 4 月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这里推出了后来被批判为形"左"实右典型的"桃园经验"。

与这个"桃园经验"相联系的，1964 年 5 月，刘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总结得不全面，""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这些论调后来被毛泽东批判为形"左"实右的代表性语

在 1964 年期间，刘少奇在其他一些报告及讲话中，对农村的阶级斗争还有过类似的描述。认为农村中严重"四不清"的干部不少于三分之一，主张工作队进村后，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搞"扎根串连"，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些都在后来被批判为形"左"实右的典型语言。

他还特别强调多吃多占的干部经济退赔的重要性。这也被后来的大批判说成是不着重从政治上解决干部中的问题，企图以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

正是在刘少奇的主持及影响下，中共中央在同年 9 月 10 日又推出了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二个十条，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这个"后十条"在后来被定为"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

应该说，刘少奇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系列讲话及这个"后十条"，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别样的紧张。在这个所谓形"左"路线的指导下，共产党在农村的阶级斗争中反而处在了不够有利的位置。用扎根串连的方式、秘密工作的方式调查情况，展开阶级斗争，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共产党人在农村高度领导权的自信。

这无疑是一个并不得力的方针路线。在这个插曲中，我们无须牵强地附会刘少奇路线正是代

表生产力发展的路线之命题。

在这里，刘少奇虽然一方面依然表现为和毛泽东一样同是共产党人，同是从共产党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又有很大的区别，刘少奇还并不是像毛泽东这样真正从中国农村文化、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

毛泽东无疑比他更了解农民，更相信农民，更不怕农民，更表现出在领导农民问题上的大得多的坦然与自信。从共产党要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课题本身而言，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路线无疑显得比刘少奇高明。

然而，这还不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此时的根本差别。根本的差别是刘少奇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前后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这种倾向。

面对党内刘少奇这样的倾向，毛泽东于 1965 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于 1 月 14 日发布了。这是毛泽东指导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

完备纲领性文件。

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他批判和“粉碎”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原则，那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在这里，我们才看到把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定为形“左”实右的真正含义。

客观地说，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的路线确有“左”的倾向（这“左”的倾向其实来自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奠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毛泽东把它定为形“左”而实右时，不过是把刘少奇的经济务实主义与修正主义路线及资本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在《二十三条》中最核心的东西，这也是根本对立于刘少奇的东西，它既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结论，也成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原则 1。

可以说，《二十三条》既是 1956 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全国性阶级斗争的发展结果，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它是一个承下启下的纲领性文件。

五、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展开

1962 年 9 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国际上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同时，在国内还特别着重抓紧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思想政治斗争。这个斗争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在一起，成为当时中国阶级斗争运动的全貌。

1963 年 5 月 6 日，由柯庆施、江青组织人写的批判孟超的《李慧娘》、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于上海《文汇报》发表，露出了思想政治领域内阶级斗争的锋芒。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意识形态诸领域的事情十分敏感。他抓住各种题目作文章，实行舆论上的推动。1963 年 9 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要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9 月 27 日，毛泽东再次指出：“文艺部门、戏曲、电影要抓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旧形式要出新内容。”“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

他接着指出：“《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同年 11 月 16 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这样的指示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领域内斗争的力量配置，另一方面也给了林彪更多的政治资本。林彪在这一时期始终处在稳定的崛起过程中。

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锐利矛头，一再指向艺术领域。

他在一份反映上海柯庆施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作出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在这里，毛泽东对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意思是十分明白和透彻的。他把这个领域当做是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的部门。他的严厉批示，既为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指明了对象，也开始在党内组织起进行这场斗争的干部队伍。

正是在这些批示的精神下，江青、张春桥这样的人物才嗅觉敏感地聚集起来。

毛泽东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教育部门。

1964 年 2 月 13 日，在一次春节座谈会上，他对教育领域的工作又做出指示：“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他以非常有力的语言指出：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必须改革。这一类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他曾反复重申。

还是这个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对文艺领域做出了指示，这个指示自然是相当严厉的。“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否则写不出东西来。不下去不给开饭。”

这样的指示在当时只被当做一种精神。在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一线主持工作的人的过滤下，最多成为一种和风细雨的吹风。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在无比彻底的、夸张的乃至残酷的程度上实现了出来。

1964 年 5 月 9 日，作为对毛泽东一系列精神的配合，林彪对部队文艺工作也作出相应指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

同年 6 月 5 日—7 月 31 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一个政治上有意识的行为，毛泽东观看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现代京剧，并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

江青在参加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所谓京剧革命，是毛泽东逐步成熟文化大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这又是江青全力以赴策划和操作的。

正是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的巨大需要，给了江青崭露峥嵘头角的机会。江青在这方面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又有一定的擅长。当她在这时顺势挺身而出时，一贯对她的公开行动给以很大限制的毛泽东，便不能乃至不愿再予以限制了。

江青的“脱颖而出”，使得文化大革命增加了一个很大的进攻性人物。

1964 年 6 月 27 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做了继续张满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大弓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与此同时，他还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报告上作出批示：“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这些批示的定性已经非常明确了，它在中国的政治天空中如高悬的利剑。然而，即使这样，党内那时对这样的声音似乎还没有重视到毛泽东所需要的程度。

1964 年 7 月，毛泽东作出了更为提纲挈领的论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在这里，一个一百年到几百年才可能完成的政治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被提了出来。当时的

党内，到底有多少人真正领会了毛泽东这一论述的含义及其严重性？特别是在党的领导上层，又有多少人领会这个论断中所含的矛头已经隐隐指向他们中间的某些人？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表明，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领会毛泽东的言中之意。

7 月 14 日，《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了。毛泽东在其中亲自写了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接着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这段论述特别明确地显露出毛泽东对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与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切谋略。他提出接班人的问题，不仅让我们联想到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如何否定了斯大林，还特别让我们想到毛泽东是何等警惕身边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存在。

当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定义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人们才认识到毛泽东这段论述的真正分量。遗憾的是，从当时整个党内上层的反应看来，包括从刘少奇本人的反应看来，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领会毛泽东此话的深意。

1964 年 9 月，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又指出："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时隔不久，12 月 22 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指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进一步阐述，甚至看到了毛泽东对斗争前途满怀信心的乐观主义。

在 1965 年 1 月《二十三条》制定并发布后，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的格局进一步成熟。

一方面，中国广大农村阶级斗争的局面已经有了全局在手的把握；另一方面，《二十三条》已经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原理在党内以文件

的形式正式肯定了下来。接下来的半年中，他继续顺势推进着。

1965 年 8 月 5 日，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他又指出：“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分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

在这段讲话中，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了中国国内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这是一个相当严重醒目的提法：另一方面，他正在对国际范围内吹风，这是为他以后揭开中国共产党内全面阶级斗争盖子的一种舆论准备。

说到文化大革命，就其公开化、全面化的开始，一般可以从 1966 年 6 月 1 日中央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算起。如果更往前推，就应该从 1965 年 9 月毛泽东在党内触及吴晗问题开始。

从 1962 年 9 月八中全会到 1965 年 9 月的近三年时间里，毛泽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已经做了一系列开展阶级斗争的指示和批示。仅仅就以上引述的这些内容而言，就能够感到毛泽东一直在抓紧推动这场斗争。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绝不会像我们今天集中阅读这些论述时感受那么强烈。毛泽东如此之多的指示与步骤，毕竟是被分散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之中，他并不可能每天做阶级斗争这件事。

他即使心中从未忘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但是在实际中，也只能因势利导地乘机而做。因为他面对的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面对的是一个从几亿人的吃饭穿衣到整个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塞满党和国家各部门工作日程的实际情况。

当毛泽东处于远离实际工作的二线，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地推动政治思想运动或者推动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上层领导都在一线面对各种具体的党务、国务、经济、文化。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实际中又可能淡化、削弱和抵制了毛泽东的指示。

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中，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及宣传等工作中，我们看到，占据着一线工作岗位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批党的上层领导干部，都在十分务实地操作着。并没有哪个人敢于公开否认和对抗毛泽东的纲领性指示，然而，具体的操作中，确实很少有人真正在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的强度上落实照办。

除了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康生和姚文元等这样一些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分子逐渐崭露头角外，更多的党的领导层的表现，是让毛泽东产生大权旁落的愤怒。

毛泽东或许无暇也不屑于亲自顾及一线的日常琐碎事物，他喜欢纲举目张，统管全局；然而，放弃了第一线的具体操作，就必然失去第一线的巨大权力。党和国家的各个部门在刘邓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运转着，而这些运转本质上又必然是经济现实主义的。

毛泽东日益感到了重新开展一场大革命的必要性。

当然，毛泽东的这一决心也是逐步成熟的。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并非事先全部设计好的。逢山攀山，逢水涉水，路是在走的过程中明确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斗争也是在运筹和推动的过程中，逐步在现实与头脑中成型的。

当毛泽东发出一系列有关上层建筑领域内革命的指示后，只有江青等少数几个人声嘶力竭地响应，并未引起他所期待的全党轰轰烈烈的拥护，他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已经日益逼近了。

1965 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经坦然承认中国存在个人崇拜，同时不失大政治家风度地从容说道：当时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那当然是指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了。其中真正的含义是，这是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政治革命的需要。

斯诺当时或许并未完全领会毛泽东这番话的深刻含义。

1970 年，文化大革命处在胜利巅峰状态之时，斯诺再次访问中国，12 月 18 日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说：在我们 1965 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省、各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

这段谈话再次表明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前自己大权旁落的意识。当时，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罗，1965 年 1 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后斯诺通过当时中国的其他高层领导人证实，1965 年 1 月 25 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下面这个情况对于我们判断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有用的：1964 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四清工作会议期间，一次邓小平主持的会上，正值毛泽东身体不适，邓小平劝毛泽东不要来，毛说：不行，非要参加不可。当毛泽东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在再一次会上，他带上了宪法和党章。在讲话时，毛泽东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说：这有两本书，这本是宪法，我是公民，有公民权。这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毛泽东发了脾气。后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检讨，说他对主席不尊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不满意，认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指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指李富春的国家计委。）

当后来的历史学家中的有些人将文化大革命归为毛泽东浪漫主义的革命性格，或者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归于他在权力上的多疑、猜忌与性格残忍时，我们说，这些都是不足道的。

文化大革命前的全部情势是，毛泽东深深感到了共产党可能"改变颜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可能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

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不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党内阶级斗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本身就可

能被推翻。不借助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运动，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保证其“正确”的领导路线贯彻下去。

毛泽东虽然生性好斗，热爱革命，敢于破坏现存世界，然而，对于自己几十年经过艰苦斗争“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党和国家，不能说没有责任心。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也是在他的立场上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行为的。

正是为了打倒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法轻易打倒的敌人，他必须借助多种能量。

其中包括个人崇拜。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的政治分析（1965 年－1966 年 6 月）

政治的力量同军事的力量一样，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常数。政治及军事力量的大小，还在于对其力量的使用艺术。不同的棋手，在看来势均力敌的阵势中，却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敌制胜的局面来。

一、抓住《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

面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已经感到，这并非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现实的发展也使他认识到，久拖不决的局面必须打破。全部信息都告诉他，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正在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操作中越来越稳固地占据各部门的权力。这种迹象在 1963 年－1964 年这两年中，越来越明显。

作为一个纯熟的政治家，他势必感到了这些问题绝非以往按部就班的中央会议、政治局会议所能解决的。只在会议斗争的舞台上，他不可能将刘少奇及其所代表的党的一批上层领导干部搞掉，更不可能将刘少奇这条路线在各省、市、地、县的代表人物搞掉。政治斗争有各种各样的程序，当按部就班的程序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必然要寻找别样的程序。

毛泽东从来都是以领袖的身份出发指导全党。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方式对他而言都是合法的程序。只要这些程序可能被他的巨手调动，他就会想方设法地调动。他深知，政治的力量同军事的力量一样，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常数。政治及军事力量的大小，本身还在于对力量的使用艺术。不同的棋手，在看来势均力敌的阵势中，却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敌制胜的局面来。

在政治局面对面的会议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必须超出这个范围才能得到。当毛泽东有关政治思想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党得不到真正有力的贯彻执行时，他知道，需要对党本身做一个除旧布新的大手术。

为此，他必须使斗争尽可能地公开化，尽可能地全党化、全国化和社会化。在这里，有几个力量是他可能凭藉的。

首先，是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的崇高个人威望。正像他对斯诺讲的，这种个人崇拜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凭藉。在社会公开的舆论中，没有任何人敢于举起讨伐他的旗帜，而他，却可以举起讨伐任何人的旗帜。

其次，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路线在中国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基础。正像其后他在 1966 年的《五·七指示》中所描绘的图画一样，他知道自己的社会主义蓝图必定会在中国大多数民众中得到热烈的响应。

再其次，他深知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多年的宣传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阶级斗争的纲领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之中。他永远注意民众的大多数，他也相信民众的大多数会站作他的旗帜之下。

所以，党内斗争一旦公开化，民众的力量就会形成巨大的声势。以此声势为底盘托起的党内斗争，一定会形成对他有利得多的格局。

他当下处心积虑的是，寻找突破口。

对于这场政治革命如何搞，他目前还只有一个朦胧的概念。重点点是明确的，应该将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掉，应该在全国开展一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而，更多的内容却不是一下子都能设计好的。

毛泽东从来是一位注重实践的政治家，他的社会主义或许是空想的，然而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他一贯依靠行动开辟道路。不需要想好了再做，而要在做的过程中逐步想好。

正当他多方面抓题目、作文章时，真正的突破口出现了。

这就是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原本是一位研究明史的史学家，之所以写出《海瑞罢官》，最初可能还和毛泽东本人有关。1959 年，面对党内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毛泽东也曾发出过某种程度的批评。毛泽东曾经讲道，有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其实是上面压下来的。他鼓励人们敢讲真话。他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

当然，这些讲话都发生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没有彭德怀这样的人物站出来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反对他时，毛泽东倒有足够的胸怀。领袖在权威没有受到威胁时，恰恰能够显出宽容。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自然得到了响应。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很快便在有关会议上讲到要写海瑞。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作为史学家的吴晗紧跟潮流，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并于 1959 年 6 月 16 日刊登发表。

随后，他又写了《论海瑞》一文。这篇文章的完成，已是庐山会议（1959 年 7 月－8 月）结束之时，为了在政治上避嫌，划清界限，经胡乔木等人审改之后，该文于 9 月 21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特别增加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论述。这无非表明：彭德怀不是海瑞，海瑞不是彭德怀。

接下来，应京剧界艺术家的要求，吴晗又写就了《海瑞罢官》的剧本。京剧《海瑞罢官》在 1961 年初由北京京剧团公演。

到了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全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无疑做出了很大的扭转。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种种“资本主义”倾向开始被有力地批判，阶级斗争这根弦已经在中国的政治上空绷紧。

在这种形势下，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她先是找到中宣部四位正副部长，企图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是没有成功。

今天看来，毛泽东及江青最初选择《海瑞罢官》作为批判对象时，大概还没有把它视为后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端，但是，至少是把它列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对象。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跳出来，颇有点以海瑞自居的情状。特别是其后不久，彭德怀又以洋洋八万言上书为自己翻案，更颇有海瑞的架势。在他们眼里，《海瑞罢官》在庐山会议后不久便浮出地平线，绝非偶然。

毛泽东是一位对意识形态斗争极为敏感的领袖。他“深知”可以用小说和戏剧实行反党活动。他大概从一开始就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翻案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他历来相信，一切意识形态的动向都有其社会背景和政治根源。

1964 年 6 月 5 日－7 月 31 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无疑为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发放了一张红色通行证。她加紧活动，动员曾经批判过俞平伯的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依然没有成功。

同期，也就是 1964 年 9 月，毛泽东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包括《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这是毛泽东推动思想政治领域内大革命的又一个步骤。

然而，这个步骤又被当时的中宣部及有关部门淡化，当然也就没有真正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这一系列运作中，毛泽东除了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党的许多权力已经不在他手中以外，更加感到需要依靠江青这样的冲锋陷阵者。

仅就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斗争的全局而言，没有江青及江青在其后联络的一批意识形态斗争的“杀手”，就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巨大的政治斗争需要给了江青这样一批人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和迅速崛起的机会。

1965 年初，江青跑到意识形态领域内正刮着“左”风的上海，在市长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完成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有效策划。文章决定由当时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撰写。这就是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著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九易其稿、于同年 8 月份第十稿方才定稿的文章曾经不止一次送交毛泽东审阅。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关注下，由江青、张春桥及姚文元联手炮制出来的。

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敏锐性知道，这是政治上的一枚重型炸弹。当他手中握有这张王牌后，他在整个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中就有了更加含威不露的力量。

1965 年 9 月－10 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些话已经非常尖锐地道出了他在随后开展的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主要方向。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明确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进行批判。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当面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的回答显然是有很大保留的：“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彭真并不清楚毛泽东问话中的深意，更不清楚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准备，而毛泽东则通过对方的回答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彭真在这个问题上的顽固立场。面对毛泽东本人如此咄咄逼人的问话，彭真居然还敢做那样保留性很大的回答，其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之后的 9 月 23 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厅、局长会议上讲到“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讲到“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成为彭真的罪状之一。

其实，这不过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很多权力部门对待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指示的惯例。毛泽东的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之所以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高潮，就在于当时党的一线工作确实被刘少奇、彭真这样一些务实主义者所把持。这也正是毛泽东不得不下最大的决心发动最大规模的斗争的原因。

11 月，中国政治舞台上同时发生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件，是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它后来成为全军工作的指导方针，也表明林彪进一步稳步地扩大著他的政治影响，给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实际权力上的支持。

另一件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 11 月 10 日在《文汇报》全文发表。

对突破口的攻击正式开始。

毛泽东当即指示全国报刊予以转载。但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各报刊举步不前。毛泽东又指示出小册子，北京市面对上海新华书店发往全国的征订单，又迟迟不做反应。这一切不过反映了在彭真以及各地彭真式人物的把持下，全党的权力结构对毛泽东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指示表现出了巨大的消极抵制。

然而，既然已经抓住了突破口，既然已经发起了攻击，毛泽东绝不会有片刻犹豫。他毕竟掌握着最高权力。他毕竟抓住了一个看来能够做成文章的好题目，并且已经做成了文章。相隔两周半之后，党的权力机器经过一个相当迟缓的旋转之后，毛泽东的指示终于被执行了。

11 月 29 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与此同期，全国各主要报刊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文章的大规模转载无疑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声势。即使广大民众还没有意识到这里的阶级斗争信号，但思想界，政治界和知识界却多少意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发生。

在转载文章的过程中，由于彭真们把持着权力，依然对转载这一行为做了别样的淡化与抵消。《北京日报》温和的转载按语是彭真亲自加的。在彭真的布置下，《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化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些文章悖离了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大方向，把对海瑞的批判引入了对“道德继承”、“让步政策”、“清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纯学术的讨论之中。

当然，这种消极抵制除了最终使彭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以外，并不可能堵住已被突破的突破口。

同年 12 月 8 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该文在批判胡适的过程中，对剪伯赞、吴晗的历史观展开了批判。这个批判虽未点名，但批判的火力更为猛烈。

毛泽东于 12 月 21 日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文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件。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翻案联系在一起，就政治斗争而言是极为深辣有力的一笔。只有将《海瑞罢官》与党内已被定性打倒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打倒《海瑞罢官》，也才能真正将矛头指向站在《海瑞罢官》后面的党内当权人物，才能实现大的突破。

随后的几天，当彭真听到毛泽东的这个意思之后，不服气地解释“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时，除了加速他本人政治权力更快地消失而外，已经没有任何澄清事实的意义。当毛泽东说，吴晗和彭德怀有关系时，彭真却说，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在这里，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权威、意识形态领域组织有效的攻击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政治步骤，给《海瑞罢官》定了性。

一旦定性，就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斗争成果。

当党内绝大多数上层领导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时，毛泽东已然从这第一步成果中突破了他最终需要突破的突破口。

二、撕开突破口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可以视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对这篇文章的出笼过程，我们做了大致的扫描。这是剖析当时党内的政治力量结构所必须的。

本书并非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大事记，那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旨在概括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中那些最有意义的过程、情节和因素，并对之进行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的分析，从而得出尽可能深刻的认识。

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出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真实处境。

毛泽东有没有权力？毫无疑问，毛泽东具有很大的权力。毛泽东的权力是无限的吗？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权力有着明显的限度。当毛泽东在评《海瑞罢官》一事上如此耐心地捕捉机会、排除阻力、逐层推进时，我们已能看出他当时的政治处境。

此刻，他抓住了一个突破口（也还是刚刚开始突破），突破与反突破的斗争便立刻展开。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深知此时绝不可犹豫。

从 1965 年底－1966 年 5 月 16 日这四五个月时间中，在《海瑞罢官》问题上，在彭真问题上，也就是在未来的整个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斗争显得十分地致密。阻力越大，他调动攻击力的决心越大。仅仅在撕破《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上，他就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

作为中国特别的一年，1966 年开始了。1 月，我们就看到了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活动。

1 月 2 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在这个会上，胡绳传达了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并在传达中有意隐瞒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论断。彭真则在会上提出一个"放"的方针："扯得越宽越好。""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这已经显露出彭真对抗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基本策略：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扯离政治问题而纳入学术领域。

康生则在会上摆出了针锋相对的姿态。他指出，毛主席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 6 月写了《海瑞骂皇帝》，9 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

尖锐的斗争以面对面的形式在会议桌上展开了。

1 月上旬，刘少奇做出偏袒彭真的讲话，他说："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

同期，陆定一在中宣部召开会议，同样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学术化："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1 月 9 日，彭真在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特别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有关论述。

1 月 17 日，在彭真的部署下，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许立群明确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由他们直接掌管，稿件、版面都要送审，极力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与此同时，相对的舆论则从林彪、江青那里升起来。

1 月 18 日，历时二十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高举林彪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旗帜，认为“突出政治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出来的。”提出“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指示为标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这无疑为毛泽东正在开展的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提供了必要的舆论与充满实力感的威慑。

紧接着，2 月 2 日－20 日，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座谈会纪要》。这又是一个色彩极为鲜明的政治举动。林彪与江青的联手合作颇有意味地展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期间所做的力量调配。

斗争进入 2 月份时，彭真等人的活动更为紧密。

2 月 3 日，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个“五人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964 年设立的，由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彭真在这个会议上再次讲明，“已查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他还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不要讲庐山会议。

这采用的依然是将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纳入学术轨道的几本策略。

康生在这个会上自然又扮演了对立面的角色。他依据毛泽东的精神说：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划清界限，不要打击左派，要“依靠左派”及“打击右派”，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

然而，彭真毕竟控制着“五人小组”以及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更多权力，在他的主持及安排下，一个基本体现彭真意图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写成了。这个提纲可以视为彭真对抗毛泽东政治斗争部署之最主要的行为。《二月提纲》表面上接受毛泽东指示，实际上却尽可能地把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温和化、学术化。这是彭真利用党内合法的权力及程序进行政治操作的一个范本。

2 月 5 日，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这个提纲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刘少奇明确表示，对这个提纲没什么意见了，并同意彭真向毛泽东汇报这个《二月提纲》。

2 月 8 日，彭真等人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这是一个看来十分正常的程序。在汇报过程中，彭真讲述了《二目题纲》的内容，但并没有照读《二月提纲》的原文。毛泽东对此做出了严正的指示，他再一次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面对面的斗争。尖锐的斗争性质掩盖在正常的汇报谈话之中。彭真需要一个在毛泽东这里汇报了《二月提纲》并且得到通过的合法结果。而毛泽东在面对面的谈话

中虽然保持了领袖的从容，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松动。汇报期间，毛泽东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容对方躲闪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关键问题。对此，彭真含糊其词地勉强回答：不能算。

也许，毛泽东并不一定需要彭真的任何回答，他所需要的是自己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彭真同意不同意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不影响毛泽东在往下的斗争中摧毁对立政治势力的决心和行动。毛泽东对彭真指出：“要保护左派，不要打击左派。”又指出，“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不管毛泽东做了什么样的口头指示，彭真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已经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过了《二月提纲》他随即将《二月提纲》略加修改予以定稿，并加上一个中央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全党，让各级党组织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是一份充分表明彭真策略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放”，提出“先立后破”，提出防止“左派学阀”，提出“纯学术讨论”，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等，无疑是一个抵制毛泽东政治思想革命的举措。

斗争进行到这一步，毛泽东与彭真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仅仅在面对面的范围内是难以解决任何问题了，毛泽东开始在党内正面展开大规模的行动。

3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时，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这是对彭真、陆定一等人控制的中宣部及有关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所谓“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更是含义十分明确，因为农村工作部是1962年被解散的部门。

3月28日－30日，毛泽东又多次找康生、江青谈话，批判《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他说：“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到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这是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正面行动相配合的又一侧翼行动。他开始更为认真地组织像康生、江青这样的左派，并且通过他们在全国上下组织左派队伍。在这里，他无疑已经超越

了党的按部就班的、合法的组织程序。

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合法的。这是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一个毫不迟疑的原则。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战略部署，可以看到，他始终贯彻了这个政治行动原则。

与此同时，林彪与江青联手的行动继续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空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

3 月 20 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江青组织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且论述："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在 2 月 3 日－4 月 5 日长达两个月的时间中，《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突出政治的社论。这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密切配合毛泽东政治斗争的部署。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一个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改定的《纪要》。《纪要》发出了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号令。《纪要》中以非常严重的口气指出，自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林彪、江青的联手政治行为对于毛泽东与彭真集团及彭真集团后面整个党内反对派的斗争是特别有力的配合。它可以视为对彭真集团另一条战线的打击。

毛泽东推进了党内正面斗争的步骤。4 月 9 日－1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康生传达毛泽东指示，在彭真做了"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的表态之后，康生、陈伯达等人批判了彭真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治路线上的一系列问题。会议最后决定，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决定呈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这个在毛泽东指示下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其实不过是完全照办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那样的政治格局中，在经过了毛泽东一系列思想政治的部署之后，党内已经很难有谁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条件已进一步成熟了，对党的领导集团的思想已经有了足够的预热了，便于 4 月 16 日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个会上全面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这是一个基本定性的批判，并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彭真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此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尖锐指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政治打击集中在彭真及相关的一些人身上。整个党的领导层在一段时间内也并没有超越这个斗争范围，看到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斗争。

当彭真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触怒毛泽东时，党的上层相当一些人把彭真的错误归结为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而对于毛泽东之所以要搞掉彭真的更广阔的政治路线的含义，许多人缺乏自觉的意识。正因为如此，在 4 月 9 日－12 日批判彭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做出的平和的又不失原则的总结是，“彭真的错误是反对毛主席的错误。”

4 月 18 日，《解放军报》不失时机地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4 月 21 日，毛泽东又批发了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出要北京市委揭发彭真的罪行。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推进，5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问题。而《解放军报》则同时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失时机地指出：当前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我们的进攻具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新特点，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5 月 7 日，毛泽东写下著名的《五·七指示》。

5 月 8 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批判的锋芒直指《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及其后台北京市委。

5 月 10 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又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全国各报立即予以转载。

5 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解除了彭真等人的权力，任命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这一系列舆论的以及政治的行为，不过是对 5 月 4 日开始一直进行中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斗争的注释。这个直到 5 月 26 日才结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解决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被定成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被定成修正主义分子。

这是毛泽东从《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开始，真正取得的第一个有实质政治内容的胜利。

到这一步，《海瑞罢官》是否与彭德怀有联系，已然不重要了。当《海瑞罢官》的支持者彭真等人在党内被作为资产阶级分子定性、打倒之后，政治斗争的战线已经极大地纵深推进了。这是毛泽东对对立势力的一个摧毁性打击。

当然，中央的领导上层并没有更多的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对彭、罗、陆、杨予以打倒的政治表决中，党内的高层人物大概没有人敢于不举手通过。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毛泽东纯熟的政治、军事斗争艺术，向来是各个击破的。今天全体通过了打倒彭、罗、陆、杨的决定，这个决定就为往下的行动提供了出发点。

因为，正是在对彭、罗、陆、杨的处理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正式展开的第一个纲

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三、一线与二线分歧的实质意义

我们现在有必要对诞生了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 1966 年 5 月 4 日－26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一点深入研究。

这一扩大会议是在北京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有关单位负责人七十六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及戚本禹等人。毛泽东未到会，由刘少奇主持会议。

事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草稿，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做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毛泽东还于 4 月 16 日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基本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的草稿。

5 月 4 日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是按照毛泽东 4 月 16 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

这个为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而由刘少奇主持，会后由康生向毛泽东做汇报。这表明，毛泽东已做好了部署，成竹在胸，从容地等待会议的成果。到现在为止，毛泽东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或者军事行动，都需要充分的准备过程，都要形成足够的势。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庞大的政治机器，几千万党员的共产党组织，盘根错结的政治力量体系，如毛泽东所期望的大革命运动，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发动的。

毛泽东耐心地通过几年来的一系列动作，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势。势一旦形成，就不可阻挡了。毛泽东相信，在这个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敢于和能够做出真正的反抗。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当他决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时，既是他不出场时按照党内地位顺理成章的安排，又是一个极为策略的安排。在打倒彭真以及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的过程中，他需要刘少奇等人都站在举手的阵营中。他需要各个击破，需要层层推进，需要今天的斗争取得绝大多数人的举手通过。到了明天，可以有又一轮绝大多数举手通过将今天举手的部分人予以打倒。

从刘少奇等人在整个扩大会议期间的行为来看，他们确实还没有百分之百地吃透毛泽东的整个政治意图。

这次为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进行了五个程序。

第一个程序，是历时三天的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

其中，康生做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讲话。他传达了毛泽东自 1962 年 9 月以来特别是 1965 年 11

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以及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要在这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还特别谈到了他对毛泽东历次有关谈话的认识和体会。

他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就是。

张春桥、姚文元沿着同样的精神做了长篇讲话，并针对彭真、陆定一等人进行了攻击性极强的批判。这第一项活动，借助毛泽东在党内的个人权威，极大地震慑了与会者的心理。

会议的第二个程序，就是于 5 月 16 日上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相当于成立了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战指挥部。

会议的第三个程序，是林彪于 5 月 18 日上午在大会的讲话。

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非常有名的“五·一八讲话”，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展开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进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讲话中，林彪讲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政变的事例，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着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危险性，讲到在这种情况下反复辟斗争的重大意义。他特别强调：“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林彪有关政权的经典用语。他还讲道：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还讲道，毛泽东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这里，林彪用“反革命政变危险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论”以及“毛泽东是天才论”注释了他跟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

会议的第四个程序，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查。这个检查在会上理所当然地又受到批判。

会议的第五个程序，是于 5 月 23 日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这个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做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对他们进行专案审查的组织处理。

1966 年 5 月 4 日－26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标志。党内的政治斗争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路线无疑已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态势。

除了林彪、康生、江青及张春桥等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清醒领会毛泽东大多数意图（也不是全部意图）的状态中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之外，党的领导层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不同程度的不

理解和困惑之中。他们一定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政治潮流冲来，使他们有些站不稳脚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朦胧中对毛泽东的意图有这样或那样的感觉与猜测，实际上又完全吃不准。

有些人大概也预感到这样的潮流以后会冲击向自己，但是又难以排除各种侥幸心理。从侥幸出发，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意图又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解。

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的第一线工作的上层领导人物，多少都处在一种思想混乱之中。即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政治打击将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但在巨大政治势力的压迫和冲击下，也很难与左右有相同处境的人做任何沟通，他们根本没有形成明确的反对意见并结成某种阵线的可能性。只求在大潮冲击下，左摇右晃地极力站住不倒下来，随着潮流往前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多少有一种听天由命的被动状态，换句话说，一切要听任毛泽东安排了。因为《五・一六通知》的批判矛头虽然直指彭真等人，但实质上对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党的领导层都发出了批判。

这是近年来已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出的严厉批判。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整个斗争过程，都是毛泽东退在第二线深处策划组织的。当二线发出的政治打击落在了一线彭真等人头上时，批判的锋芒已经指向了整个一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二线与一线的差别。

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庐山会议之后，逐步退居党的领导的第二线。他将党和国家的日常性工作，也就是所谓第一线，交付给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这样一些人；自己则退居二线，掌握有关党的重大理论问题、路线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

然而，在一线、二线的分工过程中，毛泽东渐渐感受到日益强烈的大权旁落的滋味，也渐渐形成了一线正在越来越深地滑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判断。当形势最终迫使他在二线深处指挥江青、康生及张春桥等人策划这个政治思想的大革命时，这已经是一个决心搞掉整个一线指挥班底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几年前所采取的一线、二线的分工，恰恰促成了今天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党内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的经济和政治的必然性。

所谓一线，就是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就是必须面对国计民生，面对经济的、生产的组织和管理，面对这个时期的所有国家行为，包括外交活动。就本质而言，这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全部一线行为，包括其全部政治行为，都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服务于生产关系及生产力提出的要求的。因此，他们的倾向必然是务实的，是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趋势的。这是一线必然要顺应的趋势。

而毛泽东所退居的二线，他所掌握的党内意识形态斗争及政治斗争的权柄，必然和一线发生越来越大的分歧。

这个分歧是无法调和的：不是毛泽东放弃自己的路线，屈从一线的路线（那意味着毛泽东眼里的国家改变颜色）；就是对一线发动革命，使之最终服从于毛泽东的路线。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阵营，从毛泽东到林彪、到康生、到江青、到陈伯达、到张春桥、到姚文元，恰恰都不是站在第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管理国计民生的人物。

如果说第一线是具体管理党和国家的领导集团，二线则是要管理那个领导集团的集团。

中国古代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那么，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则出现了另一种奇观，那就是“务虚者治务实者，务实者治于务虚者”。

四、对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分析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全面发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纲领性文件以及相关的文件做出分析。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做出如下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毛泽东还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

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些论述特别典型地展露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纲领。

为了对这个政治纲领有更生动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看在通过这个《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1966 年 5 月 5 日毛泽东会见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讲话，当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林彪、伍修权。

毛泽东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毛泽东又说：“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 1921 年到 1966 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这些口头讲话以更加生动的语气注释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写就的那些政治结论。

为了对这些政治结论有更广阔、更全面及更生动的把握，我们再超越一个不长的时间差，引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公开化之后的一个文本。那是他 1966 年 7 月 8 日从武汉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他以不无人生悲壮慷慨以及自信乐观与忧患意识交织的心理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 5·18 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

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 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

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封信以其随心所欲的语言对《五·一六通知》做了特别生动的补充说明。

如果再联系本书第四章引录的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五·七指示》，将上述几个文本综合在一起，我们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就可以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了。

一，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空前尖锐、残酷无情的。这个斗争绝无平等可言，必定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不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没有调和的余地。

由此，我们断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绝无心慈手软之处，绝无动摇迟疑之处。他对这种斗争的你死我活性、不可调和性，已经做出了坚定的判断。这是他根据十几年来国际、国内的斗争历史做出的判断。

二，作为资产阶级的反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已经混进党的各级领导层，这无疑是最大的危险。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最主要对象。

三，进行革命要破字当头。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收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认定，这些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认定这些领域全部在资产阶级手中。

这是他对相关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定性，也是对相关的一些盘踞在这些领域的党的领导部门的干部的定性。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要批判的重要对象。

四，无论是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是为了直接打击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必须在党内开展一场卓有成效的清洗。

在《五·一六通知》中，他明确指出“要清洗这些人”。在对谢胡的讲话中，他讲到“要剥笋”。这些都是实行清党的明确语言。

五，他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这里，斗争的矛头已经明确地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高级领导人物，表明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决心已经下定。文化大革命随后的发展虽然是在因势利导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很多部署毛泽东想必也是乘势而做的，具体的步骤是在具体的运动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然而，摧毁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批高级领导人物的权力，这在毛泽东早已是既定方针了。

六，毛泽东认定，那些反党分子就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之前政治形势的判断。他认定，刘少奇、彭真这些人就是要推翻他，打倒他。这个政治判断的性质十分严重，由此我们也能深刻透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当毛泽东认为党内已经有人企图打倒他时，我们再书生气十足地评议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明智之举，就显得远离了根本。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分析毛泽东何以认定党内一些人要打倒他？这个判断产生于什么样的政治形势？

七，毛泽东充分估计到了“右派政变”的危险性。他肯定受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想像到，康生、江青、张春桥之流对他所做的类似的影响。

然而，更多地还要归因于毛泽东本人对形势的直接判断。他对政变以后发生的事情，右派、左派将会利用他的旗帜这些过程性的特征都有了足够的预想，这说明他的深思熟虑。

八，毛泽东认定，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右派政变都将是短命的，因为他相信“代表 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清了毛泽东的阶级观念。他相信自己的路线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现象，譬如北大、清华的“盘根错节，顷刻瓦解”。

我们据此也可以在随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描述中，看到他的所谓代表 90%以上人民利益的阶级路线的实质。这也是他要在最大现模的公开化的程度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及社会基础。

九，联系他的《五·七指示》，联系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那么，他的所谓代表 90%以上人民利益的阶级路线就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注释。

正像我们前面对《五·七指示》所做的注释一样，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反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是恐惧并且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他的带有平均主义思想的、自给自足的、自我封闭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总是抓住社会中出现的任何一点贫富差别作为阶级斗争的题目。

在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他确实很容易号召 90%以上的人民跟着他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在一个农民文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汪洋大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能够调动民众的大多数。这一路线和党内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最终使毛泽东站在了一个以商品经济为对立物的“革命者”的立场上。

中国传统文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汪洋大海不仅蕴藏在广大民众中，而且凝聚在党内和军队内。当中国的军队成员和共产党员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或者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全民、全党、全军获得一时的全面拥护，也就显然可知了。

于是，我们看到：

一个被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以及在党内的种种反应惊慑了的毛泽东；

一个依靠自己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而在全国、全党有着广泛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毛泽东；

一个在政治斗争中有着极高敏感性和纯熟艺术的毛泽东；

一个一贯热衷集中权力而绝不容动摇削弱的毛泽东；

一个对自己的个人权威有足够自信的毛泽东；

一个自认为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退让、坚定不移的毛泽东；

一个被苏联修正主义特别是被赫鲁晓夫推翻斯大林这样的事实触动了的毛泽东；

一个在一段时间内被党的一线领导“架空”而感到愤怒和失落的毛泽东；

一个相信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会使得中国向社会主义理想国迈进一大步的毛泽东；

一个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具有高度政治意识而绝无对敌同情和怜悯的毛泽东；

一个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更大的作为、取得更大成就的毛泽东；

一个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

——必然地、义无反顾地、绝无反悔地发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五、自上而下的发动方式

《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

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权力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了。这个简称“中央文革”的机构人数不多，却权力极大，其核心成员是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后来还有姚文元。摆在他们面前的急迫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们是毛泽东真正依靠的左派，他们必须为毛泽东打开一个局面。

如果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以及对彭、罗、陆、杨等人的处理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的推进造成了足够的起势，那么，现在就是如何借势继续做文章，使其势获得发展的问题。

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有其力量对比，而所有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又是在矛盾各方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变化的。

就像棋局一样。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不仅在于子力，不仅在于这些子力之间的联系构成的阵势，也不仅在于双方子力阵势的相互关系，还在于如何运动子力，抓住时机作战，最终扩大自己对敌斗争的优势。有时候一个精彩的、机智的、阴险的方案，常常会极大地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甚至置对方于死地。

也许是对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有了相当的经验，也可能受到借批判《海瑞罢官》实现政治突破的启示，“中央文革”要寻找类似的题目作文章，还要继续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地进行发动。

关键的问题是选择好题目。就像批判《海瑞罢官》一样，题目选得准，就有了一切。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是全国政治、思想及意识形态的最敏感点，历来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而且现在就有一个非常便于作的文章题目。

由于 1963 年以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中形成的种种矛盾与分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面前有一个对立面，这就是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以及哲学系的一些人。当聂元梓等人与陆平发生冲突时，彭真曾经是陆平的后台。现在，彭真已经垮台了，那么，从聂元梓出发，包含着一篇极为现成的好文章。

5 月 17 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刚刚通过的第二天，康生的夫人曹轶欧来到北京大学，避开陆平及北京大学党委，找到聂元梓。宗旨自然是明确的，鼓动他们起来造陆平等人的反，同时给了他们足够有恃无恐的支持背景。

5 月 25 日，署名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七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北京大学赫然张贴出来。

这一行为立刻在北京大学引起轩然大波。这张以北大校党委以及北京市委大学部为进攻目标

的大字报，自然受到北京大学党委的反对。在北大党委的组织下，很快张贴出上千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时形成北京大学内大字报的海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曾派张彦到北京大学，强调北京大学有多国的留学生，大字报应该注意内外有别，这自然是批评聂元梓的。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也到北京大学讲了话，强调要内外有别。他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内外有别，“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

就在聂元梓等人承受着巨大的、几乎难以抗拒的压力时，康生将大字报的底稿直接给了远在杭州的毛泽东。

5 月 31 日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接管了《人民日报》的全部权力。

6 月 1 日，在他的安排审定下，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全国兴起，全中国即将出现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局面。”

当天中午，毛泽东在杭州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立刻在大字报上做了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 月 1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对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评论员文章中，提出了高昂的斗争口号：“几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了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正是从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全国公布开始，文化大革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发动起来了。

中央文革的“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文章终于做成了。这篇文章所展开的多年不息的群众运动及社会大动荡，则演绎出一篇更大的文章。

而那篇文章，不仅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始料不及的，也是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始料不及的。

第七章 文革学生运动中最初显露的社会结构（1966 年 6 月－1966 年 8 月）

在人类历史上，一定程度的领袖崇拜是一定的权力集中的需要，而极端的领袖崇拜常常是专制政治的需要。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全面专政”的政治，这种政治需要绝对性质的领袖崇拜。

绝对的领袖崇拜是绝对的政治专权的意识形态保证。

一、文革最初一个多月的运动进程

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年 6 月 1 日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在中国全面展开了。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一个精心的、也是“精彩”的政治行动。它是“自上而下”策划的，表现出来却是“自下而上”自发的。当这个貌似自发产生的典型被舆论一下子宣传起来时，所形成的力量确实是巨大的。公布这张大字报是号召广大群众效仿聂元梓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典型，让全国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们）起来造党委的反，造黑帮、黑线、黑组织和黑纪律的反。

对一个具体典型的支持，有时候胜过一打政治纲领。正像毛泽东一贯提倡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 6 月初的随后几天内，中央文革为代表的上层“左派”所掌握的舆论进行了连续的、高密度、高强度的宣传，将聂元梓大字报的爆炸力予以放大和推进。

6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地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6 月 4 日，《人民日报》又刊载新华社 6 月 3 日电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同日，还刊载了新华社 6 月 3 日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在这个电讯中，公布了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撤销了北大原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作为对新华社这两条重要电讯的政治宣传，《人民日报》还于同一天（6 月 4 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评价了北京新市委的诞生以及北京新市委对北京大学的改组。

6 月 4 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6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更加鼓动群众运动的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6 月 6 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人民日报》于同一天全文转载。

6 月 7 日，《人民日报》又刊登新华社 6 月 6 日发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的人事决定，并使《前线》杂志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这一系列整版整版的文章覆盖了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聂元梓大字报的爆炸性力量无限放大了。用毛泽东后来于 1966 年 10 月 25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说：“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当时，全国各地、各界支持聂元梓的电报、信件雪片一般飞向北京大学。全国各大报刊都连

篇累牍地发表了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支持文章。北京各单位、各界的人士，特别是各大学、中学的学生们，潮水般涌向北京大学参观大字报，校园成了人群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在海洋的环围中，一群又一群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人冲上高高的讲台，振臂高呼发表激昂的讲话，支持聂元梓，学习聂元梓，造“黑帮”的反，造“黑线”的反，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正像康生于 1966 年 9 月 8 日接见来京串连者时说的那样，“这张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聂元梓的典范，在全国特别是在各大专学校以及中学首先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

各地、各学校都效仿聂元梓，将造反的矛头指向校党委。南京大学很快“揪出”了校党委书记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揪出”了院长贺绿汀。而覆盖民众舆论的党报，又将这些政治行动予以肯定和表彰。一个又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被打倒的战报在全国传播，造成了普遍打倒“黑帮”校党委的革命浪潮。这一时期，全国几乎所有大专院校以及大部分中学的校党委、党支部都已瘫痪。他们或是被完全打倒，或是被半打倒，或是还处在他们“是红、还是黑”的群众辩论中，胆战心惊地等待群众运动的判决。

这时候，大、中学校的领导权问题尖锐地出现了。

从省、市委的角度考虑，校党委瘫痪了，必然有一个新的领导权设置问题。而各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工，也面临着一个没有权力机构领导的现状。特别是那些在思想中还习惯并倾向于校党委领导的学生及教职员工（在这一阶段他们还占学校人数的大多数），更有一种寻找领导的需要。这些人纷纷向省、市委或有关上级领导发出要求派工作组的强烈呼声。

面对这种现状，仍在党的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共产党一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传统，向各大专院校以及中学派出工作组，以维持必要的领导及秩序，似乎是惟一能够采取的、也是惟一有效的措施。在此之前的 5 月份，中共中央已经派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派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而这两项派工作组的决定都曾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

于是，刘少奇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于 1966 年 6 月 3 日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派出工作组到大学、中学及有关单位领导工作。在这个会上，还做出相关的“八条规定”，旨在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序地、有领导地发展。

在此期间，刘少奇也曾向身居外地的毛泽东多次请示，毛泽东对派工作组一事并未做出明确表示。6 月 4 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达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文化大革命工作，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而毛泽东则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

这一历史情节使我们看到，即使在那个“暴风雨已经来临的时刻”，刘少奇、邓小平还在负责任地站在一线工作，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显露出兢兢业业的精神，不如说是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当我们相隔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回看这一幕时，联想到刘少奇、邓小平在其后不久就被打倒的惨况，不由得生出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悲悯与同情。

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此刻含威不露，他对刘、邓的汇报既不做明确指示，也不打算回北京主持

工作，只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这是非常从容和富有谋略的行为。当前，运动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难题上，他需要让运动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和机会，也需要让刘、邓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和把柄。

此外，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回京主持工作的最好时机。此刻回京，事态在僵持和蒙昧状态中，一时没有更好的文章可作。他要让刘少奇再多承担一点责任，表面上是一种信任，其实不过是听任对方在难题中表现，从而给自己留下更从容的掌握形势、把握时机的时间。

工作组派出了。这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处在一线领导位置时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个以党的高层领导身份做出的重大决策。北京市向各学校派出了近一万两千人的工作组。上海对四十所大学（含十一所半工半读大学）及近一百七十所中学派出了工作组。全国各大城市都派出了工作组。而作为各大、中学校党委的替代物，作为新的领导机构，工作组与正在蓬勃兴起的学生运动形成了新的矛盾冲突。

工作组刚刚进驻学校时，大多数师生由于受中国多年政治思想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 1957 年反右斗争历史的影响，工作组即代表党的领导，接受工作组的领导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原本就对校党委的被打倒不大理解的师生们，这时候就把他们习惯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了对工作组的欢迎和支持上。1957 年反右斗争的故事是中国的知识界深有印象的，先是“引蛇出洞”、后又组织反击的斗争策略，以血和铁一样警醒的教训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学师生头上。工作组依靠着这样的“传统文化”，立刻在学校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及依靠队伍。

那些尚居少数的造反者，刚刚推翻了旧校党委的领导，又要面对一个新的带有临时党委性质的工作组。造反的学生们打倒了旧党委中的黑帮分子，那只是他们革命的最低纲领。他们的最高纲领是要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摧垮旧的教育制度。很快，这部分造反者与工作组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尖锐矛盾与对抗。

在造反的无限冲动中，充溢着难以压抑的能量。当他们面对一个对运动做出种种规定的工作组的领导时，无论在文化大革命批斗的对象上、方式上，还是在运动的方方面面，都和工作组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

这在根本上又可以说是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等人在党的一线做出的维持党的稳定领导的冲突。这些造反的师生们每天都在报纸和电台上受到毛泽东和中央之革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鼓动，他们在现实中每天又受到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的压制。这种对抗势必愈演愈烈。

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6 月 18 日上午，生物系、化学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及无线电系等单位发生了乱批乱斗的现象，四十多名学校及系领导干部以及部分教授被带上“斗鬼台”，挂牌子，戴高帽，抹灰脸，搞喷气式，批斗游斗。工作组当即赶到现场予以制止。

下午，工作组以系为单位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指出这个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当晚，工作组又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长张承先在讲话中指出：工作组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而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种做法已被坏人利用。今天的事

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

工作组的这一行动无疑遭到聂元梓为代表的少数革命派的反对，却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支持。

工作组将“六·一八”事件草拟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 9 号）。刘少奇于 6 月 20 日亲自批准转发了这期简报。中共中央对这个简报的批语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 9 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份简报及其批语是刘少奇在派工作组这个政治部署中的代表性动作。它在当时代表了党的一线高层领导干部甚至代表了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态度。在武汉的毛泽东其后不久指出：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这表明，围绕着工作组问题上形成的矛盾与斗争，实际上已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根本矛盾与斗争。

同期，清华大学发生了“六·二一事件”。学生蒯大富于 6 月 21 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在此之前，蒯大富就提出过要赶走工作组，并和前来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进行过辩论。

当天，清华工作组的领导人之一王光美指出：蒯大富要夺权。而薄一波则打电话指示工作组要反击。随后，在清华大学内，出现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口号响彻清华大学。刘少奇对此亲自做了指示。在他的指示下，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大规模地斗争蒯大富等造反师生，被斗者中有一人自杀死亡。

清华大学围绕工作组的斗争，更是直截了当地反映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与刘少奇巩固党的现存秩序的路线的尖锐冲突。正是这个性质，使得文化大革命在以后的发展中，随着刘少奇的下台，蒯大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英雄人物，与北大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共同成为显赫一时的学生运动五大领袖。

造反派与工作组的矛盾，不仅在北京的各大学愈演愈烈，在全国各省市同样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革命信息空前地大交流，大串连。例如西安交大发生的“六·六事件”，同样是造反派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6 月 6 日这一天，造反派学生要赶走工作组，便从工作组有后台这一联系贴出大字报，指出省委有黑帮。在刘少奇路线从上到下的影响下，党的系统与西安交大造反派学生的矛盾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六·六事件”之后，刘少奇曾有意图让《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被陈伯达所抵制。而在“六·六事件”之后的几天内，西安交大对反对省委、反对西北局的造反派头目开了各种斗争会，将造反派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游校。6 月 9 日，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李世英便成为西安交大和整个陕西省的造反风云人物，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

全国各省市，特别在北京，这种冲突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焦点。两种势力在工作组问题上展开了较量。造反派学生的后面，站着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这些人，相当一批学校的工作组被学生赶走了。

然而，在毛泽东 7 月 18 日回到北京前，在党的系统占主流的无疑是支持派工作组这一部署的思潮。面对这个与 1957 年右派猖狂进攻极为“相似”的学生造反运动，党的各层领导干部自然更倾向于用工作组来加强运动领导的方针。包括在粉碎彭真反党集团中诞生的北京新市委，也采取了同样的政治态度。

作为新的市委书记，李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重要的升迁，理应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共产党的传统思维支配了他。他在 6 月 23 日的市委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否定了反工作组的做法。他指出：虽然多数反工作组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其中确有坏人在“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这些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还特别明确地讲道：“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这无疑是 1957 年反右斗争的政治路线的再版。在李雪峰“六·二三”报告的传达、覆盖下，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形势似乎被暂时稳定下来。在新市委号召的“反干扰”过程中，各校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其成员大多由拥护工作组的骨干分子组成。而蒯大富式的反工作组的师生，遭到批判、斗争、打击，被定为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蒯大富本人被开除了团籍，并被关押了十八天。其他学校也有一些蒯大富式的人物被开除党籍、团籍，并遭到批判与斗争。全国各地与北京同步，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一时间，在一些人眼里，文化大革命局势平稳了；在另一些人眼里，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就要夭折了。

毛泽东于 7 月 18 日回到北京，他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这是一个矛盾演化到了可以立刻就势作文章的时刻，也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真正需要他出来的时刻。大政治家绝不该频频出击，然而，在该出击的时候，又绝不错过时机。

他在当天晚上就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同一时间刘少奇赶到他的住所，希望汇报工作，却没有受到接待。在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之后，他又阅看了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高等院校反工作组的材料，开始深入情况，捕捉战机。

7 月 19 日－23 日，毛泽东责成刘少奇主持“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详细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这是运用合法的程序，开展在文化大革命领导路线上的党内斗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会上攻击派工作组的做法，攻击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运动的发展发出了严厉的评价。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离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又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他还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列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

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等人镇压学生运动的做法，指出“这是方向错误”。

在刘少奇主持的情况汇报会期间，毛泽东又于 7 月 22 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书记，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他还指出：斗、批、改“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

在 7 月 19 日—23 日刘少奇主持的情况汇报会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方法。

然而，毛泽东无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决断。7 月 24 日上午，也就是情况汇报会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他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要立即撤出。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 月 26 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明确指示撤销工作组，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当晚，陈伯达在北大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并说“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号召全校师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北大的这一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立刻传遍北京高等院校。7 月 27 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

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宣白撤销所有工作组。李雪峰在大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七·二八”决定。

在这个大会上，邓小平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

而刘少奇则最后讲话：“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衷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会的讲话似乎还维持着党中央的统一形象。刘少奇和邓小平关于撤销工作组的讲话无疑也是以共产党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了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决策调整。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健步走上了主席台，会见全体与会者。全场自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这其中包括曾被工作组关押十八天后被直接送来参加大会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他满脸热泪的激动不过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们对毛泽东的忠诚。

二、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读者都不难发现，我们在上一节中对文化大革命 1966 年 6 月 1 日全面发动后的两个月的发展做了最简扼的概括。这种概括比起当时丰富浩瀚的现象可能过于简单，而对于这个文本却已显得十分详尽。它是我们进行社会政治分析所必须的。我们的目光将穿透这些简单的情节，看到历史的本质。

正像刘少奇在 1966 年 7 月 29 日北京高等院校与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所讲的那样：他到了那个时候，还并不真正领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更不领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

然而，当他 6 月初主持党中央工作，决定派出工作组时，这一措施在当时几乎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层的支持。除了毛泽东，除了林彪、江青等人以及他们掌握的意识形态工具所发出的声音外，我们在那段历史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没有发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刘少奇的派工作组的决策在党内是很容易得到贯彻的。

几乎所有的省、市委以及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对这种方式都没有任何怀疑，当工作组与学生中的造反派发生冲突时，当工作组的权力受到挑衅、反对和破坏时，从中央到省、市委到工作组的共同思路是；这里有坏人，有右派，有反革命，需要对其进行斗争。这恰恰是 1957 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共产党的集体思路。

刘少奇自然也是这个思路。他在批转中共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他还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包括她女儿刘平平在内的校文革委员会成员说道:“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这种思路，自然是 1957 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共产党的思路，也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奠定的思路。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清刘少奇企图维持的是共产党的集体利益和党在十二年前就形成的政治斗争传统，同时也看清了毛泽东在 1957 年领导反右斗争时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利益，最起码代表了他们整体的情绪和愿望，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在反右斗争后获得更高的威望。

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代表党的整体利益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一年后成为刘少奇等人的政治路线。

现在，毛泽东却要反对这个政治“传统”了。

如果说在十年前的反右斗争中，他对待右派知识分子的斗争路线是维护当时的共产党组织和权力所需要的，今天，他恰恰要对这个党的组织和权力本身进行革命。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从 1957 年－1966 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天的毛泽东何以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斗争方向？当学生起来反对党委、反对上级党派出的工作组时，何以换成支持学生运动的立场？

答案是十分显然的——

第一，右派已经在 1957 年被打倒了，当前上升的矛盾是，毛泽东代表的党内“无产阶级”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毛泽东对整个政治斗争策略的重新制定。

第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学生，都是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的。造反派中很多人出身于工人、农民或革命干部家庭，他们的政治立场与 1957 年右派是不同的。

第三，与校党委、工作组斗争的这一代大学生还特别是被毛泽东这两年关于无产阶级要在思想政治领域内继续革命的思想灌输起来的，他们的政治倾向无疑带有这样一个大背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蓝图，成为他们深入血液的思想纲领。

第四，多年培养和形成的对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崇拜，在这一代大、中学生中形成了一种“革命”的狂热。这是毛泽东自觉看到了的，又是刘少奇没有自觉意识到的。

正是这一切，使毛泽东一反 1957 年反右斗争的立场，做出了支持学生造反的举动。在他眼里，今天的学生反对党委甚至反对整个党组织，不但不是反革命，恰恰是革命的，只要他们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就理应得到支持。

然而，只要深刻分析就会发现，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投人造反的学生不仅具有上述的政治思想基础，而且因人而异有着其他各种思潮根源。只要我们多少解剖一下那时学生投入造反运动的具体个案，就能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促使当时的大、中学生投入造反、革命运动的思潮，还有对各级领导干部特权的反对。特别是那些出身工农的子弟，这一点尤其成为这批人的内在政治动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前，各级领导包括校领导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对于大多数工农子弟而言，都是被掩在帷幕后面的。当文化大革命把帷幕揭开之后，他们对任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特权现像，都有着极大的攻击性。这也是早期斗“黑帮”过程中，所谓黑帮”生活“腐化”的罪恶最能够激励大批判仇恨的原因。

第二，在中国这个农民占主要人口、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般的国度里，大学生普遍容易感染无政府主义思潮。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还非常巧妙地和各种极端的革命口号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政治能量。

第三，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都和旧有的教育制度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是现代世界中的普遍现象。学生与各种现成的教育制度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必然的，当一切行为都以革命的方式展开之后，对旧的教育制度的不满情绪（哪怕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满情绪）也会成为学生对整个现有秩序造反的动因。

我们在早期的学生运动中看到：往往学习成绩好、受学校和老师重用的学生，运动早期倾向于保守；而那些成绩不好或不太好，又与学校领导及老师存在过矛盾的学生，特别容易成为激进的造反派。

第四，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有的现象，也是近代史上各种学生运动都难免包含的现象，那就是青春期的狂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一点在中学生中特别明显。

这种青春期的狂放，表现为对一切禁忌的突破，表现为停课闹革命之后的欢乐，表现为摆脱了一切限制及束缚，走南闯北、四海串连的解放和喜悦。这是青春的力量。人类社会从来都将这种力量置于一定的规范中，使其有节制地表现和释放。青春的力量一方面有很大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破坏性。

当中学生们将教室的门窗玻璃打碎，将课桌座椅一举破坏，不再需要背诵枯燥的课本，不必应付令人头痛的考试，大串连，斗黑帮，放言高论，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是一种多么盛大的节日般的解放！而在革命高潮过去以后，又能无拘无束地谈恋爱，这一切确实表明文化大革命借助了社会上的各种能量。旧的秩序崩溃了，被秩序所禁锢的各种不安分的能量就会汇集到“革命”潮流中。

第五，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们的造反并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目标十分明确、革命性质十分明确的行动。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一个学校同时存在的多个造反组织，他们在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却可能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不过表明年轻的学生们在这场社会大革命中都有涉入政治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被诱发，在各种榜样的培育下会急剧膨胀起来。

姚文元、戚本禹的飞黄腾达，聂元梓、蒯大富的飞黄腾达，都使他们深受刺激。当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们由于某种政治权力在握而享尽风光时，投入造反的学生自然有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理想。说得更世俗一点，这样一场大革命，给了无数造反的年轻人出人头地之路。

对于学生们以上的“革命”动因，1957 年的毛泽东肯定要实行镇压的。而 1966 年的毛泽东不仅没有镇压（暂时），并且要尽可能地借用。

当摧毁刘少奇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之后，学生运动中不可收拾的无政府倾向及青春期的狂放倾向成为建立新秩序的破坏性因素时，毛泽东使用了许多不是镇压的镇压手段，用了各种有力的手法来管教学生。

当然，在 1966 年 6 月－7 月，毛泽东显然并没有看清这一切，在政治的“蜜月”中，他同样被学生们高呼万岁的激情与热泪所迷惑。好在这种迷惑并不妨碍他此时与将来的政治行动。有时看不清事物的全貌反而有助于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同盟军一阶段一阶段变化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此刻要做的是，依靠学生的力量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他知道，除了林彪、中央文革等少数左派之外，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都不会反对派工作组这样的传统思路，很多中央及国务院的干部也都卷入了派工作组管理下面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行动之中。然而，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毛泽东有力量扭转这个在 1957 年就开始形成的党的既成“传统。因为他已经做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潮流；已经有了对彭、罗、陆、杨做出政治处理的成果；已经有了向党内走资派以及赫鲁晓夫式人物开展阶级斗争的《五·一六通知》；已经有了林彪这样执掌军权的人作为坚定的同盟；通过陈伯达、江青等人，他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大权，并把全国的报刊、电台都变成了自己的喉舌。

他现在开始用新的方式重谈“相信群众”的观点，作为相信群众的最时下的运用，那就是：反动派才镇压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无好下场！面对全社会，面对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及广大的家庭背景，这个声音无隙可击。

最后，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一反 1957 年反右斗争的这个“传统”，而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还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他本人握有巨大的权力。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声势，但是在他从武汉回到北京之前，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力量，无论是来自于群众，还是来自于林彪、中央文革，都不足以对抗刘少奇路线的政治力量。一旦毛泽东将他的力量放在政治的天平上，形势便发生急剧的变化。

毛泽东的力量毕竟太大了。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扫描

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已经看清楚了 1957 年反右斗争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变化。1957 年，毛泽东缔造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传统”；这个传统在 1966 年党的组织与造反派发生冲突时，被刘少奇继承了。

在反击各高等院校反工作组的“逆流”中，刘少奇体现了这个“传统”，这是维护党的领导权的强硬政治立场。与此同时，我们联想到刘少奇在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路线。在对待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对待与生产关系相关的政策上，他又显得相对开放和宽松。把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便能够看清楚刘少奇完整的政治纲领。

刘少奇绝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也绝不允许民众中的任何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政治上，他需要的是对全党、全国集中的统治权力，要求不容动摇的政治权威。他绝不会允许社会上任何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的存在。而在这样严密的政治控制之下，则允许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松动，包括允许农民“三自一包”，允许资本家开工厂，任何能够发展经济的实用措施，他都会拿来采用。在这一点上，他的治国路线是完整的。

毛泽东要打倒的正是刘少奇那种集中的政治权力，从而建立毛泽东本人的集中的政治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所要求的集中的权力，要远胜于刘少奇所要求的集中的政治权力。这里的重要差别是，毛泽东希望在他本人集中的政治权力下，民众超越任何经济、政治结构与权力结构直接接受他的指挥。只有当民众以超越经济的方式跟随他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开始响应毛泽东号召、投入大革命的民众，我们仅从前面对大学生的简单分析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革命行动中其实融会了多种社会利益与社会思潮。大学生是整个社会的显示屏，社会上有多少种思潮，大学生中就会有多少种反映。在运动往下的发展中’伴随着更加充分暴露的事实，我们会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显示出来的社会阶级结构、利益结构及思潮结构做出更深入的剖析。

然而，在6、7月份这个最初阶段中，广大民众及大、中学生中存在的最主要的倾向，是所谓“造反”与“保皇”的矛盾与斗争。这反映着共产党内两种力量的矛盾与斗争。当各种社会思潮还未在民众中完全展开时，民众以及学生中的矛盾与冲突，还紧密依附于政权内部的矛盾与斗争。这样，我们又将目光比较主要地投向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上。

8月1日—8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是需要着重透视的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需要将在工作组问题上获得的斗争成果进一步肯定下来，并且深化和发展；而刘少奇或许也试图找到一个正面的、合法的、公开的场合，将自己思路的合理性予以解释和澄清。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手段，将会内会外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将党内的斗争与社会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从事政治斗争的强烈冲动。在毛泽东的眼里，文化大革命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战争的发展一定会有声有色。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这些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全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最初发起者。他们曾在7月28日北京海淀区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工作大会上，将他们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与《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交给江青，请她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红卫兵的信中写到：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当然，他也同时指出：“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8月3日，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期间，王任重在钓鱼台接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让他们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清华附中红卫兵惊喜若狂。这封信立刻以大字报传单的方式流布全国，成为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内会外的斗争则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

8月2日、3日下午，全会召开大会，相当一些领导干部做了带有检查性质的发言，总结前一阶段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和不理解，表现出紧跟毛泽东思想的努力。刘少奇则继续试图在基层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材料。8月2日，他曾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收集情况，该学院曾在工作组问题上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讲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哪些做对了，哪些

做错了，我们还不清楚”，还说：“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

8 月 4 日，他在同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谈话时，指导他们撤走的策略：“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现在的问题思如何脱身。”他还讲道：“暂时群众分裂一下也不要紧，不要怕反革命上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几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就暴露了他们。”这表明 1957 年反右斗争形成的政治“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地扎根于刘少奇的思维之中。

刘少奇绝非一个思想僵化的人，他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共产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中的务实主义，都表明他有足够的灵活性。而他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出的政治上的顽固性，不过说明这确是他根深蒂固的政治本质。在这里，他捍卫的是共产党的政治体系。可悲的是，这些行动在那时显得支离破碎，贫乏无力。

而毛泽东的行动绝对是从容而大气魄的。他从来没有犯过角色错位的错误，他从来以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身份出现。他要在刘少奇等人也在场的会议桌上，以充分有理有力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纲领光明正大又威慑全场地发布声音。他在党的领导层中的每一次讲话，都可以视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他从来都是一手抓住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另一手紧紧抓住党内会议桌上的斗争。

8 月 4 日下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具有典型毛泽东风格的讲话。他的讲话既是提纲挈领，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高原则出发的，又是谈古论今，非常生动的。他讲道：“谁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法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 6 月 20 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这次讲话十分严厉。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层的心理历来感觉极为准确。话一出来，总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笼而统之的权威。他的每一篇讲话，都极高地体现了因势利导的政治艺术。有如一只大手，伸出来罩住整个局面。尖锐也好，和缓也好，原则也好，灵活也好，正言厉色也好，幽默调侃也好，他总能够将在场的领导干部都圆融在他的统帅之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逐节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权威更得到了空前的增长。他的讲话刚柔并济，泰山压顶。他用领导层能够接受并必须接受的声音维护和加强着自己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的讲话使八届十一中全会突破了原定的计划，原定于 8 月 5 日结束的会议，主要是解决运动初期围绕派工作组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正式通过 1966 年 5 月 4 日—26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罗、陆、杨等人的处理决定。现在毛泽东提出，全会各小组传

达、讨论他的讲话。原定五天的全会被延长了。

作为对毛泽东 8 月 4 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的配合，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了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康生、江青号召全体师生员工彻底批判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日，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参加了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亲自为革命群众平反，坚决支持广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进行的过程中，又把社会上的群众运动有力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8 月 5 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将全会当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斗争场合而采取的既灵感突发又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

这张草稿写在 6 月 2 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的大字报，充分表明毛泽东那灵感突如其来的随意性。当然，这种随意性又绝对经过了他深思熟虑的理性的确定。在领导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具有充分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又有判断力量对比的透彻与冷静。至于这两方面是否经常能够平衡，则是另外的事情了。

这张大字报于 8 月 7 日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起，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与会者，它不仅震撼了这次会议，在中南海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新增添的项目，最终成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带有实质意义的行动，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本人。

这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相机做出的重大决定。他认为，运动到了这个时刻，应该走出这一步了。他完全清楚这个举动的严重性质，也相信这个举动最先在党的领导层内继而在全党、全国对政治斗争形成的大的推进。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这一时刻如果仍不触及刘少奇，不把这一问题挑明，将使文化大革命无法深入。所以，他极为果断地采取了这个行动。

作为党的领袖，写一张大字报，在党的全会上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党的第二号人物，绝对是一个非常之举。毛泽东一贯喜欢非常之举，他知道，非常之举一定会产生非常的爆炸力。

从评《海瑞罢官》到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到写出《炮打司令部》，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极为有声有色地发动起来。

形势果然立刻得到推动，对刘少奇的批判面对面地开始了，在党的最高层，奠定了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基调。全会于 8 月 8 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即《十六条》），这个于第三十一稿才定稿的《十六条》是指导全国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十六条》中首先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即所谓“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任务。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还特别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这是一个放手发动群众的纲领。虽然其中也讲到要文斗、不要武斗，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强调对四种不同的干部各有其判断标准，还提出了一些政策规定，但是，整个纲领贯穿了毛泽东“不怕乱”的思想。

在此期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不要怕出乱子”。他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惟有天下大乱才能乱掉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各级领导权，惟有大乱才能够打破各种组织框框，直接体现毛泽东思想与广大民众的结合。现在，军队在他手里，舆论工具在他手里，他的思想又绝对可以掌握中国 90%以上的民众，所以，大乱乱掉的是旧秩序和权力系统，却绝对乱不出他能够把握住的大局。只有在大乱中将旧世界摧毁，新世界才会以大治的形式浮出地平线。

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显示了足够的胆略和气魄。其后发生的省、市及各级权力机构的全面瘫痪，大、中学生的停课大串连，铁路、公路交通的混乱，生产力的被破坏，在他眼里都不值得大惊小怪。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群众运动中露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自信。放手发动群众，是指导运动发展的最主要手法。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对党内的权力机构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陈伯达及康生在党内的位置得到了明显上升，刘少奇却从第二位排到了第八位。

而这，不过是刘少奇下台前的一个短暂过渡而已。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他主持的党的一线领导层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逐步予以打倒的。其后不久，毛泽东在 10 月 25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所以十一中全会做了改变。”

林彪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在全会中再一次做出不失时机的“精彩”表演。他曾在一个讲话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文化大革命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作为对这次会议的总结，8 月 12 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这一公报中，用林彪的语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公报》与《十六条》的发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全国范围内更为汹涌澎湃的革命狂潮。

1966 年 8 月 10 日晚，毛泽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独自来到中共中央信访接待站，面对热血沸腾的群众挥手说道：“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举动立刻被新闻宣传作为特大喜讯铺向全国，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全国部署中，进一步树立起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

像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一样，8 月 10 日晚七点十五分毛泽东来到中央信访接待站的这个行动，充分体现了他在这个阶段对民众的信赖和对自己威望的信赖。

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他已经掌握了优势。而在广大群众中，相对于他的政敌，他更有无可比拟的大得多的优势。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怕什么呢？

四、对红卫兵运动的初步分析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随着放手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出现了，那就是红卫兵运动。这是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极为重要的政治现象。没有红卫兵运动，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红卫兵的关系，红卫兵与整个政治的关系，无疑是我们透视文化大革命一个特别深刻的领域。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出现的，更具体说，是在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的感染下诞生的。当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其影响首先辐射到附近的大、中学校。毗邻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学生，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探究聂元梓大字报的政治背景，探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动向。

几年来，相关的政治舆论宣传，特别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激起了这些中学生的政治敏感。这种反应和那个年轻的年龄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做出了似乎甚为神圣而又重大的判断。经过对形势的分析，认定目前应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且必须投入战斗。

1966 年 5 月 29 日，这些中学生以极秘密的方式组织了红卫兵。在他们的影响波及下，1966 年 6 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二十五中等中学的学生先后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东风”的秘密组织。这可以说是后来席卷中国大地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他们当时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红卫兵的出现，必然与在各校领导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的思维自然是 1957 年反右运动中形成的传统思维，对这种类似地下组织的学生活动，当然地认为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在工作组的压迫下，参加红卫兵的中学生以青年人特有的反抗性做出了反应，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认定："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1966 年 6 月 24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题目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说，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还说，"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这张大字报很快在中学红卫兵运动中传播开来，成为他们的思想旗帜，而且和大学中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力量串连在一起，成为当时与工作组对立斗争的重要阵势。当然，工作组会继续施加压力，继续"反干扰"，继续实行 1957 年反右斗争的政治手段。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被相继定为反动组织，予以解散。

7 月 4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张贴出了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与工作组的对抗中，更广泛地在北京的中学乃至大学传播开来，成为在当时十分夺人耳目并引起大、中学生政治兴奋的新鲜事物。

中学生的行动启发了大学生，在各高等院校也都相继出现了各种命名的红卫兵组织，以集团的方式展开和工作组的斗争。这种群众自己成立组织的斗争方式，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遍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特征。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无疑意识到了他们的旗帜性作用，他们于7月27日第三次贴出了题目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大字报中宣称："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乓，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他们将大字报的底稿（《一论》与《二论》）托江青转呈给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毛泽东于 8 月 1 日亲笔回信，表示对他们的热烈支持。当红卫兵把毛泽东的回信通过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广泛渠道散播出去之后，红卫兵运动立刻在北京乃至全国漫延开来。

1966 年 8 月 18 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在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下，于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别有深意地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表明他正在亲自领导一场大革命，表明他的革命决心，表明他作为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握有军队的实权而且得到军队的全力支持，也表明他要否定现存的党和国家政权格局的决心。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

同时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宋彬彬将红卫兵袖章献给他的事实。当毛泽东穿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向百万群众挥手致意时，他就成为红卫兵名符其实的“红司令”。

正是在这个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做出了像红卫兵一样高昂的讲话：“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个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形象，通过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为大规模发动群众运动首先是发动红卫兵运动的巨大号召。毛泽东的这一形象，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经典照片之一。从这天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席卷全中国。“八·一八”被红卫兵看成最伟大的纪念日。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率先在北京形成的行动，就是“破四旧”。他们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红卫兵拿着剪刀走上街道，把一切他们认为的怪发型全部剪掉，把一切他们判定的奇装异服全部剪碎，把他们认定是资产阶级的高跟鞋全部没收，把各照相馆内一切奇装异服和资产阶级发型的照片全部赶出橱窗。

街道两旁的横匾及招牌，一一受到清理。各种各样的老字号招牌更被红卫兵运动的浪潮打得稀巴烂，“全聚德”、“东来顺”、“荣宝斋”、“亨得利”、“福贵楼”……这些带有封、资、修特征的牌匾荡然无存。

红卫兵们威风凛凛地在北京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号令一切。各种各样的通令、通牒的传单、口号和大标语覆盖了大大小小的街道。“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随处可见。

名称也要反帝反修化。“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被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被改为“援越路”。“北京崇文织布厂”被改为“北京东方红兴无织布厂”。“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则改为“红卫兵战校”。

他们不仅将全市所有的街道、车站、商店、餐厅、宾馆改名换姓地进行革命，而且波及到家家户户。绝大多数家庭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都把家中的各种不革命的书籍、装饰及家俱革除了。门窗墙壁贴的都是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

接下来，红卫兵开始革自己名字的命。一大批旧名字在户口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卫东”、“卫红”、“东风”、“卫兵”、“造反”、“前进”、“红旗”这样的名字。

“破四旧”的潮水继续席卷各大书店和工艺美术商店，在那里进行大清查、大销毁。红卫兵乘胜追击，冲向寺庙、公园进行大扫荡。寺庙里的文物遭到摧毁，相当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永久性地散失，摆放在公园门前的石狮被糊满了大标语。

总之，在红卫兵“破四旧”的红色革命风暴中，现存的一切文化差不多都在扫荡之列。

在扫荡中，性质最为惨烈的是对人的进攻。“地、富、反、坏、右分子、资本家还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红卫兵运动打击的对象。游街、批斗、挂牌子、戴高帽、剃阴阳头（把头发剃掉一半）、罚站、罚跪，用皮带抽，用棍棒打，注释了红卫兵运动最血腥的一面。

当红卫兵运动扩展到全国时，各地出现了甚至比北京更狂热、更残酷的情景。那些所谓的“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无一例外地遭到红卫兵运动的无情批斗，手段之残忍，令人毛骨悚然。

在此期间，大批老知识分子受到冲击和迫害。

红卫兵运动扩展到广大农村，出现过更为残酷的情况。不少农村把本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杀掉，就在北京郊区也出现了多个公社杀死地、富、反、坏、右的事情。

随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一再放手发动下以大串连的方式在全国纵横交叉、相互辐射，形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更强大冲击力，以至发展到一个连毛泽东也不得不设法对其约束的不安分力量。

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在往下的篇章中还会做更全面的概括和分析。在此，我们仅就红卫兵运动最初的发展做出如下的剖析：

一，正如红卫兵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意义一样，也正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最初成立时的誓言一样，红卫兵的第一个本质，即它是捍卫毛泽东的小卫兵。它把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作为自己的纲领，实际上就是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基础。说得更客观些，这是一个时期以来共产党的舆论工具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宣传的产物。

这也正是毛泽东一眼相中红卫兵的原因之一。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出现，既表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新的阶段，也是毛泽东继续树立自己个人权威的有力手段。

二，红卫兵得以诞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受毛泽东发动的思想政治领域内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影响。红卫兵实际上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纲领的产物，是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然产物。没有毛泽东这个政治革命纲领，就没有红卫兵。

三，如果分析最早的红卫兵成员的家庭出身，我们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红五类”出身，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属、工人及贫下中农的后代，其中坚力量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以及革命烈士的子弟。他们所谓的保卫党、保卫红色政权的纲领中其实含有很大的红色特权意识。

他们自认为这个红色江山是他们的父母打下的，所以在他们早期发起的以“破四旧”为典型表现的政治行动中，打击的目标是地、富’反、坏、右，是资本家’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所谓的封、资、修，他们的行动表现出极端的性质。

当后来充分反映“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在红卫兵中出现并广为流传时，不过注释了红卫兵运动本身的既得利益性质。不管红卫兵运动中有多少理性分子曾试图抑制“血统论”的极端倾向，然而，这种本能的利益驱使却是早期红卫兵运动的重要政治动因之一。

四，红卫兵运动的又一个重要思潮，就是反文化的倾向。“破四旧”不过是这个倾向的根本暴露。

当他们反对人类悠久历史形成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时，不过是受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或者反过来说，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民众中的基础。

五，与反文化倾向相联系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反教育。

中学生与他们多年所受的学校教育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常常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是教育机构和学生的矛盾，是人类文化传递过程中普遍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意识形态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即与毛泽东所讲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教育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又一个思想基础。

当红卫兵运动冲破工作组的领导权之后，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同时，还对本校的教师、领导进行了一番更惨烈的批斗。

六，红卫兵运动无疑存在着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着反对一切秩序的倾向。这在中国这个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汪洋大海的国度里，尤其不奇怪。红卫兵反对一切约束他们的力量，反对一切管制。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敢于无法无天。

七，还有，就是中学生在青春期特有的冲动和逆反。他们有着要当孙悟空的本能。

这是青春期被强烈压抑又渴望解放的巨大能量。在红卫兵运动中可以充分看到，文化大革命如何使他们的青春得到解放，他们如何快活。

事隔几十年，当今天的某些中学生听他们的父母讲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青春时，大多十分羡慕。认为那时的学生可以批斗老师，可以不上课，可以不考试，可以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周游全国，实在太幸福了。这一代年轻人的羡慕不过注释了上一代年轻人造反的最常规的原因。

八，政治时代造就政治野心。那样的时代也造就了大批青年的政治野心。

即使在中学生的年龄，也不乏介入政治、当左派甚至当政治领袖的野心。文化大革命中众多风云人物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九，红卫兵运动中那些最极端的迫害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迫害狂”这一类心理变态的表现。

当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抡起铜头皮带，把一位老知识分子打得头破血流，跪在地上认罪不已时，她非但不手软，而且越打越痛快，越打越发狠，越打越斗志昂扬，这确实还有特别的心理学性质的原因。有不少教师在运动中被毒打致死，在那些手段特别凶很的学生身上，常常让我们看到“迫害狂”的心理特征。

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典型的注释。

红卫兵运动也是近代中国青年史上最可悲的一页。

如果这一代人至今对此没有足够的自省，那既是一代人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一切所谓“青春无悔”的论调在残忍而冷漠的历史面前都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在经历了 8、9 两个月乃至其后不长的高热之后，随着斗争的深入，最原始意义的红卫兵，也就是像清华附中这样一批最早的红卫兵（后来被中学生称为“老兵”）慢慢衰败了。随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政治的锋芒触及了很多红卫兵的父母，触及了他们的家庭。他们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主要地不是斗地、富、反、坏、右，不是“破四旧”，也不是反对学校的“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而是要反对党内的整个领导集团。这样，作为保爹保妈派，他们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动摇和变化，接下来，他们开始成为中央文革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左派路线的打击对象，其境况同样惨烈。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另一种悲哀。

对毛泽东的崇拜，并不能抵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旦切身利益战胜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悲剧中反而含着喜剧。

现实利益的各种世俗表现，似乎比政治的宗教式狂热更合乎人情。

原始意义上的红卫兵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生了蜕变、分裂和转化。这也预示了整个民众跟随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发展逻辑。

毛泽东在一片欢呼万岁的红海洋中，没有看到这里同时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以为文化大革命就能给他带来一个理想国，也是浪漫得近乎幼稚可笑。

五、文革中个人崇拜的社会学、文化学分析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或者说领袖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与世界上一切最狂热的宗教领袖崇拜相比，它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16 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的消息于 7 月 25 日的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席卷全国各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愿，那种无限信赖、无限幸福的激动场面，典型地

表现出了那一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疯狂到什么程度。

1966 年 8 月 18 日，天安门前百万人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关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提法在全国民众中形成振臂高呼的回应。当“四个伟大”与“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狂热覆盖中国大江南北时，不过再度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何种炽热的程度。

《毛泽东选集》的发行，成为中国最大的事情。十亿人口的国家，一户一套，甚至一户几套。1964 年曾经在军队率先发行的毛泽东语录本，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遍布中国。大大小小的毛泽东纪念像章数以几十亿地生产，曾一度造成军工用铝的危机。胸戴毛主席像章，手挥毛主席语录本，口喊毛主席万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时尚。

文化大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这种个人崇拜。所有的政治分析家都能够看清楚，毛泽东得以发动和推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就是民众中存在的这种领袖崇拜。

领袖崇拜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宣传造成的。当一个将舆论手段完全集中于自己手中、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有意识地宣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时，大规模的舆论确实能够产生非凡的效果。

然而，任何宣传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不仅体现在效果上，也体现在动机上。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达到的巅峰，有着特别深刻的原因。在那些深刻的原因消失之后，即使动用任何集中的舆论进行类似的操作，都将无法再版那种程度的个人崇拜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社会学、文化学中找到分析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的基本思路，对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的原因做出完整的概括。

一，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是政治的需要，是当时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运动的需要。这种需要绝非只是理论上的演绎，而是一个被强烈的社会生活予以注释的重大结论。

《解放军报》于 1966 年 6 月 7 日发表的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中这样讲道：“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这段论述是从林彪的讲话中演变过来的。正是这个政治性极强的个人崇拜，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面对广大文化程度不高的解放军士兵，面对同样文化程度不高的全国广大民众，政治化地树立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远比复杂地解释文化大革命各种政治斗争的理由简单得多，也有力得多。

当政治化地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之后，以一应万，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全部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得全党、全军以及全民排除了各种对文化大革命的疑惑，在行动中绝对服从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

不抓住这一舆论造势上的中心环节，文化大革命是难以进行的。

二，从毛泽东本人来讲，这还是推行其理想的（也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蓝图的需要。

在他的理想蓝图中，每一个老百姓都是能工、能农、能文化、能打仗、能批判资产阶级的多面手。整个社会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中，生活在基本自给自足的封闭小团体中。这种排除商品经济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权威的社会，需要全民直接地接受一种思想的领导，当然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毛泽东接受并有意识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也是有多种社会性原因的。因此，他虽然热衷民众对他的个人崇拜，但当崇拜大大超出他需要的限度时，也会“讨嫌”。

三，与文化大革命整个政治斗争需要相联系的，是林彪、江青这个极左政治势力的需要。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政治新贵，只有借助制造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制造最狂热的个人崇拜，才能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深知文化大革命面对的对立面有着巨大的势力，更深知他们作为个人面对的对立面有着巨大的势力，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在政治上的软弱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借助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借助对毛泽东崇拜，才能够保护自己，为自己全部极端的政治行为提供合理性。

正因为如此，林彪、江青等人无不在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中做出极端的表现。高举领袖崇拜的大旗，他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造反派势力的政治需要。

无论造反派们的行动由哪些原因造成，只要他们进入了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乃至反对省委、市委、中央各部委的政治斗争中，便都需要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作为自己的口号和武器，也作为支撑自己的精神信仰。当造反派在受压制时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高唱“日夜想念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时，典型地注释了这一点。

五，在人类历史上，一定程度的领袖崇拜是一定的权力集中的需要，而极端的领袖崇拜常常是专制政治的需要。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全面专政”的政治，这种政治需要绝对性质的领袖崇拜。

绝对的领袖崇拜是绝对的政治专权的意识形态保证。

六，在人类历史上，极端的领袖崇拜还常常是极端残忍的政治、军事行为的产物：反之，极端的领袖崇拜又造成着极端残忍的政治、军事行为。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军事史及宗教史中，都能看到这个法则。

贯穿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的政治残忍性，必然需要极端的领袖崇拜作为其意识形态。只有高举绝对崇拜的大旗，才能使那些残忍的政治行为拥有信仰的光环。

七，在造反派及红卫兵队伍中，相当一批人有着依附于文化大革命政治的需要。对毛泽东表赤诚、献忠心、写血书、做宣誓，然后冲锋陷阵、对敌斗争，极为丑恶地表现出了他们追逐

政治风光的个人目的。

当他们争先恐后地表达对领袖的绝对崇拜时，各种“唯我独左”的自我标榜更是注释了对领袖个人崇拜的功利目的。宣扬领袖崇拜最“左”、最极端的人，往往也是在政治上最贪婪、最急功近利的人。这些面孔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八，更深刻地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领袖崇拜还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几千年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中，对君、父权威的尊崇和崇拜，是政治模式，又是心理模式。这种模式积淀在文化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中，被代代相传的文化延续着。

当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时；当城市、农村的民众在胸前挂起大大小小的忠字牌、跳起忠字舞时；当在机关、工厂和部队，手持语录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成为每日必修的功课时；不过极为原始地再版了传统封建文化中对君、父的崇拜。

民众中有潜在的个人崇拜的心理需要，有高呼万岁的心理需要，这是民族的潜意识模式。这个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翻动起来，进行了一次充分的表演。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呼万岁还真是文化大革命中相当一些民众的幸福源泉。

正因为如此，我们既可以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民众心理中深藏的一些思维模式推动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制造绝对个人崇拜的运动，是一个把几千年刻下的记忆再现出来的运动。

九，在狂热的领袖崇拜中，还可以看到一种文化学性质和心理学性质都很明显的原因，那就是奴仆思想。这种奴仆思想是几千年专制政治下人性的萎缩，它表现为对一切权力的恐惧、怯懦和恭顺。

正是这种恐惧、怯懦和恭顺，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民众以极端的形式汇入对领袖个人崇拜的洪流。政治上最怯懦的人，常常同时就是对毛泽东表现得最忠诚的人。最恭顺的人，常常就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最无限的人。这是性格低劣的表现。

十，对领袖的极端个人崇拜有时还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偏执。“自虐狂”、“迫害狂”倾向常常以转化的方式为一些人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增加了心理能量。

当一些红卫兵将纪念章别在自己胸脯的皮肉上，裸身表现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时，不过是心理上“自虐狂”的转化。而当他们将对领袖的极端崇拜结合上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凶残殴打时，不过又加入了“迫害狂”的心理偏执的能量。

十一，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的全部政治狂热，在一定意义上还夹杂著青春期被压抑的生命能量。

青春期压抑的生命能量在释放的过程中表现为各种政治上过度夸张的行为，也表现为对领袖极端的个人崇拜。在全国民众对毛泽东极端的个人崇拜中，红卫兵是冲在最前面的。“毛主席

挥手我前进”，他们是领袖崇拜热潮的先锋部队。

十二，从心理学原因讲，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在某种程度上是泛恋父情结的转化。

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在女性中远比男性更甚。在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生活中，家庭生活中的心理情结常常被抑制和掩盖着，便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头换面爆发出来。毛泽东慈祥的形象，成为整个民众恋父情结的最好倾泻对象。作为一种能量，它也被输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领袖崇拜的万顷波涛之中。

可以说，极端的领袖崇拜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大的思想政治现象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丑陋、最不堪入目的思想政治现象之一。

一个民族的劣根性在这里暴露无遗。

第八章 现实的利益分化与重组一切（1966 年 8 月－1966 年 12 月）

这个世界远没有理想王国。当人们高呼着似乎十分崇高、圣洁的宗教意味的口号时，脚下踏着的却是利益的轨道。

现实的利益比一切政治宗教更有力量。

一、对运动主要矛盾的描述

让我们继续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我们在对运动过程性的概括中，掌握其内在矛盾关系的演化。我们可以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用在这里，也可以将系统论的理论用在这里，还可以将文化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的相关理论用在这里，总之，我们要揭示文化大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与内在机制。

在对过程顺流而下的概括与揭示中，我们自然要经常截取它的横断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重大的现象与事实做出专门的研究。

虽然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发现，然而应该承认，我们还太依附于运动本身发展的浩瀚素材，在和这些素材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时，“即”有余而“离”不足，或者说，“若即若离”还未显出足够的生动性。在这里，同样有一种“出神入化”的空灵状态可追求。

让我们继续俯瞰文化大革命进入 1966 年 8 月时的态势。

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了，工作组已经从各高等院校及中等学校撤走了，对前一段的运动也做出了总结。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做出检查之后，在党内的地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地位则明显上升。8 月 18 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庆祝集会已将这些胜利成果肯定下来。

现在，摆在毛泽东、林彪及江青面前的，是一个他们愿意就此停步不前的现状吗？摆在那些反工作组的造反派面前的，是一个他们感到满意的现状吗？显然，他们都不满意。他们对保

守势力的进攻与冲动远没有发泄完。刘少奇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党的各层干部，特别是上层干部，对于这个结局是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呢？大概也不是，他们潜存着无限的不理解。

在偌大的中国，此时虽然有千方百面的因素与矛盾，而最主要的矛盾无疑还在这里。这个主要矛盾的任何激动与运动都将有力而全面地影响中国的社会生活。让我们看看这个主要矛盾的动态。

照理说，各学校的工作组都撤退了，即使有些单位留下了联络员，也只起观察、联络的作用。各大、中学校运动的主动权毫无疑问地落在学生和教职员工手中了，特别是落在了造反派手中了。按照《十六条》的规定，运动的发展，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在学校里斗“黑帮”、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旧文化、旧教育。

然而，“黑帮”已成死老虎，没有人愿意打死老虎。斗“黑帮”只是表面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不在造反派的兴奋点上。同样是死老虎，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兴奋。已经占有了的，一般不会重复占有：已经征服了的，也不需要重新征服。所有的成果只能是新一轮斗争的出发点。至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思想文化，何其枯燥乏味，根本引不起造反派们的兴趣。

毛泽东领导下的江青、张春桥这批“革命家”，更不会听任学生运动停留在关起校门斗、批、改的状态中。他们已经感到，工作组的撤走使得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进攻锋芒失去了有力的对立面。

当工作组存在时，与工作组的冲突恰恰是极好的靶子，通过工作组可以把锐利的铁矛直刺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样一想，一个非常简单、自然而又天才的斗争方案出现了：那就是继续斗争工作组。

中央文革的斗争目标与造反派学生的进攻冲动在这一点上契机相合了。

1966 年 8 月 19 日，清华大学校园出现了《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引起了强烈轰动。将与王光美为代表的工作组的斗争旧话重提，显出了无比有力的斗争新意。

8 月 21 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号召：“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段话里隐含的潜台词，是所有敏感的造反派学生都能够猜得到的。

对 8 月 18 日天安门前百万人庆祝活动的报道中，刘少奇地位的明显下降，早已使造反派们想到了其中的内幕。更何况还有中央文革频频泄露天机的暗示，足可以使学生们把这样的社论当做新一轮攻击的号令。因为刘少奇、王光美与清华运动的直接联系，因此，最敏感的斗争率先在清华大学发作出来。

8 月 22 日，清华园出现了第一张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刘少奇同志 7 月 29 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8 月 23 日，北京地质学院反工作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集结上千人，到地质部要求揪回原工作组长进行批判，甚至为此展开了静坐绝食示威。由于中央文革居高临下的政治压力，终于迫使地质部答应了造反派的要求。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针对各地工人、农民以及军队包围、阻拦学生造反，发出了支持学生的有力声音。

8 月 24 日，清华大学在这些新动向的影响下出现了大批矛头直指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同一天，受刘少奇思想影响的清华大学另一派学生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以多数派的优势撕毁了这些大字报，“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响彻了清华园。多数派依靠着共产党在 1957 年反右斗争的传统，保持了统治局面的力量。由于这种“传统”的力量深入知识分子之心，造成了少数造反派在校园内的孤立无援。

然而，9 月 2 日便传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9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明确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和市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对全国各地遭到围困的红卫兵的明确支持，也给了清华园造反派以巨大声援。

这一阶段，造反运动在北京与在全国已经显出了时间差。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造反派已经将矛头直指刘少奇和王光美，虽然这些人受到了校内多数派势力的围剿。在全国，造当地党委反的学生运动正受到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和军队的反对。这不过表明，文化大革命在反对刘少奇及其代表的整个党的旧有组织时，必然遇到的全面抵抗。

中国政治生活此时的主要矛盾，就这样又以强有力的方式向前推进了。

清华大学多数派的红卫兵对反对刘少奇的少数派的围剿与反击，不过是全国范围内“保守”势力对造反势力包围的象征。在全国各地，都发生着大量的工人、农民和市民有组织地反对学生的现象。一些地方的农民成群结队，扛着铁锹、棍棒“杀”进城来。

显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人、农民远没有学生们灵敏。他们对党的领导的服从这一思维惯性有着更大的稳定性。在这里，学生与工人、农民、市民之间的矛盾，不过反映了毛泽东、林彪、江青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党的各层领导机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9 月 15 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百万人集会上，林彪讲话指出：“要坚决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做他们的强大后盾。”这种舆论日复一日、越来越强烈地铺张开来，在全国范围内给遭受围困的学生解围、撑腰，在清华园以及北京各高等院校给造反派们揪斗工作组、把矛头直指最大后台的斗争以鼓动和支持。

10 月 1 日，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的盛大集会上，林彪提出了意义重大的新的运动口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是指刘少奇的路线。与刘少奇的斗争是当前运动最尖锐的问题。

10 月 3 日，《红旗》杂志在刊登林彪国庆讲话全文的同时，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向全社会明确发出“批判资产阶级路线”的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也就是批判刘少奇的路线，作为当前的主要斗争内容被提了出来，而所谓的“斗批改”则隐退到后面了。

这一轮斗争无疑要比八届十一中全会前的斗争更尖锐，文化大革命遇到的阻力也更深广。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对刘少奇的斗争进行了一系列更有力的推动。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十六所高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于 9 月 6 日联合组成了“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10 月 16 日，“三司”主持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这是中央文革直接策划的一次大会。江青在会上讲话：“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代表中央文革发出了支持造反派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特别重要的是，张春桥还在这个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中说：“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这是对全国范围内受到不同程度斗争、批判及打击的造反派学生的有力支持。这个大会通过的《大会通电》，号召全国各地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这一轮斗争的程序，与发布聂元梓大字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程序是一样的：自上而下地策划，由下面点火向上搞。从清华大学最初出现反刘少奇的大字报到此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足够的声势。

10 月 9 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由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长达二十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林彪和陈伯达都做了有关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讲话。陈伯达讲话的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这些讲话随后就变成《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各种社论文章，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号召。

如果说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揭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第一轮的斗争，公布聂元梓大字报揭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第二轮的斗争，那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第三轮的斗争。这一轮斗争（正像清华大学出现的大字报一样）是把矛头越来越直接地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由于这轮斗争发生在毛泽东 8 月 5 日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之后，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内容就是“炮打司令部”。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做出检查。这一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贯穿了 1966 年的秋、冬两季，在 1966 年 9 月－12 月这四个月的时间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

概括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矛盾斗争展开后，在它的能量没有消耗尽之前，是不会终止的。在此过程中，它会随着具体的形势，转换新的方式向前演进。一个矛盾

也和生命一样，有其孕育、诞生、成长、壮大、衰老及死亡的过程。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安于现状的斗批改局面，而是演化出更加激烈和广阔的冲突斗争，这也不过表明，支配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矛盾斗争才刚刚开始。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善于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的运动。

矛盾斗争自然有其对立统一的规律，有其相互依存的条件。它也会在某个时候缓和，在某个时候僵持，在某个时候维持平稳的现状，然而，这都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条件发生变化，矛盾就可能再次激化。好比夫妻吵架，也要等吵架的冲突能量释放完了才会平息。更何况是这么大国家的一个如此之大的政治冲突，积聚了久远的能量还远未释放殆尽。

除非有特别的外来因素，才可能中断原来的发展逻辑。

夫妻俩吵架，正不可开交时，外面有客人敲门，他们可能中止；或者家里突然发生了火灾，他们也会中止。战争中的人类，如果突然面临地球的毁灭，战火可能也会中止。阶级矛盾尖锐冲突的民族，面对外族侵略，其阶级斗争也可能会暂时缓和，甚至暂时中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没有任何“客人”敲门，也没有任何足以威胁这个民族生存的外族军事侵略。整个世界都在以或惊恐、或惊喜的目光观察着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兴起的风暴。在这种观察中，甚至有不少人正跃跃欲试地接过它的火种，传播于中国领土之外的广大地区。

当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更加实际地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他与刘少奇分歧的实质。我们首先看看毛泽东在 10 月 9 日－28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 10 月 25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道：“讲几句话，两件事。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就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好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是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

“为什么说我有责任呢？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觉，还是在《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了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这段关于一线、二线问题的讲话，使得我们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意图又有了更生动一点的透视。在这个看来很从容的讲话中，已经包含了与《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性质同样尖锐的问题。当面对中央全会一张张面孔时，他讲话的口气自然和落在书面上的文字有所差别，实质却是一样的。

他甚至接着讲道：“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我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发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给红卫兵的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一个不亦乐乎。”

他像个十足的家长一样，平和地说道：“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

这些看来温和的话必须结合毛泽东那张措词严厉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一起阅读，这才是他作为全党领袖形象的完整性。这样的讲话或许也包含一点真正温和的东西，似乎会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限制在“同志”的范围之内；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随后的发展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对此，我们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毛泽东的讲话不过是其政治家的老练与含威不露而已；另一种解释是，他即使曾有过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同志化”的一丝倾向，也被其后政治斗争本身发展的尖锐性所抹去。

在这一年 12 月，毛泽东还有过一个更说明问题的讲话：“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是这个问题。”他又说：“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在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到，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全面阶级斗争的路线与刘少奇的路线之分歧的实质，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分析是多么正确，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是对这种分析的最好注释。刘少奇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路线分歧，最尖锐之处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刘少奇倾向于接受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倾向于社会主义体系内容纳更充分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容纳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容纳多种经济成分，容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因素；而这正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

他们的分歧除了在思想理论上的渊源之外，在现实中又代表某种社会利益的差别。

二、大串连瓦解了学生运动与毛泽东的结盟

1966 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的发展，是和大串连分不开的。对大串连这个看来比较简单的现象，很少有人做更多的政治分析。然而，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是透视文化大革命极为重要的窗口。

大串连最初产生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的不平衡状态。

1966年8月13日，天津大学的部分造反派学生因为受压，决定徒步到北京“取经”。中央文革得知以后，立即抓住这个典型，派火车去杨村车站接他们。天津大学的学生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激动，注释了大串连这一新生事物的开始。8月16日，中央文革召开了“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这是一个专为各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学生撑腰打气的大会，也是一个对北京学生发出支援外地文化大革命号召的大会。一时间，外地的学生大批涌进北京，而北京的红卫兵也开始到外地串连。

继毛泽东在8月18日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群众之后，于8月31日第二次接见了五十万红卫兵群众。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支持大串连：“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由此，声势浩大的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

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冲向外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揪斗走资派、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造反浪潮。他们与当地的造反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得那里的造反运动陡然高涨。与此同时，外地来京人数激增，经过首都的强化造反教育返回老家时，带回去的是强烈激发的造反精神。

正是这个时期，各地相继发生了保守派力量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对造反学生运动的围攻。造反学生的相互串连使反围攻的造反气象更加升级。

在轰轰烈烈的大串连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快地升温了。

数以百万计的外地学生在中央的号令下，抱着见到毛主席的强烈渴望聚集在北京，毛泽东于8月18日、8月31日两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又于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分别接见了少则五十万、多则一百五十万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前后共八次的大规模接见，是在全国大串连的基础上形成的，反过来又极大规模地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大串连。

发动和支持大串连，是毛泽东特别简单而又有力的手段。没有大串连，就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当时全国运动的不平衡性来讲，许多保守倾向严重的地区，使运动很难在短时间内开展起来。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体现“放手发动群众”的战略部署之一，也是毛泽东最自信、最大气魄的手段之一。

手段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他需要更大规模的红卫兵运动与领袖崇拜，这是他进行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所必须的力量。正如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百万游行队伍时对林彪讲的那样：“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然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可能并没看清社会政治的一个规律，对任何力量的利用，其实就是

与它形成合作的契约。虽然在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看来，他们与学生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然而，领导与被领导其实也是双边关系，也有一种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契约内含其中。

那么，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运动的双边契约是什么内容呢？双方合作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双方能够给予对方的是什么呢？双方各自得到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所需要的，是学生造反的行为，造反的贡献。这是他正在得到和还将会得到的。那么，毛泽东能够给予学生什么呢？毛泽东首先给予红卫兵的是接见他们的待遇。同时，他把造反、串连及革命的权利交给了红卫兵。这正是学生们渴望的。由于上述政治基础，这个合作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那么，除了政治的权利，学生们还得到了什么？还得到了免费的旅游，青春的解放，以及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的充分实现；当然，还得到了对秩序不满（这其中显然包括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满）的各种变相的释放方式（对本地运动不满便跑到外地串连去）；部分学生甚至初尝了腐化的滋味。正因为如此，全国性的大串连，从一开始就获得极大的推动力。学生们享受到了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极大特权，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受到崇拜和信任。特别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被称之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一副钦差大臣的角色感。他们煽风点火，推波逐澜，成为各地造反的核心力量。

在大串连中，即使是那些在北京相对保守的学生，或者在北京没有造反权利或造反机会的学生，一到外地也都纷纷成了造反派。北京学生在大串连中具有“指挥”外地运动的特权，面对这样的诱惑，任何一个年轻人都很难抗拒。不同政治倾向的北京学生们走到外地时，可能结成一个统一体，呐喊着冲击各地的党政机关、厂矿学校。

无论是政治上的特权也好，还是免费游山玩水的特权也好，还是可以在此基础上腐化一下的特权也好，都有无限扩张的自发倾向。如果说最初的串连是政治性很强的行动，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上千万大、中学生在全国的大串连，已经在很大意义上离开了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政治内容。

不仅在井冈山、延安、遵义、大寨等“革命圣地”塞满了拥挤不堪的学生，在一切名胜古述、风景区、游览地、名山大川，同样挤满了游山玩水的青年学生。交通堵塞以至瘫痪，各地的接待工作不堪重负。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遭到大规模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的各种副作用，以社会动荡的形式浮现出来。

北京以及各大城市的学校中，本校的学生已经走空，冷冷清清的校园早已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所需要的热烈气氛。从 1966 年底到 1967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文革开始对大串连实行了一系列的收缩与限制，并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出的通知与布告将所有的车站码头、交通要道以及学校单位都贴满了。毛泽东提倡回校闹革命，提倡回本地闹革命，最后终于明确提出停止大串连。

1967 年 3 月，正式全面禁止了大串连。作为毛泽东、中央文革与学生运动的一个契约，大串连达到了自己的最后限度。

当毛泽东把串连的特权交给学生时，巨大的特权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一时间大串连确实成

为造反的巨大能源。然而，特权必然沿着其自发的倾向无限扩张，当它超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政治需要时，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对学生运动的限制与约束。

蜜月般的合作过去之后，限制与反限制、管教与反管教的矛盾与冲突，使双边关系发生了性质严重的变化。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不仅是大串连，整个学生运动在毛泽东的眼里都超出了他的政治需要。自 1967 年 3 月以后，毛泽东与学生运动的关系就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的限制和管教。从放手发动到限制管教这一过程，颇有代表性地注释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多种势力的合作关系。

在限制、管教学生的过程中，曾经反对对学校派驻工作组的毛泽东，却派出了更大规模的工作组。先是"军宣队"，后是"工宣队"，再后来，与全社会青年学生的安置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大批的青年学生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工作队"的再教育。

这就是毛泽东、中央文革对学生运动利用与限制的全过程。当用工宣队、军宣队、贫下中农来管教大、中学生时，毛泽东根深蒂固的阶级路线就更充分地显露出来。

在对毛泽东与学生运动双边关系的简单透视中我们看到，所谓高扬着共产主义理想旗帜的中国文革运动，内在充满了现实的利益关系。

这个世界远没有理想王国。当人们高呼着似乎十分崇高、圣洁的宗教意味的口号时，脚下踏着的却是利益的轨道。

现实的利益比一切政治宗教更有力量。

三、关于"全红总"典型事件的阶级分析

在这里，我们还将分析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件。这个事件算不上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事件之一，也常常被关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所忽略，然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事件。通过这个事件，可以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更深刻的政治分析、经济分析及阶级分析，也可以对文化大革命整个运动的内在结构有更清楚的透视。

它就是所谓"全红总"事件。

"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是于 1966 年 11 月 8 日由部分合同工、临时工联合成立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跨省市的工人造反组织。"全红总"在北京成立，造反派头目是王振海等人。

1966 年 11 月底一 12 月初，"全红总"近 400 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了大礼堂，提出了他们的造反要求。12 月 4 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布"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正当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及劳动部党组有关负责人汇报、请示和研究如何处置这一问题时，

中央文革似乎又发现了一个可以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新事物。他们在 1966 年 12 月 18 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事业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

这次接见之后，"全红总"听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迅即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

1966 年 12 月 26 日晚，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会见一开始，江青就阶级感情"充沛"地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立刻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则插话说："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显得更为马列主义化地说道："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

"全红总"的代表汇报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且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陈伯达立刻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照样工作！"江青更为激烈地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康生也紧跟着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

江青还以中央文革最实权人物的口气总结道："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2，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1966 年 6 月 1 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按《十六条》处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这时，江青对两个靠边站立的领导干部说道："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中央文革的讲话，"全红总"立刻以大字铅印传单发向全国。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 1967 年 1 月 2 日的《联合通告》。《通告》指出："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 年 6 月 1 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全红总”的造反派开始揪斗领导干部，围攻领导机构，通告全国各分团展开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的造反活动。一时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刮起了被后来批判为“经济主义”的“歪风”。不仅属于《通告》内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要求兑现《通告》的规定，类似的“经济主义”要求超出这个规定扩张开来。很多地方将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有些地方将 1961 年－1963 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而十几年的工资。

继而，大量的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的纯经济目的的行为在运动中呈现出强有力的扩张冲动。这种突出工人现实经济利益的浪潮来势凶猛，立刻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政治形势及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冲击。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意识到这是一个有着很大危险性的势头，任其发展，很可能破坏整个文化大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还在一线勉强维持局面的领导成员（例如周恩来）形成了共识。

政策调整后出台的一系列部署是性质明确的。1967 年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实质上就是针对“全红总”这样的潮流在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同年 1 月 20 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省造反派代表时，又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周恩来还说：“至今中央还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这里首当其冲指的是“全红总”。同年 1 月以及 1968 年的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

1967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发出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1967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又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但是，“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通告特别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

“全红总”在这一系列严厉的通告面前，仍然沿着本来的自发冲动顽强地活动着。

历史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局：1967 年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市卫戍区逮捕了在京的“全红总”及其他一些所谓“非法组织”的头头。在中央文革策划下，1967 年 3 月 2 日，北京数十家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批斗“全红总”头头大会。

“全红总”的头目王振海等人当然地被法办了，这些人也很快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中被遗忘。更多的革命造反派高举着似乎是纯政治的斗争旗帜，踏着“全红总”这样的“经济主义”反动组织的残骸，继续前进了。然而，这段故事却留下了分析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典型个案。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无不记得江青等人接见“全红总”代表时的讲话，这些讲话在社会上流传之后，中央文革“首长”那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纯粹的“无产阶级”色彩，在激进的学生中、更在广大的工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讲话使得很多在理论上努力思考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造反派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

可以说，中央文革的这一举动在一些天内似乎给运动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然而，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共中央的声音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除了表明这种经济要求十分明确的工人造反活动如何迅速扩张、表现出它的不合理性外，同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在这里，我们延续上一节中得到的一个思路，从双边关系的性质上、从利益的结合上分析这个事件。“全红总”最初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支持，其实意味着中央文革作为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集团与“全红总”及其代表的社会利益形成了一个合作。

中央文革需要的是，“全红总”造刘少奇的反，造刘少奇所依据的党内“修正主义”力量的反。而他们给予“全红总”的利益，则是这种造反的特权：这些人可以进驻总工会大楼，可以发号施令，可以采取政治行动。

“全红总”这样的势力给予了中央文革所需要的造反能量的投入。当他们冲击劳动部、总工会以及各种劳动制度时，无疑加入了冲击刘少奇政治势力的斗争。而他们想要得到的造反权利，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充分地给予了他们。

然而，“全红总”们还要一些十分具体的经济利益。江青等人绝对没有看到这些要求的严重性，绝对没有想到它在一个月多的时间内对中国生产格局和政治格局形成的破坏性冲击。这里没有任何“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的是极为现实的阶级利益。

正像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进行这场大的政治革命有着十分具体的个人利益一样，“全红总”也有着非常具体的利益。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野心，而他们所代表的合同工、临时工等工人队伍，则有着完全经济性质的利益要求。这个经济利益一旦暴露出来，就远离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口号，也远离了中央文革这个政治集团的政治需要。

中央文革与“全红总”“合作”的双边关系超出了原有的限度，“全红总”被限制是必然的。当这种限制在逐步升级的过程都不能限制住“全红总”的狂烈趋势时（因为它代表的社会利益十分广大和强烈），极端的限制手段——镇压便开始了。

镇压是限制的最高手段。而包含镇压在内的限制，则是任何一个政权都有的职能。

二，如果超越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与“全红总”的双边关系这个范围观察整个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巨大的社会政治潮流中，表面看来，不同阶层的人一时间可能有着完全一样的政治口号，然而，在实际上只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反对现状”。当反对现状在一个时期内、在一个主要目标上暂时一致时，可能就有了浩浩荡荡、广阔范围的统一战线。而由于统一战线内不同的队伍、不同的阵营有着各个不同的利益，广大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又是必然的。

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斗争及运动都是如此。

包括民族间的斗争及战争亦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当然也不例外。在轰轰烈烈、一轮又一轮的革命中，无论是反对“黑帮”、“黑线”，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统一的旗帜下面有的是各不相同的社会利益。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依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现实利益行动着，一切都可能随着利益的发展而改变。

现实的利益分化与改组着一切。

三，关键是对任何社会潮流及统一战线内部利益的精确分析，包括对各种民族主义潮流的分析，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所谓思想政治革命的分析。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的年代，还是那些相对而言显得平常的年代，社会总在一种潮流的状态中，不是这样的潮流，就是那样的潮流。无论是支配历史的总的潮流）还是总潮流中的某些分潮流，都是多种力量合成的统一战线，有着复杂的利益结构。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全部利益做出无一遗漏的分析，则是判断社会进程的必要智慧。在这方面，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对于政治家，都无例外。

四，我们又要探究一下毛泽东的思想了。他在《红旗》杂志 1967 年第一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过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在毛泽东写下这段崇高文字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全红总”所代表的某些社会势力的现实的利益要求，看到的是对这种利益要求推动起来的“全红总”这样的政治行动的限制与镇压。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委实显得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差距甚远。

更具体地，我们联想到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与刘少奇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之间的对立关系。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乃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不止一次谈到取消等级制、恢复和实行供给制。这些说法因为在现实中太缺乏可行性而没有成为实际的部署。然而，它却引起我们对历史哲学的思索。

当他要工人阶级为共产主义而战斗时，工人阶级却提出了十分现实的经济目的。工人的全部行为，最终要从其现实的地位、现实的利益及现实提供的轨道进行。这是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当他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的高空时，他无视经济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当他号召社会上各种阶层、力量与他一起进行大革命时，他却无法给他们提供任何超越历史的东西。“全红总”以坦露的方式暴露了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本质上是经济的，政治只是手段。

“全红总”被打下去了，更多的革命队伍，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还是农民，还是党内的干部，当他们将自己的现实利益掩盖起来，而在光明正大的政治口号下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毛泽东想必又淡忘了“全红总”的警示。

五，只有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深刻透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力量及其相互关系时，我们才能对什么是历史运动得出更为实在的结论。

在政治斗争中，表面看来，不同的力量只是不同的思潮；揭开它们的旗帜，才能看到他们脚下踏着坚实的利益基础。正像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看到的，当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借助林彪、江青、康生及张春桥的力量时，同样是利益的双边关系。

毛泽东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自己政治斗争所需要的东西；而毛泽东也给予了他们各自所需要的东西。

林彪、江青等人要的是个人权力的扩大，地位的上升，这是这样一批党、政、军官僚的最主要利益。他们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投入制造毛泽东绝对权威和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只不过是十分现实的利益活动。

有多大的利益，就有多大的冲动。当利益以无比巨大的诱惑出现在面前时，冲动可以达到疯狂的程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高利润可以使资本家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

当毛泽东决定放手发动红卫兵运动时，他要借助的当然是红卫兵运动革命造反的奉献；他给予红卫兵学生的，是造反的特权。这样的双边关系，肯定有其自身的限度。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期望与要求；红卫兵有红卫兵的期望与要求。能够结合时，就出现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光辉岁月。当双方的利益冲突超出这个限度，毛泽东不能超越历史条件给予红卫兵更多的东西时，红卫兵与他的政治合作也便停止。接下来的，就是对红卫兵的“再教育”。

这一点在“全红总”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典型。

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与“全红总”的关系，显然是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他们短暂的蜜月和最后以镇压为极端表现的分裂，表明了一切相互关系的对立统一性质和限度。

中央文革和“全红总”共同要求反对旧的秩序时，他们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然而，超出这种程度，当他们的要求不一致时，相互就会斗争。倘若中央文革能够把“全红总”的活动限制在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框架内，譬如不在全国煽动“经济主义歪风”，而只在思想政治领域内开展对刘少奇的批判，那么，无疑还会允许“全红总”的发展。在能够限制对方的情况下利用对方，这是中央文革与造反派联系在一起的必要基础。

如果再放开视野，我们看到，毛泽东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也是一种双边关系。

阅读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讲话，既能看到他要坚决把刘少奇这样的赫鲁晓夫搞下去的无情的一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有时也会看到他将刘少奇、邓小平保留在同志范围内处理的温和的一面。然而，毛泽东只有在对立面对自己没有威胁时，才能团结和容忍对立面；只有在能够完全限制住对方时，他才可能利用对方的力量。

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所代表的党的一线将他“架空”的印象太深刻了，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势力及社会势力太顽强了，也太危险了，他没有可能在保证自己

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保留对方的某种政治存在，毛泽东最终采取了打倒刘少奇的方法。可以说，在 1966 年乃至 1967 年，全党上下表现出的各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反情绪，最终促成了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在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潮流中，不同的力量相互矛盾和对立统一地结构在一起。每个矛盾的两方面都有著相互的限制，表现为一定的界限。

在众多力量错综复杂的相互界定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运动着的现状，那就是历史。

四、“血统论”与“联动’的社会、文化背景

1966 年 7 月 29 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简称北航附中）出身干部家庭的红卫兵，贴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一出现，立刻引起了支持和反对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写对联的一方则耀武扬威地把这副对联称为“鬼见愁”。

8 月 1 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将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等北京主要的高等院校，当天晚上就在所有张贴该对联的大学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院校围绕着这副对联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夜。

对于这个政治性极为敏感的爆炸性动态，中央文革迅速作出了反应。8 月 2 日凌晨，陈伯达便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把它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然而，中央文革的权威与思想说服工作并不能平息和改变被这副“鬼见愁”对联唤发出的强烈的“血统论”情绪。就在 8 月 2 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名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以及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到清华大学游行，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口号，与清华校园的造反派学生发生激烈冲突，并引发了清华大学关于对联问题的两派不同意见的大辩论。

这副对联所发动的“血统论”思潮，疾风暴雨般扩展到北京所有的高等院校及中等学校，很多学校开始成立“干部子弟协会”，“贫下中农子弟协会”，“工人子弟协会”乃至“工农革干子弟协会”，有的干脆就成立了“贫协”。

对联的出现无疑冲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在“传统”的既得利益中产生出的“阶级路线”，已经成为毛泽东、中央文革推动政治大革命的障碍。于是，就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干涉的措施，当然，声音显得犹豫和温和。

8 月 6 日，在对联思潮的席卷下，部分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出席了大会。在这个所谓的辩论会上，“血统论”的观点极为嚣张，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需要借助红卫兵革命造反行动的江青，只能继续扮演一个爱护学生运动的领导形象，并一再重申陈伯达提出的对对联的修改方案，那就是“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

儿背叛，理应如此”。在这里，显示了毛泽东、中央文革与红卫兵运动双边关系中对立的一面。

“血统论”思潮在这副纲领性对联的带领下，冲向社会，冲向全国。一时间，革命干部子弟都穿上了父辈的绿军装，佩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以无比自豪与骄傲的姿态明确地标榜出自己血统的高贵。这种装束成了蔓延全国的出身革命干部的红卫兵时尚。

1966 年 8 月 12 日，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等人贴出了题目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将对联中含有的政治内容理论化了。他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

谭力夫的讲话以其富有鼓动性的雄辩口才及鲜明强烈的“阶级感情”而成为一个迅速辐射全国的文本，不仅各地持有相同观点的红卫兵以传单、大字报的方式广泛传抄、张贴，甚至一些省市的负责人也认为这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讲话，数万、数十万地印刷和发放。“血统论”迅速在全国“政策化”。很多地方住旅店、上火车、进商店，首先要自报家庭出身。

特别是在刚刚开始的大串连运动中，红五类的家庭出身是真正有效的通行证。在上海、长沙、天津等城市，一切火车站的出口都有红卫兵把守，对前来串连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查出身。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热烈欢迎。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弟，坚决不让出站，甚至予以扣压，强行遣返。在“血统论”最猖獗的一些学校，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特别是所谓“黑五类”、“黑七类”或者“黑九类”出身的学生，完全在红五类学生的管辖之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了运动的对象。

这种明显干扰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的思潮，势必遭到文革派力量的反对。在 9 月、10 月、11 月、12 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反动”的“血统论,，遭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实际上，“血统论”在这一时期的泛滥已确实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之一了，它已成为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支青年近卫军。

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大、中学校举行了全市性的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批判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鬼见愁”对联及其所代表的“血统论”。

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文化大革命将矛头越来越深入地触及到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中层一大批领导干部。

“血统论”的反文革政治倾向终于显示出来了。红卫兵已经不再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首长请到辩论会上，期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了，有的只是明显对立的政治意识。

1966 年 11 月 27 日，一批以“血统论”为主要思想基础的革命干部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秘密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随之在老红卫兵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秘密串连，并于 12 月 5 日发布了成立宣言。这个宣言的文字如下：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

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从这一天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名噪一时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正式成立了。

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组织，立刻显示出他们“联合行动”的政治能量。他们对抗当时正在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及传单等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行动。他们的大标语“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等布满京城。当他们受到公安部的镇压时，又于 12 月多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的“联动”成员。

1967 年元旦，部分“联动”成员策划了一图更为极端的政治行为。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大人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 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该《通告》宣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勇敢的领导干部。”

《通告》全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典型的反文革纲领。它所发出的政治声音，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

在这个《通告》中，还宣告了一个典型的高干子弟性质的组织路线。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这个极端的、毫不讲任何“策略”的纲领，不过在更典型的意义上注释了“联动”的政治性质。它的组织路线也以极端的方式注释了“鬼见愁”对联揭开的“血统论”思潮的实质。

在这里，让我们伸出历史的笔触，写下必要的分析文字：

一，我们在上一章分析红卫兵运动时，曾指出红色特权是早期红卫兵的社会思潮基础之一。早期的红卫兵（跟随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先成立起来的一些中学红卫兵组织）与后来广义的红卫兵概念不同。这些被称为“老红卫兵”的红卫兵是以革命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子弟的特权组织。红色特权不仅是其思潮基础之一，而且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础。无论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无论是对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的忠诚，无论是要当毛泽东路线的小卫兵的青春热诚，都是外在的。最终，切身的利益决定一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清醒地看出，在早期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掩盖着多少不同的现实利益。对此，毛泽东大概没有足够的预料。

二，“联动”同“全红总”一样，是我们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个案。它和“全红总”同样说明，决定不同社会势力政治态度的最主要因素，是切身的利益。就学生运动而言，因为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所以，他们通常不是以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工资、待遇、福利等）内容表现出来，因此，往往显得更政治化，更意识形态化，这是一切学生运动的共有特征。

在社会大动乱中，很多阶级都会提出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裸露的要求，惟有学生运动常常表现为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然而，对学生运动更要分析。

一方面，他们容易感应大的历史潮流，例如，在民族受到压迫时，他们率先感应民族抗争的情绪，当一个时代的腐朽政治压迫社会进步时，他们率先感染社会要求进步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运动往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且全社会化，常常很难看出他们各自的社会阶级地位与切身利益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有着非常切身的、现实的利益驱动，只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更充分地显露，通过分析才能够有分别地揭示。

三，如同“联动”一样，像蒯大富这样一些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学生，一方面他们是在为一种所谓革命政治奋斗，这不过是卷入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各自都有着非常具体的切身利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表演，本质上被切身利益所驱动。离开了切身利益这个基础，他们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四，在批判“联动”、“血统论”的过程中，有着特别强大的政治力量。

1967 年 1 月 31 日，《红旗》杂志在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曾明确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当时，不仅对“联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围剿，抓捕了一批“联动”成员。直到 1967 年 4 月 22 日，毛泽东出于策略的考虑，亲自下令释放“联动”分子。

之所以对“联动”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围剿：

第一，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文革集团的政治需要。不打倒联动，任其扩张，就可能形成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第二，这也是社会上各种造反派势力的需要。这个需要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既是一件事，又是两件事。

所谓是一件事，就是一切造反派势力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司令部”的时候，面前都有一个直接的障碍，就是“联动”势力。不冲破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以进

行。

所谓又是两件事，就是这和造反派队伍中有很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相关。出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出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个人前途等一些根本性的切身利益，他们无疑有着批判“血统论”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血统论”的批判要比对刘少奇的批判有着大得多的战斗冲动，甚至有一种直接反对“阶级压迫”的阶级性含于其中。此外，在造反派队伍中还有一些出身工人、农民的红五类学生，他们对“联动”高干子弟的特权优越感同样有某种程度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有时甚至比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更为强烈。这些都汇入了批判“血统论”、“联动”的斗争之中。

五，被对联激发起来、又被“联动”所注释了的“血统论”确实有着极为现实的利益基础，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既得利益性质的政治思潮。这不仅高度政治化地显示为“联动”要打倒中央文革的政治纲领，还特别社会化、阶级化地表现为早期红卫兵的社会行动。

当早期的红卫兵席卷学校，冲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时，我们看到了两个特别具体的进攻方向：一个，就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一系列早已被共产党打倒的敌人；另一个，就是指向教育、老师、知识和文化。在学校中，毒打教师的主要是他们，在社会上，毒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又主要是他们。至于摧毁各种文化，“破四旧”的核心力量还是他们。这里暴露出了以农民出身为多数的共产党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内部相当一些人的一种政治倾向，就是对知识、对文化的恐惧和敌视。

这种倾向曾经是毛泽东得以领导全党进行 1957 年反右斗争的政治基础,也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同盟。

正是由于毛泽东不断号召的对“资产阶级”文化、艺术、教育、学术权威的反对与批判，才使得党内一大批从农民出身的、对现代文明有恐惧感和敌视感的干部队伍对文化大革命保持某种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当文化大革命初期只批判学校内的“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时，他们尤其能够理解和接受。

这也是早期红卫兵与毛泽东的共识；当他们以“联动”的方式站到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时，不过说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又向纵深推进了。回顾红卫兵从“破四旧”到“联动的发展过程，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联系。

六，“血统论”是当代中国最腐朽、最落后的观念之一，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糟粕之一。它是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哺育出来的巨大传统观念。这一观念渗透整个中华民族，也渗透着共产党。作为一种积淀，作为一种心理模式，这样的传统文化深深储存在民族的潜意识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给了它表现的机会。

现在，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中国的历史也翻过了“血统论”这一页。中国的历史似乎也翻过了恐惧和敌视知识、文化的一页。当社会的政治领域在逐渐知识化，而生活又给人们超越家庭出身提供了比较均等的机会时，回顾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更加感到历史进步的可贵。

五、遇罗克的《出身论》与当代中国“出身等级制”的灭亡

在考察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血统论”时，还必须考察与之相对立出现的遇罗克的《出身论》。

在文化大革命的青年运动中，遇罗克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1966 年 12 月，正当“血统论”猖狂蔓延时，二十四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写出了针锋相对的文章《出身论》，以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传单方式张贴在北京一些公共场所。

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出身论》针锋相对地指出：“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他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的影响。”从这种直接的论述出发，他还更加深入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的斗争，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对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提出了尖锐的、与众不同的论述。他在表述观点时的勇敢与彻底，也给人一种极端的印象。

《出身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全文刊登《出身论》的学生小报《中学文革报》更把遇罗克这个名字连同《出身论》这篇文章广泛地传播到社会上。因为它触动了“血统论”强大的势力，也附合了受“血统论”压迫的广大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的利益和情绪，一时间其影响大有奇峰凸起之势。

由于《出身论》在论及文化大革命涉及到的重大社会问题时所做的大胆的、带有极端意味的论述，它被中央文革认为是与“血统论”相对立的另一个异端。如果说“血统论”在右的方向上干扰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认定，《出身论》是从极“左”的方向干扰了文化大革命。听任《出身论》的思潮泛滥，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及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因此，对遇罗克及《出身论》实行了及时的镇压。好在他只是一个人，远没有“血统论”那样广大的政治背景，所以，对他的打击是十分迅速的。

1967 年 4 月 14 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在公开场合指出：《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从政治上对《出身论》做出了宣判。1968 年，公安部门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为罪名，将遇罗克逮捕，并对他多次批斗、公审，于 1970 年 3 月 5 日对其执行死刑。

十多年后的 1980 年，《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被平反昭雪。

今天，我们在思索中翻回这一页。不能不看到，出身问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最重大的社会事实之一，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刻的透视。

一，可以说，出身问题在当时就是一个“等级”问题，就是一个社会地位高下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阶级问题。当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说要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变为“自觉的阶级路线”时，其实它已经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初成为了阶级路线，只不过是做了而没有明确说出而已。

阶级原本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由于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就有了阶级的划分。因为阶级的不同，就有立场的不同，这无疑是真理。当地主、富农、资本家在原来的地位中进行经济剥削时，他们是剥削阶级是毫无疑问的。

当他们被剥夺了，成为普通劳动者时，他们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无疑已是新的阶级了。至于他们怀念旧的社会，某些人在政治上的反动，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他们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以新的面貌劳动生存，就应该取得新的阶级成分。是农民就是农民，是工人就是工人。

如果由于对历史的阶级判定，在新的社会劳动中加以歧视，使得他们支付同样的劳动，却不能得到与其他农民、工人同样的报酬，这种歧视的经济含义，倒使他们具备了新的阶级意义，那时，他们就可能不是剥削者，而是被剥削者了。

出身于地、富或者还包括反、坏、右家庭的子女，长期受到社会的歧视，这种歧视不仅表现为社会政治地位的低下，还表现为在同样的劳动支出下不能得到与出身好的人同样的报酬，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已经带有新的阶级意味了。

在中国一些年的不正常社会生活中，出身问题是一个带有阶级性质的问题，是一个给相当一些人带来特权、又给相当一些人带来卑贱与不平等的重大社会存在。这是曾经对每一个中国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问题，在一些年内甚至是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问题。需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透视这个中国当代生活中的重大现象，并且对其做出新的论述。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分析中，我们看到，出身几乎是文化大革命中影响一个人政治态度的重大因素之一。只要对出身问题稍做探究，就能够看清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工人农民组织中某些政治差异的根源。

二，让我们看看出身问题如何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一种“等级制度”。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民主、民族革命时期，共产党内、军队内讲出身，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的政治态度和出身确实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讲成分而又不惟成分，大概多少可以代表那时比较完整的“阶级路线”我们要考察的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发生的事情。

作为对民主、民族革命的直接延续，出身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依然是直接的政治问题。被剥夺的地主、富农及其他敌对分子，注定会有政治上的反对立场与情绪，他们的子女也肯定会受到影响，因此，讲究出身，在当时无疑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出身问题之所以被长期固定下来，又有其历史原因。

它首先被共产党面临的长期的阶级斗争固定了下来。

因为有抗美援朝等战争，有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因为 1957 年反右中暴露出来的阶级斗争，因为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阶级斗争”形势，这一切无论是由国际原因造成的，还是由共产党的政策错误（例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造成的，总之，共产党始终处在不安全的感觉之中，因此，便持续地进行阶级斗争。它始终需要将地、富、反、坏还有后来的右派固定在阶级斗争对象的范围内。由此必然产生推衍和株连：出身的划分永远地将这些敌人的后代打入另册。

其次，当出身的划分造成了社会地位的卑贱之分，由此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之后，它又被在这种不平等中获得利益的人巩固下来。

出身使一些人失去了完整的、平等的权利，而使另一些人得到了超过平等权利的特殊权力，或者使某些已经获得特权的人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特权。那些在出身问题上的特权利益集团，必然会巩固“出身等级制”。

再往下分析，我们看到，“出身等级制”还被特权利益集团中对文化和知识的恐惧巩固下来。

当知识更多地掌握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旧知识分子手中时，或者当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在学习上表现出某种优势时，那么，在出身上有优势而在文化知识上处劣势的特权利益倾向就尤其会强化“出身等级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出身红五类但学习不太好的学生，对那些出身不好而学习比较好的学生表现出强烈的蔑视和欺压。知识上的劣势，强化了特权上的优越感。这种心理平衡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十分充分。

再往下，出身等级制还被 1957 年形成的阶级斗争“传统”巩固下来。阶级斗争不仅作为一个具体的情势在巩固和强化“出身等级制”，而且还变成一种当代的传统观念在固定“出身等级制”。

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世袭制度的文化传统，在固定中国当代生活中的出身等级制。传统文化的力量是潜在的，又是巨大的。

三，“出身等级制”是如何逐渐破解的呢？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的需要，对出身等级制度给予了最初的冲击。当“血统论”成为阻挡文革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大障碍时，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派势力便首先展开了对“血统论”的批判。

在对“血统论”的批判中，出身等级制坚固的堤坝开始动摇。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很多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以及广大群众获得了加入造反派组织的平等政治权利。在随后一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及群众无疑在继续运用自己获得的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得之不易，他们往往倍加珍惜。因为这个权利有可能得而复失，所以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得更勇敢。

当然，随著文化大革命发展，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已经不再需要造反派，如同他们在运动初期很快就不需要“血统论”基础上诞生的红卫兵一样。

但是，历史也很快抛弃了这些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林彪垮台了。毛泽东逝世了。江青被捕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国当代逐步形成、又被固定了相当一些年的出身等级制也迅速地解体了。

因为阶级斗争理论的被否定，使得出身等级制的政治大前提消失了。因为现代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知识的优越性，任何出身等级制的歧视已经不能抹杀知识的地位了。因为改革开放政策，有海外关系的人纷纷从出身等级制的底层浮上来。因为与国际现代文明的接轨，各种社会的、

文化的沟通使得家庭出身等级制丧失了意识形态条件。因为经济改革造成了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新的机会，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国家色彩的出身等级制，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当时间在改革中又走过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直到今天，这个社会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早已发生了各种变化，出身等级制在新的社会潮流中不仅显得面目全非，甚至有些滑稽了，所以它消亡了。

然而，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页历史，我们却要说：那曾经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逃脱的重大社会事实。它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留下的污垢或伤痕至今还深藏在记忆之中。那个时代愚昧的耀武扬威和愚昧的怯懦恭顺更是今天的中国人需要对自己进行的灵魂的洗刷。

第九章 1967 年中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967 年月－1967 你 12 月）

在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多少文人渴望获得君主的赏识而飞黄腾达、耀祖荣宗。这个潜藏在中国一代又一代文人心理中的动力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极端的领袖崇拜一起被焕发了出来，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英勇无畏的造反行动之后，等待的是毛泽东的赏识。

一、“一月风暴”掀开了全面夺权的序幕

1966 年向 1967 年的转化，是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中完成的。从 1966 年 10 月开始，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文革所领导的文革势力，向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各级领导权发起了更为广泛的攻击。

在此过程中，对抵抗这种攻击的各种对立政治势力，都予以坚决摧毁。镇压了炮打中央文革的“联动”。镇压了林业学院学生李洪山为代表的反中央文革的学生潮流。镇压了从北京到上海、到全国各种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潮流。镇压了把矛头指向林彪的各种活动，其中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伊林和涤西致林彪的《公开信》，曾被当做典型的反革命案件予以镇压。还镇压了类似“全红总”这种另类性质的“非法组织”

在极为激烈的斗争中，历史在 1967 年翻开了新的一页。

形势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预计。原来的预计是，学生停课半年闹革命，到 1967 年春节前后，可将文化大革命结束。然而，文化大革命所揭开的矛盾斗争如此深刻、全面和强有力，使得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与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 1966 年的 8、9、10、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做过各种关于工厂、农村、军队及军事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限制红卫兵对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及军队的冲击。然而，由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本身的需要，由于把大串连的权利交给了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几经起伏，终于完全波及了中国的工厂与农村。

虽然“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然而，运动的深入自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力图维持自己权力的党的各级组织需要运用工人、农民和军队的“保守”力量，而文革派势力也必然要运用工人、农民和

军队的造反力量。当1966年接近岁末时，毛泽东感到，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摊牌了。

1967‘《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社论还对全面展开阶级斗争规定了四项具体任务：一，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二，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这篇经毛泽东审阅、改定的社论，传达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他曾经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道：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二，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主要责任落在造反派身上，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半以上；三，上海很有希望，学生、工人、机关干部都起来了，这是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四，红卫兵一定要艰苦朴素，要向解放军学习。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推动下，在毛泽东"展开全面阶级斗争"的战略部署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直接策划下，上海出现了"一月风暴"。

此时，又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後来在中共十大上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

1966年11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的串连发动下，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夥同上海其他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目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联合全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向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发起了大规模的冲击。

在共产党传统力量的影响下，或者说在上海市委的影响下，12月6日，上海市工人队伍中，以老工人、党团员、劳模、生产积极分子为骨干，正式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作为与"工总司"相对抗的组织，自然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支持，队伍很快扩至八十万，成为这个工业城市中的多数派组织。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内以徐景贤为首的一些干部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於12月18日开始造上海市委的反，成立了被张春桥、姚文元视为嫡系部队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随後，"机联站"与王洪文的"工总司"联合，对上海市委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冲击。

在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被迫做了"'赤卫队'大方向错误"的表态之後，12月28日，"赤卫队"一万多人聚集到位於康平路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12月29日，曹荻秋来到康平路同"赤卫队"谈判。这被张春桥、王洪文看做是一个斗争的关键时刻。

在张春桥的紧急指使下，"工总司"和"机联站"等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随後，"工总司"迅速调集了十几万造反派工人，将康平路一带的街道完全包围起来。到下半夜，也就是30日凌晨两点，"工总司"的造反派队伍对占领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的"赤卫队"发起了攻击，揭开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经过四个小时的猛烈攻势，到清晨六点多钟时，一万多名“赤卫队”工人全部投降。当他们像战争中的俘虏一样在胜利者的押送下分队走出来集中时，已有上百人负伤。他们没有武器可缴，只有“赤卫队”的袖章作为投降的被缴物堆了几大堆。12 月 31 日，“工总司”发布《特急通令》，各厂矿的造反派都将本单位的“赤卫队”头目抓了起来。上海市的形势急转直下。用张春桥后来的话讲，“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紧接着，1967 年 1 月 4 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对《文汇报》实行夺权，并发表了《告读者书》。1 月 5 日，上海《解放日报》同样被报社内造反派夺权。同一天，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署名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发表。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将“赤卫队”定性为破坏生产交通的罪魁祸首，而“工总司”则在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中站立起来。这是在张春桥、姚文元亲自策划下出台的一个政治上完美的工人阶级革命造反的纲领。如果说“全红总”，那样的工人造反行动，因为其赤裸裸的“经济主义”必然被文革派镇压下去，那么，上海“工总司”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造反纲领，就完全符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了。

1 月 6 日，“工总司”、“机联站”为首的上海几十个造反派组织于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十多万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个张春桥、姚文元一手领导的大会共通过了三个《通令》，做出了一系列夺取上海市委权力的部署与规定。

1 月 8 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上海的夺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文汇报》现在由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大方向是好的。文汇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写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在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指示下，1967 年 1 月 9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中指出：“上海《文汇报》1 月 5 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抓住的又一个重大典型。如果说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回信，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是毛泽东在

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采取的四个重大步骤，那么，这就是第五个特别重大的步骤。这个步骤在全国引起的反响，将比起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聂元梓的大字报和给红卫兵的回信，显得更具爆炸性，这是一枚当量级更大得多的政治氢弹。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了贺电，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1月16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同时刊登了《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1月19日的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和1月22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则把上海市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典型、新战略部署推向全国。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中宣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它还指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它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从这天起，夺权的风暴便在全国展开了。

文化大革命以强烈的方式引爆了社会上各种积压的能量。在全面的阶级斗争中，1967年真正成为“天下大乱”的一年。

二、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阶级分析

毛泽东讲，上海“一月风暴”的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一月风暴”是一个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个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的工人夺权似乎最能证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因为实施上海一月夺权的虽然是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的联合行动，从人数上讲，产业工人占了绝大多数，像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工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工人的夺权，给了毛泽东继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很好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感觉，给了毛泽东在理论上更坚定、圆满的论证，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欺骗性。本着对历史的诚实与负责，我们将坦然面对这样的理论问题。

毛泽东大概确实是把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大革命。这里，有必要把他在这方面的有关论述集结在一起，看看他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1967年1月26日，上海工人造反派夺权后不久，毛泽东讲：“接管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取了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个讲话为上海夺权做

了充分的阶级理论解释，也为所有大城市的共产党政权的构成做了概括。

共产党解放了城市，占领了城市，派出自己的干部，和原来的留用人员结成政府，这是 1949 年前后发生的事情。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真正掌握城市权力的，恰恰是共产党派去的干部，而不是原来政府的留用人员。在解放后的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早已实现了共产党对城市政权以及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化。因此，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发动工人或者全体群众夺取政权，其实是共产党夺共产党的权，是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像林彪、张春桥、江青）在夺刘少奇、陈丕显、曹荻秋这部分人的权。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带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路。这也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原因。例如，他在 1965 年 1 月 29 日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曾经这样讲道：“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傅，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二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上海夺权之后不久，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卡博时曾经讲到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群众都发动起来，什么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他还讲道：“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体现出了他“不断革命”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政治上顽强不息的努力。他还不止一次讲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宣言”。

从这些看来十分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中，我们却要发现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实质。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认清中国的近代史、当代史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上海工人阶级造反夺权的情况。我们将如实剖析以“工总司”为代表的产业工人造反派的性质和特征。

“工总司”反对的是上海市委以及上海市各级党政领导权力，而与他们面对面抗争的“赤卫队”，是以党团员、老工人、劳模、积极分子为骨干力量的。在这里，显然可以把“赤卫队”看成某种“既得利益”的集合。

如果分析上海“工总司”造反派的成员状况，那么，同“赤卫队”相比，他们有如下特征：

第一，非党团员、非积极分子、非劳模的成员占有更大的比例。也就是说，在造反派队伍中，政治地位高的工人少。

第二，老工人、级别高的工人、技术高的工人要比保守派的“赤卫队”少。他们的技术水平、

收入水平或者说经济地位比保守派“赤卫队”更低，显得更为“无产”。

第三，出身不好的人比保守派“赤卫队”比例更高。这是在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之后，上海工人造反派队伍中的普遍情况。

第四，与厂矿或企业领导有过这样或那样矛盾的工人的比例，要远比“赤卫队”高得多。这种矛盾一般和他们是非党团员、非积极分子、非劳模、非老工人、非高技术工人、非出身好相关，当然还有其他各种矛盾，其中包括工人阶级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第五，在造反派队伍中，生产劳动纪律差、生产劳动态度差、偷奸要滑者普遍要比保守派“赤卫队”中比例高得多。也就是说，具有各种流氓无产者倾向的工人大多参加造反派而不参加保守派。

第六，在历次运动中受过这样或那样处罚的人，在造反派队伍中要远比在保守派队伍中比例更高。处罚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能是受歧视、受迫害甚至是政治迫害性质的，也可能是违法乱纪及流氓作风等问题。

第七，造反派队伍与保守派队伍都有老年人与青年人，但就平均年龄而言，造反派队伍一般低于保守派队伍。

这里对上海的造反派工人队伍与保守派工人队伍所做的对比分析，只是一个大致的分析，它强调的是比例上的差异。在造反派队伍中，也有很多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劳模，也有很多老工人，也有几代产业工人出身的红五类，也有从未受过任何处罚的十分清白的人，然而，这并不能转移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辨别。

在全国所有的工矿企业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阵线分野，大概都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在有些地方、有些厂矿，这种差异甚至十分明显。相当一些厂矿的保守派，其核心力量都是党团员、劳模、积极分子，而政治地位低下的、受过处罚的、出身不好的、与领导有过仇隙的、流氓无产者倾向严重的，无不在造反派队伍之中。

那么，毛泽东所讲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上海“一月风暴”，究竟是什么性质？

如果上海夺权确实是工人阶级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权，那么毛泽东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指的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在这里，造反派工人队伍中的种种特征都可以归为一点：因为他们处在和官僚资产阶级尖锐的对立之中，所以他们起来造反；而“赤卫队”以保守的面貌出现，只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收买的力量，“赤卫队”具有典型的既得利益性质。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的逻辑。决定一场“革命”的阶级性质的，是谁在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究竟是谁？

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资产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作战时，也有工人阶级参加，但那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不是工人阶级性质的。同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一月风暴”是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个官僚阶层领导的，它的本质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个党内政治集团打倒了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是毛泽东、林彪、江青这个党内势力打倒了刘

少奇所代表的势力。

工人阶级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只是张春桥、姚文元借用的力量。就像文化大革命曾经借用过学生运动的力量一样。但学生运动并不决定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他们后来该被关在学校里训练，就被关在学校里训练，该被赶到农村去，就被赶到农村去。

在“一月风暴”中，权力真正落到了张春桥这批人手里。王洪文只是依傍着这个政治势力取得了自己的位置。造反派曾说陈丕显、曹荻秋是“官僚资产阶级”，其实，随后掌握上海权力的张春桥为代表的领导集团，才是真正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而且有着十足的法西斯性质。

革命的性质不仅看它的领导阶级是哪一个，还要看它在生产关系及所有制领域内提出和实现的变革。

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并没有改变所有制形式，只是张春桥这样的政治集团取代了原来的上海市委。过去的国家所有制，表现为陈丕显、曹荻秋的领导；现在的国家所有制，表现为张春桥、姚文元的控制。这种领导集团的变化，并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阶级利益或地位的上升。除了少数像王洪文这样的人物混入领导层之外，就整个工人阶级而言，他们反而比原来少了经济实惠，少了政治自由。当全面专政的政治落在他们头顶时，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更下降了。

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夺取旧市委权力的过程中，曾引起极大的社会动荡及工人阶级中近百万“赤卫队”的反对，而在“四人帮”经营了近十年之后被粉碎时，上海的工人阶级却显得十分平静，甚至欢欣。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

撇开理论上被浪漫主义所欺骗的毛泽东，看清林彪、江青、张春桥、康生这个真正的政治官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操作，我们尤其不该蒙蔽了自己的视线。

一个社会运动、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性质的——要看这个运动的领导阶级是谁？从根本上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它在经济上、政治上提出了哪个阶级的根本要求？整个斗争过程所做的经济的、政治的任何变革，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

三、全面内战的天下大乱

上海的夺权，使毛泽东看到了 1967 年在中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所谓全面阶级斗争，主要内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包括夺各级省市委的权。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能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对党政权力机构实行一次大更新。

在毛泽东眼里，这是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对上海“一月风暴”予以了全力支持和一系列十分具体的指导。这是比发布聂元梓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更深入、更重要也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部署。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上上下下展开了夺权斗争。在此之前，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大多还只在批判省市委及各单位的党政机构，夺权一下子把这个斗争推进了，它对群众组织的刺激力是可想而知的。对权力的夺取和占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任何人都十分

清楚的。

在全国一片夺权风暴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夺取省市委这一级的权力。这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最主要结合部。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能够直接控制、策划的层次。有了对这个层次的控制，也便有了对全国的控制，因为各地、县的夺权完全可以纳入夺权之后的省市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在中央文革派势力的直接策划下，1967 年 1 月，接连几个省份实行了夺权。1 月 14 日，山西省实行了夺权。1 月 25 日，贵州省实行了夺权。1 月 31 日，黑龙江省实行了夺权。2 月 3 日，山东省又实行了夺权。这四个省份的夺权，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正式批准，也都得到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的舆论工具的大规模支持和高度评价。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文章，对全国的夺权斗争发出路线性、政策性的指导。

这些指导体现了毛泽东对夺权斗争的亲自把握。他强调，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他强调，要实现“三结合”所谓“三结合”，就是革命群众与革命干部、与支左的解放军代表实行“三结合”，组成新生的政权革命委员会。

这是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完整政治纲领。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有了来自群众的革命造反势力的大多数；而有了“三结合”，就会将真正属于文革势力的干部或者能够接受文革路线领导的干部结合到新生的政权里，从而加强了新生政权的组织领导能力。再加上有军队支左代表的参加，就使得毛泽东、林彪直接掌握军队这个优势体现了出来。

在这一时期，扩大军队对全国政治的控制权，无疑是毛泽东决心彻底摧毁各级旧的党政组织的重大战略部署。面对已经乱起来的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这是“乱了敌人”。把被他的革命理论和崇高权威号召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势力与他所掌握和信赖的军队力量结合起来，再结合一些站到文革路线上来的干部，夺权就是完全成熟的大革命。

毛泽东此时正处在高度的政治亢奋中。这是一场轰轰烈烈、千变万化的大革命，又是一场有胜利把握的大革命；这是一场有胜利把握的大革命，但又不是轻易就能够完成的大革命。正好给了毛泽东的革命胸怀和战略指挥艺术以充分展现的机会。

他从来渴望运动世界，喜欢轰轰烈烈，改天换地。1958 年及 1959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那种全国动员起来“喝令三山五岳”的人山人海的热闹，曾使他感到由衷的欢欣。而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一片解决吃饭问题的务实操作，让他不屑顾之。他不习惯于一个按部就班运转的国家机器，也不习惯一个每日周而复始、毫无戏剧色彩地从事建设的社会，他不喜欢一切守成的事物。他喜欢波澜壮阔的社会大革命。

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1967 年的毛泽东已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控制不住局面了，这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毛泽东。毛泽东此时正在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对于自己浪漫主义革命情怀可能在全党和全国造成多少残酷与惨烈的事实，他并无太多的恻隐之心。一个以千年历史为自己行为参照物的大革命家，不需要妇人之仁。

在中国 1967 年的全面阶级斗争中，我们更充分地看到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纲领，也更看清了

他独特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整个人格的体现。正像抗日战争、推翻蒋介石的大革命也是他人格的体现一样。历史肯定了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所做的事情，否定了他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所做的事情，不过说明，他的后一个人格体现超越了历史赋予他的权力。

为了保证全国范围内的大夺权，保证全面开展阶级斗争，除了在意识形态方面大规模的舆论指导之外，除了毛泽东已有的绝对权威之外，无疑还需要种种具体措施。全面发动，必然要有相应的规范。所谓通过“天下大乱”以求“天下大治”，对“乱也必须要有种种规范和限制。潜伏在地层下面的岩浆一旦被解放、奔腾出来，既要给它泛滥的广度，同时又要通过一定的限制规定其大致的流向。这才能摧毁需要摧毁的东西，开拓需要开拓的局面。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出台了许多充分使用权力的措施。这些措施不过是一系列限制、制约、规定和法令。

1967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规定对某些广播电台实施军管，这是其后更大规模军管的开端。

196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这是保证大夺权的又一个强制性措施。《公安六条》对一切现行的反革命破坏分子，对一切带有刑事犯罪的破坏分子，对一切企图混入革命群众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制定了严惩不贷的规定，这是共产党的“传统”也会做出的规定。而《公安六条》中增加了一条更有现在时意义的内容；一切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行为，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是在 1966 年底社会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中酝酿、诞生的文本。全国范围内，因为反对林彪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群众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仅仅逮捕、判刑的，据初步统计，就在十万人以上。

1967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前一个文件保证军队的稳定性，后一个文件则给了军队支左的方向与权力。

在后一个《决定》中，传达了毛泽东亲自发布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决定》的传达，标志着解放军全面支左的开始。

在此之前，1966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发出过《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给予了军队执行军训的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军队介入和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权力。

1967 年 3 月 19 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全面担负起“三支二军”的任务。

有了公安上的保证，有了解放军的“三支二军”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介入，全国大夺权的全面阶级斗争在“天下大乱”中似乎有了足够的限制和必要的保证。

然而，狂热的岩浆一旦从地表喷射出来，就肆虐奔突，为此，在 1967 年的 1、2、3 月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过一系列《通知》和《决定》。

2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学生停止串连。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返回原单位。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强调“抓革命，促生产”。

1967 年 3 月 7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稳定春耕大忙期间的农村形势。

1967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再一次强调“抓革命，促生产”。

1967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对学生大串连予以完全的禁止，席卷全国的大串连从此寿终正寝。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在接见有关造反派组织时规定，中央国务院一级的大权，中央各部委的大权，无论是公安、外交、国防，还是财政、外贸、计划，都不允许夺权。这些规定大多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宣布的。

大量的《通知》、《决定》，大量的限制、规定，与放手发动大夺权的全面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似乎是一个完整的大革命系统了。然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仍然对整个形势中爆发出来的超限制力量、超规范力量估计不足。

无论做出了多么充分而强大的指导和制约，试图把“天下大乱”的革命潮流按规定的方向引向正确目标，全面动乱导致的“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1967 年爆发出的全面动乱是史无前例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名符其实的“全面内战”。

在上层，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二月逆流”。作为“二月逆流”的典型事件，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

1967 年 2 月 11 日和 16 日，周恩来两次在怀仁堂主持政治局碰头会。在这两次碰头会中，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发生尖锐冲突。特别是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人态度极为激烈，他们把矛头直指江青，直指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以及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这些人大多是军队高级干部，在组织上与刘少奇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在感情上也绝不反对毛泽东。他们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一系列党的会议上，大概也给了毛泽东所需要的举手支持。在运动初期也极力理解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意义。然而，文化大革命深入

到这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到党内、军内如此大量的老干部，冲击到如此大量的革命干部子弟时，他们难以接受了。特别是这些冲击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极为残酷无情，他们尤其难以忍受。

正像谭震林在碰头会上高声怒斥的：“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高干子弟通通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就向毛泽东做了紧急汇报。毛泽东当然明白事态的严重性。面对这些主要来自军队高级干部的反文化大革命倾向，他立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他一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手发动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反对，就是对他领袖地位的动摇。

毛泽东于 2 月 18 日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陈毅等人，他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全场在毛泽东的雷霆大怒下鸦雀无声。毛泽东最后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开中央全会，中央全会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他起身退出会场。

毛泽东的这个反应是足够有力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允许任何人用“清君侧”的方法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知道，面对军内高级干部的集体压力，他必须坚定地动用自己的权威，动用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合法性，包括动用军内高级干部对自己的敬畏之心，还要动用自己在几十年党内斗争中一贯正确的资本。他甚至动用了一旦被推翻就“上山打游击”的说法，以示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义无反顾的决心。

毛泽东原本就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力量，当他无比坚定地使用了这个力量之后，来自军内高级将领的反文化大革命倾向被抑制住了。当军内高级将领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而抨击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存在，才能表现得如此正义凛然。及至毛泽东站出来，挡在中央文革前面时，面对领袖的震怒，他们只能低下头重新思想了。“二月逆流”的参加者们不久便遭到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批斗，到这一步，大概也只能将怨气藏于胸中了。

毛泽东此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毫无动摇，他已没有任何后退的余地。当他对“大闹怀仁堂”的高级将领们的严厉批评被江青等人传播出去之后，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击退二月逆流”的大标语。

“二月逆流”被粉碎之后，在文革派势力面前出现的真正难题，是全国局面的失控。

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出现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尖锐冲突，工、农、兵、学、商大规模卷入，在人山人海的激烈对抗中，从挥舞拳头到长矛棍棒，到子弹枪炮，斗争的武器及规模都急剧升级，真正形成了全国性的内战。当毛泽东将支左的权力给予了军队后，在一个时期内不但没有保证全面阶级斗争有序地展开，反而加剧了动乱。

率先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自然是各省、市、地、县的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这些军队机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 1966 年，已然成为某些最激进的造反派的冲击对象。各级地方党委瘫痪之后，各军区、军分区便在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下成了保存各级党委档案材料的权力部门，也常常成为被造反派揪斗而失去安全保障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庇护所。那些最坚决的造反派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这些军事机构。当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支左的权力给了军队之后，各军区、军分区便迅速以合法的形式介入和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运动初期以裸露的形式保省、市、地委的保守派组织已经瓦解。在新的群众组织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经过一系列的分化、改组和集结，各地区基本形成从上到下贯穿省、市、地、县的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势力。解放军支左，首先面临着“谁是左派”的判定。

军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支持了更亲近他们的一派，或者说更拥军的一派。这一派中常常有更多的党团员、劳模、先进分子、复员军人。他们虽然也叫造反派，但就其组成的渊源上，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保守派有着更多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各省军区、军分区常常隐蔽地延续了原省委、市委的政治倾向，那么，他们现在支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就很隐蔽地延续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保守派的政治倾向。

当然，情况也并非绝对。有些军队支持的派别确实是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开始造反的组织。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与军队更为亲近，理所当然地成了支左的对象。

支持了一派，另一派难免成为反军派。这些反军派，有可能因为运动初期冲击过军队，酿下了对立根源；也可能因为其组织成员更缺少党团员、劳模、先进分子，出身非“红五类”的成员相对多一些，不被军队所信任；也可能因为他们势力太大，已经成为独立控制该地区局势的权力系统，军队建立自己新的权力中心，反而需要支持比较弱小的一派。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一步时，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有了更新的认识。经过 1966 年的演练，又经过 1967 年“一月风暴”的发展，那些人数庞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以及他们的联合体已经有了很大的权力。在旧的省、市、地、县等领导班子瘫痪的情况下，他们已成长为决定社会命运的权力结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成为重大的社会格局。

当军队的权力介入之后，与群众组织中原有的两大权力系统的对抗结合在一起，更扩大了冲突的规模，社会上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权力系统，斗争自然十分尖锐，他们要争夺的是明天省、市、地、县的合法政权。特别是在 1967 年 7、8 月份，全国局势失控。两大派的武斗席卷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也不例外。在四川等省，武斗中使用了最先进的军工产品，坦克、装甲车纷纷投入战斗，很多地方城乡一片战火。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早已看清楚，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军队支持的群众组织具有保守派的倾向，而反对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才是真正一反到底的文化大革命派。于是，1967 年上半年，中央文革便表现出越来越明确的支一派、打一派的立场，而这些立场大多是与省军区

相对立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斗争对全国大规模内战的性质又做出了本质的揭示，它依然是新形势下“革”与“保”的斗争。

局势失控的标志之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了一系列《通知》及《通告》，均收效甚微。无论怎样强调革命派大联合，强调“三结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强调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秩序，强调不夺枪、不开枪，都未能控制住局势。《人民日报》发表的《打倒无政府主义》之类的社论，也对局势的影响不大。

这期间发生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便是一个典型。

武汉同全国一样，也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大派组织，就是人数有百万之多的“百万雄师”，他们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7 月 14 日，谢富治、王力为代表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时，明确否定了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指出他们支持“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组织，压制了与之相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谢富治等人的表态引起了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与“百万雄师”群众的极大不满。自 7 月 20 日开始，连续几天内，“百万雄师”调集近千辆卡车，出动几十万群众游行示威，高喊“打倒王力”“揪出谢富治”的口号。在几十万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棍棒的“百万雄师”的游行队伍中，还有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近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队伍。“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毛主席受了蒙蔽”的大标语覆盖了武汉市。

“百万雄师”原本是一个对旧省委比较温和的群众组织，它反对全面否定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因此，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性质就十分明显了，是 1966 年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1967 年全国各地的大规模内战，在本质上都有这个性质。

毛泽东曾于“七·二〇”前夕在武汉接见过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当情势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毛泽东当机立断，就像曾对“二月逆流”做出的强有力反应一样，对武汉“七·二〇”事件，也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

7 月 22 日下午，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文革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声势浩大的报道。7 月 25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三军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各界革命群众代表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以此制造了一个压向武汉的雷霆万钧之势。

7 月 26 日，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指出：“七·二〇”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

的一封信》，指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中还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轨道，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同一天，中央军委改组了武汉军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锺汉华被撤消了职务。"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布满北京街道。

"百万雄师"被残酷镇压了。在随後的政治迫害中，数十万计的群众被打死、打伤。

武汉"七·二〇"事件是全国全面内战的缩影。

正是在"七·二〇"事件前後，毛泽东看清了这场内战的严重性质，他甚至做出了解放军可以武装左派的指示，其真正的含义是，在全国很多省份调动忠於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野战军，支持与省军区相对立的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同期，江青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全面内战经过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及相应的部署，开始朝著对毛泽东有利的方向转变。

毛泽东在"大乱"中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未来"大治"的希望。他深深知道，无论是击退"二月逆流"，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击退陈再道、"百万雄师"这样的大规模逆流，都要依靠实力。对於"七·二〇"事件，必须以坚决的手段予以解决。对全国发生的类似事件，也必须以坚决的手段解决。经过一番调兵遣将的力量部署，毛泽东逐渐实现了对形势的控制。他在这个期间的讲话，表明了他对全面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在一段时期内，三令五申的《通知》、《布告》不起作用，是因为内战打成那个样子，没有人听你的话。当武汉事件无法用一个自上而下的指示予以扭转时，不过表明对立派的势力已经到了自认为可以蔑视文化大革命的程度。毛泽东认为，对於那些利令智昏的倾向，首先要把它打垮，然後才谈得上教育。先要晓之以利害，接下来才可晓之以道理。

当然，武汉"七·二〇"事件解决之後，当"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出现时，毛泽东也没忘记打掉"政治冲锋队"的王力和关锋，以稳定军队，平衡局势。

（7 月 25 日，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华社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造反派》中，首次公开提出"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8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8 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周恩来派来汇报工作的杨成武，在王力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的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稿上批示："大、大、大毒草"。并指示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将王力、关锋抓起来，分割戚本禹，观其有无转变。）

7、8、9 三个月全国内战硝烟未息，毛泽东开始视察大江南北。他以足够从容的心态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在视察中从容讲到“大联合”；讲到“三结合”；讲到“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讲到“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讲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讲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讲到“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讲到“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当这一系列最高指示传布全国时，最核心的内容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对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大局，显然更加成竹在胸了。

四、对刘少奇极端批斗的动力分析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 1967 年时，刘少奇在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刘少奇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在党的上层似乎已成定论。无论在整个社会上，还是在党的领导上层，并没有哪个人敢为刘少奇喊冤叫屈。即使在“二月逆流”中曾对文化大革命打击一大片的极“左”路线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党政军高级干部，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在刘少奇问题上与毛泽东分庭抗礼。1967 年大夺权引起的全国内战中，也没有哪一派群众以“为刘少奇翻案”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

这似乎是一个已在政治上解决了的问题。新的“革”与“保”的矛盾完全不涉及刘少奇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1967 年开始了对刘少奇更大规模的批判与斗争。

1966 年 12 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的。

1967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也把矛头不点名地指向了刘少奇：“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这已经露出了对刘少奇展开大规模批判的信号。

3 月下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了。这个会议一方面是对反击“二月逆流”的一次总结，另一方面则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新一轮批判。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特别针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出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毛泽东完全明白这样讲话的意义。正像他通过评《海瑞罢官》、通过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他要使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形成对刘少奇大规模批判的新的突破口。

很快，在报刊和社会上，以“《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题的大批判开始了。

紧接着，3 月 31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刊登这篇文章的《红旗》杂志第二天就覆盖全国。《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都原文做了转载。在这篇文章中，借着毛泽东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谈话，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少奇。毛泽东讲："《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整个文章将刘少奇说成是《清宫秘史》的保护伞，并以"八个为什么"指向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对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密度展开了。

1967 年 4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同一天，《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1967 年 4 月 11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1967 年 5 月 8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三天以后，5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1967 年 5 月 8 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7 年 8 月 5 日，为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同一天，为纪念毛泽东大字报一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讨刘邓陶"的百万人誓师大会。在中南海内，中南海的造反派则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了残酷的批斗。

1967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杂志 1967 年第十三期发表文章：《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1967 年 9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把对刘少奇的批判推向更高的高度。

在此期间，造反派对刘少奇批判的大字报、大标语遍布京城的街道和学校。中南海的造反派更是接二连三地残酷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甚至让他们站在缺腿的桌子上、顶着烈日接受批判。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 1968 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最后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并通过决议，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9 年 10 月，刘少奇被赶出北京，于 11 月 12 日凌晨惨死于开封。当他与世长辞时，身边无一个亲人，头上的白发有一尺多长，鼻子、嘴及整个面孔都严重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这场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时，除了通常的感性意义的义愤，更要分析一下，是哪些原因造成对刘少奇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的极端斗争？这是我们剖析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极端行为的一个重要事例。

一，之所以在刘少奇已经完全失去实权的情况下，还要对他进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是因为要打倒更多的人。

《人民日报》1967 年 4 月 8 日的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中写到："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

因此，必须把刘少奇彻底批倒、打倒，并由此打倒他扶植的一批人，解决他的全部基干力量，这才能给毛泽东及文革派势力以更大的安全感。否则，天长日久，形势发生变化，难免存在着刘少奇一呼、群起而百应的政治危机。半年多来文化大革命在干部体系中遇到的阻力，已经使毛泽东及文革派势力产生了深刻印象。

二，在毛泽东眼里，真正打倒刘少奇，而且在十足的理由上打倒刘少奇，其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文化大革命立论、正名。只有把刘少奇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打倒，才可能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合理性提供最重要的论据。

从暂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来讲，刘少奇对毛泽东似乎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对于没有威胁的敌人，毛泽东倒是可以宽容的。然而，真正的威胁在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是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面对着现实与历史的巨大潜在压力。

因此，当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钊致信毛泽东，"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时，毛于 1967 年 3 月 10 日特回信："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 3 月 10 日"。随后，毛泽东便派人把当时中央文革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使得章士钊叹惋而难以再言。

这件事情说明，毛泽东多么需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理由，从而使文化大革命获得充分的理由。

三，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这批文革中的左派人物，无疑更需要上述两个"意义"。只有打倒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中更多的人，他们才能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势力，才能建立"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安全感。只有把刘少奇结结实实地打翻在地，他们在今后的政治舞台上才能真正站住脚。

如果刘少奇只是犯了一般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继续留在党内，即使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再掌握实权，也会从根本上破坏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资本与立足之地。仅仅是"方向性、

路线性错误”的结论，是无法为文革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极端行为提供合理性的。因此，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工作由江青亲自来抓。当查出刘少奇是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罪魁祸首时，江青之欣喜若狂到了极点。

刘少奇的彻底沉没，才可能成为江青的真正崛起。刘少奇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永远开除出党，江青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旗手。根本的利益决定了根本的动力。极端的利益决定了极端的行为。

四，在 1967 年展开对刘少奇的大规模批判，还特别有助于震慑全党、全军、全民。

在全面内战的大动乱中，已经有数不清的群众、干部和军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惑。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群众及解放军指战员，会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产生疑问。像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镇压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过他们的武汉军区指战员，他们直接的利益和情绪非常容易导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怀疑。倘若刘少奇只有一般化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就很可能产生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结论。

因此，大规模地批判刘少奇，将其结结实实地彻底打倒，理由充分地打倒，对全党、全军、全民都是有力的震慑。这种震慑有助于保证 1967 年中国全面阶级斗争中的全面夺权行动。这也是毛泽东所讲的“用大批判促大联合，促‘三结合’”的真正含义。

五，“二月逆流”刚刚被镇压下去，党、政、军内像谭震林、陈毅这样一批高级干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倾向，还有着巨大的潜能。对刘少奇的任何从轻发落，都可能导致反文化大革命潜能的松动，给这种力量可乘之机。只有对刘少奇大规模地批判，彻底地打倒，才能对已经被粉碎的“二月逆流”和将来可能出现的“二月逆流”实行强有力的震慑。

铁案如山地打倒刘少奇，是弹压任何“逆流”出现的有力法宝。

六，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造反派的极端表演。正是他们极端的表演，成为推动批斗刘少奇的一股巨大力量。

1967 年 7 月 13 日，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成立了“揪刘前线指挥部”，将“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了京城街道，并先后两次向刘少奇发出了勒令信。他们的行动立刻形成了揪斗刘少奇的中心点，于是乎，北京各高等院校、机关、厂矿的造反派潮水般涌向中南海，声援“八一战斗团”。1967 年 7 月 17 日，“八一战斗团”又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第三次勒令刘少奇于 7 月 22 日零点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八一战斗团”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到中南海西门建立“揪刘基地”的造反派队伍越来越多。1967 年 7 月 18 日零点，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造反派在“中南海揪刘指挥部”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的誓词是：“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当天晚上，一百多个造反派战斗队的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揪斗刘少

奇誓师大会”。这一行动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几天之内演变成一个全市、全国加入揪刘战斗的运动。中南海西门外人山人海，席棚帐篷连成一片。揪刘造反派日日夜夜驻守在这里，救护绝食学生的解放军医疗队则在造反派人群中往返巡回。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高音喇叭此起彼伏地高呼着“誓死揪出刘少奇”的口号，对中南海几个大门发起了轮番冲击。

表面看来，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显示了人民群众对刘少奇的深仇大恨，显示了人民群众保卫毛主席的坚定决心，为党的上层进一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提供了舆论支持，也为中央文革打击“二月逆流”这样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足够的群众运动压力。

而实际上，造反派的这些极端行动并不包含对刘少奇的真正仇恨。如果说运动初期受到工作组压迫时，造反派的抗争还带有很大的真实情绪的冲动，那么，现在的这一切表演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既是出于造反派队伍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更是出于造反派队伍中那些领袖人物的政治利益需要。

极端性的疯狂行为，除了极端的利益之外，还有种种极端的心理原因。无论是所谓对刘少奇的极端仇恨，还是对毛泽东的极端崇拜，都把某些心理上的“迫害狂”倾向、“施虐狂”倾向发挥到极致。其中带有“青春狂热”性质的恶作剧心理，也得到了极端的表现。

毛泽东的利益与毛泽东的心理，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心理，造反派学生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心理，都造成了他们各自的带有极端性质的行为。这三方面的极端性又相互推动；造反派的极端性会给中央文革以鼓励；而中央文革的极端性又会给造反派学生以推动；两者的极端性又给了毛泽东以推动；毛泽东的行动反过来又使造反派学生和中央文革势力更加无所顾忌地走向极端。

当没有别的力量平衡这个极端行为时，这个极端的行为便势如破竹，造成了极端的结果。

五、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

在 1967 年反击“二月逆流”的过程中，北京市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1967 年 3 月 24 日，北京石油学院、石油部、国家计委、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苏东海等人在校园张贴了大字报：《给周总理贴大字报》，开始试探着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他们的行动立刻遭到了广大师生的反对，“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一类的大标语、大字报布满了师范大学校园。1967 年 3 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派学生批判了参与炮打周总理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于 3 月 31 日发表声明，依然重申炮打周恩来的观点。

1967 年 5 月，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的新组织。5 月 16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有人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题目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保护李先念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

5 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等人，正式组建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随后贴出了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开始越来越升级地炮打周

恩来。在张建旗等人的策划下，几个高等院校炮打周恩来的人员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这个于 6 月份成立的人数不多、规模有限的跨校组织，开始了炮轰周恩来的行动。由于人寡力薄，他们大都在深夜活动，在市内街道秘密张贴炮打周恩来的大标语、大字报。《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这样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代表了他们的斗争口号。这一口号在路线上将周恩来诸多保护干部的行为归结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在策略上对周恩来仍称之为周总理，以求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在舆论中占领进攻的滩头阵地，再逐步升级发展。

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下，“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在 6 月－7 月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继续进行着。“打倒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大标语、大字报，在北京一些单位不时可见。

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是反击“二月逆流”的产物。任何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都像一个潮流一样，必然有其潮头，而这个潮头的最尖端部分，往往会突破预想的界限表现出极端性质。毛泽东发动了反“二月逆流”的运动，红卫兵中必然会出现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因为在那个政治格局中，惟有周恩来担当了保护老干部的角色。

如果再从造反派本身的思维、行为逻辑总结，可以说，学生中一些人突破既成的政治格局，顶着环境的压力，以胆大包天的勇气又发起一个炮打周恩来的斗争，不过是一种争当造反英雄的冒险。聂元梓的成功，蒯大富的成功，王洪文的登峰造极，是毛泽东树立的全国性样板，这些人物的成功给了广大青年人以无比的刺激力。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都冒过险，都受过压，都在别人没露头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豁出去当“反革命”，孤注一掷，以致于博得了人生的大彩。

文化大革命是争当造反英雄的冒险家乐园。在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中，我们都看到了这种一鸣惊人而飞黄腾达的追求冲动。红卫兵初期“破四旧”时，竞相发布惊天动地的先锋通告，都有这种冲动含在其中。北航的红卫兵曾经发出“将全国都变成红海洋”的号召，用红、黄油漆涂抹所有的街道、商店、门面。有的红卫兵则提出把交通标记红绿灯颠倒过来的革命倡议，红色意味着马列主义，意味着毛泽东思想，所以应该红灯行、绿灯停。在一系列竞相标榜革命造反的行动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极端行为。

然而，并非每一个极端行为都能够成功。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极端行为的成功，惟一的途径，是获得毛泽东的承认与支持。

当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得到毛泽东支持而一步登天时，受到巨大鼓舞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群众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多少文人渴望获得君主的赏识而飞黄腾达、耀祖荣宗。这个潜藏在中国一代又一代文人心理中的动力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极端的领袖崇拜一起被焕发了出来，显示出巨大的能量。英勇无畏的造反行动之后，等待的是毛泽东的赏识。

然而这一次，他们的愿望落空了。

用文化大革命中通行的一句话讲，他们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第一，就全国政治斗争形势而言，周恩来是惟一站在一线有效地帮助毛泽东维持国计民生的操作人物。没有周恩来，“天下大乱”就会乱到全国人民都没有饭吃的地步。三年自然灾害一定给浪漫的毛泽东留下深刻的教训：政治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要在解决了吃饭问题的经济底盘上才便于开展。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周恩来。

第二，在目前这个全国性的政治斗争中，周恩来是惟一能够帮助毛泽东缓和党内干部系统敌对情绪的人物。周恩来这个从无个人野心的兢兢业业管理国务的总理，是毛泽东“团结干部大多数”这一政策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后象征。毛泽东需要这个象征。

第三，“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不仅引起周恩来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会引起党内更多的中上层干部的不满。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那些干部中的相当一些人，在大夺权后的新政权中，是要结合与使用的干部队伍。他不能使这些人不满。

因此，“五·一六兵团”的出现，倒给了毛泽东一个作文章的机会。当他决定打掉“五·一六兵团”时，不仅平衡了来自干部队伍的不满，甚至还能够笼络他们，从而巩固和补充了毛泽东团结和保护干部大多数的领袖形象。

在这里，毫不犹豫地打掉“五·一六”，如同打掉王力、关锋一样。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全国范围内的报纸、社论一时间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口号。这在中央文革看来，是处理武汉军区问题的必然结论，意外的是，毛泽东却做了“还我长城”的批示。为了平衡军队的暴乱情绪，也为了补充毛泽东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领袖形象，中央文革丢卒保车，将王力、关锋抛了出来，在 1967 年 8 月这个十分炎热的夏季，祭奠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四，用文化大革命又一个通用的语言说，运动发展到 1967 年夏天，随着全国范围内夺权斗争的推进，在右的干扰的同时，也出现了“左”的干扰。用毛泽东在 1967 年 7、8、9 三个月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那就是“现在是红卫兵、造反派犯错误的时候了。”

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信号。随着逐步摧毁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保守系统，在组建新的各级政权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需要抑制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权力要求了。全国范围内天下大乱的事实已经给了毛泽东足够的印象，这不仅是造反派中有坏人的问题，也是整个造反派队伍自以为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问题。只有整肃他们，才能领导他们。只有限制他们，才能借用他们。

在未来的政权中，需要更多地依靠接受统一指挥的军队，甚至还要比较多地依靠站在革命路线上的领导干部。对于权欲旺盛的造反派们，则到了教训、管制的时候了。

抓“五·一六分子”，意味着严厉管制的开端。

第五，当然，这一定是毛泽东的全局观念，只有他真正具有这样的全局观念。

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的利益出发，可能更倾向于搞掉周恩来。他们和毛泽东的眼界从来是有差异的。“大树底下好乘凉”，这些人在毛泽东的大旗下，极力想搞掉他们权力扩

张的全部障碍。然而，他们没有力量违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当毛泽东发出了保周恩来、保军队的指示之后，他们除了坚决地打掉“五·一六兵团”，坚决地牺牲王力、关锋及随后（1968年初）的戚本禹之流，没有别的选择。

随后，他们或许也便意识到毛泽东战略部署的正确：在 1967 年的这个时刻，远非炮打周恩来的时机，当时全国政治斗争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

于是，对“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活动，立刻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打击。

1967 年 8 月 11 日，中央文革召开的座谈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首次提出“五·一六兵团”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炮打周总理实际是反对党中央。1967 年 9 月 5 日，在一个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又指出：“目前北京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再一次发出了揪“五一六分子”的战斗信号。类似的大标县第二天便大批出现在北京街头。

1967 年 9 月 8 日，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作为批判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重要文章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写了如下一段有关“五一六”反动组织的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

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显示了他要平衡整个局势、完整自己保护周恩来及其所象征的党内大多数干部、信赖和稳定军队的领袖形象之目的。打掉“五一六兵团”，是他赐给党政军大多数干部的一个礼物。至于他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所说的“‘五·一六组织’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尤其具有威慑力。现在的斗争任务是，逐步地管教那些桀骜不驯的造反派了。

1967 年 9 月 23 日，又有一个文件进一步落实了毛泽东管教造反派的战略部署。这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批转《安徽“P 派”和“G 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

经过这一系列部署，揪“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这个运动持续时间很长，范围日渐扩大。到了 1968 年，江青在 3 月 25 日的一次讲话中，对“五·一六分子”定出了极为宽泛的标准。凡是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三指向”者，就是“五·一六分子”。

到了这时，最初在北京某些高等院校出现的那个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早已被历史遗忘了。当为数寥寥的人物被清查、批斗、专政之后，并不足以注释毛泽东所说的“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句话的分量，所以，这些人在揪“五·一六分子”

的运动中倒不被提及了。清查“五·一六分子”，以相当的规模从 1967 年延续到 1968 年，乃至 1969 年、1970 年、1971 年以及更长的时期，范围遍及学校、工厂、农村、机关。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它成了整造反派、整群众、整学生、整知识分子的最有效手段。

在北京，相当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文化教育部门的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印象最深刻的，是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某些学生组织和某些文化部门中被定为“五·一六分子”的，在一个时期内几乎达总人数的一多半。相当一些造反派学生到了这一步，才领教了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和惨烈。

清查“五·一六”在 1967 年、1968 年以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军宣队、工宣队、新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整肃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这确实显示了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高明。推翻旧政权所要借用的各种造反力量，现在都该予以不同程度的镇压、限制和管教了。不允许这些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学生、群众和知识分子提出他们的权力要求，干扰新政权与新秩序的建立。

文化大革命需要自己的新秩序，毛泽东需要自己的新政权。

毛泽东于 1967 年便高瞻远瞩地抓住了清查“五·一六”这一战略部署。在随后的几年内，其伟大意义被林彪、江青之流越来越充分地领会了，清查“五·一六”成了他们全力推动的事情之

1968 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全国范围内把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又过了一遍。甚至可以说，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普遍的运动中，清查“五·一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抓坏人运动。到了 1970 年，已经进一步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中建立起自己政权的林彪、江青势力更把抓“五·一六”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

如果说在此同期进行的各种反右倾的活动主要是针对上层，那么清查“五·一六”就指向了整个社会。在他们眼里，各种各样的反对势力都可能隐藏在社会中、群众中，甚至也隐藏在军内、党内的基层成员中。

1970 年 1 月 24 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发出了清查“五·一六”的新指示。林彪以带有法西斯意味的强硬声音宣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为抓‘五·一六’的问题，我好几天没睡觉了。”她高呼：“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

林彪、江青的讲话被迅速传达，全国掀起了又一轮清查“五·一六”的高潮。那时，林彪、江青的势力已经统摄了全国的局面，因此，他们的指示便带有了更大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全国范围内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成了普遍性的阶级斗争。

在很多地方，清查“五·一六”将中国历次阶级斗争运动，从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到反右斗争，到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各种阶级斗争手法都综合在了一起。人人过关，人人揭发，隔离审查，逼供信，灵魂深处闹革命，关押、批斗，法西斯专政，应有尽有。这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百倍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

1971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对清查“五・一六”问题又做出了重要的《二・八决定》。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于 1971 年 3 月 27 日正式发出《三・二七通知》。同样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统一部署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的运动。

在《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部署下，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梳理着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群众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个一贯用在对待反革命、后来又用在对待走资派的口号，此刻高悬在了所有热诚地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头上。

林彪、江青面临着两个敌人：一个，是像刘少奇这样被他们打倒的党内军内的势力；另一个，是曾被他们借用过、现在又必须整肃下去的造反派、学生和群众。两种势力都可能成为隐蔽的反对力量，清查“五・一六”，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击一切反对分子。作为他们大权的基础，派驻各单位的工宣队、军宣队、各级革委会在清查“五・一六”中的变本加厉、层层加码，也都是出于维护自己权威的需要。

在对刘少奇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残酷打击中，在借清查“五・一六”对广大学生、知识分子、群众的残酷打击中，论证了林彪的一句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垮台之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一度有所搁浅，军队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尤其受到动摇，因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及“五・一六”嫌疑分子的绝大部分人是反对林彪集团的人。然而，当江青等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不断稳定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之后，依然残忍地维系着清查“五・一六运动”，把它作为继续整肃反对派和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的手段。各地区、各单位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也因地、因人地延续着。曾经领导或参与过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人，自上而下都不会否认这个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同时结束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肃反运动。）

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与政权（1968 年 1 月－1969 年 4 月）

毛泽东面对的是一个现实中的社会，这是一个有着商品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社会，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社会，是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分工的社会。当他企图将空想社会主义强行嫁接在这个历史阶段时，不管他有多么巨大的政治家的实践才能，最终出现的是一个十分畸形的东西。

一、“杨、余、傅”成了反右倾的新对象

文化大革命进入 1968 年，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派势力面临的任务，无疑是在 1967 年全面阶级斗争的夺权运动基础上争取更大的胜利。1967 年，仅有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青海、内蒙、天津等九个省市真正实现了符合毛泽东要求的夺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在 1968 年内，毛泽东无疑要在全国各省市都完成这个任务。

正像 1967 年已经显露的那样，毛泽东面临着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要继续摧毁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另一方面，则要开始管教造反派群众。前者，可以说是反对“右”的斗争；后者，可以说是反对“左”的斗争。而就 1968 年的政治大局而言，右的危险显然还是第一位

的。因为从 1967 年底开始，就有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全国泛滥而起。

这股“右倾翻案风”的直接缘起，是由于 1967 年 8 月份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文革抛出了王力、关锋，1968 年初，又抛出了戚本禹。这三个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冲锋陷阵的左派人物的垮台，启动了社会上想为 1967 年“二月逆流”翻案的政治潮流。江青在 1968 年 3 月 21 日接见外省来京人员的会议上讲道:“从去年冬天,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击溃了形‘左’实右，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里的彭、罗、陆、杨留下的一批爪牙（指王、关、戚），右倾保守主义就冒头了，今年就大肆活动了，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

这一点并非江青等人的捕风捉影。在北京，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活动以多种形式冒出来了。

1968 年 2 月 13 日，外交部九十一名司局长、大使级领导干部在外交部张贴了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影响波及全国。一时间，给了很多怀有相同思潮的人以一线希望，有人甚至从毛泽东对待“王、关、戚”的态度中，杜撰出了毛泽东政治立场的某些变化。

同年 2 月底，国防科委党委在评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标准中，增设了如下条款：“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此举立刻遭到造反派组织的强烈攻击，并上报中央文革，最后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因为负责国防科委的聂荣臻早已被造反派定为 1967 年“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因此，把这一条款的增设攻击为为“二月逆流”翻案，便成了造反派和中央文革的必然口径。毛泽东自然对这种拥护他人为核心的提法十分警觉，深为不快，指出：这是“多中心论”。该条款很快被国防科委党委撤销了，但它已引发出毛泽东对“右倾翻案风”的敏锐觉察。

在这一时期，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出现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活动。他们往往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那些曾经炮打“二月逆流”的造反派组织，这无疑引起了中央文革强烈的反应。更尖端的行为是，在北京及上海均出现了将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人的政治活动。1968 年 3 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就曾在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质问谢富治和戚本禹的关系。

这股右的潮流，不仅涉及到中央上层的对立斗争，还在更广泛的领域表现出来。清华大学就出现了重新评价原党委领导蒋南翔、刘冰的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至今发生的事情是大翻个儿，是整个否定共产党，是地、富、反、坏、右的翻天。全国很多省市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右倾思潮。他们或是将矛头指向本地区已经掌握权力或正在掌握权力的左派政权，或是提出对被打倒的旧省委领导的全面评价，甚至还有极个别“铤而走险”的保守派群众，为刘少奇喊冤。

全国性的右倾思潮，大多和武汉地区“百万雄师”这类被镇压下去的组织相关联。这些在全国夺权斗争中被逐渐镇压下去的相当数量的群众组织，将整个社会潜存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推动了起来。他们的情绪又在军内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应，在 1967 年的支左中，许多大军区特别是大军区之下的省军区、军分区，大多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他们的支左也随着他们所支持的那一派组织的被镇压而被同时否定。

这种自上而下的右的倾向，毛泽东最先敏感到了，随即做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全部合理性的

纲领性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种舆论纲领提供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口号，真正能够给这股"右倾翻案风"以毁灭性打击的，依然是抓住题目，做出有声有色的文章。这是毛泽东所擅长的，也是中央文革所擅长的。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上海一月的大夺权，都是以具体的典型造成全国性影响，产生辐射全面的爆炸力。

1968 年的中国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即所谓"杨、余、傅事件"。"杨"是指当时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余"是指当时的空军政委余立金，"傅"是指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1968 年 3 月 24 日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北京军区等军队干部的大会。在这个毛泽东亲临大会接见与会人员、林彪直接讲话的大会上，宣布了撤销杨成武职务、撤销傅崇碧职务、撤销余立金职务并将其逮捕的决定。

这一决定使全军感到非常突然。林彪在这个大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这是打倒杨成武、傅崇碧及余立金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大会上，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及姚文元先后讲话。特别是陈伯达，将打倒"杨、余、傅"总结为文化大革命继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打倒"二月逆流"，打倒"王、关、戚"之后的第五次伟大胜利。

就"杨、余、傅"三人的革命历史而言，杨成武、傅崇碧和聂荣臻有更多的上下级联系，而余立金则是新四军时期陈毅的老部下；就他们现实的政治地位来讲，又都与林彪的亲信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及吴法宪等人有矛盾。当毛泽东、林彪决定打倒"杨、余、傅"这三人时，它的第一个直接意义，是加强了林彪及其亲信对军队的集权，巩固了文革势力对军队的控制；它的第二个意义，无疑是震慑了所有有"二月逆流"倾向的党政军干部，震慑了军内对文化大革命怀着保守主义立场的力量；它的第三个意义，就是震慑了全国所有有"右倾翻案思潮"的"百万雄师"一类的被镇压的群众组织。

这是一个比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更重大的政治部署。那一次解决的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和政委，这一次解决的是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围绕着"三·二四"大会，全国报刊在 4、5 月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右倾翻案风"的舆论宣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5 月 1 日社论《乘胜前进》中指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它代表这个时期数十篇重大社论、文章的主要口号。

解决"杨、余、傅"问题，是毛泽东在 1968 年采取的比较重要的政治行动之一。通过这个行动，他主要解决了来自右的方面的压力，震慑和更有效地掌握了整个军队，打破了军队和社会上右倾保守势力的联合，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全面夺权斗争提供了保证。

同时，也必然为整肃造反派群众、整肃红卫兵及整肃知识分子的"左"的干扰提供了保证。

二、清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

新一轮"右倾翻案风"经过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大致解决掉了。1968 年最本质性的

事情，则显示在毛泽东改造整个社会的一些部署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1968 年是逐步建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社会与政权的一年，这是在 1967 年全面阶级斗争开展以后、全国范围内夺权斗争逐层推进下进行的。这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由大乱走向大治的一年。这个由乱到治的过程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是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实质的重要素材。

我们不妨看看在“右倾翻案风”被“击溃”之后，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推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社会政策。

在 1967 年－1968 年的交界处，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它实质上是在那些派驻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单位，对全部人员进行一番梳理。把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全部“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查。清查的范围甚至超出以上这些“黑色”人物。

1967 年 11 月 27 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这大概代表了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从此，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就在全国逐步展开了。到 1968 年，任何一个省市，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由乱走向治，只要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理阶级队伍便成为纲举目张的第一件事。

毛泽东最信任的八三四一部队进驻的“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方面创造了典型经验。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成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指导性文件。

1968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于 5 月 25 日将这件材料批发全国。在这个《经验》中总结道：“这个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中，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向全国推广的《经验》。这是一个在全体群众中实行大清查、揪坏人的阶级斗争运动。这是一个包括清查“五・一六”在内，又比清查“五・一六”更广泛的运动。这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运用工作组方式领导的阶级斗争运动。正是这样一个运动，开始把文化大革命中动乱的社会民众整肃了起来。这是任何一级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了权力的革命委员会都首先会做的事情。即使有些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还未建立，也早在支左部队的控制之下。派军宣队或工宣队去解决各单位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是十分便当的。

当然，文化大革命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动红卫兵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到清理阶级队伍，这种主要矛头由向上到向下的转移，表明毛泽东所领导的文革派势力开始在基层重建自己的政权了，也表明毛泽东对放手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新的认识。

显然，他们不是清一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坏人。正因为这样，全国的夺权形势才发展得如此不平衡。很多地区的造反派之间、大学生之间的矛盾斗争持久激烈，无论发出什么样的指示，都很难使他们听话。这种在毛泽东需要大治时还经久不息地大乱，则是毛泽东绝不允许的。

全国很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冲突难以平息，对此，毛泽东采取了极为坚决的措施。针对广西柳州、桂林等地区的武斗动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 1968 年 7 月 3 日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军队作为实施布告的实力基础。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于 1968 年 7 月 24 日发布《七·二四布告》，解决陕西省境内的武斗动乱，同样是依靠军队的实力，在大规模宣传包括空投传单的情况下平息动乱，粉碎造反派组织的派性，逮捕制造动乱的造反派头目。

这种对省一级大规模动乱的处理，与对一个厂矿学校“老、大、难”问题的处理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在《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执行过程中，较大规模军队的出动，可以视为一个大编制的军宣队。掌握政权，平息局势，清理阶级队伍，抓坏人，本质上都一样，只不过这时需要以公开的武装形式实施威慑。

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毛泽东掌握下的军队，开始在不同的规模上领导地方运动。

毛泽东认为，对于那些大学生、中学生，需要人数更多的工作队实行领导，于是，从 7 月份开始，又向学校派出工人阶级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北京第一批三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这一措施在北京几个“老、大、难”学校付诸实践时，立刻遇到了造反派学生组织的顽强抵制，冲突十分激烈。

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两派学生各占据部分楼房作为堡垒，展开大规模武斗，从棍棒长矛到枪支弹药，武斗规模日渐升级。1968 年 7 月 27 日上午，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千人进驻清华大学，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并拆除武斗工事，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实施了武装对抗，致使宣传队五人死亡，七百三十一人受伤。造反派学生与工宣队的矛盾立时成为全国的焦点之一。

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名全国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他们，将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形象，也必然破坏毛泽东在造反派学生中的形象；不镇压他们，这批我行我素的学生已经到了几乎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的地步。

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典型。

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被紧急召来的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首都“五大学生领袖”，在这

次谈话中，毛泽东严厉而又足够从容地批评了他们："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必答覆，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毛泽东含威不露地说："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五大学生领袖"自然是屈服了。毛泽东亲自出面的处理运用了毛泽东独有的权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武斗工事自然是被摧枯拉朽地拆除了。工宣队、军宣队自然是一统天下地、更全面地领导起这些学校的运动了。清理阶级队伍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清理出来的各种坏人，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清理过程中所显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也是令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及干部终生难忘的。

毛泽东在蒯大富这些造反派学生已经比较孤立的情况下出面解决问题，既显示了对军队和工人的有力支持，也不失在学生中的家长形象。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得当的表现。

1968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将外宾赠送的芒果转赠首都工宣队，立刻成为覆盖全国的大舆论。正像当年给红卫兵回信一样，现在给工宣队赠送芒果，表明在启用一支新的队伍。全国工人阶级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这个"特大喜讯"。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无疑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掀起了又一轮新的热潮。这次是把领导运动的权力交给了工人，如同 1966 年将掀起运动的权力交给红卫兵一样。

毛泽东的指示立刻化为了具体的部署。1968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指出："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

1968 年 8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阐述了所谓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无疑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原则在教育领域内制度化了。关于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讲话，在随后一些年中，成为农村学校普遍遵循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一步，其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似乎显示出来了。

1968 年 9 月 2 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是：“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在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下，不仅一些军事院校进驻了工人和军管部队，而且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都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这种做法还超出了教育领域，各种各样的机关、文化单位，凡属“老、大、难”者，都派进了工宣队，军宣队。这比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出的工作组规模要大得多了。

1968 年 9 月 5 日，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所谓“全国一片红”的形势下，毛泽东组建大革命后新社会的部署进一步推进。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又一个恰逢其时的光辉典型，那就是柳河“五七干校”。

1968 年 5 月 7 日，在庆祝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乡劳动，在黑龙江省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名为“五七干校”的农场，并且把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送往同一个农场劳动改造。五个月的办校“经验”报告到了毛泽东这里，毛泽东做了重要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968 年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及毛泽东的批示。从这一天起，干部下放劳动及“五七干校”便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中国。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提出两年半后，终于变为中国社会的实际存在。“五七干校”之风甚至刮到了各大城市的家庭妇女及各种无固定收入的市民身上。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更加推动了城里人纷纷回老家、去农村劳动的热潮。

在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织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一指示，又造成了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规模运动。

1968 年，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设他的新社会的一年。

三、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社会

在 1968 年中，清理阶级队伍，围剿派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贫宣队进驻农村学校，干部下“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高

潮中建立新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部署。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些部署：

一，清理阶级队伍。

只要联系历史做一点比较，就会发现，它确实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执行的路线的扩大化，也可以说是 1957 年反右斗争形成的党的“传统”的新表现。这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推行的革命造反的路线相比，是一个完全的颠倒，它表明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已经发生转移。现在，虽然在名义上继续以批判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为主要目标，其实只是一种舆论，具体的政治行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在了整肃社会基础、群众队伍上。这也表明毛泽东对两年来造反的“革命群众”的新认识。

二，对于派性所展开的大规模的围剿，也是 1968 年特别重要的一个战略部署。

首先，是由于社会上不同群众组织间的派性斗争已经失去了原本意义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意义。例如，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派虽然曾经是支持中央文革的极端革命造反派，然而，随着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基本被打倒，这个派别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当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不再需要这支力量在中国政治舆论中继续呼风唤雨时，它便成了一支无用的力量。几乎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有相同的命运。

接着，各群众组织的派别利益、小山头的利益显示出来了。现在他们都是自成体系的集团了，这些集团的全部活动都是在为自身的利益战斗。他们相互之间的争夺，常常游离在两条路线斗争之外。

如果深入分析某些造反派组织，我们还会看到，他们现在之所以不服从管理，不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挥，其根源之一，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们对革命成果的分配不均有着不满。这时，他们各自为政的行动早已不是对刘少奇路线的敌视，而是对毛泽东、中央文革本身的对抗了。

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曾是一种临时的权力系统，它们都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存在。然而，运动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取消它们的时候。因此，到了 1968 年下半年，所有被称之为“派性”的造反派活动，不论两年来其在路线斗争中表现如何，一概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派性而予以围剿。

三，在 1968 年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大规模派出军宣队，是毛泽东采取的重大部署之一。

在林彪的配合下，毛泽东对军队有了越来越大的控制权，运用军队是化乱为治的最有效手段。运用军队，便给了军队特殊的权力。有了特殊的权力，便有了特殊的冲动与积极性。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在这一时期非常符合毛泽东建设文化大革命中新社会的要求。

四，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并且派出大量的工宣队，这是毛泽东在 1968 年由大乱走向大治的过程中采用的又一个创造性举动。

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主要是用工宣队管理学校，管理教育、文化部门，管理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并不曾用它管理军队，管理外交，管理财政，管理国防，管理党的意识形态。

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从一开始就带有十分特定的性质。从最表面看，这是稳定形势的需要，是管教始终处于动乱不安中的学生及知识分子的需要，带有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的性质。但在实际上，这一措施无疑给了工人特殊的地位与权力。这种地位与权力不仅是平息学校、文化部门动乱并建立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还带有非常广大的意义。

虽然工宣队在整个工人阶级中只占有限的人数比例，然而，它给了工人阶级新的地位感觉。这无疑有助于取得工人阶级对文化大革命的赞成票。这是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阶级力量关系中的一种调配，造成了阶级力量关系的变化。它使工人阶级站在了管教学生及知识分子的第一线，让他们承担了来自学生及知识分子的不满与对抗；同时也调动了工人阶级对学生及知识分子的某种排斥心理，抑制学生及知识分子的破坏性能量。

这是毛泽东极为出色的一个战略部署。在这个战略部署中，我们又看到了一条“传统”的阶级路线，看到了毛泽东在过去多少年中一直强调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路线。当这条“传统”的阶级路线在 1968 年的中国出台时，它既让学生及知识分子感到震惊，也让整个社会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似乎又来了。

如果更深入地透视这条“阶级路线”在当时的中国所产生的全社会反应，我们就会看到，这里还潜含着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取消体脑分工的倾向。在毛泽东所采取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部署中，隐含着一条畏惧、抵制和排斥知识与文化的路线。这条路线不仅在工人、农民中会有思潮基础，在党内和军内尤其有深厚的传统。这是十年后的中国改革要摒除的传统；而在 1968 年，则是毛泽东要加以运用的有力的传统。

无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部署有多少权宜之计的含义，必须承认它确实具有比较浓烈的“马列主义”理论色彩。当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对此做出一番论述之后，中国的工人，包括知识分子，似乎都“认识”到了这里重大的马列主义性质（其实，在那些派出工作组的厂矿中，军宣队领导下的湝理阶级队伍运动又在梳理每一个工人）。

而这一切在毛泽东眼里大概还有特殊的意义。当工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了大、中学校，而且将长期留下去，成为一个永久的制度时，这一定是向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迈进的一步。

五，1968 年 10 月开始掀起的干部下放劳动、建立“五七干校”的浪潮，大概是一个更新的事物了。

“五七干校”解决了很多问题：

首先，它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政治斗争需要。因为任何一个单位的“五七干校”，都把本单位的走资派带去了，在那里继续批判、斗争，换了空间反而增加了新意。

第二，确实解决了稳定局势、控制局势的问题。这么多机关干部堆在机关里、城市里，终归不是一个稳定因素，他们总该有事干，“五七干校”的劳动与“阶级斗争”，则使大量的机关干部离开城市，分散在广大的农村，被千山万水分隔开来，使城市与机关的不安定能量被消化了。

第三，解决了大量的安置问题。夺权以后的各级新政权淘汰了绝大部分旧有的干部，这些干

部如何安置，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最普通的社会就业问题，去干校，一走了之，如卸掉一个大包袱，不能不让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派势力顿感轻松。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建立“五七干校”的热潮所引发的城市家庭妇女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去农村，这也是“五七干校”在安置城市居民的一个副产品。

满足了多种实际需要的“五七干校”在文化大革命中便很合时宜地出现了。在毛泽东眼里，“五七干校”除了这些实际功能，大概更有另一方面的伟大意义。它提供了文化大革命后要建设的新社会的某种模式和动力，“五七干校”作为《五·七指示》的体现，和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更具有直接的联系，那是按照他的《五·七指示》蓝图施工出来的社会模型。这个模型或许还很初级，然而，却可能含着伟大的希望。

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在 1968 年推出的建设新社会的最后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同样非常实际，又含着理想的前景。

就实际的功能而言，上山下乡运动首先将学生中蕴藏的巨大动乱能量一下子化解了，城市的最大不安定因素被清除了，这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全国一片红”这个阶段时特别需要的。当成千上万所学校一泻而空时，所有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都感到局势的平稳度极大增加了。

这又是一箭双雕之举。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不仅是如何消化广大学生的动乱能量，还面临着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人就业安置问题。上山下乡无疑是最方便的方法，偌大的农村并不困难地就吸收了这些年轻的劳动力。

当然，在毛泽东眼里，除了这些非常实际的社会功能外，他一定还看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包含的属于他的社会理想构思。他从来相信农民胜于相信知识分子。农民一定能对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许多弱点的知识青年进行一番有效的教育。这种教育以及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产劳动，又和他在《五·七指示》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十分吻合。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毛泽东在 1968 年推出的这些建设新社会的措施做出分析了。“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部署，干部的“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社会蓝图。一方面，这里确实有 1968 年社会政治需要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这也和毛泽东根本的理想社会蓝图相联系。

如果只说毛泽东是权谋家，那是极为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确实是一个极为坚定的革命家，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尽毕生力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他的巨大的热诚塑造了一个始终一贯的形象。

然而，如果只说毛泽东是一位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又不对，那同样很肤浅。因为毛泽东深谙中国的国情，永远对事物的客观可行性有着很好的感觉。他总是因势利导，相机行事。该去乡村领导农民土地革命，就去乡村，该上山打游击，就上山打游击。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策略家，也是一个权谋家。

因此，我们必须将他的理想的纲领和实践的策略、行为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把握他。

我们应该分析他的理论文本；但又不仅要分析他的理论文本，还要分析他的实践“文本”。正

是两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从他的理论到他的实践的展现过程，看到他在自己的理论指导下到底做了什么？到底能做成什么？

在毛泽东与客观环境的互动中，我们既看清了他，也看清了社会。

我们曾引用的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确实描述了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原本是他对解放军总後勤部一个材料的感想，在单纯的、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意味的军队生活中，引发出的对整个社会模式的联想。

这种联想在今天看来是一片空想。因为毛泽东面对的毕竟是一个现实中的社会，这是一个有著商品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社会，是一个有著自身结构的社会，是一个有著巨大社会分工的社会。当他企图将陶渊明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强行嫁接在这个历史阶段时，不管他有多少政治家实践的才能，最终出现的只能是一个十分畸形的东西。

1968 年文化大革命建设新社会的实践，不过表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经过实践的选择，最终形成了什麽样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他所极力推崇的“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是从清理阶级队伍的角度提出来的，展示的却是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主义落到实践中将是什麽样子。这个被他批示过的“同类材料”中“最好”的一个文本，就是《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在这个《经验》中，是这样描绘他们在“大联合”後出现的新景象的：

“我们也组织群众大学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大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组织群众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演忆苦戏，唱忆苦歌；”“有一次吃忆苦饭的时候，大家一边哭一边吃饭。还有的唱《不忘阶级苦》的歌。大家在这个时候对中国赫鲁晓夫越批越气愤，一气之下，就把本厂一小撮走资派提到食堂，就地批斗了一番。”

“有一个曾经被群众称为‘大联总’的女干将，四大妖婆之一，是抛头露面的人物。後来与军管会定的坏头头能划清界限，并到了那个组织的临时勤务小组，但是联合後，群众越琢磨这个人越认为是牛鬼蛇神，要揪斗。军管人员对她作了全面分析，认为，原来起来造反是对的，中间跟坏头头说了一点错话，干了一点坏事，是受蒙蔽的，当她认识了以後，她能够划清界限，特别是经过帮助教育，斗私批修後表现很突出，有些派性大的人开会，找到她，她当场指著那些人的鼻子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联合，你们还搞派性，还这麽干？她回家後，把三个孩子，一个老母亲，一个丈夫弄在一起办了个学习班，在公共汽车上读门合同志的材料，读主席的最新指示，她自己本来唱歌不怎麽样，但是她出於无限忠於毛主席的感情，在车上唱语录歌。她不仅自己家里办学习班，还把院子里，不是一个厂子的职工，也组织起一个学习班。”“结果，这个人最後被选为全厂出席北京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有个反革命分子 xxx，这个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以後，在她劳动的时候，她瞅著管她的民兵一疏忽，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女宿舍的四楼，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

“凡是我们准备要接触搞的，都至少有一件完全可以打倒他的材料在手里。一旦别的事情怀疑得不准了，就凭这一件就可以把他提起来专政，得有这样的把握才行。有的群众讲，撕破了脸皮，也没伤一个好人，伤了坏人。”

这段文字极端生动和形象地描述了新华印刷厂当时的生活状况，在“六厂二校”基本都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就是在二校（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阶级斗争的烟火更浓烈。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更为强大。在这两所大学里，清查出的坏人都在千人以上。

如果将新华印刷厂的《经验》，联系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干部下“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就会对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社会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任何一个对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浪漫景象憧憬的人，大概都不愿意踏入新华印刷厂这样的现实社会中。

透视毛泽东在 1968 年建设的新社会，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一，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小小的“理想国”。

在这里，无论是军宣队掌权，还是工宣队掌权，他们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可言，也绝没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种革命造反的民主可言。

二，是极为扩大和夸张的阶级斗争。

在这些新社会的“理想国”中，无论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清查“五·一六”，都像个无比巨大的铁篦子，一遍遍篦过人群。正是这种大规模的、深入的、毫无遗漏的阶级斗争，维护了这些“理想国”的集中权力。在这种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相互揭发，相互批判，相互监督，“群众专政”，它颇让我们想起商鞅变法时期秦国封建统治者对待人民的强化统治政策。

三，在思想上，是统一的强化政治下的愚民政策。

看一看新华印刷厂的《经验》就会知道，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人们是如何愚昧及驯服地屈服于一种统治。在这里，有着思想上的绝对服从，这种绝对服从的最高表现，自然是对领袖的绝对崇拜。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使我们看到，空想的社会主义落实到现实的社会中，就是一个人人经过洗脑、人人没有自由思想的世界。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可怕世界，是一个稍有现代生活体验的人都望而生畏的世界。一切侈谈崇高理想的人面对这个现实的愚昧世界，大概也会久久迟疑，不敢跨入。

四，在组织上，有着编制军事化的强烈倾向。

在中国所有的“五七干校”中，差不多都是营、连、排、班的军事编制。这种编制不仅是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干校的结果，也是 1968 年毛泽东建设文化大革命后新社会的特有的组织表现。

五，无论是“六厂二校”这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进驻文化机关管理一切，还是军宣队领导“五七干校＂，贫下中农教育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有一个反知识、反文化的倾向，都有一个“没文化的”在管“有文化的”的倾向。

当这种倾向以社会化的政策表现出来时，不能不说是文明的倒退。十年以后的改革提出干部知识化，正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理想国领导权非知识化的反拨。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蓝图落实到现实社会中，是一个消灭知识“特权”的社会，甚至是一个将知识贬为“负特权”的社会。

六，与反知识、反文化相联系的，还有反社会分工，反各种社会差别。

城乡差别，体脑差别，都予以简单地抹平。对各种劳动的分工，比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差异，更持以保守主义的反对立场。不是通过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来缩小和消灭这一差别，而是用贬低知识地位的方法消灭差异、达到平衡，甚至造成无知识优于有知识的特权。

与此相联系，在“五七干校”中，还表现出一种违背价值规律的生产观念。当那些具有高技术、高知识的人年复一年地除草、喂猪时，以为这是社会的进步，其实是社会的倒退。

七，各种形式的平均主义。

除了少数领导的权力之外，被领导者在劳动中、分配中及社会地位中趋向平均主义。

1968 年中的“六厂二校”，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管理学校，干部下放办“五七干校”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从空想的云端落到现实的大地上的必然图景。新华印刷厂清理阶级队伍时那种极端专制和愚昧的图景，正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极端愚昧图景的缩影。

历史证明这个图景是短命的，它昙花一现地消失了。今天的中国人无论对现状是怎样一种评价，大概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再回到 1968 年的新华印刷厂和“五七干校”那样的理想国中了。

至此，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毛泽东作为一个毕生奋斗的革命家的悲剧。

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广场上的百万民众，民众眼噙热泪忘情地向他欢呼时，他眼里的世界一定是理想的，单纯的：那就是在他的伟大号召下，人们只有一个意志，一致地欢呼。当百万人众列队意气风发地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那整齐划一的步伐可能给了他更为自信的概念：这个世界一定是非常容易统一的，作为社会理想蓝图的《五·七指示》，一定能够使全国人民都像他检阅的游行队伍一样齐整肃然地大踏步向前。

然而，他不知道，甚至可能不愿知道，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游行队伍行进到复杂的山川地形时，绝对不可能再保持如此齐整的方阵。地形越复杂，人群的分化就越迅速，高高低低的不一致是难免的，他们之间的联络与组织也必然是因地制宜的。那时，他不可能

再要求他们永远保持行进中的整齐，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永远直接接受他的指挥。大自然的复杂地形，早已使他的队伍改变了原有的结构。这时，他若还想把天安门广场上游行受阅的编制强加给人们，即使用尽自己的全部威势去进行整肃，最终也是徒劳的。

1968 年建设新社会的种种实践，以及这些实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迅速消亡的命运，已经说明了一切。

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具体结果，充分揭示出它的小农经济与封建主义专制相结合的性质。

“六厂二校的《经验》与“五七干校”，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政治纲领的大显露。

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十足的保守和反动。

四、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

1967 年开展全面夺权运动以来，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完成了夺权，并陆续建立了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庆祝“全国一片红”的锣鼓声中，1968 年 10 月 13 日－31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二中全会。

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一论断代表了毛泽东对局势发展的坚定、自信和满意。林彪则在这个全会上提出了“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著名”论断。

这种“最最最”是林彪的典型句式。这种典型句式中也包含了林彪最根本的政治特征，因为语言方式是思维方式的显现。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极大鼓动作用的“最最最”式的极端用语，也非常明显地显露出他极端的政治纲领。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各种倾向推向极端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以及那些最勇敢的学生领袖，差不多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极端型思维和行为的人物。如果专门剖析林彪的言论，那么，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语言，都给我们提供了极端的代表作。

在讲话中，林彪还提出了人类历史上“四大文化革命”的观点：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第二次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化；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第四次则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里，他再一次运用了最最语式，说：“前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

正是在这个极端的运动中，一切都以“最最最”的方式表现出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结局，便是以最最惨烈的方式，写在了中国当代政治史上。

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把持下的中央专案组用伪证做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并继续清

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罪行的决定。

这个《决定》无疑给了刘少奇原本已经很艰难的生命以致命的打击。刘少奇于 1969 年 10 月 17 日被秘密押到河南开封。11 月 12 日晨六时，这位中国当代史上应该留下一页的、值得尊敬的人物，无声无息地死于开封市囚禁他的地方。当他被秘密火化时，已被折磨得形象枯槁，填写的是化名，没有人知道这位火葬单上填写为“无业”的“刘卫黄”，就是共产党的副主席，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回看当时真实的历史镜头，我们看到，在宣布刘少奇专案材料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面无表情地坐在主席台上。那目光既是含威不露的，又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在会议上宣布有关刘少奇的决定时，他俯瞰全场的目光使人感到，他面对着他不得不翻过的这一页历史，既沉重而又义不容辞，他不时微眯的双眼表明，或许他心中还掠过更复杂的思绪。

他做了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做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做了一件历史要求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件潮流推动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件足以震慑全党、全军、全国百姓的事情；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做了一件在他的眼界中又不算很大的事情。总之，他做了，而且有着做完后的从容。

回顾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 年 1 月 13 日深夜，毛泽东曾派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当刘少奇向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此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时，毛泽东曾温和地建议他认真读几本书，并对他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还将他一直送到门口。

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所有经历的把握，我们知道，在政治上剥夺刘少奇的权力和影响，使之离开最高领导核心，这大概是毛泽东在运动初期的既定方针。然而，后来采取的极端方式，确实是因为有一份足可以把刘少奇在历史上定为“公贼、叛徒、内奸”的专案材料放在了他的面前。这个江青及红卫兵的杰作，推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最极端的处置。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也只能采取这个处置。他不可能、也不再会对刘少奇留出一点宽大处理的余地。

透视刘少奇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毛泽东这样一个大权在握、不被人左右的领袖人物，他既决定着一切，也被一切决定着。他既推动着潮流，又被潮流推动着。他有足够的选择余地，实际上又没有选择的余地。

历史翻到 1969 年的 4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九届代表大会召开了。这似乎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象征，也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达顶峰的时刻。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面带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大革命之后的坚定、从容、安详和疲倦兼有的神情和口气，讲了许多话。讲了要落实政策，讲了要防止一个潮流掩盖另一个潮流的错误，讲了工宣队、军宣队不要压人，讲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讲了要准备打仗，讲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也讲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

这其中，有一段话是特别重要的，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们跟着过去刘少

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资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段话总结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这段话，揭示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

正像我们曾经分析过的，文化大革命最终反对的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个庞然大物。毛泽东在 1949 年以后，一直在和这个看来渺小实则庞大的对立物做斗争，今天，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所以，他又接着讲："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要把“六厂二校”那种清理阶级队伍、学习毛泽东思想、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做法落实到社会所有的单元中。

在显示文化大革命光辉胜利的中共九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当然，在“六厂二校”的经验中，在那些社会单元中，已经包含了基层的政权，这里讲的是与这些基层政权相联系的、或者说作为全国各级政权（包括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集中体现的中国当时最高的权力机构，即中共中央的政治局。

我们把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二十一人名单公布如下：

毛泽东，林彪。（以下按［简体字］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二十一人的政治局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最高权力中心。二十一人的名单其实已经包含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政治纲领，包含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全部含义，包含了毛泽东在 1968 年以来推行的建设新社会的战略部署的性质，包含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质。

需要略做说明的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共二百七十九人中，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继续当选的只有五十三人，仅占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 19%。占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 29%。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个“大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已在上层的大换班中充分显示了出来。我们对二十一人政治局名单的分析，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对整个中央委员会乃至全国各级政权组成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实。在二十一个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周恩来和李先念属于操持国家国民经济、国计民生的人物。对于一个夺取政权、独立管理国家已达二十年的政党，这绝对是一个十分畸形的权力结构，它表明曾在国家一线领导经济运转的干部力量基本被摧毁了。这确实是一场把商品经济打倒的政治大革命。

接着，让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除了毛泽东，除了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这三位德高望重而又多年不掌握实权的元老，再除了叶剑英、许世友、陈锡联这样几位毛泽东需要平衡政治全局的人物以外，主要是两个六人集团。

一个六人集团，就是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林彪为首的这六个

人是军队的实权人物，他们是林彪“最最式”极端政治纲领的组织体现。正是这批人扩张权力的需要，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极端发展的力量之一。

另一个六人集团，就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这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操作者。是共产党内专门从事整治干部的一批政治杀手。他们极端的思想和扩张权力的极端需要，也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极端发展的力量之一。

当政治局内这两个六人集团（一文、一武）掌握了国家的生杀大权时，不难想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了。毛泽东通过他们指挥一切；而他们又通过毛泽东指挥一切。当这样两个六人集团簇拥在毛泽东左右时，当国家的最高权利基本上由他们掌握时，他们的思想就是国家政权的纲领，国家政权的特征又体现在这些人物的人格上。

这是一个反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政权；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内要强化愚民政策的政权；这是一个在政治上要大搞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社会的政权；这是一个要用工宣队、军宣队的方式管理文化教育的政权；这是一个抵制、仇视知识与文化的政权；这是一个企图以“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口号、运用政治动员经济的政权；这是一个在所有制上不允许有多种成分、只能是清一色的政权；这是一个似乎充满共产主义理想，在实际中又十分法西斯的政权。

这是一个似乎团结、其实已蕴含着深刻矛盾和危机的政权。

第十一章 历史制造的野心（1969 年 4 月—1971 年 9 月）

当蓬蓬勃勃的政治野心将造反的利剑刺向历史固有的经济规律时，它们似乎无坚不摧，各得其手。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野心的利剑纷纷折断，遍体伤痕的商品经济却像一株不死的铁橡树，越来越高大地成长起来。

一、全面禁锢的两年之社会政策概述

1969 年 4 月—1971 年 9 月，是中共九大召开后的两年，是“全国一片红”的政权维持其稳定存在的两年，也是中国人民在越来越强化的政治统治下生活的两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种全面胜利的阶段，越来越显出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从空中落到人间是个什么样子。

清理阶级队伍还在全国深入广泛地进行着，军宣队在很多单位掌握着领导权。清理阶级队伍又把清查“五·一六”分子包含在内，全面阶级斗争正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单位。两年中全国清查出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多达数百万之众，仅在 1970 年一年中，就达二百万左右（其中，遭到逮捕的人数近二十万）。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形势似乎正在稳定下来。而在稳定的帷幕后面，则是布满全国每一角落的整人运动。工人阶级还在领导一切，军宣队和工宣队还在统治着大、中学校及文化机关等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他们的权力一方面在阶级斗争中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在受到某种程度的腐蚀和瓦解：有权力造成的腐化，也有知识浸濡造成的“腐蚀。然而，由于来自上面的一系列指令，工宣队、军宣队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机构还在坚强地占领著文化阵地。

“五七干校”在这两年中成了遍布全国的常规存在，它既是一种永久性的、大规模的、全面的干部流放制度，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大规模劳改制度。把“三结合”新生政权扫除掉的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批判斗争及隔离审查，确实是巩固红色政权、排除政治隐患的有效措施。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同样落实到“五七干校”，并且进行得更为惨烈。

然而，在大规模囤积、流放干部的“五七干校”中，文化大革命强有力的红色统治开始遇到了最初的反弹。这种反弹不仅表现在广大干部及知识分子的萌芽状态的思想不满上，表现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怀疑上，还更多地表现为生产、科技及行政等方面的工作需要不得不让某些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干部回到城市中。这些因素在 1969 年、1970 年乃至 1971 年上半年中虽然尚未成为潮流，却以最初的曙光映照出“五七干校”这种大规模流放干部的不合理性。

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过了 1968 年底和 1969 年初最初奔赴农村的热潮。两年多的农村劳动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除了使少数知识青年进入农村基层政权而得到一线生路之外，大多数知识青年开始对接受再教育的处境不满。因此，当 1970 年开始进行了招收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读书，使得个别知识青年得以重返城市之后，回归的愿望在数千万下乡知识青年中渐渐升起。少数知识青年依靠后门参军走了，更造成留下来的插队知识青年的不平衡心理。又有一些人凭着各种门路以“病退”、“困退”为名返城之后，遍布全国农村的知识青年日渐成了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存在。

数千万知识青年渴望返回城市，数千万个城市家庭期待自己出子女回到身边，这些愿望与相应的活动已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知识青年政策产生巨大的反弹力。这种反弹力不过表明，将大量经过教育而形成知识财富的人一律赶到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知识是有价值的，知识是一种财富。不承认它的价值，不把它当做财富，必然处在与价值规律的斗争之中。你付出了政治上强制性行为的代价，你维持的只是一个暂时的下乡运动。这里，知识的反弹是必然的。知识的价值突破政治的强行限制，也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当遍布全国农村的数千万知识青年出现回归骚动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红色政权统治基础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当然，现实还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政权，整党在九大之后作为一个重要的部署于全国推开。这是红色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强化自己统治的重要手段。当整党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全社会性的阶级斗争运动中展开时，尤其显出文化大革命的强化统治。这是一次更为认真的清理，每一个人、每一个头脑都要被阶级斗争的大铁篦子纵横梳理到，绝不允许阶级异己分子混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执政党内。

在全社会，这种强化的政治又表现在方方面面的“斗批改”上，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在更全面和更透彻地缔造自己的新社会。正是在缔造新社会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强化的政治遇到的最初的反弹力。

在教育领域，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的教育革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这

样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进行的。正像 1970 年 7 月 21 日《红旗》杂志第八期上刊登的署名为“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中指出的那样，教育革命最首要的是“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教育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批判资产阶级，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排除那些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就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使学校革命化、劳动化、社会化和生产化，就是要使新老知识分子都接受工人及农民的再教育。

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不能说没有一点真理。它那点有限的真理，可能体现在破除旧教育的繁琐性。然而，它在整体上却表现出巨大的不合理性，那是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对知识这一“特权”的平均主义态度以及对知识的“均贫富”，所谓教育革命体现出来的是对知识的抵制和压迫。

当毛泽东使用工宣队和军宣队长期占领教育阵地时，运用了工人及农民对知识“特权”的不平衡心理，以所谓“无产阶级”性质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来。这其实是毛泽东反对商品经济，企图抵制和压迫商品经济的具体反映。

然而，在教育领域的革命中，反弹力也已隐隐开始。随着 1970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并于同年 10 月 15 日由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进行，全国大专院校普遍开始招生、复课。

虽然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招收的是政治上可靠、思想上革命的学员，虽然学校是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虽然对学制做了缩短为两年或三年的改革，虽然简化了很多旧教材，虽然规定所有的学生都要劳动，都要学军，都要批判资产阶级，然而，只要学校一开始招生和教学，就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反对学校的学生总还要学习人类既成的知识，特别是那些直接为生产服务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时，现代经济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透过所谓强化的无产阶级政治，显示出力量。

这时，你就不得不依靠某些老教授、老知识分子，你就不得不使用那些不是毛泽东著作的自然科学书籍。当你以为可以将这些不带阶级性的自然科学书籍的学习纳入“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时，孰不知，这些知识以及这些知识的掌握者和传播者却在显示现代文明本身具有的力量。学生们虽然被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意识灌满了脑袋，然而他们多多少少都知道，对于科学知识还是要努力去学习，他们甚至还会朦朦胧胧地想到，未来的政治形势一旦发生变化，惟有这些真才实学是真正有用的。这一动态已然是对教育革命反弹的萌芽。

当那些旧知识分子重返讲台时，多少会重新感到自身的存在与价值。他们面对军宣队、工宣队威严的面孔时，虽然还表现得恭顺、怯懦和战战兢兢，然而，在学校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他们又多少会找回一点自信，也多少会冷眼看清那些挥舞着阶级斗争指挥棒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面对知识的陌生和外行。对这些外行的潜在不满和私下非议，随着他们日复一日走上讲台的工作而增加着。当这些因素逐渐形成潜在的社会舆论时，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领域内遇到的反弹便显示出来。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艺领域时，问题就更为明显。文艺和自然科学不同，这是“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尤其可以专权的地方。旧知识分子掌握的自然科学不能不学，旧知识分子掌握的文学艺术却可以完全封闭。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文艺生产最贫乏的年代，也是文艺最专制的年代。一个十亿之邦的伟大民族所呈现出来的全部艺术成果，就是八个“样板戏”。

当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艺术都被野蛮地排除之后，这个红色革命所要缔造的红色世界的确显出了空前绝后的“革命性”。紧跟江青步伐前进的文艺界造反派人物于会泳，1968 年 5 月 23 日在《文汇报》发表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曾经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突出”的口号：“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二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

这种“三突出”的原则是对林彪关于军队工作“四个第一”原则的完全模仿。如果说林彪企图用“四个第一”的原则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那么，江青、于会泳则要通过文艺“三突出”统一文学艺术创作。

文化艺术是最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精神产品生产领域。在“三突出”口号的统治下，中国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贫乏、单调、乏味到极点。任何革命的理想和宗教的狂热，都难以消灭一个民族在文艺产品消费方面的真实胃口。整个社会对单调而专制的文艺慢慢形成的不满情绪，在 1969 年 4 月－1971 年 9 月的两年多中逐步滋长。随着人们逐步在政治的漩涡中清醒过来之后，不满的情绪野草一般从冻土中露出头来，并在随后的一些年中越长越茂盛。

当然，这些反弹的力量暂时还都潜伏在红色政权的统治之下，潜伏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洪流之中。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面对的最广大的领域，就是物质生产领域。社会是要生存的，人民是要吃饭的，民族是要在世界上立足的，如果说文艺这样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可以大规模扼杀，教育领域内知识技术的再生产可以较大规模地停滞，然而，物质的生产是不能停止的，这是再空想的政治也不得不承认的基础生产。毛泽东之所以讲到“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之所以在 1970 年就恢复了大学招生，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不得不屈从于物质生产本身的需要，教育不过是为物质生产提供脑力型劳动力。

在广大的物质生产领域，文化大革命遇到了最大的、也是最普遍的反弹力。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的最大对立面，就是价值规律及整个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了对付这个对立面，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动用更多的政治强制性力量，“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大批判尤为紧密。

《红旗》杂志 1969 年第六、七期发表了《政治统帅经济，革命统帅生产》；1969 年第八期发表了《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1969 年第十期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1970 年第一期发表了《正确处理抓革命、促生产中的几个关系》；1970 年第二期发表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红旗》杂志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内，就发表了如此之多的重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章。

在《红旗》杂志 1969 年第六、七期合刊发表的又一篇文章《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中，这样论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忘记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阶级敌人篡权就看不见，修正主义路线就认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

社会主义企业就保不住。”“只有彻底破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才能破在要害处；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才能立在根本上。”

在这里，“利润挂帅”、“物资刺激”等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其实不过是游荡在红色掌权者面前的价值规律的幽灵。用强化的政治批判鞭策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政治而生产，似乎是有力而简便的手段；但只要时间稍长，必然显出疲乏无力。

要求企业不为利润生产，要求工人不为自己的报酬生产，这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成立。如抗美援朝期间，当民族矛盾激化时，工人阶级普遍不要报酬地加班加点。然而，将战争状态下才有的“共产主义”常规化，永久化，是违背历史规律的。特别是当劳动者逐渐看清了红色政权掌权者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大相径庭时，他们无论如何都难以长久地接受这种安排。他们虽然不懂得《资本论》，但是，他们不自觉的行为表明，他们知道自己劳动力的价值。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的真正历史地位。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口号。所谓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全面专政，就是大规模地批判，以此强化对劳动阶级的统治，然后，用这种政治统治的压力迫使每个人更多地劳动付出。在这里，利益不是劳动的动力，畏惧才是劳动的动力。

然而，生产毕竟要依靠广大生产者，阶级斗争不可能打倒生产者中的大多数，因此，畏惧逐渐变得有限了。统计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可以看到，“抓革命，促生产”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号之一，也是越来越贫乏无力的口号之一。当这个口号最后的几年像标签一样张贴在各处时，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对它麻木不仁。

对“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的各种消极抵制，是文化大革命红色政权的统治遇到的最广泛、最“和平”、也是对抗性最大的反弹。

二、林彪军事官僚集团的覆灭

中共九大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在看来一片大好的形势中，出现了重大危机。这个危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是不为当事者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开始的。

1970 年，毛泽东认为，应该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了，因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已经重建，共产党掌握的国家最高政权也该重建了。3 月 8 日，毛泽东做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有关指示，并且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1970 年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指示。

4 月 11 日，林彪抓住时机，提出一个在他看来很重要的意见，要求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他说：“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这条意见当然无人敢于反对。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都赞同林彪提出的“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一次，林彪似乎又扮演了推崇毛泽东的角色。

然而，4 月 12 日，毛泽东便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提议的报告上做了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十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明确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明确表态。

到了 1970 年 7 月中旬，正值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明确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至此，毛泽东的声音已经十分明确，然而，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仍然没有收回。

在这里，也许是林彪错误地判断了毛泽东。他以为这个提议无论怎样都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绝对领袖地位的维护，然而，他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的态度何等坚决。首先，毛泽东本人不愿意担当国家主席，处在繁琐的国务活动的第一线，同时，他也绝对不会允许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把持第一线工作的格局再版，任何大权旁落的情景都不可重演。如果说，林彪最初的提议在他看来是一个拥护、忠诚的表现，那么，到他第四次坚决表示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被强加意见时的不快。

林彪显然没有看清这些，他也许正被自己推崇毛泽东的一贯成功所激励，又被叶群等人的狂热活动所推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一股潮流的领袖。这股潮流是由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他的儿子林立果（此时已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个军事官僚集团及其基干队伍组成。

林彪在处理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一贯十分谨慎，他非常注意对自己的宣传提法的分寸，绝不允许丝毫喧宾夺主的倾向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但这一次，他被自己的野心、更主要是被簇拥他的潮流搞晕了头脑。叶群就曾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总之，提议设立国家主席，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当毛泽东不担任时，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这或许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林彪集团需要抬高林彪的地位，由此获得这个集团所有人的利益。这些利益汇集的结果，成为推动林彪坚持此举的潮流。

8 月初，叶群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8 月 13 日下午，吴法宪便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宣称："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这里，他们已经开始把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这个文人官僚集团。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出林彪军事官僚集团与江青文人官僚集团在联合夺取国家权力胜利之后逐步展开的矛盾斗争。

这一时期，江青等人可能更领会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图，因此，逐渐表现出与林彪提议的对立。被九大的胜利晕热着大脑的林彪及其集团，一定觉得这样做是很有利的行为，孰不知，他们已经迈出了异常危险的步伐。

1970 年 8 月 23 日－9 月 6 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这个大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讨论战备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在这个会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让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第五次表示了自己的反对，他甚至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这一条）。

正是在 8 月 23 日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林彪做了一个自认为非常精彩的讲话，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这里，他已经把“国家元首”这个称号冠在了毛泽东头上。这是他的设国家主席、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提议的含蓄再版。

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把对毛泽东的推崇上升到新的高度，提出了“天才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当他论述了毛泽东的天才，论证了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之后，他以为自己又做了一件万无一失的事情。

叶群为首的林彪集团成员经过一轮紧锣密鼓的活动，试图扭转全会的原定议程。8 月 23 日晚，吴法宪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提出，建议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学习和讨论。他的意见被政治局通过。第二天，8 月 24 日，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二中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及西北组发言，将林彪 23 日的讲话扩展为一个支配全会的潮流。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国家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还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翻案？”

吴法宪则在西南组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作者注）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吴法宪还与同一小组的张春桥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

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做了类似的讲话和表演。

他们都在“捍卫”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当然，就包含他的国家主席的地位；都在捍卫毛泽东的天才地位；这些捍卫的行动自然联系到最高领袖论及“天才论”的提出者林彪。这是一个“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攻势，在那个领袖崇拜弥漫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时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附和。小组会上出现了热烈希望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提议。

8 月 25 日，江青将全会小组会的情况对毛泽东做了汇报。江青、张春桥等人自然在这种进攻中感到了他们正是林彪一伙人的对立面，九大召开后的两年时间中，两个集团的矛盾终于激化了。

凭着对政治局势的高度敏感，毛泽东立刻嗅到了这里的气味，也看出了有关设不设国家主席提议后面的政治内容，他迅速采取了行动。

8 月 2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全会停止讨论林彪 8 月 23 日的讲话，并收回了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这个《简报》以极为热烈的口气肯定了陈伯达在小组会上的讲话，表示了对林彪开幕式讲话的高度推崇，甚至发出了对一切反对“天才论”的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政治口号。该《简报》还提出，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的建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随后，26 日－27 日，周恩来、康生又接连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令他们做出检查。然而，林彪集团还在用各种方式串连、活动和抵制。

毛泽东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透过所谓让他当国家主席与“天才论”的舆论，毛泽东看清了林彪一伙的政治动机。对于这个利令智昏的潮流，毛泽东认为，只做和风细雨的正面工作，并不能有力地解决问题。根据党内斗争的经验，要打掉任何干扰大方向的潮流，必须采取简练而有力的手段。

就像他曾经用拿掉“杨、余、傅”解决“二月逆流”翻案风一样，也如他打掉“王、关、戚”而排除了极“左”潮流的干扰一样，那样的政治斗争手段才是简洁而警醒的。这一次，他决定拿陈伯达开刀。因为陈伯达已经跑到林彪的阵营里，成了这个山头呼风唤雨的人。

8 月 31 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搞的一份材料《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并将两者印发给全会。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大有泰山压顶之势，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相互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用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探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能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且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得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我的一点意见》在印发全会之前，毛泽东曾给林彪看过。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毛泽东采取了保护林彪、稳定林彪的策略。而对陈伯达则可谓毫不留情，老账、新账一起算。随着陈伯达的覆灭，全会的形势立刻急转直下，批判陈伯达成为全会的最主要内容，“批陈整风”也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批修整风”运动。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似乎并没有想搞掉林彪。就像他搞掉“杨、余、傅”后，又留住了叶剑英、陈毅等“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一样，也如同他搞掉了“王、关、戚”，却保护了中央文革主要成员一样。此时搞掉陈伯达，是一个分寸得当的处置。对于林彪集团如何处置，要走着看，看着办。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采取的行动，表明了他在政治上一贯的老练。

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事情发展得非常迅速。

在“批陈整风”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的锋芒一直或深或浅地指向林彪集团。作为高度警觉的政治家，毛泽东也防患未然地对林彪控制下的军权做了必要的调整。特别是像北京军区这样的要害军权，毛泽东以陈伯达是北京军区“太上皇”的说法，在“批陈”的旗号下进行了整肃和改组。

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妥当策略。林彪集团如果逐渐安守本分，以上措施无疑已规范了他们，消除了权力结构不平衡的隐患。如果林彪集团崛起为一个巨大的危险势力，那么，他也已经布成了搞掉它的大局势。

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出人意料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似乎已是一片太平景象，无论在毛泽东那里，还是在林彪那里，都没有意识到事情将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九届二中全会的冲突一下子改变了形势。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凭着本能的政治警觉与防范，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林彪势力的措施。而林彪集团同样出于政治上的警觉和不安全感，开始采取一系列紧迫的对抗性活动，以至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了准备军事政变这个极端的程序。在此过程中，有一大篇为当代中国人所熟悉的惊险故事。本书无意重复这些故事细节，本书的视点依然是概括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过程，并揭示其实质。

到了 1971 年夏季，无论是林彪对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对林彪，对对方都有了十二分的警戒。毛泽东深知林彪在这些年中建立起来的影响和势力，也深知与林彪的冲突发展到今天应该做好哪些斗争准备。对于党内、军内的力量，他必须做出部署。在与他亲自树立的“副统帅”的斗争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行动。以往，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以及其他党内高级干部时，他可以让林彪、让中央文革出面，然而，今天要解决“亲密战友”林彪的问题，只有他亲自发出的声音，才能说明一切。临近八十岁高龄的毛泽东不得不再一次亲临一线，做出重大的政治、军事、战略部署。

1971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开始文化大革命史中有着重要一页的南巡活动，他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停留，接见了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

浙江、上海、南京、安徽、江苏、广州等很多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在南巡过程中，他把九届二中全会及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斗争讲清楚了，将陈伯达及林彪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的问题摆出来了。对林彪本人，也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了批评和警告。对个别跟着林彪势力鲍的军队负责人，实行了严厉的威慑。对大多数党政军负责人，做了发动和安排。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毛泽东已将与林彪集团斗争所需要的党政军的力量特别是军队的力量调配好了。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紧急策划了谋杀毛泽东、实行军事政变的活动。然而，由于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充分，也由于毛泽东足够地警觉，当毛泽东于 1971 年 9 月 12 日下午回到北京时，已经预示着林彪集团的军事政变归于失败。9 月 12 日下午，在北京丰台火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在谈话中，依然把林彪放在要保护的位置上。也许那时的毛泽东还不清楚林彪集团具体的政变阴谋。

然而，阴谋家自己先行恐惧了。1971 年 9 月 13 日零点三十二分，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北戴河机场漆黑的夜色中强行起飞。这架飞机载着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飞往苏联，在飞机越出国境前，周恩来向毛泽东紧急汇报，请示是否将其击落，毛泽东只回答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13 日凌晨两点三十分，这架飞机在飞出国境后四十分钟左右，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随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集团的主要干将被一网打尽。

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并显赫一时的军事官僚集团，就这样覆灭了。

三、历史制造的野心

我们对林彪事件做了最扼要的概括，这个概括为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分析提供了最基本的事实。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内部的危机，而且，主要是政权上层的危机。所谓政权的危机，在这里的表现，就是权力结构严重地失去了平衡状态。

权力结构像世界上其他的一切结构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权力结构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最基本的要求是相对于一个中心，周围各种力量有比较均匀的分布。倘若力量集中在中心的一侧，中心就不成为中心，权力结构便失去平衡态，必然发生倾斜和变化。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毛泽东自然懂得这一点。如果这个政权中除了林彪集团只有他一个人，那么，就没有他的中心位置。在九大的政治局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权力结构的平衡态构造。

国民经济政府部门，是周恩来等人在掌管。这一稳健和务实的力量，无疑有助于平衡林彪、江青这些激进的文革派力量。有文革派在前面冲锋陷阵，有务实派在后面照顾国计民生的大后方，毛泽东居中自觉很平稳。

在文革派中，林彪、叶群、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后来还有陈伯达）等一伙人与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谢富治一伙人又各在左右，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对于毛泽东也是一个平衡态。武的权力在林彪手中，文的权力在江青们手中，谁都难以专权，毛泽东的居中位置当然十分稳定。

就军权而言，毛泽东也远没有麻痹到让林彪全部控制。像许世友这样一批历来只忠于他本人的军内高级将领的存在，构成了对林彪军权的多方面限制和制约。更何况毛泽东在全党、全国包括在全军享有的不可动摇的极高领袖地位。仅就军内的实力和影响而言，林彪都远远无法构成对毛泽东绝对领导权的威胁。

任何一个能够理智评估 1969 年、1970 年及 1971 年中国权力结构的人，都能看到林彪绝对没有向毛泽东领导权实行挑战的可能性。然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说明这种“挑战”出人意料地开始了。

分析起来，主要原因有两条：

第一条原因，在九大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治局这个最高权力中，虽然有着围绕毛泽东这个中心均匀布开力量的大致的平衡，然而，也已经出现某种不平衡了。那就是，林彪集团控制了太多的军权，同时也过多地控制了政治权力。林彪等六人（后来又有陈伯达）加入二十一人的政治局，本身已是一个不平衡现象。

这种不平衡现象可能在政治上表现出来，也可能不表现出来。之所以表现出来，而且又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就涉及到第二个原因，即林彪集团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家集团。

所谓野心家集团，就是它在政治上不那么安分，充满了扩张权力的冲动，是一个在政治上有着疯狂扩张趋势的军事官僚集团。不仅林彪本人是典型的野心家，他的集团就是典型的野心家集团。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二十四岁时就平步青云，担任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吴法宪更进一步讲，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

1970 年 7 月 31 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做了整整一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用以树立他的政治权威。就是在这个报告会上，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全场数十次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并把林立果的报告吹成是“天才，超天才，全才，全局之才”。

这丑恶的一笔，注释了林彪集团处在何等忘乎所以的疯狂之中。封官许愿，是这个集团的兴奋剂。结党营私，是这个集团的组织原则。这个集团从上到下的每个人都像林立果一样，做好了迅速攫取更大权力的准备。当林彪嘱咐林立果“要多见见军级以上的干部，否则没有领导权”时，当叶群为林立果安排“选美”时，已然摆出一个十足的要夺取未来国家领导权的架势。

这个充满权力扩张冲动的集团，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步形成的。

最初，是林彪一个人浮出海面。他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特殊表现，使得他不仅取代彭德怀担任了国防部长，而且从此以“捍卫毛泽东思想”为晋身的阶梯，一步步登上了权力高峰。在文化大革命前及文化大革命中，他大胆而谨慎地借用了毛泽东要发动党内阶级斗争的需要，使得自己一步步接近了最高权力的宝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利用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需要，扩大了自己的

权势。

同时，他也借助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将黄、吴、李、邱这些人物更紧密地聚集到自己身边。当邱会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生活腐化被解放军总后勤部造反派批斗时，林彪一个亲笔手令就将邱会作保护起来，再用所谓“大节小节论”为邱会作进行了根本的开脱，从此，邱会作视林彪为自己的再生父母。

在党内阶级斗争中崛起的林彪，和在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中团聚起来的林彪集团，面对文化大革命这种打倒一大批人的政治斗争，无疑找到了一个急剧发展权力的机会。

这种急剧发展权力的过程，使得林彪及林彪集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处在权力扩张的冲动之中。

就整个集团来讲，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可遏制的冲动与潮流。在集团性的冲动与潮流中，首脑与成员之间，成员相互之间，都在互相推动。利令智昏，使得他们对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形势失去了清醒的判断。

以历史的眼光看来，特别是在一个旁观者看来，林彪及其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动是极为愚蠢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愚蠢行动。

是野心蒙住了双眼。

这样，我们就该谈到所谓野心问题了。我们暂且不对“野心”二字做十分科学的定义，仅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它。

野心原本是人类社会一个平常的现象，政治野心原本是平常的政治现象；然而，当大量的、超常的野心在一个时代集中暴露出来时，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了。

对一个人来讲，有没有政治野心，有多大的政治野心，完全因人而异；而对一个时代来讲，有多少政治野心，有多大的政治野心，则是因时代而异的。

可以断言，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大数量的野心实行的一场“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到了林彪及林彪集团的政治野心。我们看到了江青及其代表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批新贵的政治野心。我们也看到了红卫兵、造反派中各种各样的政治野心。文化大革命需要借助他们的野心；而借助野心就发展了野心。文化大革命每一阶段的故事，差不多都包含着这个逻辑。

所谓政治野心，就是极端的政治权力追求，就是极端的权力欲望。毛泽东之所以需要一个集团、一个集团的野心，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野心，甚至需要全社会各种各样的野心，是因为他面临着一个非常巨大的敌人，那就是被他定性为“党内修正主义”的势力。究其实，那不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当毛泽东和这个必然规律作斗争时，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所以，他“解放”了一切可以与之斗争的力量。

这些力量被先后发动起来之后，展示了各种极端的能量，也展示了各种极端的政治野心。

可以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充满政治野心的历史阶段。

当这些蓬蓬勃勃的政治野心将造反的利剑刺向历史固有的经济规律时，它们似乎无坚不摧，各得其手。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野心的利剑纷纷折断，遍体伤痕的商品经济却像一株不死的铁橡树，越来越高大地成长起来。

那些野心的断剑锈迹斑斑地散布在大树的周围，点缀着世俗的草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是历史第一次向毛泽东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第十二章 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1971 年 9 月－1974 年 12 月）

无论多么复杂的社会，无论其中包含着多么复杂的矛盾和冲突，无论是多么复杂的结构，又总有简单的方面。这个简单的方面就是，在人类历史的很多阶段，都含着一个主要的矛盾与冲突：一个体现历史明天的潮流与一个体现历史昨天的潮流相互对抗。

正是在这两大潮流的对抗之中，社会在发生变化，

其他各种中、小潮流不过纷纷汇集或被里挟在这两大潮流的冲突之中。

一、“右倾回潮”的 1972 年

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将 1966 年 6 月 1 日开始到 1976 年 10 月结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分为二：前五年，是文化大革命的上升阶段，由发动，历经一轮轮斗争，直至九大达到胜利的颠峰，这个胜利的状态一直维持到 1971 年的 9 月 13 日；其后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破碎和失败了，然而，毛泽东还在非常顽强地、又是勉为其难地支撑着。

“九・一三事件”对很多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件。那些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和冲击的老干部，无论是周恩来、邓小平，还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们，自然深感庆幸。及至后来，连红青、张春桥等人也都庆幸，因为林彪集团的覆灭给了他们扩张锣力的更大空间。

惟有毛泽东受到了沉重打击。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被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黯淡了。他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伟大举动，所谓“马列主义的第三里程碑”，由于“亲密战友”的背叛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整个世界的质疑。只有毛泽东能够深刻感受到林彪集团覆灭的严重性质，深刻感受到必须承受的压力。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这一打击毁掉了这位年近八十高龄的政治家最后的蓬勃生命风光，衰病之相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然而，他的历史任务似乎还没有完成，他只能依然纵横捭阖地领导着中国革命的进程。

1971 年 10 月 3 日，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等人负责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同年 12 月 11 日，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

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发给民众讨论，把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告知了全社会。随后，1972 年 1 月 13 日和 1972 年 7 月 2 日，又先后发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并由此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党政军内，清洗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及骨干分子的斗争则是从“九一三事件”一发生就立即开始进行的。

在对林彪集团的清查过程中，毛泽东最先做出的是党政军上层人事调整及政策调整。1971 年 10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的同一天，毛泽东决定撤销林彪时期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第二天，10 月 4 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指出：林彪的“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这等于完全否定了林彪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还特别着重指出：“军队政治教育，主要是搞路线方面的教育。”而对“路线方面的教育”，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那就是“要批判林彪的反马列主义路线。”

对林彪路线的否定，必然率先影响到曾经和林彪有过尖锐冲突的党政军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1971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他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毛泽东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更公开的姿态是，1972 年 1 月 10 日，他亲自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讲“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对军内一批高级将领的政策调整，无疑是林彪集团覆灭后毛泽东的一项重大政策调整。

恰逢中美两国关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试探、接触，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1972 年 2 月 21 日，毛泽东在京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至此，中美长期的对抗解冻，两国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这是毛泽东面对主要来自苏联方面的政治军事威胁所做的国际范围内的大的战略关系调整；另一方面，这个外交行动无疑汇入了 1972 年中国国内政策向温和方向变化的潮流之中。

有关中美关系变化的说服和解释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逐层传达，更松动和暖化了长期被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张的中国人的心理。中美关系的和解，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为他的民族所做的明智之举。

当 1972 年的温和化倾向延续到夏天时，毛泽东又做出一个看来自然而然实际上却极为重要的行动，这个行动甚至长远地影响到他去世之后的中国社会，那就是对邓小平落实政策。

1972 年 8 月 3 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林彪的问题。8 月 14 日，毛泽东就对邓小平的信做了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这就为邓小平的逐步复出打开了大门。

这一年夏天，根据毛泽东的精神，1972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这个《决定》中指示："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以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随后，在全国"批林整风"的过程中，随着各项政策的调整，全国范围内的"三支两军"停止了。军管、军训、支左的军宣队和军事人员都撤离了地方。

这件事对全国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虽然这似乎是各级党委政权重新建设完毕自然而然的结果，然而，人们普遍地把它和"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政治形势大变化联系在一起。原来高度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似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松动、和缓。这给了各阶层人民以新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又做了一件自然而重要的调整，就是把更多的信赖给了周恩来，更加倚重他在全国范围内的管理作用。而周恩来也便在 1972 年比较充分地施展了他的才能。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意义的"贤相"，具有一流的行政才能。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行为都贯穿着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就这一点而言，周恩来的严谨是政治上高度警觉的毛泽东也无可挑剔的。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讲，他或许有可能犯政治错误，但是绝不会犯组织错误。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典型的从不超越党和国家正常程序而进行任何个人色彩活动的一丝不苟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恪守的第二个原则是：尽可能地保护干部，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国民经济。他在这方面呕心沥血、力所能及做了大量工作，这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众望所归的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中，他是毛泽东与党内很多受冲击干部之间的缓冲带。一方面，他极力化解那些受冲击干部的对抗情绪，使他们以更理智的态度接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又用适当的方法缓和毛泽东某些激列的情绪和做法，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性。他的整个努力都做得极为细心、周到。

在文化大革命政治与现实的经济之间，周恩来也尽可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以保护国家的经济底盘少受破损。

可以说，在大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是维持国家得以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衔接了方方面面，连通了各种必要的渠道，使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有机体尽可能得以正常生存。

在周恩来看来，林彪集团的垮台无疑是极"左"路线的失败。根据共产党内历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周恩来认定，这是一个批判极"左"路线的时机。1972 年，在他比较得手的操作中，中国出现了全面的温和化回潮。

在 1972 年的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提出了"工业、农业、商业、科学

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立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972 年 4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指出：“‘冲击’社会主义生产和业务的‘政治’，绝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修正主义的政治。”

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这篇经周恩来审查后同意发表的社论，发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时期，有关团结干部大多数的舆论，有关解放干部、正确使用干部的舆论，有关重申党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的舆论开始春风般和煦地吹过中国上空。

1972 年 8 月 1 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同程度冲击的高级干部，出席了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招待会。这既是为这批人重返政坛做了最初的平反，也成为全国范围内解放干部的一个象征。

对“八一招待会”与毛泽东一月份出席陈毅追悼会这两件事的公开报导，形成了 1972 年整个形势温暖回潮的最有利宣传。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全社会都感受到了新的潮流。

在 1972 年 8 月 1 日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这是周恩来一个极为机智的提法。坚决地提出要对极“左”思潮予以批透，同时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向，对批极“左”做了保护性的理论注释：“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

温和化的回潮，继续扩展。

1972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庆祝国庆二十三周年的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1972 年，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温和回潮的现象：关于要在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而提高原有文化程度较差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化基础的措施；关于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基础理论教学、重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措施；关于提高大、中、小学教材质量的措施；关于在农村尽快普及小学五年教育，减少文盲的措施等等；都迎着春天的暖风，纷纷拱出冻土。

在科技领域，复苏的活动也开始露头，各种学术杂志的创刊，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展开，都表明科学技术及知识分子队伍开始试探着着活动起来。

在周恩来操作的范围内，最重要的一块自然是国民经济。各种务实的做法和政策的变化，都开始提出并实施。在农业政策方面，甚至提到在“以粮为纲”的基础上允许全面经营，不要把多种经营作为“资本主义”批判。

除了公开报导的社会政策调整，我们还看到一些并没有公开报道的事情在广泛地发生着。

在这一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大规模回城。这股潮流迅猛地刮遍城乡，数以百万计的农村知青点几近寥落无人。当知识青年争先恐后地寻找门路卷起行李撤离农村时，在黄土高原住宿过知识青年的窑洞中，一片狼藉的场面及被油灯熏黑的土墙上那残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画，不过说明一段历史已经过去。这同样预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红色社会与红色理念在开始崩溃。

当“大回潮”显示出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广大力量时，他不失时机地发出了声音。1972 年 12 月 17 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指示，是针对全国将“批林整风”纳入批极“左”轨道的反拨。同时，当毛泽东把林彪定为极右，并将随后的“批林整风”纳入批右轨道时，他大概并不准备改变他在 1972 年的政策温和化调整。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在 1972 年底逐渐形成的完整战略，即在政治上、思想上将林彪归为极右，从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进一步坚持和深化“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政治上巩固文化大革命已有的成果；而在干部政策以及其他有关政策上（例如取消“三支二军”），则做出较大规模的温和化调整。

前者是对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坚持；后者则是某些政策上的让步。

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 年 12 月 21 日）专门针对“让步政策”，有过讲话。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历朝统治阶级都未对农民有过让步政策：“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摇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这里，毛泽东对自己论点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

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处在阶级对立之中这一本质，并不妨碍它在必要时采取让步政策。统治阶级的政策是进一步还是让一步，这是策略问题。进一步或让一步，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仅在愿望，也在可能；不仅在阶级利益，也在阶级力量对比。

当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其中的一个反映就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或进一步、或让一步的调整与变化。

离开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观看整个世界近代史，我们同样会看到，执政者的政策规定了它与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显示了执政者的力量与社会上各种力量的对比，政策的调整常常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反映。

在 1972 年，我们看到很多重大的政策性变化：“二月逆流”被平反了；陈云等一批干部被平反了；邓小平被平反了：军宣队、军管会被撤销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实际中被否定了；对工农兵学员要进行文化补课了；经济工作开始更多地务实了；冲击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均被定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这一切政策的变化，都含着一个本质，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些政策调整很多是毛泽东本人做出的，以为这是稳定局势所需要的策略，然而，他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些做法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已有成果的否定。这不是他个人自觉做出的否定，而是历史迫使他做出的否定，是整个国家阶级力量对比、各派政治力量对比迫使他做出的否定。

在林彪集团垮台之后，毛泽东不得不为“二月逆流”平反了，不得不对邓小平等人落实政策了。不这样做，大的政治格局是维持不下去的。一贯懂得顺势而为的毛泽东只能这样行动了。

经过复杂的政策位移，毛泽东似乎又处在新的政治格局的中心位置上。

然而，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位移，却为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全部基础。

如果说林彪集团的垮台是历史第一次对他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那么，毛泽东为顺应形势而做出的政策调整、重整格局的全部努力，则在造成历史第二次、第三次向他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1972 年的毛泽东和 1972 年前的毛泽东一样，他的行为是历史的规定。他同样别无选择。

二、毛泽东的反潮流

作为 1973 年的开门布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又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篇社论把全国范围内的“批修整风”运动（也即党内的“批林整风”运动）完全纳入了批判极右的轨道。

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也就是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将林彪路线作为刘少奇路线的延伸，为林彪事件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规定了基本的纲领。

有了这个政治上的根本措施，毛泽东又找到了把握全国局势的整体感觉。

林彪事件虽然给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宏伟蓝图以沉重的打击，然而，到了 1973 年夏天，他似乎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可以比较从容地处理国际事务了。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6 月 22 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我们都是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在以后的外事活动中，他对此有过更加明确的说明，也就是将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定为第一世界；将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定为第二世界；而发展中国家，包括除日本之外的整个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这个世界格局的理论，反映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

这是一个既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又十分务实的战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务实的战略。它反映了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及中美和解之后的某种务实主义倾向。同时，还与他

在国内较大规模地解放干部、调整相关的政策有著令人难以觉察的内在联系。

当然，在国际战略上的务实，远不能导致他在国内战略上根本的务实主义变化。他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基调下，他推进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前进步伐。

1973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通过并批准了“中央专案组”于 7 月 10 日提出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永院开除出党，并撤销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党内外一切职务（林彪、叶群已死）。

随后，1973 年 8 月 24 日－8 月 28 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了。这个提前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九大党章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主要是对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做出总结，并完成最高权力机构的重建。

总结是不容置疑的，是全党一致通过的。对于林彪集团叛党、叛国分子的处理，是不可能有任何反对声音的。林彪摔死在中国的国境之外，为在全党、全军、全民中打倒他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

十大最关键的，是重申了“批林整风”的实质是批判极右，是批判“修正主义”。随后做出的最高权力机构的调整，也是顺理成章的。九大二十一人的政治局中，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谢富治等八人被除去，增加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汪东兴、韦国清、陈永贵、纪登奎、李德生等八人。其中，王洪文、康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另外三个副主席是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

我们看到，由于王洪文、康生成为副主席，十大不但没有削弱江青集团的力量，反而扩大了他们的力量。林彪势力的覆灭，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王洪文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起来，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还特别提出要敢于有“反潮流”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为林彪事件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提供新的政治思想保证。

1973 年的中国局势，表面上显得相当平稳。这种平稳既让毛泽东感到文化大革命处于低潮的黯淡，也让他感到某种不可觉察的不安全性。因此，一个特别的新想法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渐形成，这就是“批孔”。

在 1973 年 5 月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孔”的有关指示。到了 7 月 4 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时又专门讲到“批孔”的问题：“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在这里，作为一个要批判的对立面，毛泽东将孔子与林彪联系在一起，还特别提出了郭沫若的尊孔立场。

毛泽东在这个夏天提出的“批孔”，是在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开始萌发的。“九·一三”之后，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在林彪住处搜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孟子的材料，报给了毛泽东。这些材料当时只是为数很少的几页，然而，到了后来就有反孔尊法（法家）的思想、又正希望能够找到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新文章的毛泽东手里，无疑是恰逢其时的。

在此之前的 1973 年 2、3 月间，毛泽东曾在一首诗中批评过郭沫若的尊孔：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而到此时，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明确了要将“批孔”与“批林”结合在一起的战略。1973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又写了一首批判郭沫若尊孔的七律，并念给江青听：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从这时起，“九·一三”之后寂寞了将近两年的毛泽东又找到了一篇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大文章。这篇批孔的文章对他来讲一定特别珍贵。因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个阶段，已经很难有推动全社会的新动力了。林彪事件涣散了中华民族对文化大革命的绝对信仰。在相当沉闷的形势中，将孔子这个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存在拿过来批判，并将其和林彪、刘少奇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影响和能量将可能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海瑞罢官》。

因为毛泽东确实尊法反儒，而推动这件很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又十分符合他的本性，因此，在他即将进入八十岁高龄时，又一次焕发出发动一场革命的冲动。

就在这一年夏天，8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 月 4 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北京日报》以显赫的位置发表了批孔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随后，在 9、10、11、12 这四个月中，中国的主要报刊及杂志都发表了大量的批孔文章。《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的署名“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可以视为这一时期批孔文章的代表作。

在逐步发动起来的“批孔”运动中，毛泽东于 9 月 23 日会见埃及总统沙菲时说道：“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

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这段讲话明确地表明了毛泽东尊法批儒，尊秦始皇、批孔子的立场。

一个一贯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共产党领袖，今天以如此坦率的方式公开讲明自己尊秦始皇、反孔子的立场，不能不说是形势使然。

毛泽东在 1973 夏天坦言自己对中国法家的尊崇，是有着十分充实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的。他已经在理论上构造了一个“批林批孔”的体系，为在林彪事件中受挫的文化大革命找到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课题。

如果说孔孟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一个潮流，他十分愿意反一反这个“潮流”。

在 1973 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低谷中，他尤其重视反潮流精神，也尤其提倡反潮流精神。因此，当福建省莆田县一位中学校长李庆霖给他写信，反映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活困难时，毛泽东不但亲笔回信，寄去三百元钱，而且称誉他为“反潮流的英雄”。

这个落实知识青年政策的举动与提倡反潮流的精神结合在一起，显得十分地突兀及不和谐，然而，却产生了奇特的作用。一方面，它提醒各级政权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境况的关注，缓和了全国数千万知识青年及其家庭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为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树立了典型。

在这一年的 6 月，又有一个“反潮流的英雄”出现，他就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境内的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当他参加大学招生的文化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卷纸后面写了一封信，在表白了自己在农村劳动业绩的同时，对这样的文化招生考试表示不满。很快，张铁生就被毛远新在《辽宁日报》上宣传为“反潮流的英雄”。

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白卷先生”，在 1973 年的夏天显得特别珍贵。毛泽东准备用“批孔”这样的大行动，加上李庆霖、张铁生这样的反潮流的石头，抛出来继续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

1973 年 12 月，毛泽东从全国政局出发做了一个大动作，那就是实施解放军八大军区司令的对调。这是在十大上已被选为中央委员的邓小平提出的建议，毛泽东采纳了。197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话。随后，于 12 月 13 日、14 日和 15 日，又同政治局有关成员以及几个大军区的负责人谈了话。他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的问题，还十分威严和旷达地说道：“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在这个讲话中，他把邓小平推了出来。用他对几大军区司令的话说，他为他们请了一个“军师”。参加会议的邓小平由此很快重现于政治舞台。

毛泽东运用推出邓小平的方法更顺利地完成八大军区司令的对调工作，使每个军区司令都离开自己多年的经营之地，这无疑是加强党指挥枪的重大战略部署，并且是只有毛泽东亲自出面才能做到的事情。

当毛泽东以全党、全军当然领袖的姿态无所畏惧地谈“不怕打仗，欢迎打仗”时，这是威摄全党、全军的有力语言。

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还重申了李庆霖和张铁生的“反潮流精神”。他在每一个具体的政治、军事、思想及文化的策略行动中，都不失时机地贯穿着反潮流的路线。

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在谈话中，他又提醒道：“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被毛泽东不断重复的说法，后来被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以及打倒刘少奇做了注释。现在，毛泽东在十大之后又提出这样的警告，其含义是什么呢？这是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党政军高层人物都要警醒和思索的。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这种警告首先是对整个党政军上层的威慑。无论有没有“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只要一发出这样的警告，就有泰山压顶的威摄力。这是毛泽东成功地完成八大军区调动这类行动必要的思想态势。

接着，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九·一三事件”之后逐渐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比较放开手脚的周恩来。1972 年出现的“右倾回潮”自然是与周恩来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关于“要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提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指向周恩来的。

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知道，周恩来对毛泽东领导的一贯服从以及在政治上绝不超越合法组织程序进行任何个人色彩行为的谨慎，似乎还没有能够成为毛泽东要批判和斗争的对象，那么，毛泽东的警告一定是指一个更为宽泛和普遍的社会性潮流。

这种修正主义潮流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经危险地存在着，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在林彪事件之后，一定又危险地表现出来。周恩来可能在这个潮流之中，也可能在这个潮流之外，或者与这个潮流有某种关系。毛泽东的视野中包括了周恩来，同时，又绝对是超越了周恩来，提出了历史性的大问题。

当毛泽东提出反潮流时，其潜台词无疑是，张铁生等人所反对的，乃是在当今社会上占着某种统治地位的潮流。这对于已经进行了七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确实是值得分析的。

一，当我们说社会潮流时，只是一个大致的比喻，不过是将自然界江、河、海中的潮流，比喻了社会中的各种运动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既在自然之中，又在自然之外，既在四维的时空之中，又在四维的时空之外。对于社会的诸种运动，有时也许要用多维时空才能够予以描述·这里无疑有很多文化学的问题值得探究。

然而，无论多么复杂的社会，无论其中包含着多么复杂的矛盾和冲突，无论是多么复杂的结构，又总有简单的方面。这个简单的方面就是，在人类历史的很多阶段，都含着一个主要的矛盾与冲突：一个体现历史明天的潮流与一个体现历史昨天的潮流相互对抗。

正是在这两大潮流的对抗之中，社会在发生变化，其他各种中、小潮流不过纷纷汇集或被里挟在这两大潮流的冲突之中。

二，毛泽东本身代表着一股潮流。这是在他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在这个潮流中，我们看到了如下具体潮流的综合：

第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包括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更包括“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有着极大影响的一个方面。

第二，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对所有制的不断征服和不断集中、控制的趋势。

第三，用政治动员经济，大搞群众运动的惯性。

第四，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

第五，其中包括平均主义思潮。

第六，还结合了封建主义政治的某些模式。

第七，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崇拜。

第八，一个主要成员来自农民的政党所含有的对待知识“特权”的畏惧与抵制。

这一切合成了毛泽东的潮流。这个潮流决定了毛泽东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一直坚持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它的核心问题，是反对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是反对商品经济造成的一切“不平等“和“特权”。

三，我们接着便分析到刘少奇所代表的潮流。

第一，从宏观上讲，它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的规律显示出来的力量。

第二，一个管理现代国家的政治力量，必然会感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必然会受到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腐蚀”。

这种现代经济的“腐蚀”，其范围之广大、程度之深厚，要远比惩治贪污腐败意义上的腐蚀困难得多。因为前者是历史的趋势；后者则是与趋势无关的社会疾病。

第三，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正是在管理国家的政治力量所受到的感染中，相应的科技文明和知识“特权”逐步形成。

第四，相应的精神产品生产（如文学艺术）的市场化趋势。

第五，相应的管理技术的价值显现出来。

第六，相应的知识分子阶层与管理阶层的地位逐渐上升和扩大。

第七，相应的与现代国际社会的接轨逐渐形成并扩大。

这一切又都会使一个管理国家的政治力量受到感染，受到“腐蚀”。

四，我们就可以对比地看看毛泽东所代表的潮流与刘少奇所代表的潮流之间的相互关系了。

这种相互关系在本书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多方面讲到，这里则要再一次重申：毛泽东的潮流在过去曾经是一个主流；随着历史的发展，刘少奇代表的潮流越来越显出更大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力量对比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延安时，毛泽东的潮流一统全党。那时，并没有刘少奇所代表的潮流与之相对抗。当全国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有的还是十分优越的生活）跑到延安的窑洞里参加革命时，显示了毛泽东潮流的巨大吸引力。那时的吸引力是什么，同样可以分析。

随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进了城，事情开始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当刘少奇代表的务实主义路线作为对商品经济的感应表现出越来越可怕的“修正主义”危险时，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潮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过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及民众的革命造反活动中表现了出来。整个革命造反的潮流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力量。毫无疑问的是，这绝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愿望和权力所致。用毛泽东的话讲，权力是广大人民群众给的。

这确实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力量。包括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建设文化大革命中新社会的行动，依然有来自社会的广泛能量的汇集。

“清理阶级队伍”时，群众中有相当一些人十分积极地投入，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倘若全民抵制，任何军宣队的领导都不足以实现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六厂二校”的经验中我们看到，民众中有相当一些人到 1968 年还热衷于精神上对领袖的绝对崇拜和行动上对阶级斗争的推动。

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运动中，我们既看到了工宣队及整个工人阶级的意气风发、欢欣鼓舞，也看到了大、中学校里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某种心甘情愿的服从。

至于在“五七干校”风潮中，我们除了看到当时红色政权的各级领导者表现出的积极行为外，还看到了相当多数的机关干部在最初也是怀着一定程度的欢欣鼓舞奔向“五七干校”的。除了在“五七干校，中遭受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冲击的部分人，整体上“五七干校”的干部在一个时期内真觉得干校的天最蓝、干校的地最宽，他们曾那样理想主义地、怡悦地从事生产劳动。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与 1958 年全民“大跃进”和公社化相似的热情。这正是毛泽东空想

社会主义的普遍社会基础。当那些“五七战士”赤着脚在田头沐浴着阳光、高唱革命歌曲时，那些感受到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的面孔至今浮现在历史记忆的地平线上。

1968 年 12 月在全国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很少看到被迫的痛苦，更多的是北京火车站热气腾腾的宣誓和一列列火车上此起彼伏的欢快歌声。上千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在当时有如革命的青春洪流。

当众多知青点在农村每天早晚举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仪式，并将各种革命文艺节目贡献给“一穷二白”的农村时，当他们把农村批斗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更推动一步时，当他们插着红旗修“大寨田”时，他们颇有改天换地的高昂斗志。

总之，在 1968 年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社会、新政权的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新的“全面专政”，并没有完全挫伤整个社会跟随毛泽东潮流的积极性。

五，然而，到了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特别是到了 1972 年、1973 年，中国的局势表明，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潮流已经耗去了大部分能量。除了江青一伙仍在越来越凶猛地活动之外，社会显示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潮流的衰败。

这一时期，上上下下发生的温和化的回潮正是毛泽东预感到的最大危险。当他把李庆霖、张铁生说成是“反潮流英雄”时，等于承认对立面是一个占据主要地位的倾向。

六，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必须要对历史的潮流作出正确的感觉和反应。毛泽东是一个对历史潮流有足够的感觉能力和反应能力的卓越的政治家，然而，毛泽东又是一个有着其难以超越的局限的政治家。

当他对“修正主义”不断提出危险警告时，表明他对这个对立潮流有足够的感觉和判断。当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并且能够组织力量抗拒“修正主义”潮流时，表明他对自己所代表的潮流同样有着深刻的把握。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哪个潮流是代表明天的？

1966 年，他在致江青的那封信中所表达的判断是：即使右派政变上台，最终也只能是左派的胜利。那似乎表明，明天终将属于他所代表的潮流。

可惜，历史不会证明这个判断。

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974 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别样的一年，是色彩显得特别混乱的一年。

考察整个文化大革命历史：

1966 年是全面发动的一年；

1967 年是全面夺权、全面内战的一年；

1968 年是建立红色社会和红色政权的一年；

1969 年是召开九大、“胜利”的一年；

1970 年是维持“胜利”的一年；

1971 年是发生“九·一三事件”的一年；

1972 年是“右倾回潮”的一年；

1973 年是文化大革命低谷的一年；

而 1974 年，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进退难分、矛盾两可的一年。

正是这别样的一年，带来了后来全面整顿的 1975 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全面失败的 1976 年。

别样的 1974 年是在全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始的。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元旦献词》，指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 月 18 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江青等人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是一份将林彪的某些言论与孔孟言论对照起来的材料。如林彪写有“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的条幅，则对应有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这个材料的转发，成为中共中央 1974 年的第一号文件。它与元旦社论一起，奠定了 1974 年的政治基调。

这别样的一年，又是江青最淋漓尽致表演的一年。如果说 1974 年是江青年，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为过。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刚刚出来不久，江青从内参上看到河南省驻军的一个防化连“批林批孔”批不下去，便立刻委托迟群、谢静宜带着她的亲笔信和《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给防化连送去，推动防化连的“批林批孔”运动，借此树立“批林批孔”的典型，也树立自己指导全国运动的领导形象。

1974 年 1 月 24 日，江青又率一伙人在北京举行了在京部队单位

“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进一步发动军队内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林彪反党集团来自军队，因此，在军队里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似乎理所当然。

1 月 25 日，借着“一号文件”的开门优势，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江青在迟群、谢静宜一帮人的簇拥下，以全国“批林批孔”领袖的形象指挥一切。他们从“一号文件”也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形成过程讲起，将江青塑造为一个紧密配合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旗手。

这是江青趾高气扬的一个大会，也是江青耀武扬威的一个大会，同时又是使在场的周恩来显得极为被动和尴尬的一个大会。

1974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短评，指出，“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1974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王洪文的讲话则对这场斗争做出了更为“经典”的概括，他说：“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提法使我们看清楚了，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右倾回潮”，让文革派势力感受到了怎样的压力。经过那样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了全面的阶级斗争，实行了全面的夺权，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之后，不到几年时间，又需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见中国的“修正主义”实在是独具深厚的土壤。

在 1974 年初的两个月中，江青确实扮演了一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旗手的角色。她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以类似全党领袖的形象给四面八方的部门、地区写信，送材料。似乎她握有毛泽东一样的指示一切的权力。她给外交部、中央联络部、国务院文化组、中国科学院、四机部以及一些农村人民公社写信、送材料，推动“批林批孔”运动。

她的无限扩张的指挥欲所及范围甚至包括了军队，她给空军司令写信、送材料，给海军政委写信、送材料，给有关军区写信、送材料。在一段时间内，她似乎在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一些部队学习江青指示的报告则最终成了中共中央转发全国的文件。

这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表演阶段，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不堪入目的表演阶段。

1974 年 1 月 24 日，她以个人名义写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的信，就是一封在军内上层引起普遍反感的“代表作”。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请代我问侯全军同志们春节好！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简释》各200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20 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1974.1.24

透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江青在197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感觉。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确实把她的全部个性刻印到了文化大革命上。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在整体上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全部特征的表现，那么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人格的体现。我们接着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在更小得多的程度上还是江青个性的体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有江青的活动穿插其间。

作为江青政治野心的最鲜明注释，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在铺天盖地的“评法批儒”的文章中，有相当一些数量的文章将武则天塑造为一位历史上出色的改革派法家人物。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署名发表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法家人物简介·吕后》等，都是借吹捧武则天、吕后而为江青未来掌握最高领导权奠定舆论基础。

1974年是中国在思想理论上最荒唐的年份之一。无论从历史学的角度，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的角度，还是从实际的情理角度，这一年有关“评法批儒”的文章都显出了逻辑的大混乱。

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思想大批判运动。当将林彪“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的条幅解释为要复辟周礼，复辟奴隶制，复辟资本主义时，已经暴露出了最初的牵强附会。

显然，作为一个政治野心家，林彪对中国古代的文化采取的全部是实用主义政策。当他将“克己复礼”书赠叶群时，不过表明要用政治上的谨慎来保护自己的野心。就像在林彪的读书卡片中，也一定还有大量有关法家言论的摘录，它们同样可以服务于林彪的政治野心。当将“批林”与‘批孔”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时，不过是要将林彪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人物”归入极右保守势力之中。

林彪集团的覆灭原本是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失败，现在，反过来要通过批判林彪来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这在政治逻辑上原本就是一个错乱的大颠倒。

逻辑的错乱与理论的错乱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 1974 年布满中国各主要报刊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文章是何等地声嘶力竭。无理加倍声高。逻辑上的牵强附会表现为气势汹汹的强词夺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被杜撰为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的矛盾就是反动和进步的矛盾，守旧和改革的矛盾，分裂和统一的矛盾。在这一时期，推崇法家的封建统治者（如秦始皇这样的人物）在各方面都被吹捧得高大起来。

当他们将这些封建统治者赞颂为代表历史潮流的人物时，没有完全忘记意识形态中一贯的阶级斗争立场。为了调和理论上的矛盾，表明他们还在坚持人民的立场，在赞美这些法家统治者时，就说他们“在客观上符合了当时人民的利益”。

这种评法批儒的理论，在与实际联系企图自圆其说时，更显出了逻辑上的极为混乱。

而被文化大革命各种口号践踏了一遍的民众思想，现在更呈现出别样的状态。思想混乱中的服从与思想混乱中的抵制，在全社会表现出骚动不安的图画。正是这“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某种亚动乱。

社会确实还有未燃尽的动乱能源，还有各种未冷静下来的野心，大大小小张铁生式的人物，在拱动已稍显平稳的教育秩序。对张铁生式反潮流典型的支持，正在大、中、小学形成新一轮的“造反”活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的提法，颇能代表这个潮流中升起的口号。

在广大的经济领域，“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标语又在反潮流的舆论中逐步出现。

正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运动一样，当一个反秩序的潮流出现之后，各种对现状不满的能量便汇入其中。这一次汇入反潮流运动的能量，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矛盾与冲突。派性的斗争、内战的烟火在一些省份死灰复燃，加上各种形式的上访活动，全国许多地区和部门又开始了新的动乱。国民经济再一次出现比蛟严重的下降。

在 1974 年，毛泽东表现出的立场与江青显然有着较大的不同。

在这别样的一年中，毛泽东的态度也显出别样：一方面，他要推进“批林批孔”运动，保持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阵地；另一方面，他不希望继续天下大乱，也绝没有立刻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希望自己一生中这个最重人的行动（文化大革命）能够得到比较妥当的结果。他对江青不止一次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1974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说江青：“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他还曾跟王洪文等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这段时间的毛泽东一定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有了自己的反思。在林彪垮台之后，他也一定重新感觉了自己面对的全党和全军。他是一个永远使自己处在社会力量对比中心位置的政治家。

他一定知道，像江青这样一些极端的左派人物，绝对不能代表整个大局，因为他们积怨甚深，寡不敌众。他在这一时期对江青的批评，表明他对江青等人既要依靠、又保持某种距离的态度。他的批评既能够使江青等人稍微冷静一些，也能平息一些力量的积怨，更重要是，能够使整个上层看到毛泽东这位全党领袖的公正立场。

1974 年的毛泽东，已经是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极端行为保持了距离的毛泽东。

而 1974 年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则在毛泽东似乎还能容忍的范围内依然极端地行动着。因为他们有他们对毛泽东的理解，他们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他们也有他们对自己利益的理解。

这时候的毛泽东明显地在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和江青为首的“激进派”之间搞平衡。这其实是在一定时间内稳定大局的立场。如果说毛泽东在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上有他的偏执和努劲的话，那么，在各种实际的政治行动中，他还有因势利导的自然。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旅程越来越接近终点时，由于没有过剩的精力，更趋向稳妥的方针。

1974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是他采取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如果讲潮流，这是一个典型的顺应潮流的行动。

在 1973 年、1974 年的“批林批孔”中，江青等人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或明或暗地指向周恩来。因而，他们和邓小平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1974 年 4 月，江青等人反对邓小平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1974 年底，围绕着 1975 年将召开的四届大人的组阁问题，江青又一次表现出与周恩来、邓小平的完全对立。她所做的各种组阁活动，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训斥。11 月 12 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

迟群、谢静宜等人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立即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根据他对整个局势的判断，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1974年12月23日－27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同他们做了四次谈话。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再一次明确提出；“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在1974年12月的最后几天中，也就是在他诞辰日前后的这些天中，无疑做出了在那一时刻看来是最妥当的决策。仅仅这个决策，就表明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还有足够的清醒。

当然，这是处在他的立场上的清醒。他的决策反映了他要平衡整个政治力量的目的，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对立的两个潮流相互对抗的力量。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此时很好地平衡了矛盾的两方面。

然而，新的巨大的不平衡却由此开始了。

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崩溃过程的政治分析（1975年1月－1976年10月）

任何革命反对的都是现状。只有当反对现状的力量来自于明天新社会的萌动时，这个革命才会成为真正进步意义上的革命。如果在一场反对现状的“革命”中，只有一两面悬空的旗帜似乎在呼喊明天，而其汇入的主要力量甚至全部力量都来自昨天的历史，那么，这个“革命”虽然同样摧毁了现状，但它不过造成历史的倒退。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各疑给了我们一个解剖的典型。

一、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意义

1974年的毛泽东，已然不愿意继续“天下大乱”了。正像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希望在保证文化大革命政治成果的同时，保持全国政局的稳定。

因此，在1974年底有关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毛泽东抑制了江青的野心。这个一直难产的四届人大，曾经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引发出林彪事件。因为四届人大是一个重建国家政权的程序，它涉及到一次重大的权力再分配。

当林彪一伙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吵吵闹闹时，问题远不在于使林彪当上国家主席或者副主席，因为林彪本人身体不好，太多的国务活动未必是他本人所热衷的。然而，林彪担当国家主席或者国家副主席，必然会使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这些人的权力越出军队范围，扩展到政府领域。这无疑是非常诱人的前景。

这个诱人的前景催发出的野心膨胀，使得林彪集团更早地覆灭了。

当 1974 年再次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时，江青一伙在组阁问题上的忙碌同样因为这是他们把权力由党内、政治局内拓展到国家政府的机会。毛泽东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时，毛泽东明确地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让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这时的毛泽东目光十分犀利。对江青这一提议的整个心理背景，看得清清楚楚。毛泽东一方面仍然需要江青、张春桥等人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势头；另一方面，他绝不愿意将中国的整个权力交给这个极端而不稳妥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越来越需要启用邓小平。

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 年 1 月 8 日－10 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了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 年 1 月 13 日－1 月 18 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此后，因为周恩来病重（患癌症）住院，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邓小平这个不寻常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开始全面浮现出来。这时，世界及中国的目光才将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回顾了一下。

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从 1966 年开始就遭受批斗，随后被隔离审查。也许由于炮火更多地集中在刘少奇身上，他多少被人们所淡忘。1969 年 10 月，林彪曾发出所谓的紧急备战的"一号通令"，邓小平于 1969 年 10 月与刘少奇同期被遣送出北京。刘少奇去了河南开封，他则被送到江西软禁，在那里劳动，生活。"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于 1971 年 11 月及 1972 年 8 月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林彪的问题，并表示愿意为党再做工作。这一政治上能屈能伸、豁达自然的举动，表现出了邓小平从政的风格。

1973 年 2 月，邓小平结束了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并于 3 月 10 日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得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3 年 8 月的中共十大，他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 年 12 月，在有关八大军区调动的谈话中，他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毛泽东身边，被毛泽东当做"军师"介绍给大军区的司令员们。1975 年元旦以后，邓小平便以大权在握的实力派人物的形象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除了毛泽东这个人物最值得研究以外，另有两个人物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江青，一个是邓小平。他们都特别值得我们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扮演了一个最不"通情达理"的角色，而邓小平则表现得最"通情达

理”。将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对比，他们的路线，他们的作风，他们的人格，都形成鲜明的对比。

江青显得极端、疯狂、激进。邓小平显得稳定、坚固、求实。

江青有着一整套矫揉造作、虚假夸张、沽名钓誉的表演。邓小平的作风则显得言行一致、简练明确、磊落朴素

邓小平是我们要略做深入考察的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表现出的正常的、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中华民族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还多少可以自信的地方。包括他在江西丧失自由的劳动生活中，做工、种菜和亲自照顾残疾儿子的平常表现，都让我们感到中国人稳定如常的性格素质。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早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运动的。然而，由于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没有过多的理论色彩，不被更多的理论教条所束缚，因此，在他一生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出一种超越身边很多人的求实精神。

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理论框架，既能给人增加睿智，也能给人增加愚蠢。理论具有稳定的品格，这种品格能够保证思维的连续性，也能造成思维的僵化。理论是财富，也可能成为包袱。

邓小平显然是一位绝不让理论成为包袱的人。他在他的位置上以一种非常务实的精神，将最简单的理论化为直接的行动口号。他的这种个性曾使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获得极大的发展机会。

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理论，是此时的邓小平绝不可能公开否定的。1974 年底，毛泽东又对理论问题做了重要指示，这些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马列主义”理论，邓小平也绝对不能悖离。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能非常简捷地将毛泽东的一些口号综合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动纲领。

这就是在 1975 年经他提出的非常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第一项，是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有一大篇话，邓小平一言概之；第二项，是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的指示，这是邓小平开展“全面整顿”的尚方宝剑；第三项，是毛泽东关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自然是邓小平整顿中国的目的性口号。

1975 年邓小平一登台，就显出了排山倒海的气势。他的旗帜是“三项指示为纲”。他在这面旗帜下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四个字：“全面整顿”。他凭藉过去在党内曾经有过的威望，也凭藉他在党内的干部基础，更凭藉他一贯的雷厉风行、坚强果断、严厉干练的风格，立刻在全国局势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正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抓住具体的焦点性的题目作文章。邓小平要扭转全国的国民经济混乱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也要寻找突破口。他决定从铁路运输的整顿入手。当时国民经济全局中最薄弱的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

1975 年 2 月 15 日－3 月 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这个会议体现出了邓小平坚强的整顿方针。针对全国铁路运输中存在的组织纪律性松散、规章制度涣散、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无政府主义倾向泛滥以及各种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哄抢物资的混乱情况，做出了坚决整顿的部署。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 1975 年 9 号文件）。邓小平特别明确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

会议结束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铁道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赴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老、大、难”的路局进行了重点的整顿，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宣传落实中共中央 9 号文件，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各项政策。特别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倾向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限期改正；到期不改者，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果断的组织措施。改组和重新配备有问题的领导班子。对于个别挑动武斗、停工停产的派性头头，给予了坚决打击，以至逮捕法办。在打击过程中，又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整顿”以很大的声势先后解决了影响铁路畅通的几个“老、大、难”地区，震动了整个铁路运输系统。中共中央的 9 号文件在 1975 年 3、4 月份，成为一个影响全国生产局势的文件。全国二十个路局，除南昌外，全部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国铁路的平均日装车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铁路正点率的提高不仅使生产、也使人民的生活受益，民众普遍对铁路的整顿表现出了热烈的欢迎。铁路运输面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焕然一新，给全国各条战线以强烈的震撼。这一切，使邓小平的整顿拥有了更广大的民众基础。也给了一切深入思考文化大革命的人一个结论：那就是民众已经厌倦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厌倦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斗争。

邓小平对铁路的整顿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大概和全国范围内的这一民众情绪有关。他的整顿在 1975 年一出台，有如此锐利的开头，是因为他借助了社会中原本存在的一个“势”。

铁路之战一举成功，他又将整顿的重点移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域。

1975 年 5 月 8 日－29 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了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十一个大钢厂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资人参加的钢铁座谈会。在这个会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并将铁路整顿的经验推广到钢铁工业。在一系列强有力的部署下，仅仅经过一个月的整顿，钢铁工业的生产形势明显好转。几个欠产严重的大钢厂生产状况都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的平均日产标准。

在铁路及钢铁整顿大见成效的基础上，1975 年 7 月 20 日－8 月 4 日，邓小平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对国防工业更是采取了一杆子插到底的务求速见成效的整顿。

而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铁路、钢铁等率先整顿的经验扩展到国民经济所有部门，整个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

1975 年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曾这样概述：“3 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5、6 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

邓小平把从铁路突破形成的整顿大势迅速扩展到工业生产领域之外，教育、科技、农业及军队都全面地展开了整顿。

1975 年 6 月 24 日－7 月 15 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以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为大前提，展开了整顿军队的战略部署。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五个问题；而军队的领导班子则要解决“懒”、“散”、“软”三个问题。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军上下受到了一致欢迎。它表明在军队内也存在着与工业领域一致的形势特征，绝大部分人都渴望或者意识到需要整掉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混乱，尽快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秩序。这个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帜下开展的整顿，在本质上是一句谁也没有说穿的话：回到文化大革命前。

从军队来讲，任何一级指挥员都会以军人的眼光意识到，军队目前这种“肿”、“散”、“骄”、“奢”、“惰”的状态，完全不适应现代化国家的军队要完成的任务。且不说个人的利益如何，仅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来讲，全党、全军、全国的民众大概都知道这样的整顿是必须的。再不整顿，民族的生存就会出现危机。

全国范围内对整顿的欢迎，表明了一个全国性的共识。这种共识又和整个民众的生活现状相联系，因为混乱的交通、混乱的生产所造成的供应、生活的混乱，是直接危及每一个人的。至于文学艺术生产的荒芜，也无疑影响着民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对科技领域、教育领域的整顿，不仅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更直接地关系到这一领域的干部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

客观地说，邓小平在 1975 年的整顿，并没有今天改革意义上的任何新东西，有的只是对文化大革命前秩序的恢复。仅此一点，就使邓小平的整顿形成了一个潮流，在全国受到广泛的拥戴。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概括邓小平在整顿中的做法，其主要的方针就是六条：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各级领导班子，重建各级领导班子。

第二，打倒派性，消除混乱，建立安定团结的秩序。

第三，落实有关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的政策。

第四，整顿规章制度。在不触犯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将必要的规章制度重建起来。

第五，重视和整顿教育。

第六，重视和加强科研。

透过这些方针我们发现，邓小平的整顿之所以势如破竹，不仅是借助了全党、全军、全国民众要求恢复正常秩序的共识，借助了全国对文化大革命共有的厌倦心理；还有一些具体的阶层利益性质。

在邓小平的整顿中，第一，给了万里这样一批党的高层干部以重新强有力地回到国民经济第一线掌握权力的机会。1975 年的整顿，实际上是被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的管理国家的干部体系重返领导地位的潮流，这也正是后来江青等人把邓小平说成是“还乡团”的原因之一。

第二，整顿使得更多的干部在落实政策中得到解放。这依然是在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秩序。规章制度的重建，给了各级领导干部管理生产的更多权力。

第三，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对教育及科研的重视与加强，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整顿与落实政策，广泛地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利益。因此，干部与知识分子是受到全国大多数阶层支持的 1975 年整顿的最坚决的拥护者。

干部有着管理能力的“特权”，知识分子有着知识文化的“特权”。文化大革命剥夺了他们的“特权”，整顿又在恢复他们的“特权”。

1975 年上半年的中国还不知道，整顿意味着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于这一点，也许连毛泽东和邓小平最初也不知道。

二、1975 年“全面专政”的理论分析

毛泽东需要在保证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前提下，务实地稳定和发展形势，因此，他必然是一手放开让邓小平去整顿；另一手放开让江青等人去宣传文化大革命。

1974 年 12 月 26 日，正值毛泽东诞辰日，他在长沙接见周恩来的讲话中（周恩来与王洪文同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于 12 月 23 日－27 日四次接见周恩来与王洪文。而 12 月 26 日这一天，他安排王洪文去韶山参观，单独接见了周恩来），还特别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泽东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后来便成为逐渐传达向全国的重要声音。他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在此之前，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讲过与此相关的话:“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谈话时所做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加上了他会见丹麦首相时的讲话内容，很快成为一个在政治局和党中央传达的文本。

接着，这个声音又逐渐扩展开，1975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报》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精神。1975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则发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全部指示。

这个发到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的中央通知中指出:“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紧接着，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汇编。在“编者按”中，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这个谈话包括上面引用的毛泽东对周恩来及对丹麦首相的谈话。“编者按”最后说;“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汇编中，共选取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其中，马克思的两段语录特别有代表性，能够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最有力的理论依据。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52 年 3 月 5 日）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 年－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 1 月－11 月 1 日）

这两段语录（还有几条语录）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它的历史任务，这是这个语录汇编的第一部分内容。

第二部分内容，则讲到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因此必须对其予以限制。

第三部分内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不断地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专政要与之斗争，并铲除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

三十三条语录中有一条列宁的论述，从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摘录出来，使当时稍有理

论修养的人都感到十分警醒。这是理论界过去不曾十分注意过的一段论述："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9 月）

总之，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编者按"的形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结合在一起，在 1975 年春的中国形成了十分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

中国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革命了几十年的国家，它的社会主义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现在，当这个社会主义进行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时，毛泽东又追根寻源地公布了自己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确实有着十分强大的逻辑力量，当毛泽东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实践结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论根源上时，他的文化大革命就表现出了似乎更加严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在全党造成了巨大的理论统一力量。它使党的上层和整个知识界在理论上被笼罩，也给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以更加坚定不移的思想依据。

毛泽东一贯善于从政治思想的高度掌握全党、全军和全国。当他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自己的论述一起拿出来时，他对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论证，无疑达到了最高水平。

邓小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顿，也要以毛泽东有关理论问题的指示作为"三项指示为纲"的第一项，这表明一切务实的党内力量，也都不能对这样强大的理论思想表示异议。

毛泽东在生命临近倒数第二个年头时，还能做出如此清醒而有力的行动，来支持他的似乎难以维系的文化大革命，显示了他确实是一个天才。只不过，这个天才人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的巨大误区。

在往下的进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以他们控制的意识形态阵地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的指示发挥开来，更有力地覆盖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975 年 3 月 1 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篇文章曾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由毛泽东审阅批发。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理论任务，发挥了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他论述道：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

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当然，为了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生存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姚文元文章的必然结论。

1975 年 4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及《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发表了张春桥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的文章同姚文元的文章自然是一个理论思路，只不过似乎更“经典”一些。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绝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早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以其“马列主义的理论色彩”，充分展开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讲话，并且更将它推向极端，对现实的中国发出了“全面专政”的强有力声音。

这个声音为在思想理论上摇摇欲坠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支撑、也为张春桥、姚文元本人增加

了新的政治资本。两个人俨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稍有理论修养的干部队伍及知识分子队伍中，加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

毛泽东发动的这一轮理论宣传大势，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时，他做出的两大决定之一。这个决定如同太阳一般当空照耀，纲举目张，笼罩全国。在这个决定之下，另一个决定就是放邓小平出山，任其在铁路、钢铁等国民经济的大地上实行整顿。

这期间，邓小平的整顿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上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活动时有冲突。毛泽东对此都没有太在意。他也许相信，自己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大局。当他把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的合理性给予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最有力的论证之后，一切务实主义的操作只能使天下更为太平。

八十二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所做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证，为我们透视这个带有巨大悲剧性的伟大革命家提供了最后一份有力素材：

一，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在比较遥远的前方存在。它虽然是被私有观念占满大脑的绝大多数现代人无法想像的事情，然而，我们却要超出这个局限看到长远的未来。

正像在私有制中生活的人很难理解原始社会时期的“共产主义”一样，他们可能更加难以理解历史经过否定之否定，还有一个更高级状态的共产主义在前方等待我们。

二，然而，共产主义绝不产生于任何空想，绝不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邪恶与不合理的憎恶，绝不产生于各种性质浅薄的伦理道德理想；它产生于人类历史自身发展的机制。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当生产关系这个框架不能容纳生产力这个奔突不已的怪物时，共产主义才真正具备出现的条件。

在那个时候，人类社会的全部经济行为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行为、全部思想、文化及精神活动都不能容忍现状，又能找到取代现状的新方式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才有现实的可能性。新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已经在动摇的旧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中隐隐欲现时，向共产主义的变革才会成为现实。

三，倘若社会主义不是发生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超限度成熟的国家里，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最高目标。特别是当它处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优越于它的资本主义外部环境中，这个社会主义的全部现实生存需要和向未来发展的需要都尤其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保证。

历史并没有给这样的社会主义开据保险单。社会主义能不能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取得向未来发展的前途，惟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显示自己的优势。除此以外，任何理想主义色彩的所谓革命，都只有短期的意义，这种“革命”最终甚至会演化为畸形的保守力量。

四，这样，我们便在人类大的历史发展背景中看清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真正地位。

当他将共产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中夺取政权的革命嫁接在一起时，他忽略了历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他企图超越经济本身发展的阶段，在一个尚且“一穷二白”的国度里直接实施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

虽然他似乎也经常意识到这还需经过一个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然而，他把这个过渡阶段想得太简短了。当他于 1957 年及 1958 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已经表现出一次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共产主义空想。

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更是他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大暴露。当他企图在这个历史阶段限制和取消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时，当他把这个历史阶段必须借助的经济政策当做革命的对象时，他完全违背了这个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

这个社会并没有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也并没有提供明天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因此，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代表明天与今天斗争，而恰恰是代表昨天与今天斗争。它所借助的革命力量，正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倾向，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以及与此相关的绝对的领袖崇拜，和突破各种禁忌而实行毁坏一切秩序的野蛮狂欢。

任何革命反对的都是现状。只有当反对现状的力量来自于明天新社会的萌动时，这个革命才会成为真正进步意义上的革命。如果在一场反对现状的“革命”中，只有一两面悬空的旗帜似乎在呼喊明天，而其汇入的主要力量甚至全部力量都来自昨天的历史，那么，这个“革命”虽然同样摧毁了现状，但它不过造成历史的倒退。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解剖的典型。

五，毛泽东本身的革命理想主义，常常蒙蔽了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实质的透视。要认识文化大革命，就要认识毛泽东。而认识毛泽东，就要认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依靠了什么样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林彪、叶群集团，接着又看到了江青、张春桥集团。我们只要考察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思想及行为，就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这些“革命力量”的性质。

他们是真正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与国家不过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招牌。他们实际上是企图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将全体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剥削阶级。

在他们的统治下，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不仅将受到一般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还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乃至人身自由。他们将不仅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且还要远离按劳分配，陷入超强政治全面专政下的奴隶地位。

1975 年，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九个年头时，毛泽东对它的解释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对它的透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反击右顺翻案风”运动的形成过程

文化大革命被 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一分为二：前五年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后五年则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九一三”之后的中国社会生活，最主要的矛盾就体现在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上。

这种斗争发展到 1975 年，进入了特别关键的一年。毛泽东认为自己还能够很好地把握全局，他在平衡地运用邓小平和江青这样两支不同的力量。用邓小平来整顿全国局势，用江青来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想优势。这两支力量也便围绕着毛泽东展开了他们的斗争。

江青一伙总是借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行动。这一次，他们运用了毛泽东反对经验主义的指示。

姚文元在 1975 年 3 月 1 日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论述道：“1959 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同一天，已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4 月 4 日，江青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也重复了同样的声音：“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他们的精神变成了覆盖全国的报刊舆论。3 月 21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又一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语录，然后论述道：“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在 3 月及 4 月两个月中，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造成了新一轮政治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声势。姚文元还布置新华社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讲：“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为了排除这一思想政治舆论对全国整顿造成的压力，邓小平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经验主义的做法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表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毛泽东无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在 4 月 23 日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他还特别有针对性地发出批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975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做了严厉批评，指出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中“三箭齐发”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

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他当众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全局在手的从容心态说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当邓小平一派和江青一派围着他争论是非、听取裁判时，他觉得事情并不大。江青们是听从他的指挥，冲锋陷阵搞文化大革命的，做事不合规矩，批评他们一下不会影响他们的忠诚。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倒，是自己亲自把他解放出来，一次次提议对他委以重任，他现在一鼓作气地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应该给他一点支持。毛泽东此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邓小平的势头会形成对他的威胁，当然也不曾想到邓小平的“整顿”能够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威胁。

领袖的裁判是从容的。而对于邓小平、江青等人来说，则是一个再重大不过的事情。

5 月 27 日及 6 月 3 日，邓小平依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两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对“四人帮”进行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都讲了话。关于“反对经验主义”一事，以及江青等人宣扬的“批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事，还有在“批林批孔”中又加入“批走后门”一事（这曾被毛泽东批评为“三箭齐发”，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指出，江青等人“批林批孔”加上“批走后门”，干扰了“批林批孔”大方向），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不得不做出检讨。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这两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这标志着在这一轮斗争中，邓小平获得优势。他便仗恃毛泽东的支持，更有力地展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整顿”。

在 6、7、8 三个月中，“全面整顿”的势头推动着全国局势的发展。不仅国民经济发生明显好转，军队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科技、教育、文艺等文化领域也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围绕着影片《创业》的不同评价，成为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

影片《创业》公映后，得到了普遍好评，但却受到“四人帮”多方指责，严重压制。《创业》的编剧张天民于 7 月 18 日写信申诉，托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于 7 月 25 日对来信做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件事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在 7、8、9 三个月中，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引起全国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别样表现之一，就是被“四人帮”后来说成“谣言四起”的社会民间舆论。

当时，社会流传著有关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迟群、谢静宜等人的各种政治上病态、作风上腐化、行为上丑恶的故事。包括江青、迟群、谢静宜等人关系如何不正常；迟群在四届人大没有当上教育部长之后，如何精神失常，烧掉两床被子，破口大骂谢静宜；谢静宜又如何跪在迟群面前哀求，等等。总之，有关“四人帮”一伙的政治残忍及生活糜烂的丑闻在 1975 年夏天漫布全国。

在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统治下，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小道消息与传闻常常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态与潮流。“四人帮”在刮遍全国的“谣言”风中，虽然有敏感的嗅觉，却无从下手。

在政治上，他们依然要借助毛泽东的声音做出大的行动。在姚文元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发动评《水浒》的运动。毛泽东有关《水浒》的言论，早在 1973 年底就被姚文元抓住。正是在姚文元等人的推动下，毛泽东意识到，这确实是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又一篇好文章。

1975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在同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讲述了他对《水浒》的主要评价：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第二天，当姚文元从芦荻那里闻知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中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书‘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了开展评《水浒》运动的一系列具体建议。

毛泽东批准了姚文元的建议。中共中央随即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评《水浒》运动，就由此发端。

1975 年 8 月 28 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揭开了大规模评论《水浒》的舆论序幕。随后，从 1975 年 9 月开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评《水浒》的文章，其中贯穿的一个主要声音是：评《水浒》是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许》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内容，它的根本意义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在 5、6 两个月中受挫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在评《水浒》运动中再一次浮出海面。8 月下旬，江青召集其亲信于会泳、浩亮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

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就在全国各阶层都在以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经验猜测这一轮评《水浒》的舆论矛头指向时，真正应该对此敏感的邓小平却似乎不大介意。1975 年 9、10 月间，他在一次部分省市委书记会上说道：“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看来，邓小平知道江青等人此举有意图，但他或许以为如此牵强附会地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演化为现实的政治斗争不一定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图，也不一定会奏效。他还是乘着自己整顿的势头做事情。

在朦胧的意识中，邓小平可能也不排除这里有什么险恶，所以，他在这个时期反复讲要“敢”字当头，“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远不问亲”，他知道，他不像江青一伙有那么多接近毛泽东的机会，他只能在期望毛泽东能有正确明断的状态中继续做自己的事。

这个不擅阴谋的人，注定要在充满阴谋的时代再一次遭到厄运。他绝对没有看清楚、或者也不愿意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已何等危险。他与江青一伙的斗争是围绕着毛泽东这个权力中心进行的。而 1975 年夏季之后的毛泽东，已然是一个年迈衰老、疾病缠身、不可能更多地召集政治局会议的领袖了。形势自然向著有利于江青一伙的方向倾斜。

1975 年 9 月，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连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这个与“四人帮”持同样政治观点的毛远新，在 9 月底到 10 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里，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意图十分明确的情况汇报。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这些汇报对年迈的毛泽东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绝不能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一个不可更改的政治原则。而毛远新的情况汇报又并非无中生有，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在各条战线上表现出来的变化，确实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实质，迟早要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发生冲突。这种必然性在 1975 年的秋天以毛远新的汇报为“偶然性”实现了。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等人开会，传达他的意见。毛远新照办了。邓小平却表示不理解：“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 9 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

根据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做出了尽可能妥当的布置，他希望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政治局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没有权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来讲，这样的拒绝不失委婉。然而，正是这个拒绝表现出的不满和抵制，

使得中央政治局要停止他的工作，而毛泽东则做出了让他从此“专管外事”的决定。

邓小平立刻失去了主持党政军工作的权力，这也意味着失去了“全面整顿”的权力。这个曾经在 1971 年、1972 年复出前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一贯能屈能伸、不乏权变的政治家，这一次却显得毫不乖巧，甚至有些意气用事。然而，正是这种理直气壮的行为，注释了一个政治家的质朴。也正是这种质朴，造成了他“第二次被打倒”的厄运，当然，也成就了其后不久更光荣地复出。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病榻上的毛泽东终于认识到邓小平的整顿意味着什么了。全国各地区、各领域发生的情况已经表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正受到“全面整顿”的全面冲击。毛泽东决定再发动一场新的批判运动，矫正中国的潮流。

这对于毛泽东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无论他本人对邓小平的复出有过什么提议和赞誉，也无论邓小平在复出之后形成了什么样的威信和资本，毛泽东都能够以简练而有力的动作解决这个问题。这已是他一生中最后要解决的不多的问题之一了。他照例又抓住了一个典型。

1975 年 8 月 13 日和 10 月 13 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曾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报告迟群和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的。毛泽东借此批示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 月 3 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信件的批示。这个批示率先在清华大学引发了遮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在此过程中，首先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11 月 18 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批判刘冰及支持刘冰的教育部长周荣鑫。

12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署名“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于 12 月 4 日全文转载。在毛泽东的批示下，“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了。

1975 年 11 月下旬，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干部一白三十多人。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信件的批示，并且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975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又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了《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同时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他们在常委中传达、学习和讨论。这样，《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便进一步扩大了范围。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代总理，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并由陈锡联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明显调整。用华

国锋取代邓小平原本可能占有的位置，以及对叶剑英的排斥，是毛泽东决心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组织措施。周恩来的追悼会，仍由邓小平致悼词，这表明“批邓”还远未到公开化的程度。然而，往下的步子似乎加快了。

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全体群众。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召集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新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1976年1月间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几次谈话的汇集。

在这份《重要指示》中，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在这个《重要指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还谈到，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传达的只是毛泽东关于清华大学刘冰信件的批示。那里，邓小平不过是犯了偏袒刘冰的错误。而在这个《重要指示》中，对邓小平的批判，性质已然十分严重了。

当一些与会者思想不通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要求大家在“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新的文件，做出新的部署，将《毛主席重要指示》一层层扩展下去，一直传达到全党。

在此过程中，江青等人在各种场合发表批判邓小平的讲话，全国主要报刊则发表了数量极多

的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邓小平在 1975 年的“全面整顿”被定性为“全面翻案”；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则是“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

1976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把批判的矛头不点名地直接指向邓小平。还说：“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社论号召全国“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对刘冰等四人的来信批示开始，经过几个月的逐层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了。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又为捍卫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做了一件事。

四、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历史启示

历史发展到 1975 年底、1976 年初时，社会上大多数阶层对文化大革命的厌倦及不满情绪已经到了相当普遍与强烈的程度，“反击右倾翻案风”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巨大的不满累积甚久，存蓄太多，已经形成很大的社会势能。被压抑着的巨大势能潜伏在整个社会中，一遇时机，就会表现出极大的反弹力，随时都可能表现为一个影响社会进程的运动。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势能形成运动，都有其自我组织、自我形成的过程。这种历史的自我组织、自我形成有时表现为具体的社会领导力量的自觉组织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形成过程就是毛泽东用他的权力发动了社会上积蓄的某些势能，巨大的势能造成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运动。

现在，反文化大革命的势能在失去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组织与领导之后，以完全自发的状态存在于社会之中。在毛泽东这个领袖因素仍旧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任何人可能出来成为全社会反文化大革命势能的组织者。

然而，历史本身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条件进行组织，它可以在没有成形的领导集团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运动来。从本质上讲，所有的革命运动最初都是由历史这样组织起来的。在历史组织运动的过程中，不仅为运动带来普遍的群众属性，也为运动带来逐渐形成的领导核心。有领导核心自觉发动的运动，与没有领导核心自发形成的运动，同是社会组织势能形成运动的方式。

这一次，历史自身存在的巨大的反文化大革命的势能，通过一个巨大的“偶然性事件’，将其逐渐组成为一个运动。这个“偶然性事件”就是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逝世。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1 月 9 日，中共中央、人人常委会、国务院发出讣告，立刻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哀悼与悲痛。这个哀悼与悲痛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反文化大革命色彩。因为人们怀念周恩来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人品，更主要的是他所代表的与“四人帮”相对立的务实主义路线。

1 月 10 日－11 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在一片沉痛中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1 月 11 日下午十六点

四十五分，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从长安街到八宝山的几十里长街上，一个十分壮观的场面自发形成：首都近百万群众顶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周恩来灵车经过的道路两旁，默哀送灵。

这是一个令全社会各派力量都为之瞩目的动态。十里长街百万群众的自发聚集是一个沉默的社会政治宣言，各派政治力量的敏感人物都感到了这里的含义和分量。

1 月 12 日－1 月 14 日，北京各界群众代表四万多人又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1976 年 1 月 15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除了党政军上层领导，还有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参加。1 月 16 日，遵照周恩来生前的遗言，将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一个人的逝世，原本是有关这个人最大的一件事情。周恩来的逝世，自然是有关周恩来的最大的事情。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四人帮”对立的保护干部、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经济的象征，周恩来的逝世无疑又成为全国大多数阶层人们心目中一件最大的事情。在广泛的社会利益基础上，全社会表现出了对周恩来的深重哀悼。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当然会强烈感受到全国民众对周恩来哀悼情绪的巨大压力，也一定知道这种哀悼情绪后面所含有的政治内容。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权力，在宣传舆论上极力淡化周恩来逝世的影响。

在 1 月 15 日追悼大会以前的七天中，仅仅发表了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除了这两条不得不发的消息之外，对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一个字。在这些天的报纸上，充斥版面的依然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和报道，似乎周恩来的逝世只是一个不被国人注意的事情。

1 月 14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开篇第一句就宣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四人帮”将他们的寡头政治强加给全国民众的极端专制手段，它立刻激起了全国范围内不可遏制的愤怒。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在许多地方被撕得粉碎。

1 月 16 日，追悼大会结束了，对于周恩来逝世的不得不报的消息似乎都完成了。姚文元指示：“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在全国范围内，他们开展了更为强有力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运动。

在这种背景下，2、3 月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也出现了将矛头指向“四人帮”的政治口号。3 月 25 日，在武汉市就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这种反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社会势能，逐渐被对周恩来逝世的哀悼活动组织为一个全国性的潮流和运动。

如果说周恩来的逝世为这个潮流和运动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偶然性机会，那么，在整个潮流和运动形成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具体的“偶然性事件”。

1976 年 3 月 5 日，《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的一篇纪念、学习雷锋的新闻通稿时，将周恩来

对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去。对照其他报纸的读者自然发现了这个删除。1976 年 3 月 25 日，《文汇报》发表的《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中竟然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更大愤怒。

这句话中，“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自然是指邓小平，而党内那个走资派”显然就是指周恩来了。来自全国的抗议信、电话和电报包围了《文汇报》，在一片“谁反对周总理，绝没有好下场”的愤怒声讨中，要求《文汇报》“向全国人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文汇报》的“偶然事件”自然有其必然性，它是江青一伙控制最直接的报刊之一。这个有着必然性的“偶然事件”又激发了全国哀悼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从 3 月 24 日开始，南京市逐渐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活动。

3 月 29 日，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3 月 29 日下午，南京大学近四百名学生分成二十多个小组在全市大街小巷和开往浙江、安徽等地的长途汽车上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标语，引起全市一片呼应。将矛头指向“四人帮”的大标语遍布南京城。当天晚上，南京大学学生又将“警惕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标语刷到经南京发往全国各地的火车车厢上。

这就是所谓的“南京事件”。这个事件在随后的一两天中，演变为遍布南京市、辐射全中国的政治事件。

4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做出紧急应对。当天就向各地发出电话通知，指出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巨大的反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势能，在被对周恩来的哀悼活动组织起来之后，有着特别强劲的发展势头。“南京事件”虽然被暂时抑制了一下，全市的大标语也被撕毁或覆盖，有关“南京事件”的中共中央的通知成为全国各省市领导必须执行的指示，然而，整个哀悼、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平息下来。

周恩来的逝世，确实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巨大的事件，它本身成为了 1976 年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

第一，周恩来的逝世激发了人们对他的强烈怀念情绪。由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特表现和象征，对他的怀念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完全的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因此，对周恩来的一切怀念、纪念和悼念，都自然成为引发、发动和组织反文化大革命社会势能的旗帜。

第二，周恩来又是一个至死还在党内保留着合法领导权的人物，现政权也不得不为之隆重追悼，并降半旗志哀。正是死者的这种“合法性”，使得全国民众的悼念也同时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使得全社会各阶层能够以哀悼为旗帜更好地集结力量，也使得“四人帮”这些握有最高权力的人很难从一开始就采取赤裸裸的镇压方式。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江青一伙对立的形象，成为了全社会反文化大革命势能的政治旗帜。而周恩来生前一直保留的合法地位，则成为全社会反文化大革命势能得以行动的最好策略。

第三，对死者的悼念原本是人类社会在义理上占有巨大优势的事情。当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部不满以对周恩来这个“合法的”党的副主席、国家总理的悼念形式表现出来时，尤其在全社会具备了最大的合理性。正值清明节即将来临，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纪念先人的节日，与周恩来的逝世相隔仅三个月的时间，这个不长不短的距离恰恰给了哀悼周恩来、组织全社会反文化大革命的势能必要而充分的准备。

正是在哀悼周恩来的旗帜下，全社会反文化大革命的力量与情绪，得以最广泛、最合理和最公开地表现和发展起来。周恩来的逝世，清明节的存在，在 1976 年的中国非常出色地将全社会潜伏的反文化大革命势能引发了出来，并且组织成一个运动。

悼念周恩来是这个运动的旗帜。这是在 1976 年的中国最能团结大多数的旗帜，因而也是最有力的旗帜。同时，它又是江青一伙最不便于直接镇压的旗帜，所以，它又是一个最策略的旗帜。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个完全自发的群众运动，就这样被发动和组织了。

任何潜伏的巨大社会势能，总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反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社会势能，就是在悼念周恩来这样的“合法的”、“符合情理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它表现得十分坚决，又十分策略，它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集结了方方面面的力量，使得对立的文革派势力一时难以镇压。

全国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集中体现在北京。

1976 年 3 月 19 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了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3 月 23 日，安徽省濉溪县的张学林专程赶到北京，又向纪念碑献了一个花圈。花圈很快被收掉了，而且作为“阶级斗争动向”引起“四人帮”系统的注意。

3 月 25 日清晨，北京市第五十八中学的学生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敬献了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随后不久，又有一幅来自工厂的三米长的横匾摆放在第五十八中学的花圈旁边：“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想念您”十三个金色大字标语，在天安门广场亮出了一道耀眼的金色。

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几天之内，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迅速增多。到 4 月 1 日，成千上万个花圈在纪念碑周围布成了花的海洋。在悼念周恩来的挽联及标语中，出现了越来越显露的政治口号。

4 月 1 日，山西青年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短诗，一时间成为传抄全国的政治檄文。4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一〇九厂的部分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矗立起四块大型木牌，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类似的标语、口号及传单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山人海中鼓动着反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各种各样的讲演此起彼伏。

1976 年 4 月 4 日，这一天是清明节，又是星期天，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有二百万人次以上。这一天特别引人注目的动态有二，一是送花圈最多的单位都是“右倾翻案风问题严重的单位，”

如七机部、科学院以及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二是很多工厂的工人结队而来。曙光电机厂三千多名职工组成一里多长的八路纵队，以周恩来遗像为先导，随着收录机里播放的哀乐进入天安门广场。类似的很多支工人队伍的出现，表明了对周恩来的哀悼活动已经以各种组织的方式出现。

清明节这天二百万人次以上的活动中，绝大多数以哀悼周恩来作为自己的口号。在这个大底盘上，还有为数相当的直接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声音。

对周恩来的哀悼，以温和的方式团结、号召和吸引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使得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潜在不满有了普及性的表现。而那些直接攻击江青、张春桥的尖锐政治声音，虽然发自少部分人之口，却无疑是在哀悼周恩来的大多数的普及基础上提高起来的；他们领导着这个大多数，影响着这个大多数，成为着大多数的先锋。这也是类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通常有的结构。

当一个社会潮流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时，没有人数众多的普及性的一面，也便没有人数较少的先锋性的一面；没有先锋性的一面，也便没有普及性一面的继续扩大。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合成一个运动的数量与质量。

客观地说，正是那些直接进攻“四人帮”的政治声音，代表了数百万人悼念活动的真正性质。这一点，掌握权力的人们自然看得十分清楚。4 月 4 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认定它“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并做出在北京镇压天安门事件，在全国揭露敌人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的决定。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4 月 5 日凌晨 1－2 时，政权所组织的力量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花圈收缴一空。4 月 5 日白天，当数十万群众再次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时，和封锁纪念碑及广场的军队、警察及民兵队伍发生愈演愈烈的冲突。军人、警察及民兵体现着政权的意志，执行着对天安门广场的层层封锁；而数十万群众则冲击封锁线，将新的花圈送上纪念碑，同时面对成千上万的花圈被洗劫一空的场面悲愤地高呼“还我花圈”。冲突中，群众遭到镇压，“还我花圈”的口号上又增加了“还我战友”的口号。

在此过程中，虽然出现过群众准备与军队、警察、民兵三联合的指挥部谈判的情节，然而，终因“三联合指挥部”拒绝谈判而激起了群众更为强烈的愤怒。在群情激愤的冲突中，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了三联指挥部的若干车辆，放火焚烧了三联指挥部所在地的小灰楼。天安门的群众运动表现出了某种暴力革命的性质。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已为数不多，在最最高领导层的布置下，出动了一万多名工人民兵和三千多名武装干警及五个营的军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用木棒和警棍实行了镇压，殴打并驱散了在场群众。逮捕了三十八人，清除了 4 月 5 日又送来的全部花圈，在天安门广场实行戒严。

1976 年 4 月 7 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后，指示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的报道和吴德 4 月 5 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据此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

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第二个决议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这两个《决议》。4 月 9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两个决议。

天安门事件作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被镇压了。这个群众自发形成的“四五运动”虽然和邓小平本人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然而无疑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有直接的思想联系。因此，打掉邓小平，是毛泽东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必然措施。

毛泽东曾经用打掉刘少奇来深化文化大革命，用打掉“杨、余、傅”来击退“二月逆流”，用打掉“王、关、戚”来抑制“左”的倾向，用打掉陈伯达来解决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篡党夺权活动。现在，他必须打掉邓小平，才能够平息全国范围内的反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潮流。

全国的“反革命潮流”似乎被镇压下去了。当他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表明他想把未来的政权交给一个此时看来能够被党的高层领导普遍接受的人物。华国锋既不属邓小平的势力，也不属江青“四人帮”的势力，他是忠诚于毛泽东本人和被毛泽东提拔上来的中庸干部。中庸之道原本是孔孟之大道，一贯反对孔孟之道的毛泽东在此时却不得不采取了这个在他眼里最为妥当的中庸之道。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已是一个行为、言语都不便的老人。当他听完毛远新汇报天安门事件之后，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时，似乎表明他那被重病缠绕的身躯还没有影响大脑的思维，天安门“四五事件”似乎给了他又一次粉碎反文化大革命势力的好机会。

这一次，他无疑又胜利了。

然而，如果他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百万民众悼念周恩来的场面，他应该知道，这是历史第二次向他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五、历史的剧变

1976 年是中国发生剧变的一年。这不仅从社会的动态中看出了征兆，大自然也露出了征兆。古人所谓“天象示警”，在这一年似乎被验证了。

1976 年 3 月 8 日，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降落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15 时 1 分 59 秒，一颗陨星在吉林市金珠乡上空发生爆炸。陨星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大量碎小的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大屯乡李家村和永吉县江密峰乡一带；而最大的三块陨石

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偏南方向飞行，先后落在吉林市郊区九站乡三台子村、孤店子乡大荒地村和永吉县桦皮厂乡靠山村，最后一块陨石在 15 时 2 分 36 秒坠地时，穿破 1.7 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 6.5 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 3 米、直径 2 米多的大坑，坠地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陨石雨降落的过程中，可观察到火球，并伴随爆裂的巨响。至 4 月 22 日，收集到陨石一百多块，总重量为 2600 公斤。其中最小的重量在 0.5 公斤以下，有三块重量分别超过 100 公斤的陨石，最大的一块陨石重量为 1770 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陨石重量（1078 公斤）。

毛泽东看到这篇新华社通讯之后，颇受触动，沉思良久。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话时讲到了“人天感应”，讲到了人事发生巨大的变化常常通过天象预示出来。他这种不无忧虑、又不乏调侃的说法，表明他对中国的命运以及自己的命运有某种隐约的预感。

天安门“四五事件”虽然过去了，但它无疑给了毛泽东沉重的打击，也给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沉重的打击。当江青一伙兴高采烈地高举酒杯庆祝胜利时，孤寂中的毛泽东注定是心事重重的。他一向对历史的演变有着很好的感觉，此刻，他对未来的发展一定有着独特的冥想。

天安门“四五事件”之后，毛泽东的生命更衰弱了，多种疾病严重地侵扰了他的身体。而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也到了其生命力的最后阶段，显出了越来越深重的衰败。江青一伙还在那里忘乎所以地开展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的视野中根本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天幕已经越来越黯淡。而 1976 年的毛泽东，则不可避免地经常想到自己身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生征战，他一定满怀沧桑和感慨。

在他病情更加沉重时，他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及王海容等人，对他们做了带有遗嘱意味的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段讲话对于我们透视毛泽东的人格、透视他心灵深处的人生观是特别重要的。他将自己 1949 年以前所有的作为归于他人生做的第一件大事，而将文化大革命归为他人生做的第二件大事，也就是说，1949 年夺权以来的所有作为，在他眼里真正有意义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们只要沿着毛泽东的思路想一下，就能看清楚，他从 1949 年以来的全部革命实践确实可归结为文化大革命。

1949 年夺取政权之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他而言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过渡时期，而且，有苏联的模式作为先例。当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表现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空想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当然地失败了。作为这个失败的结果，也作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惩罚，就有了 1960 年以后的经济困难时期，也有了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的“资本主义复辟”。而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推动对社会上“资本主义”和“党内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指挥下，一口气搞到 1976 年这第十个年头。

当毛泽东将自己 1949 年以来的全部作为归结为文化大革命一件事时，我们尤其看清楚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全貌。

1976 年 7 月 6 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这对从井冈山时期就与之共同创业的毛泽东一定也有某种深入生命的触动。无论他怎样推论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那种生命的直接感觉又会告诉他另外一些事情：周恩来逝世了，朱德逝世了，他自己的生命也到了最后的时刻。有关吉林的陨石雨报道多次在他的意识中浮现出来，特别是当陨星爆炸后，除了散落五百平方公里的陨石碎块之外，其中有三块 100 公斤以上的大陨石，最大的那块 1770 公斤。他不能不对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后自己生命的即将结束做出预想。

1976 年 7 月 28 日，中国唐山地区发生了几百年来罕见的大地震，波及天津、北京、辽宁、山西、山东、河南、内蒙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死亡人数二十四万以上，七十余万人受伤。当人们把毛泽东转移出屋外时，他基本上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唐山大地震的惨重损失，使毛泽东又受到了一次直接落在生命深处的打击。从那以后，这位伟大革命家的生命进入了风烛残年的状态。

江青、张春桥等人利用毛泽东这种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挟天子以令诸侯，更为变本加厉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的全部行径注释了最典型的政治近视。利益造成行为的动力，利益也造成了视野的局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个政治势力似乎毫无现实的判断，他们虽然也谈“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然而，他们全部带有疯狂意味的政治操作，都显出了他们在自己政治生命最后阶段的利令智昏。

他们绝对没有真正看清楚一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天下，现在全凭毛泽东个人的权威支撑着。历史在这里向我们说明，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一个多么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他的权力，他的力量，他的影响，是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势能。只要毛泽东一息尚存，他的存在就以巨大的威势罩在中国上空。倘若毛泽东再健康地活过二十年，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重写。

然而，毛泽东的生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生命就这样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了一起。当文化大革命临近崩溃时，也是毛泽东的生命临近结束之时。历史有时候会因为一个重要人物的去世而发生改变；一个伟大人物也常常因为历史的遗弃而结束生命。

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命题都是真理。

倘若文化大革命不是像 1971 年以来那样屡遭挫折，日渐衰败，毛泽东的心理乃至生理也不会受到那样大的打击，他可能会更长寿一些；反之，如果毛泽东能够再长寿一些，文化大革命又可能更延长其生命。

伟大的历史人物真是和历史联结在了一起。

历史不再需要他了，他对历史也不必再负有责任了。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最不可忽略的人物毛泽东与世长辞了。

往下不到一个月的历史，是再简单不过的。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个长期超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革命”势力，对失去毛泽东的中国局势缺乏最起码的清醒判断。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夺取政权、建立他们的统治时，当他们通知上海这些根据地准备庆祝特大胜利的鞭炮锣鼓时，10 月 6 日，他们的政治生命以非常简捷的方式宣告终结。

这一天，他们被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解决掉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迟群、谢静宜、毛远新等人相继被捕。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一天，彻底结束了。

这是历史第三次向毛泽东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而这一次，毛泽东只能在天国听到这个宣告了。

第十四章 历史的余音

人必须白天做事，夜晚做梦。

人类必须有现实的一面，也有梦幻的一面。

允许梦幻的存在，又坚定地保护现实的发展，这或许就是我们全部的理性。

一、历史的极端暴露

历史早就翻过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页。历史随即也很快翻过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一页（“几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近三十年的改革已使我们较远地离开了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之后，回顾的目光尤其显得比较清醒。

历史的任何一个片断，只有将它放在较长的历史背景中观察，才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今天，经过这样的回顾，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这段极端的历史片断，应该是洞若观火了。作为对那段历史的总结，也作为对未来的一点思索，我们还有一些话要讲，这或许是那一段历史的余音。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要革商品经济的命，是把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各种表现及其根源作为革命对象并与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本质被文化大革命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遮掩着，但又透过这些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显露出来。这是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逻辑。

文化大革命为了完成其巨大的“革命任务”，打倒巨大的敌人，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力

量。正是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利益及社会潮流都汇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或者一时的动力。

如果对这些力量再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那么，有以下方面：

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包括似乎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

正像毛泽东在 1976 年还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来支持自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那样，这是他发动和推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凭藉力量之一。

二，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继续在所有制领域内实行全面占领的集中化倾向。

这是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很容易形成的一个强烈倾向。毛泽东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含着这个主要的内容。

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动员经济、大搞群众运动的愤性。

这个惯性浩浩荡荡地进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就曾有过极端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

四，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这既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潮，也是党内相当一些人的思潮。既是共产党内的思潮，又是社会性的思潮。在中国这个小农经济有着长久深厚影响的国度，广大民众、包括其知识分子都特别容易形成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潜宗教的意义。

五，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表现，或者还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相关联力量，中国社会存在着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潮。

这种平均主义也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它与商品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不平均现象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一种强大的反经济力量及社会保守力量。这种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显出了巨大的“革命性”。

六，作为平均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则是对知识、文化“特权”的恐惧、抵制与仇视。

它不仅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也在共产党内广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还是“破四旧”，还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教育、科技、文艺界的“革命”，还是“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充分表现出对知识、文化“特权”的矛头指向。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还是小农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七，对经济管理“特权”的敌视与反对。

这既是对富有管理权力与管理经验的干部阶层的反对，也是对他们所依据的一整套规章制度的反对，总起来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的反对在这里，林彪、江青这样一批“职业政治家”的“革命性”与民众中存在的反对管理系统权威的自发倾向集合在一起，成为巨大的文化大革命力量。

八，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存在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政治特权的民主倾向。

这种合理倾向与绝对的反对任何管理权威的不合理倾向是相互接壤的，它们之间原本有一条并不完全固定的界限，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冲破了这条界限。合理的民主倾向与不合理的反经济管理的倾向，混淆成一个混沌而巨大的潮流。

九，与反管理权威的倾向相联系的，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这也是小农经济历史长久、小生产者思潮成汪洋大海的国家里一种普遍的思想潮流。当文化大革命将一切秩序的限制打破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成为了一个四面奔突、冲决各种社会结构堤坝的庞大力量。

十，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理想主义”。

这是一种伦理化的社会思潮，是从伦理的、道德的、审美的角度来判断社会和设计社会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着。它同样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这种伦理化的政治、社会思潮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常常直接地汇入了空想社会主义之中。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带有狂热性质的革命理想的来源。

十一，是对领袖的极端个人崇拜。

这种绝对的领袖崇拜，既来源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来源于几千年的对父权、君权的无限尊崇，也来源于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所必须的高度集中的指挥权力结构的惯性，特别来源于在所有制领域内实行全面占领的集中化倾向。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领袖崇拜的巨大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领袖崇拜。

十二，与领袖崇拜直接相关联的，还有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

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很自然地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政治结合在一起。在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度，任何对商品经济进行全面革命的政治力量，必然更多地求助于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了十分充分的表现。

十三，林彪集团、江青“四人帮”这些专事意识形态斗争、政治斗争的官僚阶层，与代表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家管理阶层的对立与斗争。

林彪集团及江青“四人帮”集团始终将把握着国家、社会主要管理权的干部阶层当做自己权力扩张的障碍与对象。林彪集团与江青“四人帮”集团的权力要求，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之一。没有这个基础，毛泽东无从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正是直接利用了这些力量，才得以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林彪集团、江青“四人帮”集团直接注释著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十四，在群众及青年中，也存在着比较普遍的政治野心，像聂元梓、蒯大富、张铁生这些革命造反派，就是这种“一步登天”的政治野心的代表人物。

这种政治野心是在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伦理政治理想主义等社会思潮中哺育出来的，也是毛泽东、江青等人诱发、培育出来的。它是上述多种潮流的产物，同时它自身也成为一个潮流。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来自民众的政治野心，成为林彪、江青势力的社会基础，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基础。

十五，青年中的反秩序、反教育倾向，是近代历史中任何体制的国家都可能存在的普遍倾向；与此相关联的还有青年的青春期冲动，这更是一个普遍的存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及整个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青年中存在的这种倾向和冲动。

十六，文化大革命在不同的时期还借用过其他一些力量。

曾经借用过“血统论”的力量，后来又借用过“反血统论”的力量。这种借用虽然更多地表现为权宜之计（文化大革命对很多力量的借用，都有着某种权宜之计的性质），然而，它是整个社会进入充分发动的“大革命”状态之后，必然出现的现象。

十七，文化大革命还借用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心理变态，无论是“迫害狂”倾向，还是“自虐狂”倾向，或者是其他的心理变态。

在正常社会状态下压抑的这些心理能量，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得以释放与发泄。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商品经济的势力太强大了，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极端性质的放手发动群众。这个极端性质的放手发动，造成了上述“革命力量”突破了原有的社会限制，充分地发展开来。这些力量的极端解放，也便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极端的性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秩序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文化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经济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管理权威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残酷整人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表演政治暴发戏剧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表现迫害狂等人性恶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领袖崇拜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平均特权又制造特权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又极端贪婪邪恶的运动。

这个极端的文化大革命，表现了各种极端，塑造了各种极端，也暴露了各种极端。当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有了极端的暴露之后，整个社会便无比清楚地暴露在我们面前。

二、留给中国与世界的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它本身的失败。正是它的失败，破解出了中国的改革文明进程，同时也引起了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更深远的思索。这些思索联系今天的现实，具有十分直接的意义：

一，对于任何一个以改变现状为口号的“革命”，我们都不应该只看到冠冕堂皇的口号和思想纲领。

正像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什么一样。对于一场“革命”、一次运动或一个潮流，同样不仅要看它说了什么，还要看它做了什么？要看它依靠了、启用了什么社会力量？打倒了什么对象？实际上完成了什么经济、政治任务？企图改变和改变了什么经济、政治关系？

对于一个复杂的社会运动，尤其要进行这样的分析。

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近三十年的改革使得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中遭到重创的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及根源，都被很大程度地改革掉了。社会从管理阶层到整个民众，包括知识分子，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理解和接受了商品经济必然有其发展阶段的历史事实。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近三十年中，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具有实质意义的进展。这种改革不仅改变了经济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然而，这个过程远没有进行到底。

在目前的中国，还存在着某些与商品经济发展对立的因素。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贫富差别、知识的“特权”及管理阶层的“特权”，民众中有着某种不平衡心理与对立情绪。对所有制的改革，社会中也存在着反对的倾向。经济本身集约化发展的规律造成的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上越来越大的差异，也在引起新的不平衡心理。

这一切因素都构成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保守主义倾向。

与这种保守主义倾向容易发生关联的，是整个民众中存在的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合理要求。这种合理要求与抵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保守主义倾向有界限，又相互接壤。这里，界限常常是模糊的，接壤则连成一片。当它们混淆成一个社会潮流时，就形成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压力，并引发出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程度上运用这个潮流的压力造成廉政的外部环境是必要的；在这个潮流的压力下发展经济，“唯效率”考虑的同时兼顾整个社会的心理平衡及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险是必要的；同时，谨防这种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潮流超越限度，成为对经济正常发展具有破坏性的汹涌力量更是必要的。

经济发展的“唯效率至上”原则与整个社会的某种平衡状态的保持，无疑是需要兼顾的两个方面。这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面临的一个问题。要真正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不再具备产生的根源，还需要一段时间。

三，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一个代表作。

不仅是毛泽东，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个性汇入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无疑是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分析了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就分析了中华民族，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在对毛泽东的分析中，除了我们已做的有关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路线的、历史的分析之外，我们还需更丰富地看到毛泽东的其他方面，包括他浪漫诗人的一面，包括他思维方式的特点，包括他从年轻时代就不喜欢数理化等方面。

毛泽东与马克思是不一样的革命家。

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欧洲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德国的古典哲学传统给了他透彻与严谨的哲学思维。对数学的爱好，特别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使他更看清人类历史发展的铁的规律。至于法国的空想主义，给了他形成自己思想的一个别开生面的启示，但并没有影响他站在极为唯物的、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上考虑问题。

毛泽东则是典型的农民占大多数人口的国家的革命领袖。他的革命思想连同他的整个思维特点、个性气质，都打上了中国特有的烙印。他的浪漫诗人气质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十分地和谐。

正是毛泽东这种巨大的“人文精神”，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这也是我们透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并由此得出新的历史思索的重要方面。

四，随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的进行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人文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下降了。

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在所有的大学、在出版界乃至在整个社会都显出被冷落来。

这是一个经济热的时代。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这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不仅物质生产领域在市场化，精神产品生产也在很大程度地市场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示出了非常世俗的而且是冷酷无情的力量。

与此同时，“不要忘记人文精神”的口号在中国思想上空出现。

虽然，这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同样的东西，虽然，这似乎是一面崇高的旗帜，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启示让我们思考这面旗帜下汇集的潮流。

我们看到了这个潮流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是商品经济急剧发展的时代发出的变相的回归口号，是保守主义社会倾向的伦理学及美学的升华反映，也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降低不满的声音。

另一方面，就带有“后现代主义”（这或许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的意义。如果说保守主义倾向的伦理、道德及精神反应是站在昨天来批评现状，那么，后现代主义也可能是站在明天来批评现状。

对后者，我们要有深刻的审视，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昨天的立场是用明天的声音发表出来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怪圈。

人文精神的口号是最崇高的，也是最美好的，然而也不可忘记，“五·七指示”的蓝图曾经也是崇高的，美好的。历史并不能超越它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对待人文精神的态度无疑也要由两方面构成：

一方面，运用它的压力，对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进程提供一个道德的平衡力，这个平衡力有助于在追逐效率的同时保持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状态。

另一方面，我们也谨防这种人文精神溢出它的合理范围，成为某种意识形态性质的力量。任何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理论，都有可能成为破坏商品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骚扰因素。

五，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对于现代化的批评，在任何国度都可能来自昨天和明天。而来自昨天和明天的批评有时又有内在的联系，它们的一致性表现在对现代化进程本身的否定。

这是人类社会中非常本质的一个现象。

人类在自身的文化及文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对文化及文明发展进程的推崇，这是一个主流；另一方面，又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对文化及文明发展的潮流，如中国的老子提倡“返朴归真”，西方的卢梭也提出类似“返朴归真”的文化主张。

卢梭与启蒙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不一样，他对文化提出了独有的“批评。他的批评把那些“有文化的”（发达的）民族的腐化堕落、道德败坏与处于宗法制度发展阶段的民族的“风尚”的质朴性与纯洁性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所谓“文化”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比。他认为启蒙学者们所赞誉的“文化”与“文明”根本不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理想结果。

这与老子的“返朴归真”异曲同工。

人类文化及文明的发展，一方面在征服世界，获得更大的自由权，一方面被世界征服，造成更大的不自由；一方面在改造环境，使之更美好，一方面又在破坏环境，使之日趋恶化；一方面使人类生活及健康水平日益提高，一方面又使人类越来越异化。整个文化及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在越来越多地统治物质世界，又在越来越多地被物质世界统治。

发展的潮流与反对发展的潮流在整个人类文化及文明史上都存在。这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两个方面。任何发展阶段的损失、代价、弊病、畸形的错位与不平衡的社会心理，都可能成为反对文化发展的声音的基础。

人类永远不可能排除老子的声音，卢梭的声音。而且永远也不需要排除老子的声音，卢梭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存在对于人类完整的理性思索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人类冷静的理性行为也是必要的。

要运用老子及卢梭声音的压力保持对人类每一文明发展阶段的别样的思维角度，注意在发展过程中照顾人类社会的和谐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同时又不使老子及卢梭的声音越出它的合理范围，成为保守主义的禁锢。

六，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无疑要注意保证自己现代化的进程。在这方面，要准备付出代价，整个民族要有一个心理承受的过程。

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必然要形成与之相关联的某些差别和不平等，甚至也形成某些社会邪恶。在这里，任何道德的、伦理的判断只能作为一个平衡力量在合理的限度内保持，而绝不能使之成为破坏经济发展自然进程的社会紊流。

不仅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这样启示我们。整个人类近代史的经验都这样启示我们。

在这里，我们不妨谈一谈经济学领域内出现过的两种倾向，它们都曾被马克思评价过。

一种，以西斯蒙第为代表，他是用道德伦理的评价与思维代替了经济学范围的科学分析。他认为那些唯生产力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是忘记了人。他主张，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的幸福。因此，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从小生产者的伦理道德观点作出的伤感主义的批评。

这和卢梭讲的人类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人类道德堕落是一个思路。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人文精神的呼吁也是一个潮流。列宁曾经将西斯蒙第和俄国民粹派的经济学观点通称为“经济浪漫主义”。这种“经济浪漫主义”其实也和毛泽东具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经济学中，与西斯蒙第相对立的另一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大卫·李嘉图。他认为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最高目的，因为人的发展最终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

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李嘉图：“他要求为生产而生产，并且这种要求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一样，主张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外是指人类天性的财富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如果我们像西斯蒙第一样把个人幸福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必须压制全体的发展，以保证个人的幸福，且不说这种充满热情的考察不会有任何实效，他也没有理解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首先要以多数个人和整个阶级作为牺牲，但最后终究会克服这一对抗，而与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剩余价值学说史》）

马克思的话无疑引发我们的深思。在这里，马克思是真正的“唯生产力论”。

这个“唯生产力论”的马克思，同时又是一个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

实际上，这二者并不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为我们理解马克思这段话提供了一个特别有益的素材。

任何看来崇高的、美好的、理想的纲领和蓝图，都不能使人类社会超越其本来的发展阶段性。历史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空中飞路。

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我们就知道，任何伦理道德的理想主义，倘若强加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上面，将何其荒谬。这些伦理道德的评价可以翱翔在空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观望景象，也可以成为平衡人类心理的精神照耀；然而，却绝不可轻易落在现实的大地上，那样，美好的天国就可能变成罪恶的地狱。

我们要有坚实的、坚定的现实主义。我们准备承受一个看来并不浪漫甚至是很平庸的、枯燥的、漫长的发展时期。我们将有足够的胸怀与思想空间，来容纳各种道德伦理的理想主义精神。我们允许它们在那里翱翔而且美丽，同时限制它们从空中轻易落到地上。这或许就是我们真正的历史主义。

一个小生产成汪洋大海的中国，一个小农经济弥漫了几千年的中国，有着什么样的浪漫主义的伤感，我们是有足够估计的。我们期望这些浪漫主义、伤感主义的精神在黑夜里演变成梦的故事，在白日里演变成梦的艺术。当纷纷繁繁、美丽动人的故事在批判物欲横流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时，当人类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真善美及人文精神被毁灭的动人故事时，

历史按部就班地发展着。

人必须白天做事，夜晚做梦。

人类必须有现实的一面，也有梦幻的一面。

允许梦幻的存在，又坚定地保护现实的发展，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全部理性。

七，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人类都应该有巨大的启示。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准宗教现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是对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蓝图的膜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尤其可以观看整个世界。

近代世界史，特别是现代世界史，一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有可对比性的政治、宗教性社会大动乱（或者说大“革命”），其实都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现实保守力量同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大“革命”、大动乱，一方面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正是它的发生与失败，消耗了传统与保守的力量，随后便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环境。

人类社会总是充满着这样或那样极端的、偏执的社会现象，它们在一个时期内表现得非常强大，但终归会被慢慢变革掉。

人类社会终归是向“合情合理”发展的。

在这里，经济的力量让我们感到欣慰。

而各种伦理的、宗教的、偏执的理想主义，也是人类历史存在的一个方面。它们起码在这一个千年中还不会消失。经济的现实力量与宗教的、伦理的、偏执的理想主义相辅相成，构成着人类社会的完整图景。

我们希望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翱翔在高高的天空（它们有理由停留在那里乃至给我们指引），但是不要轻易落在现实的大地上。这或许是我们在若干年内还将不断看到的悲喜剧。

八，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夜晚的梦再美好，不可将梦的思维变为现实行为的逻辑；理想王国的东西再好，也不可轻易强加在现实的社会之上。有些最理想的、最崇高的、最极致的东西，却有可能同时是最残酷、最丑恶的东西。

只要将梦幻的思维强加在现实的行为中，这个现象就发生了。

一切“革命”，都在反对今天，反对现状。一切反潮流，也都在反对今天，反对现状。当明天与昨天一起站起来反对今天时，人类的理性应该善于做出区别。当今天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的状态时，我们就用明天来取代它；当今天正在生机勃勃进行时，我们只允许反对的潮流构成一个适度的压力，而不允许其溢出。

这种压力是一种照耀，是一种平衡，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梦想，是一种欣赏，是一种心理空

间，它可以帮助我们容纳现实中容纳不下的太稠密的矛盾。然而，我们绝不轻易用它来取代现实。

任何反对现实的声音，都有助于我们认清现实。而认清现实之后，我们则要更彻底地尊重现实。我们的全部智慧，就表现在对现实最为全面、最为长远、最为透彻的洞察。

不管有多少憧憬、理想、浪漫、伤感、真善美、梦幻、艺术，我们都要踏着现实的道路前进。一切理想、浪漫、梦幻与艺术，给了我们遐想的空间，但却不要扭曲我们现实的步伐。

1998 年 11 月—2005 年 12 月于北京

后记

本书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经济发展的“至高无上”，强调了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批判了任何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空想，批判了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包括这种倾向的所谓崇高的、美好的伦理道德理想主义表现。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反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保守主义的大反动。正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中，我们对扼杀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批判都十分地强烈，对各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改头换面的表现也必定十分警觉。

然而，真理从来不是绝对的，真理表现在适当的尺度。当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所典型代表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有了透彻的剖析和批判之后，我们无疑可以用一个比较健全的眼光看待当代社会发展的全貌。

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在中国当代社会表现出方方面面的活力。它的发展以其特有的竞争的力量创造着经济奇迹，也创造着贫富差别。一方面，我们绝不可调动中国传统观念中“不患贫、患不均”的习惯势力做再一次保守主义的表演，干扰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在鼓励自由竞争的同时，又永远要注重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发展。它不仅体现为理想主义的道义，而且体现为相关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的产生，与其说与传统的道义观念有关，不如说是现代社会发展本身的需要。

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经济的高度发展一方面在制造着巨大的贫富差别，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国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悬殊的两极分化。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制造差别，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人追求富裕的同等的竞赛机会。

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贫富差别造成的巨大社会思想势能之外，我们还会看到另外几个具有很大思想势能的社会要求，例如：对于惩治贪污腐败的要求，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对于社会秩序与安全感的要求，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对于均等接受教育的要求，等等。

这些要求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有时也会表现为与保守主义倾向接壤，因为将腐败、将环境破坏、将治安水平的恶化、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归因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再容易不过的。

然而，今天永远处在昨天和明天之间。现代化永远处在昨天和明天的批评之间。在警觉并剔

除了各种保守主义倾向之后，我们却要知道，惩治腐败，加强社会安全感，发展民主法制，保护环境，普及教育，这是一个真正重视自身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所必须考虑并做好的事情。

这里，没有简单化的一劳永逸，只有不断适时地调整中实现的行之有效的全面兼顾。

对于传统文化，同样没有简单化的、绝对化的一了百了——或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或简单地一分为二；有的是真正适度地、因势利导地取舍与抑扬。

对于一个民族真正有害的传统文化，听凭其被现代经济的发展所解构；甚至可以投以催化剂，加速这种解构。而对于一个民族甚至对于整个人类有益的传统文化，则应该保护乃至发扬光大。

这些课题都应该进行专门的研究，以寻得真正符合社会发展的认识。

最后，我们就要讲到人文精神。

只要我们对隐藏在人文精神口号下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有足够的警觉和批判，那么，人文精神大概是我们理性的、健康发展的现代社会所必须的，甚至是珍贵的。

倘若人文精神表现在批判封建主义，批判政治特权，批判官僚腐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残余，它的合理性、进步性与革命性是不容置疑的，那是和商品经济在现阶段的发展合拍的。人文精神还可能表现在共同富裕、追求民主、保护环境等方面，它在社会中的合理位置也是简单明了的。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一个已经现代化或正在现代化的国家中，人文精神的最主要表现，常常是批判金钱的罪恶，也就是批判商品经济的罪恶，批判金钱世界对人性的扭曲，批判金钱的万能，批判一切都可出卖的绝对商品化倾向，批判金钱世界的人的异化，批判物质世界对人的压迫，批判金钱残酷扼杀人的真性情，批判金钱造成的畸形的不平等，批判金钱造成的人对人的压迫，批判金钱带来的一切社会腐败，批判金钱带来的尔虞我诈与凶残，批判金钱使得人间的一切情感都成为商品。

而这种批判的性质又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回归于传统文化，因为对传统文化被解构的抵触：有的与人文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相关，或者与整个人文科学地位下降相关；有的根源于社会同情，具有对社会低位阶层的民众的关怀；有的源于反官僚、反特权的政治倾向；有的是对金钱统治一切的反抗，对物质世界中人的异化的反抗；有的只限于批判聚敛金钱的非正当手段；有的则批判金钱本身，发出的是对整个现代人被异化的反抗呼声。

在这里，我们绝不可将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唯效率论”、“唯生产力论”简单地移植到精神领域，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将人们白天做事的行为规则移植到夜晚的睡梦之中。任何人文精神的呼声，无论是文学的、艺术的，还是伦理的、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只要它不意识形态化，不变为破坏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保守主义社会潮流，我们说，这样的人文精神永远是人类所需要的。

人类一方面需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充分运用金钱的力量；另一方面，人类也需要不断地批

判商品经济，批判金钱的力量。作为文学艺术的存在，作为理想、信仰或者宗教的存在，人文精神无疑是永远不可扼杀的。它不仅为我们今天经济发展至上的现代化社会提供一种必不可少的平衡力量，保证整个社会人格的健全，对于人类的未来，也有着预想不到的重大意义。就像今天的一部艺术作品，有可能超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成为未来人类珍贵的财富。

柯云路

2006 年 12 月 北京

写在出版之前

一，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本书得以在海外出版，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本书充分顾及了中国大陆的语境。书中“商品经济，，一词，运用宽泛，在某些地方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类或许更为恰当。在涉及政治经济学分析时，本书也单纯地凭藉了马克思的理论，这无疑很方便。其实，现代经济学其他许多流派，譬如制度经济学等，在分析历史时也是不错的方法论。本书在分析历史时还特别用了作者在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所得（参看《人类时间》改革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二，本书在分析中国文化大革命全过程时，力求每一重大环节都能经得住推敲。

文化大革命是超大型的历史事件，对它解剖好比对一个复杂案件的侦破一样，倘若有一个重要环节的推理牵强附会，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导致错误的结论。

对一段充满苦难与罪恶的历史停留于想当然的谴责，有时却可能与其殊途同归。

对文革各种各样想当然的道义批判委实太多了：将文革仅仅归为毛泽东个人的原因，是再肤浅不过的；把它“仅仅”归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也近乎什么都没说；即使再“深刻”一步，“笼统”归于制度的原因，还是一种理论上的想当然；至于把文革说成人性恶的大泛滥，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学语言了，人性从来有善恶，何以如此多的恶一下喷发，总有缘由。

文革是一段历史，必须历史地梳理剖析才有完整结论。

文革是文革前全部中国历史（包括对外关系史）的必然延续。

就像文革后的中国改革是文革的必然后果一样。

就历史而言，正像黑格尔说的，小原因从来没有大结果。

三，历史地评价历史，具体到毛泽东本人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同样如是。任何简单化的评判，都有悖于历史。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在当时的全部处境决定的，也是他所代表的社会潮流及大小传统决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在整个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决定的，当然，也是毛泽东个

人的思想、人格决定的。一个人决定做一件重大的事情总有多种因素，倘若缺一个因素，譬如没有文革前那种特定的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毛泽东都可能不那样地发动那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对历史事件原因的探究，全面才能深刻，深刻必然全面。

四，文化大革命确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它的失败。正是文化大革命及其失败，“耗尽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保守力量，最终导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殊有意义的改革。透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保守力量，也就透视了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大小传统。剖析文化大革命，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近代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迟滞，为什么落后。

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的中国社会结构令我们找到了解析中国近代史的钥匙。

五，正像本书已经写到的，剖析文化大革命，还让我们找到了透视全世界范围内近、现代史上类似的政治与宗教大动乱的钥匙。

那里都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这种冲突常常演变为极为残酷的社会斗争。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磨合不是件和风细雨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规模最大，斗争最深刻，暴露又最充分，剖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认识世界近、现代史不无补益。

六，剖析文化大革命还为我们透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找到了钥匙。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各种社会矛盾、社会潮流的冲突，都可以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找到认识之路。

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我们也可以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找到基本的分析方法。

现代化进程有自己的规律，有其既定的国际背景；而一切传统，无论是几千年的大传统还是几十年的小传统，都在和它冲突磨合；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利益，又十分具体地布置在这一基本冲突中。只有透过各种各样的言辞与口号，剖析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与态度，梳理清楚它们关系的变化与不断重组，我们才能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

谁若想当然地简单化地给出一个结论，谁就可能犯错误。

七，说到人类未来，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也一定会为我们提供一点启示。

因为科技的经济的发展永远会和传统文化相冲突。

对于传统文化中生出的每一种理论与社会政策，都必须历史地给出评价。就好像运用武器，

当你处在遭遇歹徒威逼的正当防卫的情境中，就是合理的。当你离开这个情境，就是不合理的。

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理论与社会措施，放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大多缺乏合理性。譬如，文化大革命中所凭藉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潮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无疑是保守和反动的；然而，倘若现在提倡一点相对的平均，却可能是真理。又譬如，文化大革命中极端的反对知识的特权，无疑是阻碍历史进步的；而如果到了今天或者明天，适度批判过分的知识特权，却可能是必要的。

一切在于历史条件。

一切在于度。

这里的是非曲直我们都该有长远眼光与思想准备。

八，关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分析并不是本书的任务。文化大革命借助的传统文化在本书行文中都有十分具体的指定，诸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帝王崇拜，不患贫患不均，等等。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总会在与当代社会发展的磨合中合理地保留下来。

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2006 年 1 月于北京

部分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1976 年 12 月

《红旗》，1958 年 6 月 1 日－1976 年 10 月

《文汇报》，1965 年 1 月－1976 年 10 月

《解放日报》，1965 年 1 月－1976 年 10 月

《毛泽东选集》1－5 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4 月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 年 7 月

《共和国史记》，陈东林、杜蒲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编，新华出版社，1982 年 6 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 9 月

《“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

《历史在这里沉思》1－6卷，周明主编，华夏出版社，1986年8月

《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

《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共和国档案——影响新中国历史进程的100篇文章》，江山主编，团结出版社，1996年9月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李剑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3月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著，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李锐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

《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韩泰华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6月

《红墙纪事》，李健编著，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11月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政法实录》，严书翰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8月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文化实录》，张湛彬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8月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经济实录》，王瑞璞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8月

《毛泽东》，（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章组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

《毛泽东传》，（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美）约翰·布赖尔·斯塔尔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红编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许全兴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月

《晚年毛泽东》，萧延中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1月

《晚年毛泽东1953－1957》，陈明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

《历史巨人毛泽东》，高树等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 1 月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李玉秀、鲁谆主编，武汉出版社，1994 年 8 月

《说不尽的毛泽东》，张素华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年 5 月

《倾听毛泽东》，吴晓梅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世纪伟人毛泽东》，蒋建农主编，红旗出版社，1996 年 9 月

《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年 11 月

《权延赤文集》，权延赤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 月

《毛泽东轶事》，张玉凤等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年 2 月

《邓小平》（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著，阚思静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 5 月

《邓小平传》，（英）理查德·伊文思著，武市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 1 月

《中国出了个邓小平》，邓自力主编，新华出版社，1998 年 6 月

《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8 月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 6 月

《邓小平与 20 世纪政治人物》，陈继安·刘金田编著，北京出版社、团结出版社，1996 年 11 月

《邓小平与毛泽东》，余洪城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同雨福禄居；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抗争》，徐彬编著，1998 年 9 月

《历史巨人刘少奇》，何光国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 9 月

《渴望真话：刘少奇在 1961》，张步真著，珠海出版社，1998 年 9 月

《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吴东华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9 月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黄峥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四清运动”的历史疑点与谜团》，刘源、何家楝著，载于《中华儿女》杂志，1998 年 11 期总 102 期

《周恩来传》，（英）迪克·威尔逊著，中央党校出版社，萨夏等译，1989 年 4 月

《周恩来生平》，南山南哲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6 月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 1 月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安建设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周恩来总理生涯》，熊华源等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 月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张佐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杜易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 1 月

《将帅在逆境中》，董保存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8 月

《杨余傅事件真相》，董保存著，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 12 月

《林彪沉浮录》，（荷）雅普·冯·吉内肯著，曾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 10 月

《毛家湾纪实》，张云生著，春秋出版社，1988 年 7 月

《江青正传》，（美）罗斯·特里尔著，张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 12 月

《江青全传》，（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8 月

《叶永烈自选集》，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1996 年 5 月

《文革中的我》，于光远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 4 月

《牛棚杂忆》，季羡林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 4 月

《思痛录》，韦君宜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年 5 月

《极端的年代》，（英）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3 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 5 月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 年 4 月

《资本论》，马克思著，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

发行人：何频

责任编辑：张芸

封面设：一划

校对：林小贵

出版：明镜出版社

网址：www.mirrorbooks.com

电子邮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讯地址：P.O.Box 366，Carle Place，NY11514-0366，U.S.A

电话：（516）338-6976 传真：（516）338-6982

国际统一书号：ISBN 1-932138-50-1

定价：HK$110

版次：2007年3月第一版